

根脉与魂脉的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路径

罗 鸿

(淮南联合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展开的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既有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基因密码,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根脉”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其“魂脉”创造性融合而成。其生成遵循着理念相通、思维互补的理论逻辑与主体自觉、实践创新的实践逻辑,通过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三个层面构成的稳定结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文化标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发展,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需要在理论阐释、物质基础、教育融入、实践转化和国际传播等方面构建系统化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根脉;魂脉;生成逻辑;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001-07

Integration of Roots and Soul: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Developmental Pathway of the Cultural DNA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UO Hong

(School of Marxism, Huainan Union University, Huainan, 232038, Anhui)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creative practical endeavor undertake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embodies both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zation and distinctive Chinese features, containing profound cultural genetic codes. It is formed through the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China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s its “roots” and Marxist scientific theory as its “soul”. Its generation follow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shared concepts and complementary thinking,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Through a stable structure composed of value concepts, modes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al norms, it becomes a unique cultural identifier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DNA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an provide profound cultural support for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atic pathway in some areas such a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material foundations,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DNA; roots; soul; generative logic; developmental pathway

现代化属于全球性的历史趋势,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西方化”话语叙事。西方现代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其弊端也日益凸显:资本主导

一切,个人主义膨胀,物欲横流、两极分化、霸权横行、社会动荡,推崇人类中心主义诱发生态危机。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中国给

收稿日期:2025-12-22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21A0916);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23szzjy017)。

作者简介:罗鸿(1966—),男,安徽六安人,副教授,硕士。E-mail:ahhnlh66@163.com

出了响亮的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

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发展道路,更是一种蕴含着新文明逻辑的历史性创造。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质,关键在于剖析其内在的“文化基因”。如同生物体的特质由其基因决定,一种文明形态的核心特征与发展方向,也由其内在的、稳定的文化密码与价值排序所塑造。“文化基因”来源于“meme”一词,也译作“模因”。它是由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最初提出来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如曲调、观念、谚语、服装样式等,通过模仿在人类大脑间传播,实现自我复制^[2]。当今文化基因一般用来指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涉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思维方式或价值观的总和^[3]。文化基因存在于各种文化共同体的内部,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决定着文化系统的本性和发展方向。

中华民族以其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与百余年的现代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因图谱。这种文化基因浸润着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文化密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形成,不是源于单一文化传统的线性传承,而是由其“根脉”与“魂脉”创造性地融合而成。所谓“根脉”,是指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纵深与文化母体;所谓“魂脉”,是指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它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本质与科学方法。二者的融合,不是“体用之争”^①下的机械拼凑,而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融合”主体的推动下,于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实践中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现有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内涵、特征方面,形成了文化逻辑进路和文明形态比较进路。臧峰宇、李文堂、王一彪等学者从文化逻辑的角度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递进关系,提出“两个结合”,反对“以洋为尊”的文化迷思^[4],阐发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

型^[5],实现了文化基因内涵式发展^[6]。孙正聿、项久雨等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资本文明—帝国文明—民本文明”三元框架中讨论其超越性,指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秉承“包容性”“和平性”文化基因^[7],坚持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的冲突”与对抗^[8];但其所持的“公平正义”观不同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原则^[9],前者植根于中华文明“民为邦本”的文化基因,以人民为中心;后者基于社会契约论,以个人为中心^[10]。但上述研究均未深入剖析“根脉—魂脉”融合的具体生成机制,也未构建文化基因落地的系统化路径。本文立足这一视角,聚焦文化基因的“生成逻辑—结构图谱—发展路径”展开分析,以期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逻辑的理解,同时为扎实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提供学理支撑。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11]。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呈现出与西方现代化迥异的文明底色,源于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积淀,是始终如一且不断革新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浸润和塑造所致。

1.1 “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塑造

在历史的延续脉络中,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其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历经了数千年的风雨洗礼,经历了冲突、战争以及民族大融合等诸多历程,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炎黄部落借助部落联盟的形式,一方面产生了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也就是国家;另一方面也开启了部落之间的融合进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虽然战争频繁,然而民族之间的交流依然十分活跃,处于一个借助战争来促进交融的特殊历史阶段。最终秦始皇完成了兼并六国的大业,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至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初步形成。自秦朝以后,封建王朝不断更替变换,但是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总体上仍然保持着持续推进的态

势。西汉武帝时期开辟了丝绸之路,加强了汉族同西域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出现了五胡乱华的灾难,但是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推动了人口的迁徙以及民族的融合。从唐末五代一直到辽宋夏金以及元朝多民族国家政权的建立,由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变得更加成熟、稳定。这种经过数千年锤炼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政治与社会基础,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单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有着十分突出的不同。西方现代化走的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路径,欧洲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认同长期处于撕裂状态,如巴尔干半岛就因民族矛盾战乱不断。而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成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现代化格局,彰显出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根脉优势。“科举制”通过统一选才标准,促进了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与人才流动;明清“改土归流”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中央与边疆的联系,巩固了“多元一体”格局。

1.2 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润

在文明主体性层面,悠久的历史传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发展至今,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基于共同文化认同形成的民族精神内核。从先秦时期“轴心时代”思想精神的勃发,到秦代“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共同体,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主流思想,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道德伦理与社会理想等方面都得到鲜明有力的塑造。这种厚重的文化基础,直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性文化,并孕育出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一是民本与共同富裕的伦理渊源,源自儒家的“民本”思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2]的圣人之德,以及治理者为民而治、为利而谋的民生观念、情怀等,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了坚实的伦理基础与价值指引。近年来,浙江安吉余村秉持“民为邦本”传统民本思想,借“千万工程”关停矿山、转型生态文旅,联动脱贫攻坚培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与民生双赢^[13]。其二是源于传统的文化根源、物质精神协调共生的辩证智慧。“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民本思想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有着深刻的认知,并将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大本。这种强调二者辩证统一的思想传统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物质主义膨胀模式的根本标识。其三是来自先秦道家的天人合一与生态和谐思想。道家“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②的哲学智慧,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与生态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路,坚定选择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提供了古老而深邃的智慧源泉。2016年,我国提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政策,得到沿江各省市的积极响应及认真贯彻执行。十年来,这一政策推动长江经济带发生深刻变革,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成为引领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示范区域^[14],充分体现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实践价值。其四是融入民族历史血脉的和合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和平,“和为贵”“协和万邦”的理念深入人心。诸子百家普遍反对不义之战,珍视和平安定。这种根深蒂固的和平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选择一条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扩张的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上常伴随的殖民掠夺与战争扩张形成鲜明对照。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印度尼西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境内的雅万高铁就是由中国提供技术帮助建成的首条高铁。这不仅极大缩短了时空距离,还带动了其就业增收,实现了互联互通,彰显出“共商共建共享、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15]。

2 中国式现代化的“魂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与本质规定

中国式现代化诞生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现代化浪潮之中,其本质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魂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和根本的政治方向,使其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弊病,并以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方式推进现代化进程。

2.1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6]“两个行”的根本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它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辩证唯物主义既唯物又辩证地揭示了世界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如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的方法等,从而避免了

陷入“现代化=西方化”的误区。其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科学理论使中国人能够跳出“历史循环论”的窠臼,深刻揭示了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在于它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精神旗帜。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屡次失败(从改良主义到自由主义的各种尝试)证明,缺乏科学理论指引的现代化必然会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相应实现了飞跃。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还在于它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干事创业精气神足,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强,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人间奇迹。”^[17]

2.2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实践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

首先,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曾深刻地揭露,资本有无限增殖的本性,这使得人的异化现象产生(劳动沦为人们谋生的手段),社会也出现了撕裂的状况(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并存),同时导致了生态劫掠(自然沦为了纯粹被剥削的对象)。而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实践智慧在于,要驾驭资本而非臣服于资本,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来规范资本的行为,以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约束资本的破坏性,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有效规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桎梏社会化生产”这一固有的矛盾。例如,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范平台经济无序扩张、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约束资本的逐利性,实现了“驾驭资本而非臣服于资本”的实践探索。

其次,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阶段性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性。我们党历来重视实践,勇于实践,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与传统“民本”思想结合,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改革开放后,将“经世致用”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结合,催生了“实事求是”的改革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形态,其根本方向是通往共产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生产关系,以精神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中,为未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创造必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通过“两个结合”实现了双重目标:一是激活传统根脉,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二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范式,超越资本中心逻辑,为人类文明提供新选择。

3 “根脉”与“魂脉”的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8]此论断说明“第二个结合”的实质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即深厚的历史根基,与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即科学的理论导向展开了创造性交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生成。

3.1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生成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生成,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现代化探索的艰辛历程,体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探索,最终走向自主创新的文化自觉过程。它的生成不是简单的文化嫁接,而是在历史实践中完成的从“相互契合”到“化学反应”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其内蕴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3.1.1 理论逻辑:理念相通与思维互补

“根脉”与“魂脉”的融合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基础,体现在价值理念层面的相通与思维方式层面的互补。理念层面的相通性体现在多方面。一是共产主义理想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构想: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价值目标上高度契合。二是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契

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重视人民地位和作用方面相互贯通。三是实践观点与“经世致用”^③的学术精神: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首要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理念在强调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方面相互呼应。四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成己成物”的道德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成己成物”的人格养成观念在关注人的发展方面相互印证。五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生态伦理方面相互契合。

思维方式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和性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维、逻辑推演与中华文化的整体思维、直觉感悟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中华文化对传统智慧的守正创新相互强化。尽管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存在一定的“价值张力”,但总体而言,二者在“人民立场”“实践导向”“生态关怀”等核心层面的相通性,从而为融合提供了基础;而思维方式的互补性,则让融合成为“1+1>2”的创造性转化^[19]。

上述理念层面的相通性和思维方式方面的互补性,使“根脉”与“魂脉”的融合不仅具有了可能性,更具有了必然性。

3.1.2 实践逻辑:主体自觉与实践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生成,离不开主体自觉和创新驱动。主体自觉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成为“根脉”与“魂脉”融合的坚强领导力量。具体体现为:一是思想引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承担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创新者、马克思主义的坚守者与发展者的双重使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两个结合”,强调“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必由之路抛弃了,那我们就是自断魂脉、自毁根脉”^[18]。二是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文化基因的核心要素嵌入国家治理各领域各环节,使文化基因从理论形态转化为制度形态和实践形态,获得了稳定的传承与发展载体。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生成的。无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始终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实践检验对各种文化元素进行筛选、改造和提升,保留那些具有当代价值和生命力的文化元素,淘汰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元素,并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实现文化基因的现代转型和品质升华。

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与传统“民本”思想结合,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改革开放后,将“经世致用”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结合,催生了“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3.2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图谱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一结构通过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三个层面得以表征,每个层面都体现了“根脉”与“魂脉”的深度融合。

3.2.1 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序列

价值理念层是文化基因的核心,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观:将“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排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架构;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执政基础。“民为邦本”思想与人民主体的结合是最为核心的要义。二是和谐共生的发展观: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如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路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这一发展观是对西方现代化导致生态危机的发展模式的否定,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自觉。三是“天下情怀”的文明观:将“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传统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愿景。如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选择;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的积极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的自觉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凝练推广。这一文明观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支撑。

3.2.2 思维方式:中国式现代化思维特征

思维方式层是文化基因的方法论基础,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维特征,主要包括:一是实事求是

是、求真务实的思维方法:将传统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调整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一思维方法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形成注重实效、讲求实绩的实践导向,形成反对空谈阔论、提倡实干兴邦的良好氛围。二是守正创新的思维方法:将“恪守正道”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结合,形成了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它体现在:坚持基本原理与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尊重历史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保持文化定力与推动文明创新相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与深化改革开放相统一。三是辩证思维方法:将传统的“中庸”思维和“整体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结合,形成了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方法,强调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强调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思维方式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避免极端化和片面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政府市场社会、国内国际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注重各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推进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3.2.3 行为准则: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品格

行为准则层是文化基因的外在表现,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式,主要包括:一是独立自主的行为准则:将传统的“自强不息”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原则相结合,形成了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实践品格。这一行为准则使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二是艰苦奋斗的行为准则:将传统的“勤俭节约”美德与马克思主义艰苦奋斗精神相结合,形成了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的实践要求。这一行为准则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奢侈浪费、资源透支的发展模式。三是开放包容的行为准则:将传统的“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开放包容品格相结合,形成虚心学习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实践态度。这一行为准则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以开阔的胸襟和宽广的视野博采众长,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4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发展路径

“根脉”与“魂脉”的融合,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基因已然生成,但这只是初步的实然状况。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我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去探索一条能系统深入地推进文化基因发展的路径,使其成为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4.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筑牢文化基因发展的政治基石

推进“根脉”与“魂脉”的融合,促进文化基因的发展,要求领导主体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两者融合的核心力量和政治保证,必须始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和文化的领导权。为此,首先,要增强这种“融合”的自觉性,深刻认识到这种融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8]。其次,要把握融合发展的方向性。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前者试图用“根脉”取代“魂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后者试图用“西学”解构“魂脉”与“根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确保“融合”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前进。

4.2 促进高质量的发展:厚植文化基因发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0]“根脉”与“魂脉”的深度融合离不开坚实的现代化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推动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型,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物质生活条件,为“根脉”和“魂脉”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实的物质根基。

4.3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夯实文化基因的理论表达基础

促进文化基因的发展,需要对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片土壤进行深耕,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先,组织跨学科力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采取辩证否定的方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并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更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厘清其核心要义、发展脉络与当代价值。特别要加强对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与哲学思想的挖掘与阐释,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其次,推动概念与话语的创造性转化。要创造一批熔铸“根脉”与“魂脉”于一体,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

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一套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依赖,掌握文化融合与文明定义的主导权。如将传统“民本”转化为“人民中心”、将“天下为公”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和而不同”转化为“文明交流互鉴”,打造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辨识度的话语体系。

4.4 创新传播与践行的方式:拓宽文化基因融入的场域

促进文化基因的发展,需要创新其传播与践行方式。首先,发挥现代科学技术赋能作用,创新文化传播和表达方式。如运用新媒体、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创作更多像《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精品力作,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根脉”与“魂脉”融合的魅力和活力。如在 TikTok 上,制作“中国传统节日+现代生活”系列短视频,以生活化场景传播传统节日文化,让文化基因突破地域限制;在孔子学院开设“中医养生+生态智慧”课程,通过体验式教学传播中医文化与生态理念,实现跨地域文化交流^[21]。

其次,将文化基因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全过程地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艺术体育、社会实践等教育环节。引导青少年深刻感悟中华文化的魅力,理解“结合”的意义,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例如,开发中小学“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校本课程,通过“大禹治水”故事阐释“群众路线”,让青少年直观理解“根脉—魂脉”的融合。再次,将文化基因融入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创建文明城市、村镇、单位,以及开展“传统节日”等主题活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仪规范、道德观念、审美追求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邻里关系、工作伦理之中,使之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自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

4.5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在开放中彰显融合的世界意义

推进“根脉”与“魂脉”的融合,促进文化基因的发展,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需要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对话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18]首先,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胸怀和更加自信的心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包括世界各民族创造的有益的文化、科

技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更具包容性和先进性。其次,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主动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文明基因,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通过多种渠道和平台向世界传播。通过生动讲述“结合”的故事,展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贡献,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总之,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协同推进,就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根脉”与“魂脉”的融合,促进文化基因的发展,使其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成果,更作为一种强大的实践力量,持续滋养中国式现代化,并赋予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更加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5 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生成与发展,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开创意义的重大文化现象。这一过程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根脉”与“魂脉”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化基因,这一基因已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前,西方世界通过媒体传播、教育输出强化文化霸权,导致部分群体对本土文化基因认同弱化;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仍面临“形式化”困境(如传统节日沦为消费符号);代际传承中,青少年对文化基因的深层内涵理解不足。对此,需通过上述提出的“党的领导、高质量发展、自主话语体系、创新传播、文明互鉴”五大路径协同发力,破解挑战。

注释:

- ① “体用之争”指洋务运动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想”关系的争论,核心是“以何为体、以何为用”,本文强调的“融合”并非“体用拼凑”,而是创造性转化。
- ② “天人合一”指天(自然、宇宙)与人同源同构、共生共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研究旨在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选择绿色发展道路,并非单纯的政策选择,而是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体现了古老哲学思想对现代生态治理实践的指导价值。
- ③ “经世致用”将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相联系,指出二者在强调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方面相互呼应,是构成“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魂脉”(马克思主义)理念相通性的重要体现。

(下转第88页)

“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观涵育家国情怀的当代价值

张书浩*, 路丙辉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摘要:“孝悌为本”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从“孝”到“忠”,实现家庭伦理向国家伦理的演进;从“悌”到“友”,实现家庭关系向社会关系的跨越;从“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体价值实现的路径超越。在家国情怀的涵育中,其奠定情感基础,有益于培育个体的情感认同与归属感;塑造道德品格,有益于培养个体的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提供文化基因,有益于传承“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

关键词:“孝悌为本”;家国情怀;家庭伦理;家庭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8;B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008-07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as the Found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Family Ethics Concept in Family-nation Sentiment

ZHANG Shuhao*, LU Binghui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Anhui)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virtues such as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as the Foundation” are regarded as precious tr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civilization. From “filial piety” to “loyalty”, the evolution from family ethics to national ethics is achieved. From “fraternal respect” to “friendship”, the leap from family relations to social relations is realized. From “governing the family well” to “governing the state and pacifying the world”,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path for individual value realization is accomplished. In the cultivation of family-country feelings,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 is laid by them,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s’ emotional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moral character is shaped, which helps to foster individual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dedication spirit; cultural genes are provided,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country”.

Key words: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as the Foundation”; family-nation sentiment; family ethics; family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1]。孝悌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构成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石,并在历

史演进中塑造了中国人的社会伦理和文化基因。

学术界对儒家孝悌伦理的已有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孝悌伦理内涵的历史梳理与文本解读;二是对孝悌伦理社会功能的批判性反思;三是对孝悌伦理现代转型路径的探索。这些研究不乏真

收稿日期:2025-11-2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KS018)。

作者简介:张书浩(2003—),男,安徽亳州人,硕士研究生;路丙辉(1968—),男,安徽滁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18963722228@163.com

知灼见,但对孝悌伦理如何涵育家国情怀,缺乏系统性的深入探讨,特别是对“孝”如何向“忠”演进、“悌”如何向“友”拓展、“齐家”如何向“治国平天下”跨越等关键环节的理论阐释仍有较多的挖掘空间。因此,重新审视儒家“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观念,剖析孝悌伦理涵育家国情怀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为新时代的家国情怀培育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大意义。

1 “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观要览

《论语·学而》(以下引用《论语》只用篇名)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意指孝悌是为仁之根本。由此奠定儒家思想的家庭伦理基石,其核心指向是对父母的“孝”与对兄弟姐妹的“悌”,二者共同构建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秩序,并由此成为儒学伦理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

1.1 “孝”的核心要义

在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孝”被视为百善之首,是维系家庭秩序与社会和谐的根基。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传统孝德都有具体的要求和说明。国内论者的基本共识是传统家庭孝德大致包括养、敬、顺、继、祭五个方面^[3]。

一方面,就奉养而言,奉养是孝道实践中最为基本的部分,包括“养”“敬”“顺”三个方面,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构成子女对父母在世时的伦理责任。“养”是孝道的物质基础,指子女对父母生活的实际照料。孟子曾明确批判“不顾父母之养”的行为,强调物质层面的赡养是孝道的根本体现。如果缺乏基本供养,孝便无从谈起,“敬”和“顺”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敬”是孝道的精神核心,它要求子女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关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19}(《为政》)如若子女对待父母仅能给予物质上的养活,而不能做到从心里尊重和敬爱,与养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能养也是不孝^[4]。“敬”将孝从物质性供养提升至精神道德的高度,是从生存关系上升至道德关系的关键环节。儒家所提倡的“顺”,是建立在敬意基础上的理性沟通与道德调和。正如《论语》所言:“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55}(《里仁》)若父母之命明显有悖于道义,子女有责任通过恰当途径提出异议,但仍须恪守“敬”的底线,不放弃对父母的关怀与尊重。这一理念有效调和了宗法家庭权威与个人良知之间的紧张关系,体现出孝道所具有的辩证内涵。

另一方面,就祭祀而言,父母离世后,孝道并未终止,而是通过“继”与“祭”两种方式得以延续和升华。“继”侧重于对父母志向、事业与家庭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即所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9}(《学而》)。这是强调在精神与价值层面保持延续性,尤其重视父母所遗留的优良家风与道德教诲。它体现了孝道跨越时代的文化传承与责任接续,同时也使家庭作为伦理共同体能够稳定存续。“祭”是在父母离世后的孝道表达,孔子主张“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17}(《为政》)。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孝丧”和“孝祭”是孝敬的应有之意,通过丧礼、祭祀等仪式寄托哀思、表达怀念,强化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祭”不仅是一种仪式行为,更是一种道德记忆的实践,使后代不忘本源、常怀感恩,从而巩固家族的凝聚力与身份认同。

孝道作为一种具有多重维度的体系化的伦理观念,贯穿于物质与精神各层面,并延展至生命前后的整个伦理实践过程。它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着维系家庭稳定与伦理教化的功能,时至今日,仍具有深刻的参照价值——提醒我们如何在社会急剧转型的环境中重新审视代际纽带、责任观念及情感认同的塑造。

1.2 “悌”的核心要义

“悌”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的重要范畴,是处理兄弟姊妹关系的核心道德准则。“悌,善兄弟也。从心,弟声。经典通用弟。”^[5]本义为“心中有弟”,强调基于亲缘的彼此关爱与尊重。“悌”不仅局限于兄弟之间,也扩展至姊妹关系,体现为一种双向、互惠的横向家庭伦理体系。在解读悌道时,应主要从兄弟之间与姊妹及同辈亲属之间两个层面分别阐述悌道的内涵与实践。

首先,在儒家伦理中,兄弟关系以“兄友弟恭”为基本原则,强调相互性而非单方面服从。具体而言,“友”指兄长应以“友”待弟,即慈爱、呵护与引导;“恭”指弟应以“恭”事兄,即敬重、谦逊与顺从。正如《荀子·君道》所言:“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拙而不苟。”^[6]悌道因此在双向互动中建立起对等、良性的伦理结构,不仅促进家族内部的团结,也为社会关系提供了伦理基础。

其次,悌道同样适用于姊妹关系以及兄弟与姊妹之间的相处。传统伦理并未将姊妹排除在外,而是将“悌”的精神扩展至所有同辈亲属,构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横向家庭伦理。《孟子·万章上》中就有“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7]的表述,意为弥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姊妹(或姐妹)关

系,表明“悌”可以超越性别,涵盖姻亲与血亲等诸多同辈关系。这一扩展使悌道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横向家庭伦理,强化了家庭作为情感与道德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

悌道不仅是一套人伦规范,更在历史中具象化为文化实践。例如1930年蔡振绅所辑《八德故事》中的“二十四悌”,其中所宣扬和赞美的正是兄弟姊妹间的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友善相处的美德懿行^[8],反映出该伦理在传统社会的深刻影响。悌道融合情感与责任、自发与规范,在当代家庭结构和社会变迁中仍具有重要价值。其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关怀与协作,不仅适用于传统家庭,也为现代人处理多元人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1.3 “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体系特征

“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体系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核心,其内在特征可从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把握。这一体系以血缘亲情为自然基础,通过具体化的伦理实践与行为养成机制,最终在家庭内部建立起具有等级性与秩序性的伦理结构,三者相互支撑,共同维系着家庭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首先,该体系以血缘亲情为伦理实践的出发点与情感基础。儒家伦理深刻把握了人类最自然、最本真的情感联结。父母与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情感,源于先天的生物学联系与共同的生活经历,具有自发性、稳定性和深刻性等特征。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2]268}即儿女生下来,三年以后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表明儒家伦理并非外在强加,而是基于人性中的亲情、感恩与回报的自然情感。儒家正是从最真实的人伦情感出发,构建出一整套伦理规范体系。

其次,该体系强调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的统一。它不只停留于观念层面,而是通过具体行为规范实现道德养成。孝的核心不仅在于物质层面的供养,更在于内心的“敬”与外在的“礼”。这种行为养成体现于多个方面:一是表情的管理,即侍亲时保持和颜悦色;二是行为的服从,如“有事,弟子服其劳”^{[2]20}(《为政》);三是父辈规范的延续,例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2]19}(《学而》)。这些规范共同构成了一套可实践、可检验的行为体系,使伦理真正融入生活。

最后,该体系在家庭伦理关系中体现出鲜明的等级与秩序。《论语·微子》中强调“长幼之节,不可废也”^{[2]277},明确规定了家庭内部依据辈分、年龄而形成的差序格局。但这种等级性并非单向的支配与服从,而是一种对应性的伦理安排:父母须慈,子

女须孝;兄长应友,弟妹应恭。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以“差序格局”描述这一现象,指出中国传统伦理结构如同水波纹,以自我为中心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这一结构内蕴弹性且温情,并非僵化的制度。

2 “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观涵育家国情怀的实践路径

所谓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有高度的认同和无比的热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幸福生活有本真的心愿与美好的理想,是对个人志向建构在为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之上的使命担当”^[9]。“孝悌为本”作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以其独特的延伸性与跨越性,为家国情怀的培育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对“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2]2}的深刻洞见,深刻揭示了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孝”到“忠”的延伸,构建了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模式;从“悌”到“友”的跨越,实现了血缘伦理向社会伦理的升华;而从“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路径,则展现了个体价值从家庭责任到天下担当的宏大格局。这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伦理推演模式,使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模式和情感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2.1 从“孝”到“忠”:家庭伦理向国家伦理的衍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0]自古以来,忠与孝二者密切相关,在家尽孝,在朝堂上尽忠,即“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11](《子罕》)。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孝道不仅仅限于子女对父母的奉养与敬爱,更被视为是一种政治伦理的预演和训练基础。在国家伦理方面,孔子认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2]6}(《学而》),将侍奉父母与效忠君主相提并论,明确提出在家庭之中能够尽孝者,在国家中必定能够尽忠。这种“移孝作忠”的价值跨越,构建了以家庭为模型、以孝道为基础的国家忠诚观念,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结构。

“孝”向“忠”的伦理衍延,实现了一种伦理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儒家通过“家国同构”的类比思维,将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政治伦理。《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2]清晰地勾勒出这条“移孝作忠”的路径。事君之“忠”,是事亲之“孝”在公共领域的逻辑延伸和实践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并非无条件服从。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168}(《先

进》),强调臣子应当以道义和原则为前提侍奉君主,如君主违背道义,臣子有权谏诤甚至退出。这种基于理性和道义的忠诚观,使家国情怀超越了简单的家庭伦理延伸,具备了道德批判性和理想指向性,也避免陷入盲目的忠君主义。

历史实践证明,这种从“孝”到“忠”的伦理扩展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汉代实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正是将家庭伦理表现作为选拔政治人才的重要标准。许多历史人物如岳飞、文天祥等,都是通过孝道培养出家国情怀,最终成为忠于国家的仁人志士。这种伦理机制成功地将个人品德、家庭责任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伦理政治模式。在岳飞看来,“若内不克尽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忠与孝的内在统一性: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做到尽孝,怎么可能做到对国家尽忠?从岳飞的话可以看出,忠孝二字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能割裂开来^[13]。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期,中国人民大力支持志愿军赴朝鲜抗击美帝国主义,“保家卫国”的口号正是这一伦理的现代回响——“保家”是孝的体现,“卫国”则是忠的实践。孝道精神由此升华为民族精神,成为推动集体行动和国家认同的强大情感力量。

所以,从更广阔的伦理视野看,“忠”不仅限于对君主的效劳,更包括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责任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这一扩展使“忠”具备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为传统孝道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2.2 从“悌”到“友”:家庭关系向社会关系的跨越

在《论语》构建的伦理体系中,“悌”作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道,不仅规范了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更拓展为社会交往的普遍准则,实现了从特殊血缘伦理向普遍社会伦理的重要跨越。孔子明确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6}这里的“出则悌”,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应当秉持家庭中的兄弟友爱原则,将基于血缘的“悌”道推广至非血缘的广泛社会关系中,以此建立信任、合作与尊重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论语》对“友”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伦理拓展。孔子强调:“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2]249}这表明儒家所说的“友”不仅延续了“悌”的相互尊重与诚信交往的核心价值,更增加了道德品质、知识素养等维度。这种朋友之道与“悌”道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体现了儒家伦理建设的层次性和进步性。在此基础上,儒家进一步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176},打破了宗法社会中原有的血缘局限,主张

以对待兄弟的友爱、尊重和诚信对待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构建了“朋友有信”的社会交往准则。在这个过程中,“悌”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特定的家庭角色伦理,拓展为普遍的社会友爱精神;从基于血缘的特殊义务,升华为基于道德的普遍责任。

随着2015年“全面二胎”、2021年“三孩”政策的相继实施,我国人口结构迎来深刻的变革,长期以独生子女为主的家庭形态正在逐步向多子女家庭转型。这一转型虽然为“悌”文化的实践回归提供了久违的家庭土壤,让传统同辈伦理有了重新扎根的现实基础,却也因为时代语境的变迁,给“悌”到“友”的伦理跨越带来了新的挑战。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使一代群体缺乏天然的兄弟姐妹互动环境,他们成年后不仅自身缺乏将家庭伦理转化为社会伦理的基础能力,也难以有效引导下一代践行“悌”道;而二胎、三孩家庭中,新型手足关系建构面临的资源分配、情感沟通、观念适配等现实困境,更直接影响着“悌”到“友”的伦理跨越成效。

本质而言,从“悌”到“友”的伦理跨越,是儒家“推己及人”这一恕道原则的具体实践,更是家国情怀涵育的重要路径。因此,面对新时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新问题,传承与创新“悌”文化、顺利实现这一伦理跨越,更需要坚守儒家伦理的核心智慧并赋予其现代内涵。其中,构建新型手足关系是伦理跨越的根基,这并非要复刻传统“悌”文化中的等级秩序,而是要萃取其互敬、互助、互谅的本质内核,结合现代家庭平等观念,引导子女在相处中学会尊重差异、分担责任、包容分歧;而“悌”文化的传承创新,关键在于推动其从家庭内部走向社会——不仅要在家庭场景中践行互敬互助的准则,更要以“出则悌”的伦理要求为指引,引导个体将“推己及人”的恕道原则运用到同伴交往、社区互动等更广阔的社会场景中,让“悌”从家庭内部的手足之道,延伸为社会交往中的友善之道、责任之道。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化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伦理困境,让传统“悌”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使得传统“悌”文化既能够维系多子女家庭的和谐稳定,为个体成长筑牢情感与道德根基;又能充分发挥其涵育个体责任意识、促进社会整合的当代价值,实现从血缘亲情到社会温情的伦理升华,最终为家国情怀培育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

2.3 从“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个体价值实现的路径超越

《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了儒家完整的伦理实践路径,系统性地构建了从个

人修养到家庭伦理、再到国家治理与天下太平的递进式价值实践路径。其中,“齐家”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既是个人修养成果的检验,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预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1]这一系列清晰地表明,家庭是个体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重要过渡阶段,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在《论语》中已有深刻体现。孔子一贯强调,个体通过在家庭中践行孝悌之道,能够培养出适用于更广阔政治领域的关键品德与治理能力。他曾援引《尚书》之言指出:“《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2]^[27]在孔子看来,孝悌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实践,因为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其内部伦理的和谐是实现国家治理有序的根基。

一方面,这种由内而外、由私及公的价值实践路径具有显著的超越性。它打破了个体价值局限于家庭领域的狭隘性,通过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天下紧密相连,使个体生命获得更为宏大的意义维度。具体而言,“修身”强调道德自律与人格完善,是个体成长的基础;“齐家”则是个体在家庭中践行责任伦理、培养情感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阶段;而“治国”和“平天下”则是这种伦理能力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充分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为个体设计了一条不断超越自身、融入群体、承担责任的理想道路,其生命境界也得以逐步升华。

另一方面,这一理念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的思维模式和集体主义的精神取向。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文化名人都深受这一路径影响,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以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均可视作“修齐治平”理念的人格体现。直至当代,这一理念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强调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伦理资源。

3 “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观涵育家国情怀的价值实现

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时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人的幸福。”^[14]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15]。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家国情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培育的核心根基,其作用贯穿情感培育、道德塑造与文化传承三个关键维度:它既依托血缘亲情的天然纽带,引导个体从家庭情感升华至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又以孝道实践为起点,培育个体的责任意识、奉献精神与集体观念,筑牢家国情怀的道德品格基础;更通过“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为家国认同注入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观念为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延续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展现出中华文明独有的价值延续和情感感召力。

3.1 奠定情感基础:有益于培育个体的情感认同与归属感

家国情怀的形成不仅需要理性的认知和道德的规范,更需要情感的基础和支撑。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个体在早期家庭环境中获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是其未来社会情感发展的基础。孝悌伦理作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正是通过强化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为个体提供了稳定的情感支持系统,为家国情怀的培育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首先,血缘亲情是个体情感培育的起点和基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慈爱孝亲,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都是人类最自然、最真实的情感流露。这种基于血缘的情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稳定性,为更高层次的情感发展提供了基础。在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中,个体体验到爱与被爱的情感满足,这种基于家庭的情感体验,可以通过“情感迁移”机制扩展到更大的社会和国家层面。当个体在家庭中体验到被关爱、被接纳的感受时,更容易形成对集体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在家庭中习得的关爱、尊重与责任,也将成为个体参与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情感能力基础。通过“能近取譬”的类推思维,个体学会用对待家人的情感态度来对待他人,用处理家庭关系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关系。这种情感认同的扩展使得个体能够建立起对社区、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实现从“私情”到“公情”的情感升华。

其次,“慎终追远”强调通过对祖先的追念与对父母的孝敬,培育个体的归属感与历史延续感。通过日常的家庭仪式(如节日团聚、祭祖活动等),强化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纽带,同时创造了一种“情

感共同体”,使个体在其中获得身份认同和情感支持。这种基于血缘与伦理的情感体验,自然扩展至对家族、乡土乃至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形成一种“天下一家”的情感共同体意识。当个体感受到自己是家族长链中的一环,是文化传统的一个节点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孝悌作为“为仁之本”,既是个体情感发展的根本,也是社会和谐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情感资源。这种由家及国的情感扩展,使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不仅建立在政治或法律层面,更源于深沉的文化心理与情感纽带。心理学研究指出,早期在家庭中形成的情感模式和依恋关系,深刻影响个体后续的社会认同建构。这种基于家庭情感培育的认同模式,正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重要情感动力,有助于形成更加稳固和持久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为当今培育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3.2 塑造道德品格:有益于培养个体的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国情怀的传承和弘扬,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10]“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体系通过系统的道德教化,为家国情怀的培育提供了品格基础。这一体系注重培养个体的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和集体观念,这些品质正是家国情怀的核心要素。

责任意识的培养是孝悌伦理的首要功能。《论语》强调:“事父母能竭其力。”^{[2]6}要求子女尽心尽力地侍奉父母,这种责任要求基于血缘亲情的自然流露和道德自觉。当个体践行孝道时,不仅仅是因为对父母的自然亲情,更是出于对道德义务的自觉认同。这种道德意识的培养为个体日后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担当奠定了基础。在长期践行孝道的过程中,个体逐渐养成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进而扩展到社区、单位、社会和国家的系统中。

奉献精神是孝悌伦理的重要功能。《论语》提出:“事君能致其身。”^{[2]6}要求在侍奉君主时能够奉献自身。这种奉献精神首先在家庭关系中得到培养。子女对父母的奉献、兄弟姊妹之间的相互付出,都是奉献精神的初步实践。随着个体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这种奉献精神也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国家事务中。“二十四孝”故事中蕴含的奉献精神,虽然需要批判性地继承,但其核心的利他主义和牺牲精神仍然具有教育价值。在现代语境下,这种

奉献精神可以转化为对家庭责任的认识和承担,进而扩展为对社会和国家的奉献意识。

集体观念是孝悌伦理的另一重要方面。在传统家庭中,个人利益往往服从于家庭整体利益。《论语》中强调的“和为贵”“群而不党”等观念,都是在家庭伦理实践中培养起来的集体意识。当个体进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这种集体观念很自然地转化为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以孝道为起点实施道德教育,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与社会意义。弘扬传统孝道有助于培养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提升公民整体的道德素养^[16]。人最初接触的人际关系即与父母的关系,来自父母的慈爱与呵护使个体在被爱中学会爱,进而形成最初的道德意识。这种基于血缘的亲爱之情与忠敬之行,是其他一切德行与责任感的基础。正是因为社会成员都具有为人子女的身份,孝道不仅强化了个体的道德自律精神,也通过感恩、报恩和反哺之义,为外在教化转化为内在修养提供了切实路径。它涵养了中华民族重德践行的人生态度,并成为推动成人、涵养公德的重要源泉。因此,孝道实质上是从个人情感出发,最终通向社会伦理与国家认同的关键道德纽带。

3.3 提供文化基因:有益于传承“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7]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文明绵延至今的国家,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备的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儒家文化强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8]《礼记·大学》字里行间透露着“由己及家”“由家及国”“由国及天下”的价值观,呼吁人们以“正身”“齐家”为起点,追求“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19]。

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思想在历史长河中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孝”与“忠”的类比是这一文化基因的核心内容。依照儒家文化看来,一个在家庭中能够恪守孝道、尊重兄长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大多也会尊重权威、遵守秩序。这种类比思维

将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相对应,建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正如《论语·为政》引《书经》所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2]27},表明孝悌本身即具有政治意义,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家庭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应于政治上的仁政爱民、上下有序。这种治理理念的相通性,使得家庭伦理成为政治伦理的自然延伸和微观实践。

儒家文化倡导的“家国同构”观念,正是这一伦理延伸的理论基础。其认为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具有同构性,这一文化传统为家国情怀的培育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因。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被视为国家的缩影,国家则被看作家庭的扩大。这种“家国同构”观念使得中国人很自然地将对家庭的情感扩展至国家层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认同模式和特有的“家国一体”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一方面,它使国家治理具有情感温度和道德要求,强调统治者应如父母关爱子女般关心百姓;另一方面,它也使家庭成员关系具有政治意义,强调“家齐”而后“国治”的政治逻辑。这种文化传统为家国情怀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资源,从根本上滋养着家国情怀的培育。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16(2).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2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3] 路丙辉. 家庭孝德培养新论[J].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6(4): 118-122.
- [4] 路丙辉.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J]. 齐鲁学刊, 2012(3): 82-85.
- [5] 许慎. 说文解字: 卷十下[M]. 徐铉, 校定.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358.
- [6] 荀况. 荀子[M]. 方勇, 李波,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94.
- [7] 孟轲. 孟子[M]. 杨伯峻,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49.
- [8] 王颖. 论悌德的内涵及现代价值[J]. 伦理学研究, 2016(1): 33-37, 47.
- [9] 杨葵, 柳礼泉. 家国情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德性素养与职业自觉[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6): 85-90.
- [10] 习近平. 在二〇一九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2-04(1).
- [11] 赵伟, 张妍. 中国古代家风建设之道及其现代价值[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 20(5): 41-47.
- [12] 孝经注疏[M]. 邢昺, 疏. 金良年,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2.
- [13] 路丙辉. 善事父母之当代传承与创新[M].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 95.
- [14] 习近平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N]. 人民日报, 2019-05-15(1).
- [1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
- [16] 肖群忠. 谈孝德[J]. 中国德育, 2014(12): 28-32.
- [17]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25(2).
- [18]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4.
- [19] 朱慧. 以家庭为基点厚植社会主义家国情怀——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3(9): 28-35, 107.

责任编辑: 谢政伟

论两汉文人的地域意识

宫伟伟

(滁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受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统治政策及地域文化与意识的历史传承等因素影响,大一统时代的两汉文人仍保有浓重的地域意识。他们推崇乡土文化,熟谙地域文化差异,且对同乡具有天然的亲近感。这些植根于地域认同的观念深刻影响两汉文人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既促进了两汉文学和学术的繁荣,亦深刻作用于两汉王朝的政治走向。

关键词:两汉文人;地域意识;文化传承;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015-07

Regional Awareness of Literati in the Han Dynasties

GONG Wei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Anhui)

Abstract: Influenced b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structure, ruling policies, and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awareness, the literati of the Han Dynasties, a unified era, still maintained a strong sense of regional awareness. They highly praised local culture, had a good grasp of reg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naturally felt a sense of closeness to fellow townsmen. These concepts rooted in regional identity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They not only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and academia in the Han Dynasties, but also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Han Dynasties.

Key words: literati of the Han Dynasties; regional awareness; cultural inheritance; social impacts

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到来。与之相适应,两汉社会也渐趋凸显出恢宏豪迈、兼收并蓄的统一性特征。但两汉社会统一性的凸显,并不意味着其地域性的消亡。受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统治政策和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两汉文人仍保有深固的地域意识^[1]。所谓地域意识,是指人们依恋和认同自己的乡土文化,并自觉与其他地域文化相区隔的情感和心理倾向。两汉文人作为掌握官方主流文化知识乃至写作技能的群体,无疑是此时最有可能表述自身地域意识且使之流传至今的。了解两汉文人的地域意识,有利于人们加深对两汉社会风貌的认知。

1 两汉文人地域意识的表现

汉帝国的大一统不仅为各地人员的频繁流动和交流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使不同地域文化间的碰撞和比较成为可能。在此种情形下,两汉文人的地域意识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加显豁。

1.1 依恋乡土

王焕然曾对两汉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安土重迁”情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该情结也鲜明而深广地体现在两汉文人身上。故乡是两汉时期众多客居文人共同的情感凝结处,他们于言行中表现出来的思乡、恋乡之情,正源于自身地域意识的萌

收稿日期:2025-11-13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22AH051075)。

作者简介:宫伟伟(1986—),男,山东烟台人,讲师,博士。E-mail:gong13077@163.com

动。自从项羽说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这般地域意识鲜明的话语后，此语俨然成为两汉时期志得意满者的座右铭^[3]。据《汉书·朱买臣传》所载，汉武帝正是以此为借口诏命朱买臣回乡作会稽太守。与之类似，《后汉书·景丹传》也记载了光武帝因这一缘由封景丹为栢阳侯之事。对于多数两汉文人而言，客居他乡的生活再惬意，也难以阻绝对乡土的情思。诚如王粲所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4]如疏广、班超般归老故乡才是他们的普遍愿望。若此愿望生前难以达成，也要归葬乡里，不归葬者反成特例^[5]。

衣锦还乡表现的当然是两汉文人对故乡的认同与依恋，然而此种情感却并非志得意满者独有，失意文人思怀故土的例子也并不鲜见，更有将此种情感抒发于文学作品之中，由此得以留存。典型的例子如：“胡地多飘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6]⁷¹“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6]⁶⁹“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7]²²⁵¹客居环境的陌生与恶劣，让文人们日益思乡，愁绪满腹，于是家乡的人文风物、亲朋故旧便成为其追忆和探寻的对象，而隐匿于此种情感和表现背后的，正是他们强烈而深固的地域意识。

1.2 区隔他域文化

两汉文人对故乡的依恋与认同，往往源于对其他地域文化的接触和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两汉文人的地域意识也包含了对他域文化的认知和区隔。从宏观方面讲，主要有以崤山为界的“山东”“山西”和以函谷关为界的“关东”“关西”两种观念。“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8]²⁵⁹³虞诩在劝谏李膺保全凉州时也援引其时谚语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7]¹⁴⁹²又由于崤山与函谷关相距不远，所以由此界分出的两组地域基本上可以等而视之。东汉学者郑太在分析其时民风时说“山东之士，素乏精悍……关西诸郡，颇习兵事”^[7]¹⁸¹²，即是对上述两种地域区隔观念的混用。无论如何，上述两种地域区隔观念都反映了两汉文人对不同地域文化的认知和比较。应劭注解汉武帝将函谷关迁移至新安一事时说：“时楼船将军杨僕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8]¹⁵⁸杨僕不惜耗费家财促成家乡划归关东地区，毋宁说正是基于上述地域区隔观念所做出的选择。

“山东”“山西”这种地域区隔方法毕竟过于宽泛，而结合星际分野、环境、经济、历史传统等因素，

将汉帝国划分为秦、赵、燕、齐、鲁、宋、卫、楚等区域，则是在两汉文人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地域区分观念。《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皆是体现此种观念的代表作。在其时，无论是冠盖如云的京师，还是尊贤重才的诸侯国，均汇集了众多来自不同地域的文人。他们承载着各自原有的地域文化特质，与他人交流往来，既增广了见闻，又加深了对不同地域文化的认识。邹阳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8]²⁰⁵²王充《论衡·率性篇》则说：“齐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9]这些看法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至少说明两汉文人对各地文化风貌的差异已有了较为明确的认知。此外，两汉文人在因人作文时，还十分注重以郡、县等行政区划来标明当事者籍贯，具体表现为：西汉中期之前多以县为单位，西汉后期则主要以郡为单位^[10]。这无疑也体现出文人鲜明的地域区隔意识。

1.3 亲近同乡

乡贤作为地域文化承载者中的代表人物，往往对乡邦乃至国家有所贡献，故而多受当地文人礼敬，且此种礼敬的程度又远超当地文人对他域文人的尊崇。“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8]¹⁴⁷⁰在对当地文人的影响力上，司马相如显然超越了苦心经营政治教化的外来者文翁。这是因为司马相如对于蜀郡文人而言，既有同乡的亲近感，又蕴含了其可以成为乡里骄傲的心理。相比于其他地域的文人，楚人王逸因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11]⁵⁸⁰，故而对之更为尊崇。他不仅对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的言论进行了驳斥，称赞屈原为“俊彦之英”，还对屈原的《离骚》作出了“依托五经以立义”^[11]⁵⁸⁴等牵强附会的阐释。究其原因，仍是为了维护屈原的地位。

由于拥有共同的地域文化情结，两汉时期同乡文人间常更易建立亲密的关系。东方朔为人诙谐多智，令人难以窥其所亲，但由其留存的作品可知，他不仅曾向同为齐人的公孙弘借车马，更径自将身居高位的公孙弘视为“同类”^[12]¹⁰⁻¹²。颍川名士李膺秉性刚直，不轻易与人交往，却“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7]¹⁷⁶⁰。由此可推知，地缘上的亲近感确实在两汉文人的交游中起到了增加接触机会和催化友情的作用。与之相反，出身不同地域的两汉文人间则容易产生偏见和歧视。濮阳人汲黯在与公孙弘发生争执时，便在汉武帝面前指斥齐人品格：“齐人

多诈而无情实。”^{[13]2566}颍川人褚少孙在解读汉武帝加封齐王刘闾的策文时也说：“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13]1878}所谓“齐人多诈”，显然是一种地域偏见，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人能够如此公开直接地表述，至少说明汉代文人对他域文化长期存在着刻板印象，甚至是排斥。

2 两汉文人地域意识的成因

两汉文人地域意识的形成，是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统治政策、地域文化与意识的历史积淀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逐步建构而成的复杂文化心理现象。要厘清这些要素在此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具体作用，无疑颇具复杂性。为便于论述，下文拟从五个核心维度，分别解析其对两汉文人地域意识生成与存续的影响。

2.1 地理环境的奠基

汉帝国多样的地理环境不仅为两汉文人地域意识的生成提供了基本前提，还框定了其主要的活跃范围。汉帝国疆域辽阔，至汉武帝时已“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8]1387}。从地理形势上看，汉帝国北临草原、荒漠，西北横亘祁连山、阴山、天山等山脉，西南接青藏高原，东面及东南濒临浩渺的太平洋；虽有河西走廊维系与域外文明的交往，但总体而言，对外交流程度有限。就疆域内部而言，汉帝国跨越热带、亚热带、温带及高原气候区，地形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分布，各阶梯的落差皆在500米以上。受此地形影响，多条河流自西向东横贯帝国核心区域并最终注入海洋。山川河流的纵横交错，又将这片相对封闭的国土划分为多个更小的区域。这不仅造就了汉帝国以平原、河谷为主体的地貌结构，更潜移默化地构建了两汉文人对地域单元的认知框架。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高山峻岭与大江大河既使得同一地域内的人们更易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不同地域间的往来。汉武帝时，齐人延年曾上疏建议在北部边境开凿大河，以阻绝匈奴的袭扰^{[8]1502-1503}。汉建和二年(148)的《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则记载了从关中平原翻越秦岭，抵达汉中盆地的艰难：“上则县峻，屈曲流颠。下则入冥，顾写输渊。……空舆轻骑，滞碍弗前。”^[14]地理环境的阻隔，限制了各地域内人们的活动范围，这为各类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存续提供了物质基础。鲁西奇通过研究新始建国四年(12)东海郡剧县与琅琊郡柜县间的两块界石发现：“至迟到汉代，人们已较为普遍地使用不同的地理事物，包括

自然的山、水……以边疆界线、行政区划分界线以及田地界线。”^[15]这些用以划分界线的地理事物，无疑会强化两汉文人对自身所在区域的空间认知和边界感知，进而触发或深化他们的地域意识。

2.2 社会结构的塑造

汉帝国以平原、河谷为主体的地貌适宜农业活动的开展，并由此形成了以农耕经济为核心、手工业与商业为补充的经济结构。小农经济作为这一结构的核心支撑，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通过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与男耕女织的生产形式，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商品生产作为小农经济的必要补充，主要用于满足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需求，而这类需求通过当地集市即可得到满足^[16]。此种相对封闭的经济形态将百姓与土地深度绑定，导致社会成员的交往呈现出区域内相对活跃，区域间相对隔绝的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处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17]尽管两汉文人在知识结构和活动范围上与普通百姓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仍难以摆脱所在地乡土性的影响，并由此形成对家乡的认同意识。

汉帝国以农耕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皇权主导下的贵族官僚政治。在这一政权形式下，贵族(包括皇族宗室、获爵功臣、外戚核心成员等)依据血缘亲疏、嫡庶身份和长幼次序，世袭不同等级的爵位。与之相应，官僚与庶民在家族内部权力的分配中，也多遵循嫡庶长幼的次序。人们因血脉延续或特权承继而受益于祖先，也由此推动了其时祖先崇拜现象的强化和规范，这具体表现为国家层面严格的宗庙制度和民间隆重的祭祀、丧葬仪式^[18]。祖先崇拜借助血缘纽带，强化了时人以祖籍为核心的地域认同，进而催生了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东方朔反对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时说：“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12]4}《潜夫论·实编篇》亦言：“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19]此种对祖先及亲人坟墓的眷恋，实则蕴含着时人对桑梓之地和家族文化的双重依恋与认同，也成为两汉文人地域意识生成的深层文化动因。

2.3 统治政策的助益

汉帝国建立后，在行政建制上大致推行郡(国)一县二级制。《汉书·地理志》论及汉帝国行政区划的依据时称：“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8]1387-1388}在一定意义上说，郡、县等行政区域多

是地理环境相近、经济联系紧密且人文风俗趋同的地域单元。两汉四百余年间,郡县的数量与辖域虽时有调整,但行政区划的核心标准及相当一部分郡县的辖域范围相对稳定。“政区的这种长期的延续性又在人们心理中形成强烈的地域观念,使之成为一种改革不易的社会文化现象。”^[20]汉帝国的行政区域明确了两汉文人籍贯的空间边界,且行政区域存在的时间越长,区域内文化的同质性便越高,由此催生的地域意识也就愈发强固。

汉帝国实行“编户齐民”制度,其核心是通过百姓进行户籍登记和统一管理,严格限制户籍外流,以实现国家对人口、赋税、徭役和兵役的有效控制,从而巩固统治秩序。但需注意的是,这种控制多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经济层面的税收、徭役征派;二是政治层面的司法治理和治安维护。至于百姓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事务的实际管理多由地方社会自主承担。“在地方范围里,尤其在它的基础结构层,地方权威替代了国家所不能完成的局部整合作用”,而地方权威则必须同时拥有财富、学位及在地方共同体中的公共身份^[21]。其中,“学位”决定了汉帝国的地方管理多由拥有功名的文人阶层承担。爱德华·雷尔夫认为,居住者对地方的依附感会随其投入地方事务的增多而增强^[22]。作为地方权威的两汉文人在广泛参与调解纠纷、修撰方志、兴办私学等地方公共事务中,往往会主动梳理当地的历史脉络、民俗风情和名人典故,进而逐步转化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地域文化的建构者。这一角色转变也往往会使其地域意识从模糊的乡土情感,逐渐升华为更加具体的文化认同。

汉帝国建立初期,中央政权为军功集团把持,而同姓诸侯国势力强盛,文人群体多以游幕或游学的方式流入各诸侯国。汉武帝之后,诸侯国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且随着太学的设立,经学渐趋兴盛,察举制度也逐步推行并成为重要选官途径。文人群体由此多外出求学,最终大抵流向长安。此外,汉帝国对地方官员的任职也有着严格的限制:一是须回避其母系、妻系亲属所在的州郡县(避亲制度);二是不得在本州郡县任职(避籍制度)^[23]。这使得官员必须在相对陌生的地域履任。上述文人和官员的流动,为他们直观感受故乡与他乡的差异提供了重要前提。在此过程中,文人常提及与自身地域密切相关的文化符号(如名胜、风俗、典故等)来明确自己的身份。这在客观上加深了他们对自身地域特征的关注和认同。在东汉致仕制度成熟后,官员无论任职何处,户籍基本保留在原籍;如非皇帝恩赐等特

例,官员致仕后仍需返回原籍^[24]。当“籍贯”成为两汉文人身份的核心标识时,其地域意识也便由此得到固化。

2.4 地域文化的传承

饮食文化作为人类适应与改造自然环境的产物,因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多样性。地域间的差别一旦为文人感知,便常与乡土认同相联结,进而强化其对故乡的依恋和对异域的疏离感。刘细君远嫁乌孙后作歌云:“吾家嫁我今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8]13343}显然,乌孙以肉食酪浆为主的饮食结构,与中原饮食传统存在巨大差异,这是引发刘细君强烈思乡之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即便在汉帝国内部,饮食文化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王辉将汉帝国分为中原(华北大平原)、西北(今甘、宁、青、新四省区)、巴蜀(今四川、重庆和陕西南部)和东南(岭南和闽台)四大饮食风俗区^[25]。上述饮食文化的差异,往往成为两汉文人背井离乡后感受地域差异的最直接切入点。

房屋等建筑既承载着人们栖身的基本需求,又是彰显地域特色的重要载体。汉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加之多地气候、地貌、植被及生产方式的差异,房屋等建筑也往往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黄宛峰在《秦汉人的居住环境与文化》一书中指出,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带、西域诸国、西南夷及江南地区的居住条件存在显著区别^[26]。这些建筑差异一经两汉文人捕捉,便常被视作区分地域的直观标志。晁错认为北方游牧部落与中原百姓的差异为“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8]1993},并建议汉文帝“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8]1996}。显然,“城郭田宅”的有无,是晁错区分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风貌的重要标准。而在汉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因自然条件、民族构成和生产方式相近,“建筑的地域性差别是较小的”^[27]。因此,两汉文人对不同地域的关注焦点就转向了各地的标志性建筑。例如,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在对比长安与洛阳时,均关注到了长安的上林苑和洛阳的灵台。

方言作为地域居民日常交流的工具,既是地域文化的构成要素,又是其重要的表征和载体。受地理阻隔、人口迁移、民族多样性以及行政区划等因素的长期影响,汉帝国内方言众多。西汉末年,扬雄“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28],著《方言》一书。据该书可知,汉帝国大致存在秦晋、周韩郑、赵魏、宋卫

等12个方言区^[29]。方言的差异往往导致两汉不同地域文人在交往中面临语言上的障碍,进而强化其排他性的地域归属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记载,出身周韩郑方言区的晁错曾赴济南国学习《尚书》,而“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13]2400}。这反映出齐方言对其他方言区文人理解齐地文化造成的阻碍。贾谊《新书·保傅》也说:“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30]此语以“齐言”与齐地百姓的紧密关系为例,既印证了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也从侧面揭示出方言已成为区分时人地域身份的显性标识。

2.5 地域意识的历史延续

两汉文人地域意识的更深层根源,还在于对先秦以来地域文化与意识的历史传承。地域文化所具有的超强传承性,使其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改变或泯灭。两汉各地域文化中即有不少承继自前代的成分。如鲁地自《尚书·禹贡》记载“桑土既蚕”^[31],至汉代依然“颇有桑麻之业”^{[8]1483-1484}。河内郡本为殷商王畿之地,入汉之后仍“纣之化犹存”^{[8]1471}。班固在谈及两汉齐地民俗时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8]1481-1482}由此可知,两汉齐地民俗文化中仍留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文化特质。

上述文化承继现象表明,虽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但隶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其存在和发展却具有相对独立性,两汉大一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完全消弭地域文化的固有特质。也正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才使得植根于地域文化差异之上的两汉文人地域意识,有了承继前代并保存下去的可能。时至东晋,伏滔与习凿齿纵论乡贤人物,仍大致沿用了齐、楚等战国时期的国别单位^[32]。十六国时期,潘聪在劝谏燕王慕容德迁都广固时,也将齐地单独划为一区,称“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33]。这足以印证人们地域意识的稳定存续,且这种存续状态是难以为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变革轻易撼动。

3 两汉文人地域意识的影响

作为辅助帝王理政和传承王朝文化的群体,两汉文人普遍拥有深固的地域意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两汉王朝的文化、政治等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

3.1 文学影响

两汉文人的地域意识在文学作品中有着自觉且

深广的抒发,他们深恋家乡,安土重迁,又常将此种对故乡的眷念和热爱之情表现于两类文学作品之中:一类以讴歌故乡的人文风物为主题,代表作有扬雄的《蜀都赋》、张衡的《南都赋》以及徐幹的《齐都赋》等;另一类则主要表达作者对故乡的依恋和怀念,代表作有李陵的《重报苏武书》、班超的《上书求代》等。这两类文学作品的存在,既促进了两汉文学的繁荣,又对后世同类文学作品的创作起到了借鉴和奠基作用。此外,两汉文人对不同地域文化间差异的认知,也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助力。由《汉书·司马相如传》可知,司马相如能够写出融合齐、楚方隅文化的《子虚赋》,除自身积累的地域文化知识外,还得益于他和齐人邹阳、楚人枚乘等文士的交流^{[8]2199}。而司马迁能够著就《史记》,也与其早年游历多地,体味不同地域文化的经历有关系^{[8]2357}。

除此之外,两汉文人对乡贤的倾慕也促使其创作出一系列意在褒扬乡贤事迹或模仿乡贤文章的作品。扬雄早年即因崇拜乡贤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以为式”^{[8]3025}。王逸也因仰慕乡贤屈原,而模仿《离骚》创作《九思》,以示对屈原的悼念。《隋书·经籍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34]981-982}刘秀以帝王之尊诏撰《南阳风俗》,自然有其身为南阳郡人而“矜其乡贤,美其邦族”^[35]的目的。此种为乡贤立传的行为也引起了诸多东汉文人的效仿,如《隋书·经籍志》收录了圈称的《陈留耆旧传》,《旧唐书·经籍志》则收录了仲长统的《兖州山阳先贤传》,《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下》也有祝龟撰写《汉中耆旧传》的记载^[36]。这类记录乡贤事迹和传闻的杂传,不仅繁荣了汉代文学,还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大量涌现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2 学术影响

两汉文人推崇乡贤、认同本土文化的地域意识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汪文学认为,扬雄《太玄》《方言》等书的创作受到了同乡学者严君平、林间翁等人的影响^[37]。《越绝书》的问世则与其作者“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38],想为家乡文化正名的动机有关。此外,两汉文人对异地文化的认知和区分,又往往会成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扬雄《方言》的产生,除却得益于乡贤严君平、林间翁的研究成果外,还要归功于他对来京城的外地人“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39]。倘若没有扬雄对各地方言差异的认知,《方言》一书的创作便无从谈起。与之类似,班固能写出“州国郡

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34]666}的《汉书·地理志》,也得益于他对各地风俗、地域面积、人口数量等情况的认知和归纳。时至东汉,应劭有鉴于当时“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社会现状,创作《风俗通义》以期为统治者辨风正俗提供参考^[40],更是将自身对各地民俗文化差异的研究视为关系到国家治理、安定与否的大事。

当然,两汉文人对异地文化的认知和区分,并不妨碍他们对其进行学习和吸纳,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会就此完全放弃以本土文化为主位的成见。此种成见有时候甚至会左右两汉文人学术研究的格局。汉初研究《诗经》者分为鲁、齐、韩三派,而齐人学《诗经》多师从齐人轅固,燕人学《诗经》则多师从燕人韩婴。按汉初已不乏离乡游学之士^[41],此种现象的出现,除却学习者在地域接近性上的考量,更有其推崇乡贤和本土文化的地域意识影响。汉宣帝初立,身边重臣韦贤、夏侯胜、史高皆为鲁地文人。他们向汉宣帝建议:“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8]3113}汉宣帝自幼生活于鲁地,加之其祖父卫太子喜好《穀梁春秋》,于是立《穀梁春秋》于官学。此后《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在官学中的地位互有升降,以两者为代表的齐学与鲁学的儒家派系之争更是绵延至西汉末年方绝。齐、鲁两派经学团体的斗争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其成因固然与双方成员争夺政治利益密切相关,且双方成员的籍贯也并不局限于齐地与鲁地。但从其产生的根源上说,文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维护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3.3 政治影响

受地域意识的拘囿,两汉文人往往将是否符合本土文化价值观和利益作为其评判事物优劣的标准,此种偏执的标准也常体现在他们的政事活动中。西汉初年,娄敬建议刘邦定都关西,这原本是可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高见,刘邦以此询问群臣,群臣却因皆为“山东”人而坚决反对^{[13]2377}。东汉王朝于建立之初便定都洛阳,然而在数十年后,许多客居洛阳的长安士人却仍然“感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42]。由此可知,两汉文人的地域意识竟至影响到国家定都的战略大计。另外,两汉文人对于乡贤的崇敬之情也被其时的明智之士在政事活动中加以利用。黄霸在担任颍川太守时,便注意任用当地有名望的老人在民间宣传朝廷的旨意和政策,借此推行教化,并最终取得了“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13]3122}的良好效果。东汉章帝在东巡

路过桓谭的家乡沛国时,“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7]754}。汉章帝此种意在表达自己尊重地方人才的举措,显然激发了当地民众的乡邦荣誉感和对汉帝国的向心力。

两汉同乡文人之间易于亲近的关系,又往往演变为政治上的相互提携,抑或促成利益集团的产生。司马相如的发迹,离不开同乡杨得意的引荐。朱买臣也是经由同乡庄助的举荐而被汉武帝任用。后来,廷尉张汤在处理“淮南叛乱”一案时严惩了庄助,于是“买臣怨汤”^{[8]2422}。由此看来,朱买臣与庄助已然在政治上结盟。建武十一年(35),郭伋进言身为南阳郡人的光武帝“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7]864}。可知即使坐拥天下的帝王,依然难免在选材用人时优先考虑同乡。东汉桓灵时期发生的“党锢事件”也与其时文人亲近同乡的地域意识存在着莫大关系。《后汉书·党锢列传》载:“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7]1759}张俭所冠罪名是“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7]1757}。汉桓帝诏令官员检举结党营私之人,平原相史弼未能检举,遂被部郡从事史责问:“青州六郡,其五有党,近国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独无?”^{[7]1694}可知其时朝廷追查党人是以郡国为单位的,地域意识之于文人结党的影响已为时人瞩目。当然,文人的地域意识绝非导致党锢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却无疑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加强党人关系的润滑剂。

4 结论

综上所述,大一统格局下的两汉文人并未因国家的统一性而消解自身的地域认同,反而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统治政策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依托先秦以来地域文化与意识的历史延续,形成了以依恋乡土、区隔他域、亲近同乡为核心表现的地域意识。这一深固的文化心理不仅为两汉文学创作提供了情感内核与素材源泉,推动了乡贤杂传、地域赋作的繁荣,更深刻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派系分野与政治活动的价值取向,成为贯穿两汉社会文化与政治脉络的重要线索。

还需关注的是,两汉文人的地域意识虽然确实客观上促进了两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但其时最顶尖的作品如《上林赋》《史记》等都突破了单一地域文化的拘囿,彰显出恢宏博大的时代气质。地域间的差异在塑成两汉文人地域意识的同时,也往往生成不同的人才成长环境和学术氛围,唯有如郑玄般游学多地、转益多师的文人,方能在学术造诣上登

峰造极。倘若文人固执于本土意识而排斥乃至攻讦异己的人才和学说,则收获的只能是无休止的纷争和隔阂,也必将被大一统的时代潮流所湮灭。此外,地域意识对政治决策与利益集团形成的显著影响,虽为两汉统治者所认识并利用,但此种影响不应过分夸大。同乡文人之间相互构陷和打击的事例在汉代也并不鲜见。例如,同出齐地的公孙弘和主父偃,同出楚地的袁盎和晁错,即皆为互相攻讦的政敌。

地域意识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中性文化现象,其价值的双重性须以辩证的眼光加以审视:一方面,地域既然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则人们对乡土的认同与眷恋就天然联结着对家国的向心力,地域意识就有助于爱国情怀的培养;另一方面,地域意识又促使人们以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和利益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若将地域认同推向极端,则难免滋生地域偏见与党同伐异的乱象,并最终危及国家的安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宫伟伟. 齐地文化与两汉文学研究[M]. 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1:4-8.
- [2] 王焕然. 乡土意识对汉代文学的影响[J]. 南都学坛, 2014,34(1):42-48.
- [3] 王子今. 秦汉人的乡土意识[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1997,1(1):111-117.
- [4] 俞绍初. 建安七子集[M]. 修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 2016:100.
- [5] 杨树达. 汉代婚丧礼俗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160-171.
- [6] 沈德潜. 古诗源[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7]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8]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9] 王充. 论衡校注[M]. 张宗祥,校注. 郑绍昌,标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9.
- [10] 胡宝国. 《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古史文存: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72-280.
- [11] 严可均. 全后汉文[M]. 许振生,审订.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2] 傅春明. 东方朔作品辑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 [1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4] 高文. 汉碑集释[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88.
- [15] 鲁西奇. 空间·制度·社会:中国古代史地新探[M]. 武汉:崇文书局,2022:30.
- [16] 李恒全. 试论汉代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问题[J]. 中国农史,2005,24(4):37-43.
- [17]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
- [18] 贾艳红. 论汉代的祖先崇拜[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6(4):96-100.
- [19] 王符. 潜夫论笺校正[M]. 汪继培,笺. 彭铎,校正. 北京:中华书局,1985:281.
- [20] 周振鹤. 关于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几点思考[J]. 社会科学,1989(8):25-29,45.
- [21] 张静.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8.
- [22] 爱德华·雷尔夫. 地方与无地方[M]. 刘苏,相欣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32.
- [23] 李文玲. 试论汉代的任官回避制度[J]. 管子学刊,2007(3):98-101.
- [24] 袁延胜. 论东汉的户籍问题[J]. 中国史研究,2005(1):11-24.
- [25] 王辉. 秦汉的飨宴:中华美食的雄浑时代[M].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446-467.
- [26] 黄宛峰. 秦汉人的居住环境与文化[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109-114.
- [27] 陈明达. 关于汉代建筑的几个重要发现[J]. 文物参考资料,1954(9):91-94.
- [28] 钱绎. 方言笺疏[M]. 李发舜,黄建中,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502.
- [29] 李恕豪. 论扬雄《方言》中的几个问题[J]. 古汉语研究, 1990(3):59-64,74.
- [30] 贾谊. 贾谊集校注[M]. 王洲明,徐超,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87.
- [31] 尚书[M]. 曾运乾,注. 黄曙辉,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
- [32] 刘义庆. 世说新语[M]. 刘孝标,注. 徐传武,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52.
- [33] 崔鸿. 十六国春秋[M]. 北京:中华书局,1985:78.
- [34]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5] 刘知几. 史通通释[M]. 浦起龙,通释. 王煦华,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55.
- [36] 常璩. 华阳国志校注[M]. 刘琳,校注. 成都:巴蜀书社, 1984:807.
- [37] 汪文学. 扬雄的乡土意识与六朝社会的地域文化观念[J]. 铜仁学院学报,2018(7):11-19.
- [38] 李步嘉. 越绝书校释[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1.
- [39] 严可均. 全汉文[M]. 任雪芳,审订.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534.
- [40] 应劭. 风俗通义校注[M]. 王利器,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8.
- [41] 刘太祥. 汉代游学之风[J]. 中国史研究,1998(4):43-54.
- [42] 班固. 班兰台集校注[M]. 张溥集,白静生,校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2. 责任编辑:谢政伟

轻重对立和身心二分的兼美体验 ——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情动

张可鑫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运用斯宾诺莎等人建构的情动理论,可以为观照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供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全新路径。在情动视角下,本来对立的两种存在方式——轻和重,能够统合为流变绵延的情感体验,揭示人物看似前后矛盾的行动实则遵循着一致的情感逻辑;本来割裂的两种生命感官——身和心,能够弥合为回应情感的统一整体,发掘主体表面相左的感觉和智识在情感中的交织和共振。此外,情动还和贯穿小说情节、统摄轻重与身心的“永恒轮回”紧密契合:重复能够塑造情动,情动也在趋向重复,二者共同印证主体的存续渴望。

关键词:情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情感;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 I565.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6)03-0022-05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Light-heavy Opposition and Mind-body Dualism: The Affect in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ZHANG Ke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Jiangxi)

Abstract: Applying the Affect Theory constructed by Spinoza and others can provide a new path beyond binary opposition for examining Milan Kundera's novel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 two originally opposing modes of existence, light-heav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a flowing, continuous emotional experience, revealing that the characters'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actions actually follow a consistent emotional logic. Similarly, the two originally separated sensory dimensions of life, body and mind, can be mended into a unified whole that responds to affect, exploring how the subject's superficially conflicting sensations and intellect intertwine and resonate within affect. Furthermore, affect closely aligns with the "eternal return" that permeates the novel's plot and unifies light-heavy and body-mind; repetition shapes affect, and affect tends toward repetition, together affirming the subject's desire for persistence.

Key words: affect;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emotion; unity of opposites

情动(affect)是由斯宾诺莎、德勒兹和马苏米等人建构的理论,指向能够增强或阻碍人类存在之力的情感潜能,是对具象生命体验的过程性揭示。其在显现为欲望——人在与世界的交互中由情感引发的某种施行。情动是一种非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因而轻和重、身与心能够在情动视域下以对抗之

外的面貌呈现,成为情感向度上流动的体验和共感的媒介,进而可以发掘人物形象和小说情节对抗性中的一致性。此外贯穿小说中的“永恒轮回”是勾连轻重、身心的思想主轴,其所凸显的“重复”和超越时间的情动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情动理论为永恒轮回提供了基于情感的解读路径。

收稿日期:2025-10-31

作者简介:张可鑫(2000—),男,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E-mail:1015194624@qq.com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直被视为表达轻重对立、身心二分的典范文本:不仅作品中多次提及、强化轻和重、身与心的区分,相关解读也多将小说视作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存在状态的呈现。然而小说中不同人物在轻与重、身与心之间的徘徊游移又揭示这种区分并非绝对。在流动的人生体验中,轻重、身心无法被分别置于生命网格中分属正负极的静止坐标上加以考察。情动思潮则提供了一种更为辩证的观照方式。本研究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例,结合情动这种非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分析上述看似对立的审美体验、情感体验的内在统一。

1 情感上轻与重的共存与交替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人物行为逻辑契合轻重交替的情动流变——“就重避轻”:感受重的正向情感会强化生命力量,主体希望且能够坚守当下的生命状态;反之则期待且需要改变,尝试由轻变重。二者都是在追求能够强化自身存在体验的生活方式。小说开篇写“轻”意味着“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重”则成为“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1]15},据此将其转译为表征并影响生命力量的情动:轻可视作削弱主体本质的情感;重可视作增强主体本质的情感。轻和重不是始终截然对立的矛盾两极,而是能够表征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情感体验,形成连续的情动光谱。因而人物不会和轻或重捆绑,而是时轻时重,甚至在特定情形下轻重并存。

主人公托马斯在轻重之间徘徊不定,是因为他的情感随存在体验跌宕起伏,当他先前说“非如此不可”^{[1]39}时其实不是重,因为他的选择出于人生的有限和这种有限必然致使的悔恨,所以他依旧不断游移,不断改变;当他后来说“我没有使命”^{[1]375}时实际亦非轻,因为他的感悟导向生命的自由和这种自由带来的解脱,所以他能够安于当下,安于重复。文末托马斯“你难道没发现我在这里很幸福”^{[1]375}的真诚反问,是对自身由轻向重转变的确认,是对主体充盈生命力量的肯定,因为轻重作为情动归根结底“就是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感受,对自己活着的感觉”^{[2]45}。轻和重不再只是人物被呈现的既定选择,还是他们做出选择的情动成因。以萨比娜为例,她被塑造为“轻”的典型。“轻”既是她摇摆不定生命状态的结果性呈现,更是她进入并长期处于这种生命状态的诱因:因为父母、配偶、社会对萨比娜构成压迫,使她体验生命力量遭受削弱的轻之情感,所以她不断寻求改变,进行“摆脱原位,投向未

知”^{[1]110}的“背叛”。这一过程中偶尔产生的幸福时刻让她短暂感到生命之重,渴望坚守:“她真恨不得像天底下最普通不过的女人,对他说:别放开我,把我留在你身边。”^{[1]118}这说明她非天性喜爱轻和叛逃,而是受到情动引导主体不断遭到削弱,陷入无休止的否定,在逃离轻的途中戏剧突转般地愈显轻盈。

轻和重在特定时刻共存,体现为同一情动对象引起人物多种情感。例如托马斯对异性萌生两种迥异的感情,“他渴望女人,但又惧怕她们”^{[1]14},异性作为刺激会矛盾性地同步强化和削弱他的存在之力,因而他不断趋近和远离生命中的女性。轻重并置还体现为一种情动包涵和孕育另外一种,即轻和重作为一种可能的趋势折叠进入对方的实存,在特定时刻相互转化。重使人感受生命,远离重自然会痛苦;轻会削弱主体,改变轻便可能幸福。托马斯和特蕾莎在彼此身边深感安心,便已暗示他们会因失去这种安心而陷入悲痛。在特蕾莎离开托马斯回到布拉格后,这种潜在的痛苦终于被揭示,情动之轻从情动之重中显现自身。轻重能够并存再次说明二者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情动潜能的不同面貌,“快乐和悲伤……可以不把这些看作对立或矛盾的二元,而是共振的层面。在它们实际的专一性中,情感作用是它们的出现点”^{[2]40}。

在情感体验被群体所分享时,轻与重实现奇妙的转化。痛苦本是一种削弱存在之力的轻的情感,但托马斯在对特蕾莎痛苦的感同身受中却萌生“爱”这种强化主体本质的情感,“他理解特蕾莎,他不仅无力责怪她,反而更喜欢她了”^{[1]24}。托马斯看似为缓解特蕾莎的痛苦而娶她,并追随她返回布拉格,但同时他也在回应自身情感,回应自身对分担爱人痛苦的渴望。小说末章描述托马斯和特蕾莎的生活:“他们幸福,并不是全然没有忧伤,而是因为忧伤的缘故。”^{[1]353}忧伤本身并不等同幸福,但对忧伤的分享却给人宽慰。在情动帮助人类实现共情的过程中,对于个体而言的消极情感会因集体的共同承担转而强化主体的归属感和存在感,因而人物能够通过感受他人痛苦实现本质强化,类同拉康“镜像理论”中借由他者确定的自我。此外,轻重转化还会通过主体幻觉制造出的差异实现,在弗兰茨对萨比娜及其祖国苦难的幻想中,浪漫的遐想带来的欣喜遮蔽了萨比娜实际体验的丑恶和不安。主体想象的情动之重实为他者体验的情动之轻,此般差异在“不解之词”一章被大量呈现,不同主体难以弥合的情感体验反而使同一情动对象拥有了轻重的叠加。

将群体范围扩大,便是某一阶级、某个国家对情

感的共享。当国家被侵略后,特蕾莎感到自己与整个民族分享“弱者”的情感。“软弱”是主体对自身能力匮乏的认知,是靠近轻的情感体验,但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的合流中,弱同样赋予个体以身份认同,“她明白她属于那些弱者……。她应该忠于他们”^{[1]91}。特蕾莎在软弱中反而体会到自身独特的存在力量,并因此萌生保护卡列宁等其他弱者的行为,“软弱”在个人与国家的情感同构中由轻转化为重。小说中集体分享情感的另一种体现是“媚俗”——借由操纵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感动形成对于对象的绝对认同,无论对象本身引发的情感轻重几何,都经由权力话语编码而不断变重,成为极力赞美的热望和同仇敌忾的激情。伤员、战争、死亡这些苦难之轻,在弗兰茨参与的“伟大进军”中呈现为被明星和歌手炫耀的、沾染在白色旗帜上的那抹鲜血,生命的悲怆体验成为政治鼓动的狂欢。

2 情动中身与心的一体化体验

在情动视域下,身和心不再是彼此割裂的二元,而是共同接受情感影响并做出相应反馈的整体,“情动在同等程度上既涉及身体,也涉及心灵”^[3],“一个生命……是一个情感主体,一个将身心融合在一起的主体”^[4]。除却小说叙述中心身选择相对一致的萨比娜和弗兰茨,即便是被刻画为徘徊于身心之间的托马斯和特蕾莎,他们的身和心实际也在情动中合一。

托马斯看似将身体之爱和心灵之爱作出区分,因而在喜爱特蕾莎的同时没有同其他情人的断交;然而当特蕾莎真正介入托马斯的生活后,托马斯“刚刚出门去同某个情人幽会,便马上对她感到厌恶”“他眼前呈现的是特蕾莎的形象”^{[1]25}。特蕾莎引起的情动不只是影响托马斯的心灵,而是切实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对特蕾莎心灵层面的依存之情,使他身体层面以他者为对象的欲望实现也经受阻,身心在情动中交相呼应。后文对托马斯迷恋肉体欢愉背后隐秘想法的揭示同样印证了身心的统一:同异性交往不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感官追求,而有心灵欲求的“征服世界”^{[1]239}的愿望,心灵的渴望借由身体的接触达成,身和心在揭示隐秘所引发的欢欣中协同运作,回应情感。特蕾莎是认同身心统一的,但她也曾经在绝望情绪的影响下尝试区分身心,期待在身体的堕落中留存心灵的无瑕。然而就在特蕾莎希望心灵以旁观者的姿态将身体交给陌生人后,她的内心竟然同样产生冲动——她仍然能从中感受到“爱情”。心灵终究无法成为身体以外的默

然看客,此刻身为弱者的晕眩感情统摄了特蕾莎的身心,敦促她将身心一同奉献,彻底否定她对二分法的尝试,这是身心面对情动的双重臣服。

人物身心之间徘徊的实质是身心共同体验着矛盾的情感,情动对象的复杂性迫使主体在混乱摸索中选择二分。以特蕾莎为例,她的身心之中存在一种“残酷的乐观”,这“指称着一种执着关系……追求其生命中的x的主体将无法承受他们的对象或欲望场景的丧失,尽管该对象的存在会危及主体的幸福”^[5]。即使对托马斯幽会其他女性的忧虑和猜疑持续伤害特蕾莎,但她也在对托马斯的爱中感到生命的存续和本质的确认,因而她恐惧失去这种相处关系,她难以想象在另一种存在模式中,自己是转而感受快乐,还是进一步趋向痛苦。而在情感悖论的剧烈煎熬中,宁愿舍弃身体凸显心灵只是表象,因为她并非视心灵高于身体,而是热爱和珍视自己的身体,认为它是心灵的重要表征,是自身不可分割的部分。之所以需要尝试身心的分离,正在于她的身和心全都深刻体验着残酷的乐观。区分身心正是矛盾的情感引发的施行:主体希望通过作出区分在失去方向感的、混沌的生命体验中标记人为的路径,以理性反抗情感对人无休止的裹挟,特蕾莎也说在理性中能够接受托马斯爱自己的同时幽会他人。然而情感终究会在理性沉默的黑夜爆发,于是残酷的乐观在夜晚统摄特蕾莎的身心,成为她的噩梦。

梦是身心共同编织的情感之网。特蕾莎某天梦见托马斯和萨比娜在她面前亲密,“这个场面让她痛苦难忍。她想用肉体的痛苦强压住灵魂的痛苦,使用针往指甲缝里刺”^{[1]18}。身和心在梦中成为感受痛苦的共同体。对梦的认知既涉及生理也涉及心理,因而梦是情感在潜意识中的诉说。清醒的痛苦和梦中的痛苦,互为彼此的延续,特蕾莎醒来后梦里的场景转化为清晰的心灵体验,心灵随即又要求在身体的痛苦中寻求共鸣,身心经由情感在梦里梦外都实现合流。与之相似的是“诗化记忆”,“它记录的,是让我们陶醉,令我们感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美丽的一切”^{[1]248}。单从这句描述中很难区分诗化记忆是指向心灵的感知还是身体的感觉,因为它实际是一种身心兼有的情动。特蕾莎能够独自占据托马斯诗化记忆的原因,同时也是她区别于托马斯其他情人的实质,在于其他情人只是满足托马斯寻求“快感”的身体欲望或渴望“征服”的心灵需求,特蕾莎则使托马斯感到“幸福”——一种身心统一的情感体验。诗化记忆和梦一样,揭示身心共同感受的真实情感,还原身心尚未割裂的完整人物。

在身心对情动的共同接受中,观念认知和直感体验相互影响,以情感为交点产生共振。托马斯对特蕾莎的爱始终围绕“她是被别人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流送到他身边”^{[1]249}这一比喻。搭救弃儿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使托马斯想到法老之女拯救摩西等传说,“拯救”行为在其中是文明的发端,作为外部原因引发心灵认知在同构想象中的最初喜悦。然而纯粹的文化符号终究抽象,需要通过现实的身体接触使其更加具体,“他感到她的双唇有一股微微有点呛人的高烧的热气。他吸着这股气息,仿佛想啜饮她身体的隐秘”^{[1]8}。特蕾莎病中的身体是拯救对象的具象化呈现,鼓动托马斯向其靠近的内在本能。真实可感的躯体与拯救行为蕴含的符号意义彼此趋近,最终在托马斯对特蕾莎的爱中实现合流。

就小说人物塑造与情动紧密关联而言,他们的诞生显示身和心的不可分离。昆德拉认为:“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换言之,产生于作者对于特定对象的独特感受,其中“包含了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生的基本可能性”^{[1]262}。这一过程与情动颇为相似,因为情动也是某一对象引发的模糊潜能,“是孕育复杂的诉求、处于新生状态的过程性、突变成成的扩散地”^[6]。据此可以认为正是作家一种特殊的情动创造出人物——既非只是心灵,亦非空有肉身,而是一种未被语言、结构、理性分割的感觉,随后这种感觉依照自身脉络发展演进,形成鲜活的人物。因而,人物诞生于二分观念还未发挥作用的瞬间,对立因素依然相互纠缠之时,主体是模糊却完整的存在,身心在感觉/情动孕育的可能中交织。

3 情动视域下重复与情动的轮回

“永恒轮回”是尼采提出的哲学观念,指向环状变化的历史运动。昆德拉移用这一观念构思作品,使其成为贯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重要线索和表现轻重、身心的独特语境,小说围绕“重复”展开。突破线性时间的情动和永恒轮回强调的重复有密切关联,既表征为重复能够塑造情动,也体现为情动不断趋向重复,二者之间存在互动。

3.1 重复塑造情动

首先,重复能够影响情动强度。特定事件所引发的情动强度会随着时间衰减,并逐渐被生活中的切身体验所遮掩。例如乡下的日常使特蕾莎近乎忘却先前担忧托马斯幽会他人的痛苦,代以喜悦。重复便是对于彼时情动效果的重现,让相隔久远的往事重新作为新近体验冲击人的身心。信件意象在乡

下生活的复现时刻唤醒特蕾莎记忆中的痛苦,强烈的绝望之情陡生,即便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1]353}。在此过程中,重复也会影响基于情动强度形成的伦理评价,例如小说提及的非洲部落冲突,本因相隔久远、不复发生而“无需”评价,但在重复中“此举之愚蠢将不可饶恕”^{[1]3}，“愚蠢”先表达情感层面的排斥,再指向价值判断的否定,重复通过强化前者塑造后者,“善与恶的观念不是别的,只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快乐与痛苦的情感”^{[7]176}。当托马斯初见特蕾莎萌生爱情的美妙瞬间被预先置于无限重复的日常中进行审视,情动强度产生变化,令托马斯开始犹豫所思所行是否正确。重复通过改变情动强度,促使人物不断重新评估自身建立的价值体系和所欲进行评价的对象。

其次,重复是对情动意义的确认。情动本是尚未确定的趋势,其作为瞬时体验具有无限潜能,而永恒轮回将会记忆并呈现情感流变的路径,使其能指的不同方向固化为特定的所指坐标。情动在这过程中失去异质性和模糊性,逐渐成为一种可被观念界定的明确感觉参与循环。亦即重复能够强化语言、结构、理性编码情感、生成意义,情动在重复中“产生令人惊讶的转变,即转向更确定的存在”^{[8]37}。这一过程是瞬时情动成为“语义之河”的必经之路。情动对象和情感体验以意象形式进行绑定,例如引起托马斯和萨比娜兴奋之情的圆顶礼帽,被萨比娜赋予“接纳乃至炫耀自身被践踏之尊严”的含义;当他们于苏黎世重逢时,礼帽依然能够借由这层含义唤醒或重复彼时那种兴奋,而不理解礼帽意义的弗兰茨便无法与萨比娜分享相同的情感。意义使意象还原为同一情动成为可能,实现情感循环。永恒轮回就是情动从无法确定的瞬间成为可被理解的符号,亦即语言不断捕获情动的过程。

重复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消解了情动存在的必要,因为主体在不断重复中趋于恒定不变,其存在之力不增不减,则其情感没有介入空间。然而面对重复,人类并非只能保持不变的漠然,而是可以选择一种超越性的情感,亦即尼采提出的“命运之爱”。特蕾莎对“牧歌”的向往便是如此,“它是在已知的事物中间循环移动。它的单调并非厌烦,而是幸福”^{[1]356}。在日日相似的乡下日常中,特蕾莎早已知晓他人即将说出口的玩笑,但不妨碍她从中感受快乐,“甚至连幽默也服从于温馨的重复之法”^{[1]359}。永恒轮回使人物由关心情动对象转为关注情动本身,以积极姿态认同或喜或悲的感受,命运之爱是以体验为内容的体验,以情感为对象的情感。

3.2 情动趋向重复

首先,情动作为一种自指预言实现重复。“于是他想象着她已经在他家住了许许多多,此刻正在死去。突然,他清楚地意识到她要是死了,他也活不下去。他要躺在她身边,和她一起死。”^{[1]8}托马斯对特蕾莎的情感萌发于想象中的多重假设而非纯粹的自然现实:假设和特蕾莎相处已久,假设特蕾莎正在死去,假设特蕾莎死去后自己亦将死去,所有这些想象最终成为实际情动,引发托马斯关于“爱”的思考与施行。由此可见情动对于因果的颠倒,不是日久相处之爱作为现实境况引发共同赴死的假设,而是同生共死的情动作为想象性趋势超越时间观念,折叠进现实,使托马斯确认爱情,进而实现自指的未来——同特蕾莎长期相守。马苏米认为“从感受出现的那刻开始,未来威胁就是无尽的循环”^{[8]25}。此情境中可将“威胁”替换为“依存”,从托马斯经受“依存”特蕾莎的情动影响时,“依存”便不断自我实现,成为无法摆脱的情感重复。

其次,情动也会因主体强化存在之力的需要趋于重复。“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1]359}的存在感悟和“快乐是一个人从较小的圆满到较大的圆满的过渡”^{[7]151}的情动阐释存在互文解读的可能。重复引发强化生命的积极情感,情感驱动渴望完满的生命进行重复,形成循环。首尾衔接、因果并置,促使情动从常规的时间序列中分离,在此意义上与永恒轮回对开端和终结的取消相呼应。“卡列宁的微笑”^{[1]351}即是如此,对卡列宁而言,幸福和重复作为“活着”的同义反复彼此重叠,相互印证。情动也为自我重构的需要进行重复。例如托马斯在特蕾莎离开苏黎世后,发现对彼此往事的回忆比往事本身更加美好,愈发令人触动。情动在回忆实现的重复中趋于纯粹,因为身心倾向筛选能够印证存在之力的情感,这种情感又会驱动身心反复进行筛选。这是情动的自我强化,通过重复使自身和主体共同趋向更大的圆满。

4 结论

从对尼采的引用中可以看出存在主义对昆德拉的影响,昆德拉曾坦言,其创作旨在探寻面对困境时人类的出路:“生活是一个陷阱,对此人们始终都明白,人生下来,自己并没有去要求,就被关闭在不是自己选择的注定要死亡的肉体里。”^[9]这近似于存在主义所论述的“被抛”状态。在这种茫然的处境中,主体必须作出选择并承担相应责任。然而如何选择才算正确?存在主义在消解固定本质后并未给

出明确答案。情动理论在此体现出它的意义——既保留了存在主义对人生价值的动态把握,又超越了主体选择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将不同选择统一视为对生命存续的持续确认。如果说存在主义强调主体选择的必要性,则情动理论赋予主体选择以合理性,后者进一步完善了前者对“人”的观照。

情动看似强调个体情感,却非仅为个人所有,而是标记一种联结——人和他人的联结,人和世界的联结:“它们既说明了我们感染/影响(affect)周边世界的力量,也说明我们被周边世界所感染/影响(to be affected)的力量。”^[3]正是在这种联结中,人们产生交集,事物关联因果,小说所叙述的许多偶然全都转化为有情可循的必然,小说所构造的许多对立全都弥合为运动变化的情感。人物不再是身心各居一隅的分裂自我,而是能够感受情感、回应情感的完整个体;人生不再是凸显断裂的数幕舞台场景,而是绵延连续的一系列流变情动。情感的差异性曾在托马斯和特蕾莎、弗兰茨和萨比娜之间筑起高墙,隔断所谓轻重;情感的共通性又允许他们在特定的瞬间越过高墙,理解彼此身心。这作为一种隐喻指向读者与小说、主体与他者间相似的同构,同为砌墙者和翻墙者的我们,也在与世界的接触中用身心感觉流动的情愫,以情动衡量生命的轻重。

参考文献:

- [1] 米兰·昆德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 许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2] 布莱恩·马苏米. 虚拟的寓言[M]. 严蓓雯,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 [3] 迈克尔·哈特. 情动何益?——《情动转向》前言[M]//蒋洪生,译. 汪民安,郭晓彦,编. 生产:第1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00.
- [4] 汪民安. 何谓“情动”? [J]. 外国文学,2017(2):113-121.
- [5] 劳伦·勃朗特. 残酷的乐观[M]//赵文,译. 汪民安,郭晓彦,编. 生产:第1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33.
- [6] 菲利克斯·迦塔利. 迭奏与实存的情动[M]//董树宝,译. 汪民安,郭晓彦,编. 生产:第1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40.
- [7]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 伦理学[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8] 布莱恩·马苏米. 诞于未来的情动现实——关于威胁的政治本体论[M]//邵蓓,译. 汪民安,郭晓彦,编. 生产:第1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 [9]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孟湄,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24. 责任编辑:寇国庆

论王蒙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及其审美价值

陈梓涵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现代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表征之一,在现当代文学书写中并非只是人物开展活动的空间,更是文化意义的重要产生场域。作为与新中国一道成长起来的作家,王蒙将社会发展历史与个体感性经验相结合,在作品中设立了中国城市空间(以北京为核心)的复杂表现形态。其运用感官化经验、转换观察视角与时空组合叙事的叙事策略刻画城市,不仅继承了现代以来的城市空间书写传统,还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形式美学探索,更呈现出了城市化模式的多样形态。

关键词:王蒙;城市空间;叙事策略;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027-07

The Urban Space and its Aesthetic Value in Wang Meng's Novels

CHEN Zi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Fujian)

Abstract: Modern cities, as one of the core manifestation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re not merely spaces where characters carry out activit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writing, but also important fields wher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s generated. As a writer who has grown up along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Meng combines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his individual sensory experiences, and in his works, he has established a complex form of expression of Chinese urban space (with Beijing at its core). By employ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sensory experience, changing perspectives of observ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combination narration to depict cities, it not only inherits the urban spatial writing since modern times, but also promotes the exploration of formal aesthetic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presents various forms of urban cultural models.

Key words: Wang Meng; urban space; narrative strategy; aesthetic value

在现当代文学书写中城市是文化意义的重要产生场域,是书写历史、情感与记忆的文化载体。王蒙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在积极地刻画、解读着“城市”这个庞大的人类聚集地。他笔下的城市空间于人事幽微处呈现出从封闭到开放、从稳定到流动的演变轨迹,这也对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如此关于城市的刻画既表现出他对社会历史发展记录的真诚,也囊括了独特的空间诗学之美。

王蒙小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原因不仅在于王蒙能将丰富的人生经验贯注到作品中,而且在

于他能够融会贯通地使用叙事策略表现叙事主题。而学界对其小说的研究或多聚集在叙事主题、人物形象或艺术特征中,或聚焦于小说创作的社会历史意义上。虽然也有学者以地理视角的方法论对王蒙的文艺创作展开批评^①,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论及王蒙笔下的城市空间,大多是将其作为文本分析的一环,并没有作专门性的阐述。现代城市(以北京为主)是王蒙小说创作中人事活动的主要发生背景,从城市空间的角度入手对其文本进行阐释,有助于补充王蒙小说的研究视角,拓宽王蒙小说的研究

收稿日期:2025-11-26

作者简介:陈梓涵(2002—),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E-mail:1581606545@qq.com

思路。因而本研究将从空间形态、叙事策略及审美价值三个层面逐步分析王蒙笔下的城市空间。

1 王蒙笔下城市空间的多样形态

在文学叙事中,城市空间往往超越其自身的物质形态,成为社会关系、历史记忆与文化意义的载体。诚如所言:“任何空间都体现、包含并掩盖了社会关系——尽管事实上空间并非物,而是一系列物(物与产品)之间的关系。”^[1]换言之,处于特定空间内的各种存在彼此牵连,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之中。城市在被居民塑造的过程中,又反过来见证着居民的日常生活,激发着居民对所处城市的情感经验。因居民的个性、经历、思想水平等差异,这种城与人双向交流的互动过程便容易被解读为多种形态,即“城(人文环境)吞没着人,消化程度却因人的硬度(意识与意志独立的程度)而不等”^{[2]11}。身为作家的王蒙在看待事物时比普通居民更为敏锐,这种敏锐便转化为笔下意蕴深厚的文字,传递着他对周遭环境的体悟。从《青春万岁》开始,王蒙便开启了对城市空间书写。在近70年的创作中,王蒙并非简单按照时间顺序书写北京,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新北京形象为起点向前向后拓展出不同风貌的城市空间。当这种思路具象化到作品构成时,他便透过身份与阶层各不相同的人物去感受与回忆北京。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北京

“老北京”的文化形象早在老舍作品中就被呈现。以城墙、胡同与市井生活为构成部分的城市烟火气是老舍书写北京城市空间的重要文化主题。最为清晰地呈现出老舍关于城市感性书写的作品当属《骆驼祥子》,在其中老舍构建了一种平民化、悲剧化的城市美学。在情节发展初期,祥子对北京空间的感受是积极的。对于身体强健、怀揣梦想的他而言,北平广阔的地理空间是他展示活力与实现阶级跨越的舞台,“一眼便看到新街口,道路是那么宽,那么直,他的眼发了光,和东边的屋顶上的反光一样亮。”^{[3]32}而当祥子最终沦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时,他对城市空间的感知仅限于满足最原始的生物本能,陷入彻底的虚无与异化。他不再与这座城市产生情感上的链接。在此,城市的繁荣与萧索的两种样态随着个体的感受而发生切换,也映衬着个体命运走向的历程。老舍不仅揭示了个体在社会压力冲击下的脆弱与崩解,也对老北京的风俗民风进行了诗意化的挽歌式书写:“北平本身可是渐渐地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

……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3]223}由此可见,在老舍笔下,城市兴衰的演变过程既是个人的命运发展的写照,又是彼时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结构的清晰缩影。

这种写作模式同样也被王蒙借鉴,他藉由对“老北京”市井文化生活的续写传承了旧时代北京的形象风貌。但与老舍在书写中尽力展现小人物于宏大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不同,王蒙更注重将视角聚焦在普通居民的喜怒哀乐上。在《闷与狂》里,王蒙就以城市草民的视角回顾了早年地域建筑色彩突出的北京城:“那时是古老的北京,是无数大大小小的四合院的北京,是从高处一看都是黑瓦屋顶的北京,是正南正北、密密麻麻的棋盘一样的胡同的北京。”^{[4]32}齐整划一且紧密相连的建筑格局将居民的生活场域并置,居民鲜少私人空间,邻里常共享着彼此的信息。《活动变人形》里刻画邻居“热乎”来倪家打探消息的场景:“院门一推,……‘热乎’腾碗放饺子的时候东张西望,盯着他们的杂面汤和屋里的陈设只管看个不住。”^[5]这样直白的行为表现在当下以私人户型为主要居住空间的都市里属实难见,而静珍、静宜两姐妹在院落靠墙的一侧同样自然地以鄙俗的骂仗回敬了“热乎”。王蒙在这里生动地刻画出街坊邻里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勾画了一幅老北京的城市居民画像。相较于更具有边界感的当代城市居民,这般吵吵嚷嚷、不拘小节的城市居民是彼时北京特殊的活力所在。

在大杂院内,一大家子人过着贫苦而拥挤的生活,这样困窘的遭遇正是旧社会普通群众面对的人生常态,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千疮百孔的情状。而家庭邻里共患难的情谊也成了居民关于所处空间的珍贵回忆,这种植根于血缘关系与居住空间的情感联结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集体生活观念的释义,彰显出“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原则。当城市空间的建筑景观向密集的高楼倚重、个体生活被划分出独立的单元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似乎愈发遥远,如“童年的城市仍然是生命的乡土。现在的城市则是水泥、钢铁与塑胶的天下”^{[4]18}一样,王蒙书写《活动变人形》与《闷与狂》的时间是在改革开放后,此刻快速发展的经济、复杂的社会关系导致邻里意识已不似从前深厚,王蒙借此传达了对往昔岁月的惆怅思绪。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新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被确立为国家政治与文化中心。此时崭新的北京形象正是在“一穷二白”的底色上开始建设的,其形象内涵既充

满着广大民众的热情,也深刻烙印着时代的希望。“创造新世界”的目标是彼时北京的追求,在这个目标的驱使下,城市的整体风貌也朝着令人振奋的方向进发。这种激荡的建设情绪造就了王蒙的人生觉悟,也迎合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满怀信心的时代氛围。因而他的第一部作品《青春万岁》便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时代背景,从而展现出“新北京”的特殊风貌。例如描写“国庆阅兵仪式”的练习场景:“炮队过了,坦克车轧轧地到来,履带威严而缓慢地转动,在马路面上无情地刻下纹道,发出刺鼻的烟气。路旁观看的群众高兴地把烟气吸进去,觉得分外舒服。”^{[6]32-33}这种“舒服”是城市居民在遭受压迫许久过后对自身所处的自信、强大的祖国的畅快情绪。

从王蒙20世纪5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出,“新北京”的城市空间建设过程其实不仅体现在物理层面,而且还体现在贯彻国家精神的实践当中。王蒙关于城市作品的书写显露出一种明确的叙事策略,即战争年代那种激昂的革命热情并未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而退场,反而在他的笔下被有意识地延续至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图景之中。由此,王蒙成功地在作品中营造出“生活即是战斗”的崇高氛围。这种文学叙事旨在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以强大的精神动力鼓动人民群众跳出琐碎的日常生活,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国家的意志紧密相连。而青年学生作为接受革命教育最为迅速的对象,在领导集团的政治调控与全社会的热情氛围笼罩下自发地将人生价值实现标准向革命工作靠拢,锻造革命性、进步性的个人心智模式。上述提到的《青春万岁》便是一种囊括了校园、工厂等集体生活模式的革命话语叙事。郑波、李春等女高中生的成长与蜕变预示着青年学生在步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成为社会主义的“螺丝钉”之前,“理想化世界的缩影”的校园需要引导他们接受主流价值观所崇尚的青春激情与集体主义理想,自觉树立为建设“理想化”城市而努力的目标意识。由此,王蒙的书写将老舍笔下驳杂化的“老北京”形象转化为更具集中性和组织性的“新北京”,从而赋予这座城市强烈的时代性。

1.3 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

改革开放后,经济跃升,城市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发展更为迅速。同时,紧张的政治氛围有所松弛,西方的时尚文化元素(如电影、音乐等)涌入,丰富了社会的文化景观。于是,在广袤的城市空间中,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现代消费文明元素交叠其间,构筑出多元的文化景观。王蒙

自边疆回到内地后,经常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当时北京仍有提着笼蹯鸟儿的悠闲自在的老北京人,也有弹着电吉他唱歌的年轻人,公园里时常呈现一幅摩肩接踵的熙攘场景,甚至无处落脚休息。他相信北京城经历“文革”创伤后,仍有着包容向前的文化发展可能。因而在“文革”结束重新恢复创作,他也将所感受到的新鲜气息用笔在小说中传递了出来。如在作品《风筝飘带》中,一个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北京更具现代性、国际性的北京城市形象由此树立:“在红底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7]262}

丰富的文化景观提供了更为复杂的信息,也让城市居民更为感性体验城市空间。在此不得不提及同样将此时的北京呈现为“价值多元的现代都市”的小说家王朔。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传统的胡同空间逐渐被部队大院、筒子楼及新兴的商业街区所取代。传统的地域文化边界被打破,大院文化与市井文化混杂,此种空间样态具有明显的碎片化、平面化特征,形成了一个没有等级秩序、充满调侃与反叛的“江湖”空间。在这样的城市文化空间内,王朔笔下的“顽主”群体形象采用戏谑的对话来解构传统道德体系与伦理规范,其玩世不恭的态度展现象征着20世纪80年代北京青年对崇高价值的解读,折射出市场经济初期社会精神状态的一角。王朔这种对传统京味文化所进行颠覆的审美是通过刻画一种粗暴而真实的生命力达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荒诞感与反叛精神。“顽主”群体与传统道德伦理相异的夸张面貌实际上也反映出现代都市中个体的生存焦虑。针对这个课题,王蒙似乎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其阔别北京十六载,现代都市多样性的文化冲击对他而言似乎来得更为猛烈,甚至给他带来了一种对北京这个故乡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借由《夜的眼》中陈杲的行进路线所传递出来。陈杲从华灯璀璨的大城市再到汽车车厢最后到“迷宫似的新住宅区”,夜晚的城市让他既露出微笑又感到不安,这种游移的情绪象征着个体在城市空间中的现代性体验。但与王朔过于沉浸在戏谑与反讽情绪中的姿态相异,王蒙在《夜的眼》结尾中写道:“二十年的坎坷,二十年的改造,陈杲学会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也丢失了一点本来绝对不应该丢失的东西。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工人,爱民主、评奖、羊腿……”^{[7]239}此般包容与

接纳世俗的定力使得王蒙在书写彼时已然变得缤纷驳杂的城市空间时,文字间含有的情感底色仍旧充满温暖与希望。

2 王蒙书写城市空间的叙事策略

王蒙在1980年前后接连推出了一系列突破传统小说模式的作品,从而引发“意识流”的讨论。对于这组作品是否属于“意识流”作品,当时文坛意见不一,而王蒙自身也对创作出现的“风格转变”这个现象并不清楚^{[8]274}。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王蒙认为“给手法起个什么名称,这不是我的事。但我要说的是,是生活、是我的思想和感受提示我这样写的。”^{[8]32}可见,无论是注重描写感情与情绪的“主情式”手段,还是类似早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素描笔法,都是为表达完整故事、传递作者思想而服务。20世纪70年代王蒙重新启动创作之际,也是王蒙自遥远的边疆重新回到北京之时,此刻身处于更加开放、多元的现代城市空间中,其对小说叙事策略的采取也更多地蒙上了现代性的色彩。

2.1 感官化表达

王蒙笔下的城市空间常常是多重感官经验的竞技场,其通过小说人物关于城市物件的感受构建起了一套独特的“感官政治学”。“建筑物是以双重方式被接受的:通过使用和对它的感知。或者更确切些说:通过触觉和视觉的方式被接受。”^[9]现代性对城市的改造本质是对人类感官系统的全面重构,城市个体依凭五官获取对生活空间的认知,同时又反过来被五官捕获到的信息塑造。

在《布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城市衰颓不堪,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展城市重建后,“柔软的枝条和新绿的树叶,已经日趋繁茂,已经遮住了城市街道两旁的天空,却仍然那么鲜活……”^{[10]39}视觉上的“绿”给予人以清新的感受,新旧时期城市面貌的反差性传递出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意义。除对城市全貌进行刻画外,王蒙在《青春万岁》中刻画了如巨石般威严的北京的核心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在美学视角上彰显政权的稳固与永恒,宏大的视景传递出无需强调的政治宣言:“简直是神话中的宫殿。天安门像在燃烧一样光耀夺目。邮政大楼、前门箭楼的灯火神奇地浮在半空,正在修建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举起了一颗大红星。”^{[6]244}

作为人员更迭极富流动性的物理空间,城市常混杂着新旧与土洋的多元气息。王蒙在《闷与狂》中将城市蕴含的百般滋味结合历史记忆与现代体验

尽数托出。“我”童年居住的四合院有“糊顶棚时遗留下来的糨糊味。有樟脑——卫生球味。也有家乡的冬菜——蒜腌大白菜的味道。可能还有猫屎与老鼠屎气味”^{[4]10},这些气味是贫穷的底层人民关于“生活”这个概念的印象合集;离开荒凉的戈壁滩,“我”坐在大城市的会议室里嗅着“奶油、番茄酱、煮卷心菜与新烤焙的蛋糕的甜香气味”^{[4]257},香甜的气味暗示着主人公重新回归平淡且幸福的生活,而在访问外国时闻见的刺鼻的香水气味让“我”头晕目眩,感到兴奋与惶惑,呈现出现代消费主义文明笼罩下的城市风貌。城市的气味承载着个体的经历与回忆,这些无形却顽固的嗅觉符号,镌刻着独属个人的城市印记,不同于视觉景观的公共性,与气味有关的记忆永远关联着个人情绪,当某个特定气息不期而至,城市将在瞬间退为记忆背景,而留下个体私密化的生命片段在其中颤动。

2.2 时空交织中的视角转换

空间的叙事作用已在文学实践中得到印证,相较于凝固的定点观察,切换不同的视角能更全面地探究事物复杂的面貌,而每个视角都是打开认知维度的棱镜。“很多现代小说家对空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且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总之,在现代或后现代小说家那里,‘空间’已经成为一种被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的技巧或手段。”^[11]而王蒙也擅长利用空间推进叙事,其在城市书写中设置笔下人物多重的感知空间的视角,构建充满张力的复调型空间叙事。其不仅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单一视角限制,而且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主体在城市中拥有的丰富体验,从而在认知层面上传递出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

在社会空间中,个体常具有多种社会身份,而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时常引发个体扮演角色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常导致个体在作出决策时会感到内心压力和焦虑。在角色切换的过程中,主体的位置与身份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我又梦见了你》中,王蒙借用视角跳跃的手法呈现这种流动性的转换。“我”反复拨打着电话,而“你”在东城、西城与市郊等位置不停转换。“我”最后发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种表现实质是主体对固定身份的拒斥^{[7]54}。而在《春之声》与《相见时难》中,王蒙使叙事视角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与外部景观之间反复游移,将关于回忆与未来的抽象思考转化为具体且可捕捉的画面呈现给读者。《春之声》的主人公由车厢里晃动的光斑联想到缩短的距离,

再联想到家乡,最后并置起城市与乡村两个双重空间之间的牵绊^{[7]283}。王蒙在此创造性地运用“记忆视角”的闪回技术实现了超现实的视角转换,使北京至X地的火车车厢成为穿越历史与未来隧道的时光机器。在《相见时难》里,蓝佩玉对北京的微妙心绪在访问故居时被胡同空间强制激活,往昔岁月随着视角的推进毫无阻拦地进入了她的脑海,三十多年的时间阻隔使故乡每个看似熟悉的物件都生发出断裂感。“在走过了那个矮小的后窗,又走过了那个温暖的墙角之后,在那个给她抓花生米的可爱的小矮子和衣冠楚楚的纽约教授李平怀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互相冲突、互相缠绕、互相交融之后,那种熟悉的老病、那种迷失了方位的又苦又甜的感觉复发了。”^{[10]356}空间由时间赋予意义,又因自身的重构而抹消时间的痕迹,时空的共生共灭状态在王蒙的笔下得到了清晰的显现。

2.3 语言的狂欢

除对作品整体架构的调整,王蒙还深入探索了小说“语言”的功能性。他采用刻意颠覆语法规则、逻辑秩序及叙事常规,并借助碎片化、拼贴、重复、戏仿等策略解构传统的语言结构,例如并置不同时空的语句、制造语义断裂等使语言成为超越内容本身的存在。

在书写现代都市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经验时,王蒙通过人物跳跃的思绪和急速变换的行进轨迹呈现这些内容,与之对应的则是无序化的语言表达。在《来劲》中,主人公“Xiang Ming”没有确切名字与性别,其在医院做了一堆检查后,得知没病便“哈哈大笑呜呜大哭哼哼嗯嗯默不作声”^{[12]231}。而下一秒他便乘着跑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再下一秒又莫名其妙地上了飞机,随即他的视角转向火车里熙熙攘攘的“倒爷”人群。通篇作品时不时出现缺失了标点的句子,句子间的连贯性被随意打破,段落间的内容更像是多种城市元素的拼接与堆叠。这种断裂性的叙述,是对碎片化的都市经验的形式呼应。

除借由混乱且无序的语言表意之外,王蒙还擅长以有序排列的文字营造夸张的阅读效果。这类文字在字词位置或句式结构上看似遵循着严谨的对仗,契合传统诗文的形式美感,却在内容表达上全然脱离现实逻辑,流露出荒诞的意味。如“浩浩汤汤,固若金汤,天不下汤我煲汤,地不涌汤我即汤,万物皆备于汤,众美俱出于汤,延年益寿全靠汤,滋阴壮阳唯凭汤,汤中自有美天堂,汤中自有颜如玉,汤中自有后学识,汤中自有天与道,汤中自有悲与壮。”^[13]此番文字以排比铺陈的句式层层递进,从自

然之汤到人为之汤,从日常功用到精神寄托,将“汤”的价值无限拔高,表面上为这场奢华宴席渲染出富丽堂皇的氛围,为东道主汤公的宴请增添光彩,实则从侧面精准昭示出董事长汤公华而不实的行事风格与爱慕虚荣的性格。而身处宴席的主人公李生作为普通职员,面对桌上那些“硬如铜铁”、全然不合食用常理的菜肴,只能被迫跟随同僚的动作刻意演出感激涕零的姿态。王蒙在此精准以乱序的文字承载夸张的内容,再以夸张的笔法呈现出辛辣幽默的文风。这样的手法让读者在齐整的语势与荒诞的内容中感受到文字的张力。而王蒙更借由描摹这一具体场景传递出他对现代职场乃至世俗社会中虚与委蛇、矫揉造作风气的讽刺,暗含着对个体陷入丧失本心、被迫同流合污的生存困境的反思。

3 王蒙小说中城市空间的审美价值

3.1 “文学北京”书写的两面性

有学者对近代以来的文学北京形象做过归纳:“其一是对典型中国传统古都形态的体现,其二是作为传统城市形态在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中所赋予的‘家园’意义……其三是所谓‘新北京’即1950年代以来作为新中国首都所体现的社会主义中心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性。”^[14]而前两种文学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前于文学中占比最高。经过文人眼光“过滤”后的北京,通常是带有文人气与典雅文化意味的北京。自老舍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后,温润的人物形象与节制的情感表达在关乎北京的刻画中占据着主要位置,即便是对三教九流的描写,也着重突出囊括“礼仪”与“风度”的北京地域文化色彩。而王蒙在刻画城市空间时,也通过细节方面的描写来突出北京的这一文化特色。《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篇就写三轮车的车夫将林震送到区委门口时,看了看挂着的牌子便十分客气地对后者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7]26}这种礼仪风度经过长年累月的熏陶,便会成为一种烂熟的姿态,从通常意义上讲便是“世故”。刘世吾的语言艺术与处事风格便印证了这一点,他讲起关于革命、关于党、关于政治工作的惯用语时,行云流水,其间掺杂的情感虚实参半,使人捉摸不透。刘世吾在掌控语言格调方面所表现出的平实与烂熟,是普通市民阶层中“京味”内涵的突出一角。

在传统的文学想象之外,时代因素的转变也影响了王蒙对于“文学北京”形象的书写。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城市想象的书写逐渐向着国家意识形态掌控下的现代性逻辑靠拢。“在社会主义中国,

国家工业化的前提之一是城市单一的公共性功能,包括政治上的、生产上的。”^[15] 为了避开私人化的话语属性,当时的城市文学作品大都通过设置特定空间场景以及改变空间功能样态等方式来凸显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典型逻辑。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形象更呈现出含有公共性和政治性的想象意味。王蒙大部分时候也在作品中采用了这种书写模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便是一个范本。其围绕着“区委会组织部办公室”与“工厂车间”两个主要场景开展,极力在这两个公共性场景下凸显公共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而这种模式一直到王蒙在20世纪90年代所创作的“季节系列”小说中仍旧有着体现。在这些长篇创作里,除开有意安排公共场景之外,王蒙也将私人场景所承载的功能进行了非日常化的处理。例如在“客厅”这个场所,几乎不发生任何关于私人生活的情节。在《狂欢的季节》中,钱文前往边疆的辞行被放置在陆书记的大客厅中进行,“大客厅”与执行公务的“接待室”之间在意义功能上画上等号。对公共性场景的突出强烈折射出了当时社会万众齐心的热情氛围,人物在公私空间中的行事逻辑依照着一个“为了建设更好的明天”的中心主题。这种集体式的理想是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王蒙在一生中始终坚持的书写方向。

3.2 对城市书写的实验性探索

对于实验性的文学尝试,王蒙一直都抱着包容与鼓励的态度。这种接受新事物的宽阔眼界与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面貌相结合,促使他在书写城市时摒弃以单一手段刻画城市空间面貌的观念,而是在作品中有意地打破各种叙事策略之间的界限,使城市经验的多样形态在文本缝隙中自然流露。

王蒙颠覆了传统小说以时间为主导的线性叙事,赋予空间结构整个故事的叙事权力。这在短篇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园》中,“月光园”成为故事的叙事线索,王蒙通过空间的虚实变换,构建了一个关于记忆、时间与存在本质的哲学寓言。作为记忆载体的“月光园”保存着主人公夫妇俩的青春痕迹,青石牌坊、青石桥、假山等空间元素成为凝固时间的琥珀。但经历过动荡岁月的主人公夫妇俩折返这个美丽而残破的城市时,却陷入了找寻不到“月光园”的惊惧与恐慌,园子在他们记忆中的虚实变化对应着历史动荡中的身份危机。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某个时刻,他们再次来到园子中,突然有了“心如水的清澈”^{[12]218}的顿悟,由此,空间在两人记忆中存在状态的改变折射出时代的创

伤与精神的自我救赎。而在《临街的窗》中,“窗”成为叙事的意义本身,即使这扇幼时带给我许多美好回忆的“窗”已被堵死,“我”却并没有物是人非的悲伤情绪:“我看着已经堵上的临街的窗,祝福它过去的和现在的主人……它们将唤起新的、密集得多也奇妙得多的幻想,给新的徘徊者以安慰。”^{[12]188} 只要“窗”本体还存在,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其仍旧有着创造意义的可能。这种由空间主导的叙事架构使得城市经验不再简单依附于历史时间轴,而是通过空间的并置与独立呈现现代性体验的多样本质。

但即便空间在小说中拥有叙事的主导权,王蒙并没有完全割舍掉时间在城市空间书写中的作用,而是将其与动态化的场景结合,从而传递出独特的城市体验。在《色拉的爆炸》的城市街头场景中采用了“游荡者视角”的动态书写描绘了城市秩序之外的个人感知体验,“他”与竹青的行走轨迹犹如摄像机随处记录着城市的任意一角。文章中“后来”一词的接续使用将两个都市漫游者的动作拼贴在一起,这种流动视角的连续变焦,再现了个体在现代都市空间中的游荡感。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他”与竹青以匿名身份短暂摆脱传统社会的身份枷锁而随心所欲地感受生活,为这种“挤来撞去的闹哄哄的生活”^{[12]58}而感到舒畅。与以往输出关于城市“节奏快、人际关系疏离”的负面情绪的作品相比,王蒙在此传递了个体感受现代都市的另一种更具乐观性质的可能。

3.3 城与人:永恒的对话

现代城市因工业建设而有着趋同的物理形态,但现代城市的文化模式则逐渐向多元共生的方向建构。城与人紧密联结,城市的主体精神面貌实质上是由人来赋予,个体在城市空间中所经历的各种生存样态实际上是由人群自身所引发与塑造。“也许先要承认文化多元,承认有被分割了的属于不同人的城市,有不同人的千差万别的城市印象、城市感觉、城市节奏,才能说得清楚所谓‘城市’这玩意儿的吧。”^{[2]216} 王蒙对不同时期的城市进行书写,实际上也是在折射着对于北京这个他土生土长的故乡的理解与感受乃至个人的期待。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身为革命队伍一员的他不吝笔墨地勾勒了当时城市在全国上下团结一心的努力下所呈现出来的欣欣向荣的风貌:机关团体门口的红灯笼使得光明彻夜不灭,摊贩忙于将商品拿给抢购的顾客,服务人员则兢兢业业管理着游行活动,居民在这和平、有活力且充满秩序的氛围下似乎可以安稳无忧地期待明天。而在改革开放后,一切禁忌和戒律都

如融冰一般开始化解时,王蒙在作品里用梦呓一般的语调描绘了当时城市居民的生活:“妻子说我捣乱说没有太阳说让我煎两个气球吃了止泻补气。儿子推开我继续睡他说他明年如果去不了外国就和那个拉胡琴的大姐结婚。”^{[12]209}洋溢着躁动和兴奋的生活氛围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主流,对于此时刚刚返归北京的作者而言,这样的体验迎合了他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感受。

或许日日新鲜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现代文明,但对于王蒙而言,这种“新鲜”的经验是与私人情绪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结合着当下个人欲望的感受。“那个晚上,我与我的初恋、我的女友、我后来的妻子一起步行了六个小时,我搂着的是你,是整个的所有的北京……那永远与北京牵手共舞,与新中国一起阔步向前,与伟大首都一道挺胸昂首牛气冲天的不可思议的美妙感觉,如果你有过这么一次、这么一个夜晚的经验,你当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4]88-89}这种对城市生活的感受是复杂且具有包容性的,即便是“世界的物质性欲望性消费性诱引性”在王蒙眼里也同样是惹人喜欢的。也许正是已经走遍寰宇的心胸与丰富的人生阅历,王蒙对城市生活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更为独到的理解。幼时古老的北京城、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城,再到如今全球化时代潮流下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北京城,这方有着深厚历史的一方天地向来是王蒙感受人生的重要载体之一。倘若他没有主动观察生活的眼睛,没有积极采纳不同创作手段的学习心态,没有放眼世界的包容胸怀,城市空间在他笔下可能不会有如此多样的面貌。

从《布礼》结尾写平反后的钟亦成夫妇站在P城的钟鼓楼上遥望北京,再到《在我》写当代城市居民生活的平凡一瞬,王蒙结合着自己最真切的生活感受与最朴素的情感,用笔抒写着自己关于城市的文化期待,即“我愿意为了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编织一点各式各样的好的故事。”^{[8]36}这种对自我、对时代的乐观态度,或许是阐释他安排小说中各色主人公在不同城市样态中展露不同人生的一个最好的理由。由此可见,在王蒙笔下,城市是属于个人的城市,个人也是属于城市的个人。城市文学的核心永远是“人”。无论是经历岁月中的城市变迁,还是体验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精神困境,抑或是接受多元文化的诸种冲突,最终都指向“人在城市如何安放灵魂”的问题。在现代文明发展愈发快速、社会情感愈发疏离的当下,王蒙的城市书写实践提醒我们:唯有扎根人的真实体验,拥有更加开放包

容的态度,城市书写才能超越普通的景观描写,成为照亮城市生活的灯塔。

4 结论

当下的城市文学仍在发展,而王蒙如今仍然还在继续写作。自从开启写作事业的那一刻起,王蒙便以文学实践活动参与着城市文化生活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与他关于人生与世界的思考紧密相连,随着岁月的推进、人生阅历的丰富,他笔下的城市空间所包含的内容也愈发多元。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使他自觉地将责任感与使命感融入创作,选择真诚且如实地反映现实中的城市生活。也许王蒙关于城市空间的写作只是他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的一角,但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意义与价值,亟待更多学者挖掘和评价。

注释:

- ① 陈露在《地理之变与王蒙的叙述特色》中对王蒙的“北京情结”进行了分析。

参考文献:

- [1]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24.
- [2] 赵园. 北京:城与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3] 老舍. 骆驼祥子[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 [4] 王蒙. 闷与狂[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 [5] 王蒙. 活动变人形[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11.
- [6] 王蒙. 青春万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 [7] 王蒙. 王蒙文存:第十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8] 王蒙. 王蒙文存:第二十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9]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王才勇,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64.
- [10] 王蒙. 王蒙文存:第九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11]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12.
- [12] 王蒙. 王蒙文存:第十二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31.
- [13] 王蒙. 王蒙文存:第十三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93.
- [14] 张鸿声. 文学中的“新北京”城市形象——以“十七年”与“文革”诗歌为例[J]. 扬子江评论,2009(5):28-34.
- [15] 张鸿声.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28.

责任编辑:袁媛

AIGC 视域下 IP 构建驱动红色旅游文创设计路径

杨蕊*, 许存福

(安徽新华学院 艺术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聚焦数字化时代背景, 以安徽金寨县为案例, 探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赋能 IP 构建、驱动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设计的创新路径。研究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 200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1 月收录的 1301 篇“红色旅游文创”相关领域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以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形式描述不同关键词的内在联系, 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问题启示。构建了包含文化解码、创意生成、品牌塑造、生态衍生的四阶段文创产品设计模型框架, 以破解金寨县红色文创开发中的具体问题为导向, 通过“金寨星火”IP 设计实践验证了该模型框架在提升文化转译效能、智能驱动创新等方面的有效性, 为金寨县及同类型地区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技术应用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 红色旅游; 文创产品; IP 构建

中图分类号: J528; TP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6)03-0034-07

The Path of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Driven by IP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GC

YANG Rui*, XU Cunfu

(School of Art,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230031, Anhui)

Abstract: Focus was placed on the digital era, with Jinzhai County, Anhui Province, taken as a study case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path of AIGC technology empowering IP construction and driving the design of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on 1301 pieces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ity” retrieved from the CNKI database between January 2005 and November 2025.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among keywords were described through visual knowledge graphs,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blematic revelations within the field were analyzed. A four-phas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mode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cultural decoding, creative generation, brand building, and ecological derivation was constructed. Guided by the objective of addressing specific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Jinzhai count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del framework in enhancing cultural translation efficiency and intelligently driving innovation was verified through the “Jinzhai Xingyan” IP design practice. A path reference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depth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was provided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red culture in Jinzhai county and similar region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P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25-12-19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培育一般项目(YQYB2023075); 安徽新华学院科研反哺教学项目(2025zx16)。

作者简介: 杨蕊(1992—), 女, 安徽蚌埠人, 讲师, 博士; 许存福(1979—), 男, 安徽合肥人, 教授, 博士。E-mail: 362225340@qq.com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务院《“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1]。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以静态陈列与简单符号复制为主的红色文创产品,已难以满足新一代消费者对沉浸式、交互性与个性化文化体验的需求^[2]。与此同时,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文创设计领域带来了范式变革的可能,其在创意激发、效率提升与风格化表达方面的潜力,为破解红色文创同质化困境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支持。

安徽金寨县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红色文化资源富集^[3],但其文创产品开发同样面临品牌视觉形象模糊、历史叙事与旅游体验割裂、产品创新性不足等普遍性问题,具体表现为视觉符号分散,未能形成统一认知;叙事方式较为传统,与年轻游客的体验偏好存在代差等。本研究立足于朱政等提出的IP构建思路^[4],塑造有价值的文化符号,引入AIGC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结合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旨在系统探索一条具有文化内涵、技术前沿性与市场适应性的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创新设计路径,并以金寨设计实践予以验证。

1 基于 CiteSpace 的红色旅游文创研究现状分析

本研究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运用CiteSpace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对红色旅游文创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明确当前研究的核心焦点与尚存的研究空间,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构建与设计实践创新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1.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技术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高效解读文献的组成类型、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等^[5]。由美国德雷赛尔(Drexel)大学教授陈超美开发的数据处理及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可通过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突现图谱、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实现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为确保文献分析的全面性与代表性,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作为主要数据来源,检索时间跨度为2005年1月至2025年11月。采用“红色旅游文创”作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检索,经过去重、剔除不相关文献等数据清洗流程后,最终筛选出1301篇有效文献作为分析样本。

1.2 研究焦点与结构特征:宏观战略与微观实践的失衡

关键词共现分析显示,通过检索“红色旅游文创”关键词,结合数据分析,领域内形成了以“红色旅游”(频次528)、“红色文化”(频次238)、“乡村振兴”(频次118)及“文旅融合”(频次112)为核心的强关联集群。这些高频关键词构成了研究的知识基底,表明当前学术界高度关注产业融合、资源保护与宏观发展策略等上层建筑层面的问题。相比之下,直接关乎产品落地的“文创产品”(频次74)、“文创设计”(频次33)等关键词虽出现在网络中,但节点影响力相对有限。这一“宏观强、微观弱”的共现结构表明,现有研究在顶层设计与具体产品创新之间存在脱节,大量讨论未能有效下沉至可操作、系统化的设计方法论层面。

1.3 研究趋势演进:技术关注的滞后

关键词突现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研究热点的时序性断层。“文创产品”于2021—2022年出现高强度突现(Strength=3.47),但随后迅速减弱,这反映了该主题作为阶段性热点受到集中关注,但可能缺乏持续、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积累,导致成果沉淀不足。更具启示性的是,“数字技术”及相关关键词的突现始于2023年,且强度较弱(Strength=0.92)。这表明,面对VR/AR、AIGC等技术的快速迭代,学术研究的反应略显滞后。当前探讨大多追随“数字化”浪潮,尚未深入其内核,尤其缺乏对AIGC这类颠覆性技术在创意生成前端具有的核心价值进行前瞻性、系统性的探索。

1.4 研究热点聚类及其内在局限

通过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1)中聚类数字编号可知,#0指代聚类研究热度最高,#10指代聚类研究热度较低,聚类图中编号数字越大,研究热度则越低,可见“红色旅游”“红色文化”“文创设计”“旅游文创产品”“红色文化旅游”等主题是研究热点,也显示出研究主题的前沿性和新兴性。结合关键词共现图谱数据,识别出当前红色旅游文创研究的四大热点集群为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模式、红色文创产品开发与设计策略、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挖掘与保护传承、数字化与技术应用。

1.4.1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模式集群

以“红色旅游”“全域旅游”“游客感知”等为核心形成的关键词关联集群,研究多从产业视角探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教育培训等领域的融合发展路径,聚焦于产业联动与政策解读,但对融合的“产品化”载体及其创新机制缺乏深入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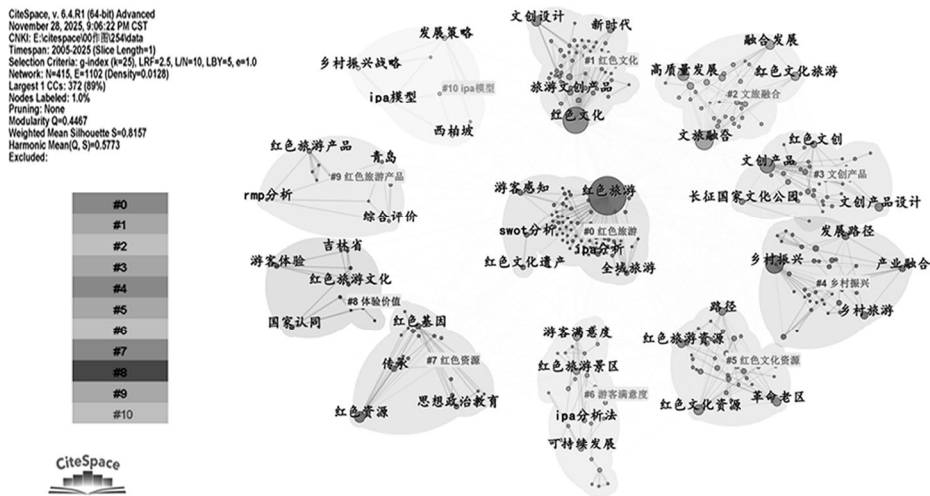


图1 近20年我国红色旅游文创关键词聚类图谱

1.4.2 红色文创产品开发与设计策略集群

以“红色文化”“旅游文创产品”“文创设计”等关键词组成的关联集群,研究内容主要涵盖产品形态创新、地域特色体现、红色文化融入及用户体验优化等方面。现有研究虽然提出了“文化元素提取—设计转化—产品落地”的基本框架^[6],但多数研究在“设计转化”这一关键环节流于原则性建议,缺乏跨学科、可复用的系统方法,特别是如何将红色文化元素转化为符合当代审美与功能需求的创新设计,仍是亟待突破的难点。

1.4.3 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挖掘与保护传承集群

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为核心的关键词集群,聚焦于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解读与当代价值重构。当前相关研究特别关注红色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方法,但多停留在传统文化符号的直接应用,对符合当代情感叙事与审美语境的现代表达研究不足。

1.4.4 数字化与技术应用集群

“数字技术”“数字赋能”“数字化”“人工智能”关键词所在集群出现于2023—2025年期间,反映近年来学界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关注度持续上升。作为新兴但节点松散的热点,其研究呈现明显的“终端应用偏向”。现有成果大量集中于VR/AR在展示与传播端的应用,而几乎未触及如何利用AIGC等技术,从“文化解码”和“IP形象生成”的创意源头进行赋能。该集群与“产品设计”集群间的知识连线稀疏,印证了“技术”与“设计”在学术研究中的连接不够充分,因而仍留有较为显著的研究空间。

1.5 研究前沿与演进趋势:IP化的机遇与系统方法的缺席

结合聚类时间线图(见图2),领域研究历经了从“资源保护”到“产品开发”,再到当下“技术赋能体验”的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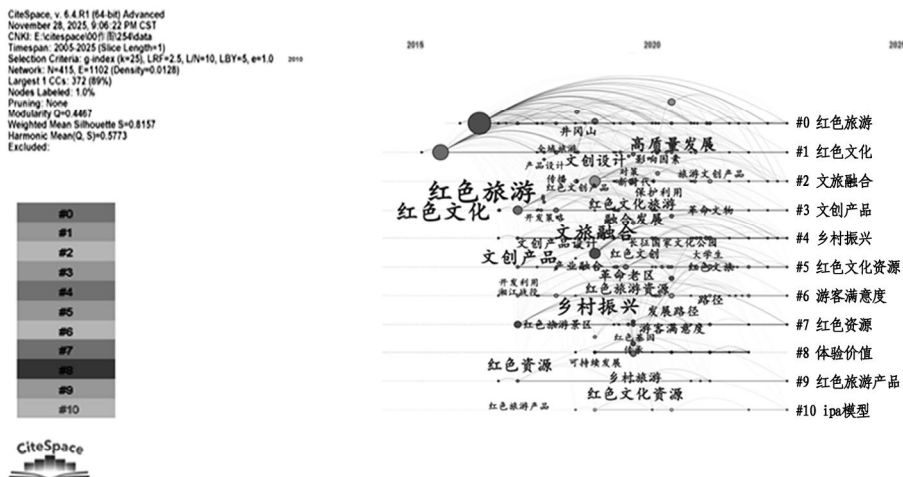


图2 近20年我国红色旅游文创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值得关注的是,“IP”作为关键词虽近年频现,却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高聚合度的核心聚类,它散见于各集群边缘。值得关注的是,“IP”作为关键词虽近年来频繁出现,却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高聚合度的核心聚类,它散见于各集群边缘。这深刻说明:尽管 IP 化已成为行业共识与重要方向,但学术层面仍普遍将其简化为“视觉形象设计”问题,严重缺乏从价值内核、叙事体系到商业生态的系统性 IP 建构理论的支撑。这种系统方法的缺席,使得红色文化的 IP 转化难以实现从“形似”到“神聚”、从“单个产品”到“品牌生态”的跨越。

2 研究评述与问题提出

基于上述对红色旅游文创领域研究现状与金寨县实际问题的调研分析,笔者发现当前研究存在着显著局限,这些局限不仅显示了该领域内的发展瓶颈,也为本研究的创新方向提供了明确指引。

2.1 现有研究局限评述

基于前述计量分析,下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评述当前研究的核心局限。

2.1.1 理论与实践脱节:策略与实践的断层

当前红色旅游文创研究普遍存在理论策略讨论过多,实践探索较少的现象。多数研究聚焦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原则、产业融合的总框架以及品牌建设的战略意义,而缺乏将理论转化为可操作设计方法论的具体路径。以金寨县为例,尽管《安徽省红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等相关政策文件中强调了“文旅融合”与“创新开发”,但学界也指出需创新红色文旅产品体系,推动资源多元开发^[7]。但在实践层面,金寨县的文创产品开发仍存在市场定位模糊、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设计与开发环节往往依赖于传统经验,缺乏系统的设计流程,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

2.1.2 技术融合深度不足:AIGC 等前沿技术在核心设计环节的应用缺失

虽然数字化已成为红色文旅的发展趋势,例如湖南等地已运用 VR、AR、AI 等技术提升游客体验^[8],但当前研究对 AIGC 等前沿技术在创意生成、方案优化等核心设计环节的应用探索仍显匮乏。目前相关设计案例多集中于 VR、AR 在展示和传播平台上的应用,或将 AIGC 简单视为辅助工具,未能深入挖掘其在文化符号的智能提取、IP 形象的参数化生成与迭代、个性化文创方案推演等方面的潜力。同时,对于技术应用如何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深度融合,也缺乏建设性方案。

2.1.3 学科交叉不充分:壁垒分明阻碍系统性创新

从设计符号学的维度出发,红色旅游文创开发需要系统考虑用户、元素、环境、载体等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9]。然而,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本质上是涉及设计学、计算机科学、旅游管理、历史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10]。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力量分布不均且合作薄弱,跨学科协作尚未形成规模。设计学者可能深耕于文化元素的视觉转译,但对旅游市场的消费心理与商业模式洞察不足;计算机领域专家擅长技术开发,但对红色文化的特殊性 & 设计规律理解有限;旅游管理研究者长于市场分析与产业规划,却难以介入产品前端的创意设计。这种学科壁垒导致研究成果呈“碎片化”,缺乏从文化解码、技术赋能、产品设计到市场运营的贯通性研究,难以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从而制约了红色文创产品的系统性创新与产业升级。

2.1.4 IP 构建系统性缺失:从“形象设计”到“生态构建”的断层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IP 在当代已被赋予各种丰富的内涵,它不再是知识产权的单纯简写,而是一种承载形象、表达故事和彰显情感的经受市场验证的情感载体。IP 构建是一套系统性、战略性地将文化产业语境下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长期生命力和商业价值的方法论^[11]。近年来,IP 化已成为红色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IP 的出现可以拉近红色文化和群众的精神距离^[12]。但现有学术研究尚未提供一套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 IP 资产的系统方法论。一个成功的红色旅游 IP,应涵盖核心价值、世界观、叙事、产品生态及持续运营。现有研究的“系统性缺失”,导致许多 IP 设计止步于图形应用,难以实现深层次的文化传播与市场价值。

2.2 基于金寨县红色旅游文创的发展与转型需求

研究领域现有的局限,在金寨县的实践中具体衍化为三大发展瓶颈。其一,资源转化断层。金寨县不仅具有代表性、集中性的红色资源,还坐拥大别山这一核心区域的绿色生态资源,“红”与“绿”底色鲜明。然而在文旅融合与数字化浪潮下,革命历史、生态资源和民俗风情彼此孤立,未能聚合为具有高辨识度的统一品牌符号,导致品牌视觉形象模糊。其二,叙事体验割裂。文创展示方式仍以静态陈列与史实陈述为主,如金寨县历史文物馆中的革命文物展览、革命旧址的静态展示等,与消费者期待的沉浸式、互动性、情感化体验存在差距。其三,技术应用表层化。数字化尝试多聚焦于景区导览等基础功能应用,未能将前沿技术如 AIGC 融入 IP 创意生成

与产品创新核心环节,导致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这些瓶颈共同构成了制约金寨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障碍,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精准的切入点。

2.3 本研究的应对逻辑:AIGC 赋能的必要性

当前研究在理论转化、技术融合、学科交叉及 IP 系统构建上的局限,在金寨县实践中具体表现为“资源转化断层”“叙事体验割裂”与“技术应用表层化”三大核心瓶颈。要系统性地突破这些瓶颈,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能够深度融合文化理解与创意生成且能桥接多学科流程的技术范式。而 AIGC 技术在此语境下具有不可替代的赋能优势:首先,其强大的多模态学习与生成能力,能够将金寨散落的“红”“绿”文化资源进行智能编码与关联,为统一 IP 符号的诞生提供数据基础,直接应对“资源转化断层”;其次,基于提示词的参数化、可迭代的创意生成模式,它能够将红色精神内核转化为多样的视觉叙事方案,极大拓展文化转译的边界与效率,为解决“叙事体验割裂”提供全新工具;最后,AIGC 作为贯穿数据解码到内容衍生全流程的技术工具,要求设计学、计算机科学、旅游管理等学科的协作,为构建 IP 文创设计生态系统提供了方法论。因此,本研究并非泛泛引入数字技术,而是明确以 AIGC 作为核心驱动力,旨在通过其特有的技术禀赋,有针对性地、系统性地破解金寨红色旅游文创发展的困境。

3 协同创新框架构建

基于前述研究局限分析,本研究构建了一个 AIGC 赋能的四阶段文创产品设计模型框架(见图 3),系统性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脱节、技术融合不足、学科交叉缺乏及 IP 构建不完整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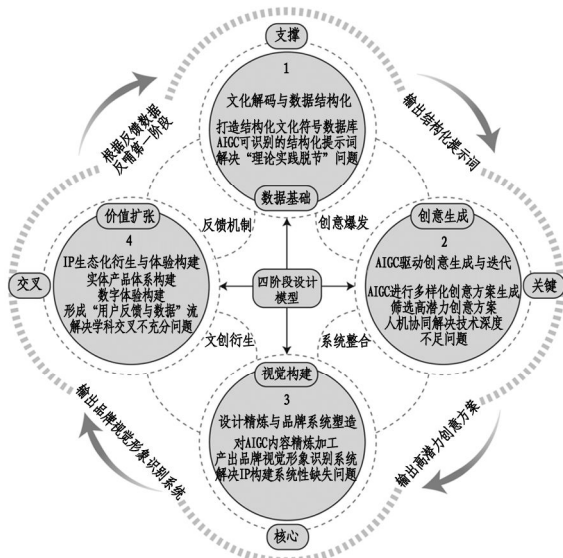


图3 AIGC 赋能的四阶段文创产品设计模型框架

3.1 文化解码与数据结构化

本阶段是 AIGC 有效介入的前提。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金寨县政府网站的公开信息,对金寨县的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调研,将其归纳为革命历史、自然环境、建筑遗址、民俗风情、饮食特产、药材作物六大维度,并建立了结构化的“文化符号数据库”。研究中为每个符号(如“映山红”“立夏节起义”“金寨吊锅”)撰写了可供 AIGC 识别的“结构化提示词”,例如在描述“红军军装”的视觉特征时,还标注其背后“艰苦奋斗、纪律严明”的精神内涵,为后续生成提供精准的语义引导。

3.2 AIGC 驱动下的创意生成与迭代

此为创新核心环节。以结构化提示词为输入,利用 AIGC 工具进行参数化生成。通过调整提示词参数,可同步生成 IP 形象、场景插画及辅助图形等多种风格的初始方案池。在此过程中,设计师的角色转变为“创意策展人与导演”,通过评估结果与反向调优提示词,引导 AIGC 向预定目标收敛,实现高效迭代。

3.3 设计精炼与品牌系统塑造

AIGC 的产出是“创意毛坯”,需经专业设计精加工。可基于品牌系统化原则,对筛选出的最优 AIGC 方案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统一线条、规范色彩体系、完善细节刻画,并建立 IP 形象的标准制图与多种动态表情,最终可形成独具金寨特色且具备高辨识度的主 IP 形象及其完整的视觉识别系统。

3.4 IP 生态化衍生与体验构建

基于固化后的 IP 资产,进行跨媒介的文创体验构建。主要包括两大路径:一是开发徽章、手提包、文具、家居等品类的实体产品体系,强调 IP 形象与产品功能的有机结合;二是构建数字体验,如开发集成游戏化叙事与互动任务的微信小程序,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最后通过用户反馈形成数据流,反哺至第一阶段,可根据不同时期的设计审美、实用需求等内容更新迭代设计,形成 IP 生态化衍生。

4 AIGC 赋能的“金寨星炎”IP 及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实践

在深入解读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开发,需要提取当地红色物质元素与精神文化精髓,结合时代特征与当代审美进行创造性转化。本研究基于前期构建的 AIGC 赋能设计模型,以“金寨星炎”为主题开展设计实践,通过智能化设计方法构建金寨县红色旅游形象体系,促进提升当地旅

游产品文化附加值,体现金寨独特的红色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

4.1 IP 主体形象“金寨星炎”生成实践

在设计实践中,完整运用了前述构建的 AIGC 赋能四阶段设计模型,运用 DeepSeek、即梦 AI 和 Tripo3D 等工具,为革命老区金寨打造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价值的视觉符号“金寨星炎”(见图 4)。通

过 IP 形象“星炎”作为文化转译媒介,构建公众与红色历史之间的情感连接,实现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的创新性表达。该设计充分体现金寨“红绿融合”的特质,即红色文化资源与绿色生态资源融合发展的理念。这种特质能够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创新发展,通过有机结合,能够实现乡村在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维度协同发展^[13]。



图 4 “金寨星炎”IP 形象设计实践

4.1.1 形象设计的文化转译与创新

在 IP 形象设计中,选取安徽金寨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小熊猫作为设计原型。这一选择具有双重文化寓意:一是小熊猫原生性的“红棕毛色”自然契合“红色文化”的视觉基调,形成鲜明的色彩记忆点;二是其作为珍稀保护动物的生态属性,精准呼应了金寨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具体塑造过程中,设计团队通过 AIGC 技术的多轮迭代生成,将革命文化元素与生态特征进行有机融合,在形象设计中融入了红军服装的造型特征和五角星的象征符号,同时保留小熊猫的生物学特质,通过现代设计语言实现红色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

4.1.2 场景插画的 AIGC 协同创作

基于 IP 形象的整体设定,运用即梦 AI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进行场景插画的协同创作。创作过程中,设计团队将金寨地域特色元素——大别山自然景观、梅山水库生态景观以及红色革命遗址等,通过结构化提示词输入 AIGC 系统,生成系列主题插画。这些插画通过 AIGC 赋能,形成统一的视觉叙事体系,构建了“金寨星炎”IP 的完整世界观。每一幅插画都是对金寨红色历史与自然风光的艺术化再现,形成了品牌视觉形象的核心记忆点,为后续文创产品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视觉素材。

4.2 金寨县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设计

基于 AIGC 技术,围绕“金寨星炎”IP 形象,构建了涵盖智能化文创产品、沉浸式体验与年轻化传

播的红色文创产品体系。该体系充分融合基础设计理论与前沿技术手段,系统改进了传统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同质化较强、体验性不足与传播力有限的核心问题。

4.2.1 智能化文创产品生成与迭代机制

在“金寨星炎”IP 形象的文创产品开发中,采用 AIGC 技术实现文创产品的高效生成与个性化定制。基于前期构建的结构化文化符号数据库,使 DeepSeek、ChatGPT 等文本类 AIGC 深度理解具有金寨地域特色的革命历史、自然环境、建筑遗址、民俗风情、饮食特产等元素,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优化提示词,最后运用图片类 AIGC 工具进行智能化设计创新。在实践中,运用 AIGC 技术生成了主 IP 形象的多个动态表情与姿态变体,并据此快速衍生出一系列主题插画。插画内容涵盖革命历史场景、金寨自然风光以及民俗生活情境等,基于这些视觉素材,进一步衍生出符合当代年轻消费者偏好的“电子邮票”“线上集卡”等文创产品,体现了传统文化与数字消费的有机结合。AIGC 技术还能够支持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通过分析用户偏好数据,设定不同的产品生成参数,对同一文创产品进行多风格方案的自动生成与迭代优化,显著提升了设计效率与市场匹配度。这种方法有效解决了传统文创产品开发中创新不足、更新迭代慢、市场定位模糊等痛点问题。

4.2.2 沉浸式体验构建与技术赋能

为增强红色文化的感染力与体验性,将“金寨

星炎”IP与扩展现实(XR)、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相结合,策划了线上线下联动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借鉴数字文旅领域的成功经验,本研究以金寨革命历史为叙事背景,以“金寨星炎”为核心角色,开发出线下红色主题剧本杀《星炎的使命》。同时,规划在金寨革命博物馆等实体场景部署AR互动程序,游客通过移动设备扫描特定标识,即可在增强现实界面中观看“金寨星炎”演绎的革命故事,实现虚拟IP与实体场景的空间融合。基于微信小程序生态,本项目还开发了“金寨星炎红色之旅”线上交互平台。该平台不仅整合了AR互动功能,还引入“星炎”虚拟数字人作为智能导览员,通过人格化的交互方式提升红色文化传播的亲合力与趣味性,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用户体验。

4.2.3 年轻化传播与跨界融合策略

为提升金寨红色文创在Z世代群体中的影响力,本研究制定了系统的年轻化传播与跨界策略。主要是构建年轻化传播矩阵,参考现代品牌传播的先进经验,围绕“金寨星炎”IP,在抖音、B站、小红书等青年社群平台构建跨次元传播体系。通过策划“寻找金寨星炎”等话题挑战赛,结合主题创意盲盒等实体产品,利用NFC技术支持的数字互动,构建完整的青年文化消费闭环。在营销层面,积极探索IP联名合作模式,可与知名国潮品牌、动漫或游戏IP进行跨界联动,借助成熟平台的流量优势与用户基础,快速提升IP知名度与市场价值,实现文化传播与商业价值的双重提升。

4.2.4 可持续发展机制

为保障金寨县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开发的长期活力,本研究计划建立动态迭代与反馈优化机制。通过小程序、社交媒体及销售渠道,运用问卷调查收集用户数据,分析细分消费群体对不同红色旅游文创产品品类、设计风格的偏好特征,并以此作为AIGC模型优化和提示词调整的依据,实现文创产品的数据驱动与持续自我进化,确保项目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持续竞争力。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AIGC赋能和IP构建,创新开发红色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模型框架,并开展“金寨星炎”设计实践,完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实践验证的过程。

其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理论层面,提出的四阶段文创产品设计模型有效解决了红色文创领域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在实践层面,“金寨星炎”IP设计案例,证实了AIGC技术在提升文化翻译效能、驱动创新迭代方面的显著优势;在机制层面,建立动态迭代与反馈优化机制,为红色文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本研究为金寨文旅发展提供了明确的IP化抓手,找到了技术赋能路径,并为数字化时代下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研究范本,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2022-01-20)[2025-09-10]. https://zwgk.mct.gov.cn/zfxgkml/ghjh/202201/t20220121_930613.html.
- [2] 陈睿. 赣南红色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研究[J]. 商展经济, 2025(11):48-52.
- [3] 汪冬. 牢记嘱托担时代使命奋楫笃行促老区振兴[J]. 党建, 2023(7):12-14.
- [4] 朱政, 张振鹏. 基于编码解码理论的城市IP构建机理[J]. 湖南社会科学, 2025(6):72-81.
- [5] 曹倩, 赵一鸣. 知识图谱的技术实现流程及相关应用[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5, 38(12):127-132.
- [6] 孙照. 文旅融合背景下红色文创产品的开发[J].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23(4):40-44.
- [7] 杨薇薇. 安徽金寨红色文化在文创产品设计开发中的运用[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0(2):72-78.
- [8] 刘建平, 单爽, 王金伟, 等. 数字经济赋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旅游科学, 2025, 39(1):69-85.
- [9] 张玉萍, 黄丹. 设计符号学维度下红色文旅衍生产品设计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3, 30(6):70-75.
- [10] 汪建宇.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红色文创产品设计研究[D]. 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2022.
- [11] 向勇, 白晓晴. 新常态下文化产业IP开发的受众定位和价值演进[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54(1):123-132.
- [12] 吴凡. 新文创视域下红色旅游品牌IP形象设计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3.
- [13] 权坦汀. 红绿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J]. 智慧农业导刊, 2025, 5(14):145-148.

责任编辑:张晓娜

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

卢学英*, 邓洪波

(安徽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以旅游环境承载力为研究视角,对拥有数个世界级著名景区的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具体分析。构建包括旅游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共21个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上述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建立模型,分别测算皖南示范区7个市的三大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水平。结果表明: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整体得分不高,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各维度指标水平存在差异。

关键词: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041-08

Assessment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Southern Anhui Demonstration Area

LU Xueying*, DENG Hongbo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t specifically analyzed the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Southern Anhui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Area in this study, which is home to several world-renowned scenic areas.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consisting of 21 indicators covering the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tourism environments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is indicator system, a model was constructed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the three major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dicators for the seven cities in the Southern Anhui Demonstration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Southern Anhui Demonstration Area is not high, and there are varying degrees of differences among the levels of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dimensions.

Key words: Southern Anhui Demonstration Zone; tourism environment;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旅游开发规划和旅游发展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目前已成为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1],也是旅游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2],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随着国内旅游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今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旅游发展,

都或多或少存在因旅游开发的无序扩张或旅游者大量涌入而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水体和大气污染、交通拥堵以及建设过程中造成的破坏等^[3]。在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和旅游市场供求形势深刻变化的情形下,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以下简称皖南示范区)旅游业在困难中开拓前行、在转型中突破创新。随着皖南示范区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其旅游业已经成为皖南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旅游

收稿日期:2025-12-06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2023CX087)。

作者简介:卢学英(1971—),女,安徽宿州人,副教授,博士。E-mail:703515656@qq.com

者在旅游目的地大量涌入有可能造成旅游环境超载,使旅游地的生态资源遭受破坏的同时也将影响旅游者的旅游质量;而旅游环境弱载则导致旅游设施闲置和旅游资源的浪费,旅游经济效益难以保证^[4]。因此,皖南示范区旅游业的发展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的破坏和旅游者满意度的下降,旅游目的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等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皖南示范区旅游业在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皖南示范区概况

皖南示范区作为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区域,既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黄山风景区,也有佛教名山九华山,以及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徽州古村落风景区。积极开发各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有助于提高旅游地的知名度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对推动当地产业升级有积极作用。2009年,安徽省政府正式批准设立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目标是将皖南打造成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进而推进旅游强省建设。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通过《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建设由安徽省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示范区位置条件优越,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丰富,是全国、全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区域。示范区范围包括黄山、池州、安庆、芜湖等7市,共45个县,面积5.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46.1万人。其中核心区“大黄山”,包括黄山市、池州市,以及宣城市绩溪县、旌德县、泾县和安庆市潜山市、岳西县、太湖县、桐城市,共18个县,面积2.9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98.95万人。近年来,示范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在政府和当地企业统筹发展全域旅游规划下,产业规模明显壮大。

皖南示范区经过发展取得喜人的成果,相关报道也屡见各类媒体,而在学术界,关于皖南示范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皖南示范区的建设^[5]、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6]、旅游资源开发模式^[7]、旅游空间结构^[8]、旅游经济^[5]等方面,对皖南示范区旅游承载力的研究较少。综上所述,皖南示范区在地理位置、自然文化资源、市场腹地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旅游业通过深度融入生产、流通、消费大循环,能够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展现更大作为。在即将迈入大众旅游时代的格局下,旅游

业发展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将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为研究对象,为皖南以及安徽省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旅游业发展提供参考。

2 评价指标构建

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内容以自然环境为主,被称为单指标评价^[9]。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文化以外的要素也逐渐被纳入研究的范畴之中。在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时,一般包括自然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文化指标等,指标的选取更加系统和完善,即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从初始阶段的单指标到此后的多指标过程^[10-12]。指标体系的多元化为后续计量模型的丰富奠定了基础。学者们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结合具体的旅游目的地地域背景,对指标体系进行了细化。例如以具体公园^[13]、海滨^[14]、沙漠^[15]、岛屿^[16]、古村落^[17]、自然保护区^[18]、具体城市^[19]、城市群以及沿海地区^[20-21]为研究对象构建的指标体系等。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提出,也为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比较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基于不同的旅游目的地实际进而构建差异化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为今后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重点。

根据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理论分析以及皖南示范区的旅游发展概况,研究旅游环境承载力旨在协调旅游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保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指标体系时既要有反映环境、资源方面的指标,又要有反映经济、社会方面的指标。在经过与资深专家、同行的反复探讨后,从以上三个研究维度出发,构建了适合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指标体系,包括旅游自然环境(7个指标,A1-A7)、旅游经济环境(8个指标,A8-A15)和旅游社会环境(6个指标,A16-A21)共21个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旅游自然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环境)是指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所能够容纳的污染物数量和所能承载的游客数量(旅游活动强度),是开展旅游活动的必要条件。本研究选取环境空气质量、森林覆盖率、污水处理率、垃圾处理能力、旅游资源组合指数、旅游资源知名度、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等7个指标作为衡量自然环境承载力的要素指标。

旅游经济环境是指一定时间内,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规模所能承受或支撑的旅游活动强度。研究主要采用星级饭店、旅行社数量、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次、旅游收入占GDP的比例、旅游外汇占旅

游总收入比例、人均 GDP、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等作为衡量皖南示范区经济环境承载力的指标。

旅游社会环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内社会发展程度和当地居民与游客的心理因素所能接纳的最多游客数量和最大旅游活动强度。旅游社会环境指标反映了居民和游客等对该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包容力和支撑能力。研究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年均纯收入、游居比、单位面积游客密度、旅客周转量、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等指标作为衡量社会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指标。

表1 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具体指标	单位
旅游自然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A1)	-
	森林覆盖率(A2)	%
	污水处理率(A3)	%
	垃圾处理能力(A4)	%
	旅游资源组合指数(A5)	-
	旅游资源知名度(A6)	-
	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A7)	平方米/人
旅游经济环境	星级饭店数量(A8)	家
	旅行社数量(A9)	家
	旅游总收入(A10)	亿元
	旅游总人次(A11)	万人次
	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例(A12)	%
	旅游外汇占旅游总收入比例(A13)	%
旅游社会环境	人均 GDP(A14)	元/人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A15)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A16)	元
	农村居民年均纯收入(A17)	元
	游居比(A18)	-
	单位面积游客密度(A19)	人次/平方千米
	旅客周转量(A20)	万人公里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A21)	%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选取 2018—2024 年皖南地区 7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指标选取均来自《安徽统计年鉴》《安徽环境质量公报》《黄山统计年鉴》《安庆统计年鉴》《芜湖统计年鉴》《马鞍山统计年鉴》《池州统计年鉴》《宣城统计年鉴》《铜陵统计年鉴》和网页

搜索结果赋值而得。

3.2 研究方法

选取指标后,采用熵值法建立模型,对皖南地区各城市的旅游业发展现状进行评估,并对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合理预测。熵值法作为一种定量赋权的方法,可以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增加权重的准确性。对确定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评价皖南地区旅游发展水平。首先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对异常值和缺失值进行处理,同时由于所选指标存在不同量纲,导致无法进行综合评价,故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P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quad (1)$$

$$e_j = -K \sum_{i=1}^n P_{ij} \ln P_{ij} \quad (2)$$

接着利用熵值法原理,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式(1)计算了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对象占该指标的比重。其次根据信息熵定义计算各指标的熵值,如式(2)所示,计算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由于熵冗余度与熵值之和为 1,最终求得信息熵冗余度及各指标权重,通过综合指数法得出结论并进行分析。

3.3 具体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测算出 2018—2024 年皖南示范区 7 个市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水平。由表 2 可知,旅游自然环境中,排名第一的为黄山市 0.207,排名最低的为铜陵市 0.055,这表明黄山市的自然环境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数量和所能承载的游客数量最高,即旅游活动强度较高,而铜陵市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数量和所能承载的游客数量最低。由表 3 可知,旅游经济环境中,排名第一的为马鞍山市 0.184,排名最低的为安庆市 0.101。这说明马鞍山市在一定时间内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规模所能承受或支撑的旅游活动强度在 7 个城市中最高,而安庆市最低。由表 4 可知,旅游社会环境中,排名第一的为芜湖市 0.171,排名最低的为安庆市 0.106,这说明芜湖市在一定时间、特定区域内的社会发展程度和当地居民与游客的心理因素所能接纳的最多游客数量和最大旅游活动强度在皖南地区排名靠前,反映了芜湖市的居民和游客等对该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包容和支撑能力较强,而安庆市则排名最后。

综合以上信息可知,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整体得分不高,得分最高的为马鞍山市,最低的为安庆市,反映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各维度指标水平存在差异。

表2 皖南示范区旅游自然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数

市区	评价指数	排名
黄山市	0.207	1
池州市	0.202	2
安庆市	0.190	3
芜湖市	0.147	4
马鞍山市	0.101	5
宣城市	0.098	6
铜陵市	0.055	7

表3 皖南示范区旅游经济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数

市区	评价指数	排名
马鞍山市	0.184	1
芜湖市	0.181	2
铜陵市	0.172	3
宣城市	0.123	4
黄山市	0.122	5
池州市	0.116	6
安庆市	0.101	7

表4 皖南示范区旅游社会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数

市区	评价指数	排名
芜湖市	0.171	1
池州市	0.169	2
黄山市	0.168	3
马鞍山市	0.157	4
铜陵市	0.119	5
宣城市	0.110	6
安庆市	0.106	7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又测算出2018—2024年皖南示范区7个市综合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子系统各指标水平(见表5)。

首先是旅游自然环境指标,其中人均土地资源

表5 皖南示范区综合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子系统各指标水平

子系统	具体指标	指数	排名
旅游自然环境	旅游资源知名度(A6)	0.536	1
	垃圾处理能力(A4)	0.138	2
	污水处理率(A3)	0.134	3
	环境空气质量(A1)	0.096	4

占有量(A7)排名最低,为0.001,而旅游资源知名度(A6)排名第一,为0.536。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指旅游地中每个居民平均占有土地的面积,通过对指标的测算可以反映出皖南地区城市居民自然生活环境的主要情况,这与旅游用地量、承载游客能力等有着密切联系。该结果说明皖南示范区的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较小,旅游的可用空间不足,开展的旅游活动及承载的游客数量有限。相反,皖南示范区的旅游资源知名度排名第一,这是由于该地区有黄山等著名旅游风景区,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因此,皖南地区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大,知名度越高,吸引力越大,更有利于皖南示范区的旅游发展,其承载的游客规模和旅游活动规模也越大。

其次,测算了旅游经济环境指标,可以看到旅游外汇占旅游总收入比例(A13)排名最低,而人均GDP(A14)则排名第一。该结果说明旅游外汇占旅游总收入比偏低,反映了皖南示范区域旅游发展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在旅游收入中,外汇收入占比偏低,说明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的国际化程度较低,未能达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地标准,还需进一步改善。相反,皖南示范区居民的人均GDP指数最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由于人均GDP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能衡量区域人口平均创收水平。因此,较高的人均GDP代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说明皖南示范区人均GDP对旅游发展的支撑力很高。

最后,测算了旅游社会环境指标,其中旅游周转量(A20)排名最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A16)排名第一。旅游周转量指数最低,说明皖南示范区旅游地的交通运输能力较弱、交通承载能力(旅行社所能接待和服务的游客数量)较差,说明该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旅游接待服务能力水平较低,政府仍需要对皖南示范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相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最高,反映出皖南示范区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较高,进而可以看出当地居民成为旅游消费者的可能性较大。

续表

表5 皖南示范区综合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子系统各指标水平

子系统	具体指标	指数	排名
旅游自然环境	森林覆盖率(A2)	0.062	5
	旅游资源组合指数(A5)	0.033	6
	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A7)	0.001	7
旅游经济环境	人均GDP(A14)	0.443	1
	旅游总人次(A11)	0.310	2
	旅游总收入(A10)星级饭店数量(A8)	0.129	3
	旅行社数量(A9)	0.061	4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A15)	0.032	5
	星级饭店数量(A8)	0.020	6
	旅游收入占GDP的比例(A12)	0.003	7
旅游社会环境	旅游外汇占旅游总收入比例(A13)	0.002	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A16)	0.366	1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A21)	0.326	2
	单位面积游客密度(A19)	0.242	3
	游居比(A18)	0.061	4
	农村居民年均纯收入(A17)	0.002	5
	旅客周转量(A20)	0.002	6

对旅游自然环境、旅游经济环境、旅游社会环境排名第一和第七的城市的各具体指标进行分析。

图1为黄山市及铜陵市旅游自然环境中各具体评价指标评分折线图。其中,黄山市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A7)远高于铜陵市,说明黄山市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大,旅游可用空间就更大,能够开展的旅游活动和承载的游客更多。同时,黄山市森林覆盖率(A2)要高于铜陵市,并且黄山市拥有著名的黄山旅游风景区,这反映出黄山市的森林面积覆盖率以及森林资源丰富程度和绿化实现程度要高于铜陵市。除此之外,黄山市的旅游资源组合指数(A5)以及旅游资源知名度(A6)也要高于铜陵市,说明黄山市的旅游资源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多,旅游开发的条件有优势,也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黄山市的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更大,越知名吸引力越大,越有利于旅游区的旅游发展,承载的游客规模和旅游活动规模也更大。

图2为马鞍山市及安庆市旅游经济环境中各具体评价指标评分折线图。从图中可知,马鞍山市的星级饭店数量(A8)、旅行社数量(A9)要高于安庆市,这说明马鞍山市的旅游地的接待能力高于安庆

市,并且星级饭店数量越多,说明其接待能力越强。同时,马鞍山市的旅行社数量多,表明其旅游地的接待能力高于安庆市。除此之外,马鞍山市的旅游总次数(A11)、人均GDP(A14)均高于安庆市,这说明马鞍山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对旅游发展的支撑力更强,并且马鞍山市的旅游地对游客的吸引力以及对旅游地产生影响的程度更大,使得旅游总人次更多,旅游地环境承受的压力就更大。

图3为芜湖市及安庆市旅游社会环境中各具体评价指标评分折线图。从图中可知,芜湖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A16)、单位面积游客密度(A19)均高于安庆市,这说明芜湖市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要高于安庆市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表明芜湖市当地居民成为旅游消费者的可能性更高,芜湖市的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游客数量更高,说明该区域游客的拥挤程度的数值较安庆市更大,该区域可能出现拥挤现象概率更高,游客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小。同时,芜湖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A21)也高于安庆市,说明芜湖市的旅游相关服务人员更多,更有可能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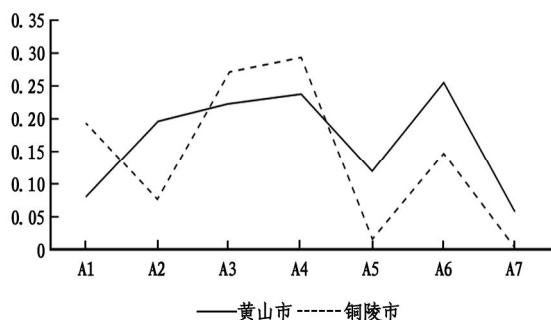


图1 黄山市及铜陵市旅游自然环境中各具体评价指标评分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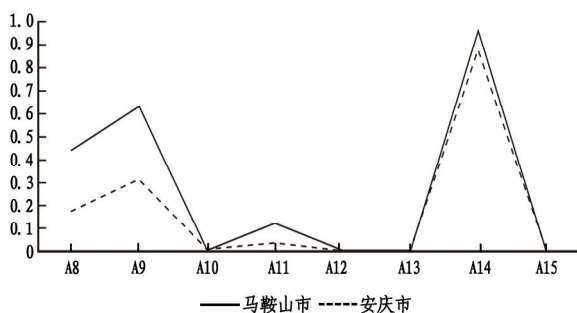


图2 安庆市及马鞍山市旅游经济环境中各具体评价指标评分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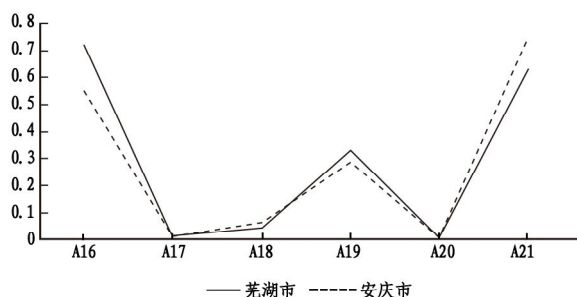


图3 安庆市及芜湖市旅游社会环境中各具体评价指标评分折线图

最后,分析2018—2024年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即包括旅游自然环境、旅游经济环境和旅游社会环境组成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评价体系。皖南地区旅游经济环境在一定时间内,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规模所能承受或支撑的旅游活动强度在逐年增高。皖南地区旅游社会环境的发展程度和当地居民与游客的心理因素所能接纳的最多游客数量和最大旅游活动强度大致呈上升趋势,该旅游社会环境指标反映了居民和游客等对该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包容和支撑能力也在逐年上升,仅在2020年突然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除此之外,皖南地区的旅游自然环境指数

在2018年达到最高,之后逐年降低,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在随之下降。

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的判定则参考相关学者对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所选择的数据都是基于皖南地区自身状态的时间序列层面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其数据分析所体现出的承载状态主要针对皖南地区特定的时空维度下的相对承载变化。皖南地区中,黄山市拥有黄山5A级风景区等,具有天然优势。同时,马鞍山市具有较高的工业基础水平,工业企业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大,来自工业的污染也相对较大,若与其他旅游目的地的承载力水平进行直接的数值对比,显然是不准确的。因此,要从皖南地区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重新划分等级。结合皖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将皖南地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标准划分为三个等级^[22]:弱载 $[0, 0.4)$,适度承载 $[0.4, 0.6)$,可载 $[0.6, 1.0]$ 。如表6所示,皖南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具体评价结果可按承载状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18—2019年),处于适度承载状态;第二个阶段(2020—2022年),为弱载状态;第三个阶段(2023—2024年),可载状态。指数呈“降低—增长”的特点。从2018—2024年的7年间看,最优年份2024年的承载指数值为0.69,最差年份2020年0.35。整体趋势呈V形,2020年最低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各地经济发展急剧下降,人们生活水平降低,越来越多的人群面临失业的风险,从而导致家庭收入水平下降,旅游发展也遭受重创。整体来说,皖南地区过去几年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受来自旅游活动的压力,若在活动量特别大的节假日,则有可能对局部区域造成较大的环境压力,但从数值上来看,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6 皖南地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等级评价

年份/年	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值	分值区间	承载力等级
2018	0.57	0.4-0.6	适度承载
2019	0.54	0.4-0.6	适度承载
2020	0.35	0-0.4	弱载
2021	0.36	0-0.4	弱载
2022	0.39	0-0.4	弱载
2023	0.67	0.6-1.0	可载
2024	0.69	0.6-1.0	可载

4 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调控建议

虽然皖南示范区旅游资源丰富,但也面临着“多”与“少”的问题,“多”指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资源时空分布与旅游环境需求的不匹配,“少”指人均旅游资源处于欠缺的状态^[22]。此外,影响旅游环境系统健康发展的因素包括自然、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旅游环境系统健康意味着它能抵抗自然和人为的干扰,保持自身应有的功能,满足旅游主体的合理需求,展现出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潜力和发展后劲。现提出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调控建议,旨在促进该区域旅游环境系统质量的改善。

4.1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的经济基础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支撑,因而提升区域社会经济水平,将助推旅游业不断发展。皖南示范区的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较大,经济综合实力不强,影响了对旅游发展的支撑力度,因此示范区需要充分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促进经济的发展,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聚焦文化旅游、绿色食品、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材料、生命健康等重点产业,实现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强有力的经济增长轴。打造全国生态文明跨区域发展保护和文化旅游绿色产业联动发展典范。做强黄山、西递、宏村世界级文化旅游产品,发展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文化旅游服务。形成旅游产品宣传营销合力,不断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的拳头产品。发挥黄山市区交通枢纽功能,推动黄山市与杭州都市圈区域合作,加强客源导入和旅游消费促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创新实施新安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加快由资金补偿向产业、人才、科技等多种补偿方式转变,提高上下游协同发展水平。

4.2 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保护不仅能够为当地居民创造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还能够树立良好的城市品牌形象,给游客一个舒适整洁的旅游环境。加强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推动能源供给结构优化,在重点景区、度假区、酒店、旅游交通和旅游公共服务节点上率先实现能源电气化、清洁化、零碳化。加快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积极引导低碳出行。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加强生态空间整体保护,提升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优化森林生态系统,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大力推进长江、新安江生态廊道提升工程和皖南山区生态屏障建设,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长

江两岸造林绿化、退耕还林还草,全面建成沿江绿化带。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做好生物多样性基础监测和调查工作,掌握生物多样性动态变化趋势,加强外来物种管控。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例如探索长三角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协同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建设,深入推进石台、岳西、歙县、休宁等县的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工作。

4.3 加强区域旅游基础设施

统筹推进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互联互通、分工合作、管理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畅通旅游交通微循环,实现“快进慢游”,让“远方”更易抵达,增强出游的舒适性,提升游客满意度。由此,也可以带动游客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上,增加过夜消费的比例。着力建设皖南区域旅游交通运输网络,进一步完善皖南示范区公路、铁路及航空运输体系,重点规划环皖南旅游景点高速公路、高铁,打造皖南旅游经济圈,全面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加强皖南区域旅游接待设施建设,结合当地旅游文化,打造旅游接待中心、旅游商场等精品文旅主体配套设施,提高当地旅游产业接待能力,提升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

4.4 优化区域旅游布局

通过综合分析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状况的区域差异,根据区域内旅游资源的特点、区位条件并结合旅游发展的不同需求,为了提高整体旅游环境承载力,保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当前皖南示范区旅游业的发展总体要求,支持示范区各市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重点发挥核心区引领带动作用。在空间上,要着力打造“一核一圈一轴一带一廊多点”旅游格局,即以黄山为核心,以徽文化打造旅游圈,以五山三湖生成旅游发展轴,以皖江城市黄金文化发展旅游带,以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全面多点带动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积极发展。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文化整合化、社会互动化的体现,代表区域范围内的旅游城市正逐步走向成熟^[24]。积极推进七市相互联系,共同谋划和推动区域文旅项目建设和发展,在规划衔接、资源开发等项目中统筹协作,以构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提升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带动皖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4.5 构建政府主导下的旅游环境治理模式

旅游目的地政府是为多主体提供服务的行政载

体,它通过宏观调控规范旅游目的地环境秩序,达到优化旅游目的地资源环境的目的。皖南示范区各级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和宏观调控对涉旅企业及市场进行规范,引导旅游环境系统良性发展;涉旅企业及市场通过投资或调控助推旅游环境系统的优化;政府通过对旅游者的引导、提升当地居民的参与机会,来影响消费者和社区居民对旅游环境系统的压力。明确旅游环境治理涉及的主体,并分析旅游环境系统的供给构成,在法律、资金、监管等方面,在旅游环境治理中对多主体进行角色定位,构建旅游环境的交互、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动态治理机制,促进政府治理制度的逐步形成。在旅游旺季,皖南示范区的热门景区应采取“有限进入”政策,控制游客数量,减轻景区的生态压力。同时实施生态监测,例如完善水质、空气质量、气象等监测和管控设施,实现旅游放得开、管得住。

参考文献:

- [1] 崔凤军. 论旅游环境承载力——持续发展旅游的判据之一[J]. 经济地理, 1995, 15(1): 105-109.
- [2] LAPAGE.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Wild lands for Recreation[M]. Washington D C: Society of American Foresters, 1963: 45-57.
- [3] 刘家麒. 旅游容量与风景区规划[J]. 城市规划研究, 1981(2): 44-49.
- [4] 张骁鸣. 旅游环境容量研究: 从理论框架到管理工具[J]. 资源科学, 2014, 26(4): 78-88.
- [5] 陈慧峰, 任以胜, 陆林.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成效评估[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20, 32(2): 8-16.
- [6] 张红, 张绍男, 龚焱怡.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化综合评价及驱动因子分析[J].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24(1): 28-34.
- [7] 金怡. 语言景观发展与旅游资源开发——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为例[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6): 128-133.
- [8] 朱芳, 陶云. 区域旅游吸引物体系空间结构优化分形研究——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为例[J]. 皖西学院学报, 2022, 38(2): 104-110.
- [9] HUNTER C. Sustainable tourism as an adaptive paradig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7, 24(4): 850-867.
- [10] 刘玲. 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方法初探[J]. 安徽师范大
-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8(3): 250-254.
- [11] 李艳娜, 张国智. 旅游环境容量的定量分析——以九寨沟为例[J]. 重庆商学院学报, 2000, 10(6): 32-34.
- [12] 裴玮. 基于面板数据的西南地区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5(3): 31-36.
- [13] 王成武, 王云飞, 文定清, 等. 达古冰山地质公园生态地质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和预测[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25, 45(1): 60-68.
- [14] 刘珍. 青岛市海水浴场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及策略应用研究[D]. 青岛: 青岛理工大学, 2024.
- [15] 宋小龙, 李陇堂, 王艳茹, 等. 沙漠型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动态测评——以宁夏沙坡头景区为例[J]. 宁夏大学学报, 2019, 41(S1): 138-147.
- [16] 董超, 王建强, 陈选博, 等. 瓯江口核心港区海域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J]. 海洋地质前沿, 2025, 41(4): 71-81.
- [17] 柳珊珊, 陈文琪, 冉启红. 文物建筑居住者的保护义务与古建筑开发之间的矛盾研究——以安徽省西递宏村为例[J]. 价值工程, 2017, 36(13): 48-50.
- [18] 牛莉芹, 王紫彦, 王垚垚, 等. 基于旅游干扰的历山自然保护区游径附近森林群落生态环境承载力[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4): 995-1009.
- [19] 许翔宇. 基于环境承载力视角的北京老旧小区改造研究[D]. 北京: 北方工业大学, 2023.
- [20] 刘佳, 侯佳佳.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9(2): 1-9.
- [21] 刘佳, 安珂珂. 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多尺度分析[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92-102.
- [22] 徐扬, 张兰新, 李念春. 基于状态空间法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分析: 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五城市为例[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8, 35(2): 83-92.
- [23] 封志明, 杨艳昭, 闫慧敏, 等. 百年来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从理论到实践[J]. 资源科学, 2017, 39(3): 379-395.
- [24] 逯进, 常虹, 汪运波. 中国区域能源、经济与环境耦合的动态演化[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2): 60-68.

责任编辑: 寇国庆

区块链技术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

陈小君

(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传统债务管理模式下,信息不对称和债务融资成本高是导致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的主要因素。深入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如何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以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越高,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此外,区块链技术应用在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和未亏损企业中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债务融资;信息不对称;融资成本;债务违约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5;TP31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049-11

Impac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on Corporate Debt Default Risks

CHEN Xiaojun

(School of Account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Under the traditional debt management model,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high debt financing costs are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the increase in debt default risks. It deeply explored how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reduce debt default risks by alleviat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 higher the debt default risk of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reby reduce the debt default risk of enterprises. Moreover,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on debt default risk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s without losses.

Key words: blockchain technology; debt finan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financing cost; debt default risk

债务违约不仅会给债权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传统债务管理模式中,信息不对称和债务融资成本高是导致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的两大关键因素。信息不对称使债权人难以准确评估债务人的信用状况;而高昂的债务融资成本则增加了债务人的违约风险。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信息透明等特性,为解决债务违约风险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债务信息可以在多

个节点上实时更新和共享,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债权人可以随时获取债务人的财务状况、债务偿还能力等关键信息,从而更准确地评估债务违约风险;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可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通过智能合约等技术手段,债务的发行、交易和偿还流程可以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减少中间环节和人工干预,降低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

尽管区块链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其在债务违约风险防控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通过分析区块链技术在债务管理中

收稿日期:2025-11-0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21A0236)。

作者简介:陈小君(1981—),女,宁夏石嘴山人,副教授,博士。E-mail:120081651@aufe.edu.cn

的应用机制,旨在为金融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健康发展,为防范和化解债务违约风险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1 理论分析

首先,区块链技术的经济后果研究方面。区块链技术的经济后果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有文献主要从改善融资环境、运营效率以及外部审计行为等方面展开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与供应链运营方面,区块链技术展现出积极影响。闫鑫等研究表明,区块链技术能够缩短贷前调查时间、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银行贷前调查能力^[1]。孙睿等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区块链技术通过降低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并提升监管力度,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违约与融资难问题,使金融系统趋于稳定均衡^[2]。在供应链管理中,孙国强等指出,区块链通过信息共享、信息溯源与信任建立三种途径赋能供应链,其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特性有助于揭示真实信息,防范道德风险,促进供应链网络协调和可持续发展^[3]。南江霞等在低碳供应链情境下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区块链技术通过提高绿色信任和降低期间费用促进减排合作^[4]。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也对审计师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徐瑞遥等研究发现,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后,审计师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并收取更高审计费用,这表明审计师感知到了更高的审计风险导致其行为更加谨慎^[5]。杨德明等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上市公司实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会显著提高审计费用,因为这增加了审计的重大错报风险和审计风险,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其技术优势,审计费用并未显著增加^[6]。

关于提升企业创新与生产效率方面,宋敏等通过分析区块链专利发现,区块链创新并非市场炒作,而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高质量创新,其价值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促进供应链去中心化和降低非效率投资等渠道实现^[7]。

其次,在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可从企业内部特质与外部环境两个维度进行梳理。企业内部因素是决定其偿债能力的根本。刘海明等指出,民营企业因“求大”“上层次”心理驱动的短贷长投和多元化经营等非理性决策,会通过降低盈利、加

剧过度负债和代理问题,显著提高债务违约风险^[8]。李萌等发现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能有效降低违约风险^[9]。窦超等揭示了“存贷双高”现象背后往往关联着大股东利益侵占,从而推高了违约风险^[10]。此外,企业的创新能力与资产配置也至关重要,花冯涛等研究表明,代表高质量创新的“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等路径抑制债务违约风险^[11]。

企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与市场生态对其债务违约风险具有系统性影响。丁志国等基于资本收支均衡逻辑指出,宏观经济冲击导致的资本收益率下降或债务成本上升,会使企业资本结构滑向“债务失速区”甚至“违约区”,是引发群体性违约的重要外因^[12]。金融生态的演变亦扮演着重要角色,翟淑萍等研究证实,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与代理成本三条机制,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13]。同时,资本市场的开放也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风险治理机制。贾秀彦等基于“沪深港通”制度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通过引入境外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和信息环境,从而降低了标的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14]。

现有研究已分别证实区块链技术可优化融资环境、治理与信息质量,而融资约束、信息失真和治理缺陷正是推高债务违约风险的关键动因。然而,直接检验“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能否降低债务违约概率”的因果证据尚属空白,这一缺位为本研究提供了契机。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核心在于其未来现金流无法覆盖到期债务本息的不确定性,而信息不对称是推高这种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在传统融资环境下,企业内部人与外部债权人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鸿沟,企业可能通过策略性信息披露甚至财务舞弊来掩盖真实风险状况,导致债权人难以准确评估其信用资质,从而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或采取信贷配给,这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财务脆弱性。

最后,区块链技术与信息不对称方面。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其分布式、不可篡改和可溯源的特性,能够从根本上提升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李勇建等研究指出,区块链通过构建可信的数据共享环境,其不可篡改的特性有效防范了信息操纵和欺诈行为^[15]。龚强的理论模型进一步阐明,在区块链赋能的供应链金融中,银行可依据链上记录的真实交易信息(如物流、资金流)进行授信决策,这大幅降低了传统模式下依赖线下尽调的信息验证成本^[16]。

这意味着,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实质上是将其关键业务信息置于一个难以篡改的透明环境中,显著提升了信息的可验证性,从而直接降低了企业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进而通过多重渠道抑制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Sun Yanyang 等实证研究直接证实,区块链技术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这一核心机制降低了违约风险^[17]。当信息环境因区块链的应用而改善后,会产生两方面积极效应:一方面,债权人能够更精准地进行风险定价,降低了对企业的风险溢价要求,这直接减轻了企业的利息负担和偿债压力;另一方面,透明的信息环境也抑制了管理层的短视行为和机会主义决策,促使企业提升经营效率和决策质量,从而从内部增强了现金流创造的稳定性和偿债能力。翟淑萍等关于数字金融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逻辑,即改善信息环境可以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与代理成本^[13]。因此,区块链技术并非直接作用于违约风险,而是通过重塑信息环境这一根本渠道,间接地实现了风险治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治理效应的强度并非在所有企业中均质。在非国有企业中,由于其通常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区块链技术带来的信息增信效应产生的边际价值更大。在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中,区块链技术能够与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实现数据的无缝协同,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其信息透明化的作用。而在未亏损企业中,区块链技术所揭示的良好基本面信息能够更顺畅地被市场识别和定价,从而转化为更优越的融资条件。反之,在数字化基础薄弱或持续亏损的企业中,区块链技术的风险治理效应可能会因协同困难或暴露负面信息而受到制约。因此,区块链技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以抑制债务违约风险的路径,其效果显著地受到企业产权性质、数字化基础及盈利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1.2 研究假设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块链技术

$$EDF_{i,t} = \alpha + \alpha_1 \text{Blockchain}_{i,t} + \alpha_2 \text{Control}_{i,t} + \text{Firm}_{i,t} + \text{Yea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EDF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债务违约风险;Blockchain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是否使用区块链技术,如果使用则取值为1,未使用则取值为0;Contro-

$$\text{ASY}_{i,t} = \alpha + \alpha_1 \text{Blockchain}_{i,t} + \alpha_2 \text{Control}_{i,t} + \text{Firm}_{i,t} + \text{Yea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ASY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信息不对称指数;Blockchain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是否使用区块链技术,如果使用则取值为1,未使用则取值为0;

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主要研究区块链技术如何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核心内容包括:第一,如何界定区块链技术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第二,如何界定信息不对称与债务违约风险的关系;第三,区块链技术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在不同特征企业中的差异性表现。为此,提出以下假设条件:

假设1:企业使用区块链技术与债务违约风险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假设2:企业使用区块链技术与信息不对称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假设3:信息不对称与债务违约风险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假设4:企业使用区块链技术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的企业中存在差异性。

2 研究设计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2016年,区块链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中阐述了国内外区块链发展现状、典型应用场景及应用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区块链技术发展路线图和区块链标准化路线图。基于此,选取2016—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财务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企业是否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在剔除金融类、*ST上市公司及有缺失的观测值后,对剩余观测值进行缩尾处理,以减轻极端值的影响。

数据统计处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主要使用Excel 2003、Stata 18软件处理数据,其中样本整理、排序和筛选工作主要由Excel 2003完成,Stata 18主要用于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以及用于模型的多元回归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计

l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控制变量,此外还控制了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

Control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控制变量,此外还控制了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

$$EDF_{i,t} = \alpha + \alpha_1 ASY_{i,t} + \alpha_2 Control_{i,t} + Firm_{i,t} + Yea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EDF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债务违约风险;ASY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信息不对称指数,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信息不对称越严重;Control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控制变量,此外还控制了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

3.2 变量定义

3.2.1 主要变量定义

区块链技术(Blockchain):借鉴杨德明等研究,若上市公司年报中提及区块链技术,则认为该公司使用了区块链技术,Blockchain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信息不对称指数(ASY):借鉴于蔚等做法,构建

流动性比率指标LR、非流动性比率指标ILL、收益率反转指标GAM三个股票流动性指标^[18]。股票流动性越差,表示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对LR、ILL、GAM进行主成分分析,构建信息不对称(ASY)综合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信息不对称越严重。

债务违约风险:采用Bharath和Shumway提出的Naive模型估计违约概率(EDF),并将其作为违约风险的代理变量^[19]。该指标值越大,表示债务违约风险越高。

3.2.2 其他变量定义

其他变量及其定义见表1。

表1 其他变量定义表

变量	定义
企业规模(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Lev)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资产净利率(ROA)	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现金流比率(Cashflow)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固定资产比率(Fixed)	固定资产净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无形资产比率(Tangible)	无形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营业收入的增长额占上期营业收入的比重
亏损虚拟变量(Loss)	企业净利润为负 Loss = 1, 否则 Loss = 0
两权分离度(DIV)	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异

3.3 变量描述性统计

选取2016—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上市公司基本特征、财务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区块链数据库根据企业年报中是否提及进行赋值,若提及赋值为1,未提及则赋值为0。剔除了金融类公司、资不抵债公司、股票

受证监会特别处理的公司以及主要变量缺失的观测值。除此之外,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进一步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双侧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22 241个年度观测值,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p50	SD	Min	Max
EDF	0.01	0.00	0.09	0.00	0.77
Blockchain	0.03	0.00	0.17	0	1.00
ASY	-0.29	-0.19	0.46	-2.15	0.39
Size	22.46	22.28	1.30	20.06	26.43
Lev	0.43	0.42	0.20	0.07	0.90
ROA	0.03	0.04	0.07	-0.26	0.22
Cashflow	0.05	0.05	0.07	-0.15	0.25
Fixed	0.20	0.17	0.15	0.00	0.67

续表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p50	SD	Min	Max
Intangible	0.05	0.03	0.05	0.00	0.35
Growth	0.15	0.09	0.38	-0.57	2.28
Loss	0.14	0.00	0.35	0.00	1.00
DIV	4.57	0.01	7.13	0.00	27.82

3.4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通过模型(1)区块链技术应用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解释区块链与债务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再通过模型(2)、模型(3)揭示区块链技术如何作用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

3.4.1 区块链技术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回归分析

利用模型(1)得到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之间的显著性关系。模型(1)变量描述性分析如表3所示,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3 模型(1)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p50	SD	Min	Max
EDF	0.01	0.00	0.09	0.00	0.77
Blockchain	0.03	0.00	0.17	0.00	1.00
Size	22.46	22.28	1.30	20.06	26.43
Lev	0.43	0.42	0.20	0.07	0.90
ROA	0.03	0.04	0.07	-0.26	0.22
Cashflow	0.05	0.05	0.07	-0.15	0.25
Fixed	0.20	0.17	0.15	0.00	0.67
Intangible	0.05	0.03	0.05	0.00	0.35
Growth	0.15	0.09	0.38	-0.57	2.28
Loss	0.14	0.00	0.35	0.00	1.00
DIV	4.57	0.01	7.13	0.00	27.82

由表3可知,多数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一定的离散程度,部分企业可能面临较高风险。另外,区块链技术在样本企业中的应用普及度较低,但标准差0.17表明存在部分积极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企业,这为研究区块链应用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差异化影响提供了基础。所有企业整体分布较为集中,但最小值20.06和最大值26.43仍显示一定差异,这可能影响区块链技术应用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效果。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数据表明从低杠杆到高杠杆的企业都有,这可能与区块链应用对企业财务状况的潜在影响相关。此外,企业盈利能力差异明显,区块链技术可能通过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等方式间接影响债务违约风险。当企业现金流状况差异较大时,区块链技术通过优化支

付流程等方式可能改善企业现金流,进而影响债务违约风险。

除此之外,根据固定资产比率的统计可知,企业资产结构存在差异,区块链技术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资产结构间接影响债务违约风险。无形资产状况差异明显,区块链技术可能通过提升无形资产可信度等方式影响债务违约风险。另外,区块链技术可能通过促进企业创新等方式影响企业增长速度,进而间接影响债务违约风险;也可能通过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等方式降低亏损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

总而言之,变量的分布特征为研究区块链应用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潜在影响提供了数据基础。

模型(1)相关性检验。通过表4可知,区块链技术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

表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即区块链技术通

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了企业债务违约的可能性。

表4 相关性检验

变量	EDF	Blockchain	Size	Lev	ROA	Cashflow	Fixed	Intangible	Growth	Loss	DIV
EDF	1.000										
Blockchain	-0.016 **	1.000									
Size	0.233 ***	-0.024 ***	1.000								
Lev	0.265 ***	-0.042 ***	0.465 ***	1.000							
ROA	-0.091 ***	-0.020 ***	0.080 ***	-0.333 ***	1.000						
Cashflow	-0.047 ***	-0.040 ***	0.090 ***	-0.169 ***	0.446 ***	1.000					
Fixed	-0.033 ***	-0.112 ***	0.098 ***	0.045 ***	-0.015 **	0.215 ***	1.000				
Intangible	-0.023 ***	-0.034 ***	0.066 ***	0.024 ***	-0.032 ***	0.058 ***	0.084 ***	1.000			
Growth	-0.024 ***	-0.027 ***	0.053 ***	0.036 ***	0.269 ***	0.043 ***	-0.027 ***	0.003	1.000		
Loss	0.050 ***	0.025 ***	-0.114 ***	0.185 ***	-0.693 ***	-0.240 ***	0.017 **	0.017 **	-0.207 ***	1.000	
DIV	0.019 ***	-0.024 ***	0.104 ***	0.047 ***	0.032 ***	0.033 ***	0.054 ***	-0.003	0.004	-0.020 ***	1.000

注: **、*** 分别表示在5%、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另外,企业规模(Size)与债务违约风险呈正相关,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债务违约风险;资产负债率与债务违约风险亦呈正相关,说明高杠杆企业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而资产净利率、现金流比率、固定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比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等变量均与债务违约风险呈负相关,表明这些因素能够增强企业的偿债能力,降低违约风险。此外,亏损情况(Loss)与债务违约风险呈正相关,而两权分离度与债务违约风险呈负相关,进一步说明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治理结构对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影响。

综合来看,区块链技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治理透明度以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机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这一发现不仅为区块链技术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在理论上也为区块链技术如何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信息环境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

3.4.2 区块链技术与信息不对称回归分析

由表5可知,信息不对称指数(ASY)最大值为0.39,最小值为-2.15,表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区块链技术的均值仅为0.03,说明大部分企业还未开始应用区块链技术,这可能出于投资收益角度考虑,盈利较小的企业一般可能不会选择投入产出比较小的投资项目。资产负债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43和0.42,说明分布较为均

匀,同时也说明大部分企业负债占比较高,可能存在债务违约风险。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5 模型(2)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p50	SD	Min	Max
ASY	-0.29	-0.19	0.46	-2.15	0.39
Blockchain	0.03	0.00	0.17	0.00	1.00
Size	22.46	22.28	1.30	20.06	26.43
Lev	0.43	0.42	0.20	0.07	0.90
ROA	0.03	0.04	0.07	-0.26	0.22
Cashflow	0.05	0.05	0.07	-0.15	0.25
Fixed	0.20	0.17	0.15	0.00	0.67
Intangible	0.05	0.03	0.05	0.00	0.35
Growth	0.15	0.09	0.38	-0.57	2.28
Loss	0.14	0.00	0.35	0.00	1.00
DIV	4.57	0.01	7.13	0.00	27.82

3.4.3 信息不对称与债务违约风险回归分析

由表6可知,债务违约风险的均值仅为0.01,说明大部分企业的违规现象不是很严重,最大值为0.77,最小值为0.00,说明不同企业差异性较大。ASY最大值为0.39,最小值为-2.15,说明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表6 模型(3)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p50	SD	Min	Max
EDF	0.01	0.00	0.09	0.00	0.77
ASY	-0.29	-0.19	0.46	-2.15	0.39
Size	22.46	22.28	1.30	20.06	26.43
Lev	0.43	0.42	0.20	0.07	0.90
ROA	0.03	0.04	0.07	-0.26	0.22
Cashflow	0.05	0.05	0.07	-0.15	0.25
Fixed	0.20	0.17	0.15	0.00	0.67
Intangible	0.05	0.03	0.05	0.00	0.35
Growth	0.15	0.09	0.38	-0.57	2.28
Loss	0.14	0.00	0.35	0.00	1.00
DIV	4.57	0.01	7.13	0.00	27.82

(-23.61) (99.95) (-34.09)

N	22241	22241	22241
adj. R ²	0.092	0.387	0.118
R ²	0.093	0.388	0.118
Year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t值检验。

总体来看,模型(1)、(2)和(3)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

变量	(1)EDF	(2)ASY	(3)EDF
Blockchain	-0.008** (-2.20)	-0.136*** (-9.59)	0.042*** (25.48)
Size	0.012*** (21.16)	-0.223*** (-101.27)	0.021*** (32.04)
Lev	0.086*** (22.59)	0.382*** (24.99)	0.070*** (18.44)
ROA	-0.041*** (-2.95)	-1.242*** (-22.04)	0.011 (0.76)
Cash Flow	0.000 (0.03)	-0.400*** (-9.47)	0.017* (1.65)
Fixed	-0.035*** (-8.56)	0.172*** (10.49)	-0.042*** (-10.43)
Intangible	-0.062*** (-5.47)	0.288*** (6.29)	-0.074*** (-6.60)
Growth	-0.008*** (-4.63)	-0.081*** (-12.24)	-0.004*** (-2.59)
Loss	0.002 (1.01)	-0.179*** (-18.55)	0.010*** (4.15)
DIV	-0.000 (-0.35)	0.003*** (7.83)	-0.000* (-1.67)
_cons	-0.270***	4.591***	-0.462***

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区块链技术对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影响,说明企业使用区块链技术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系数为-0.008, $p < 0.05$),这也验证了假设1。这表明区块链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增强企业治理透明度,有效缓解了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同时,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与违约风险呈正相关,而资产净利率、固定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比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等变量则与违约风险呈负相关,进一步说明了企业财务状况和治理结构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重要影响。

由表7可知,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这与区块链通过提供透明、不可篡改的信息记录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机制一致,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同时,企业规模、资产净利率、现金流等控制变量也对信息不对称有显著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区块链技术在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债务违约风险方面的有效性。

此外,表7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信息不对称对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越高。这验证了信息不对称会增加债权人对企业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债务违约风险的假设。这说明区块链技术能够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间接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这一结论不仅支持了区块链技术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有效性,也进一步证实了区块链技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机制。

3.4.4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债务违约风险的衡量方法。借鉴李建军等用Zscore值来衡量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其值越小,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越高,表明企业违约风险越大^[20]。

第二,排除疫情期间样本影响。

第三,加入更多控制变量。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更多诸如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以排除遗漏变量产

生的内生性问题。

根据表 8 回归结果可知,替换债务违约风险衡量指标后,虽然显著性有所下降,但区块链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仍然显著。在排除疫情期间样本后,显著性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区块链技术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仍然显著,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 8 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1) Zscore	(2) EDF	(3) EDF
Blockchain	0.601* (-1.90)	-0.007* (-1.82)	-0.008** (-2.19)
Size	-0.530*** (-10.82)	0.011*** (19.06)	0.012*** (19.83)
Lev	-15.862*** (-46.59)	0.090*** (22.26)	0.086***
ROA	19.861*** (15.84)	-0.043*** (-2.98)	-0.040*** (-2.83)
Cashflow	2.552*** (2.71)	0.005 (0.44)	-0.000 (-0.01)
Fixed	-4.185*** (-11.46)	-0.036*** (-8.40)	-0.034*** (-8.27)
Intangible	-3.013*** (-2.95)	-0.059*** (-4.91)	-0.060*** (-5.28)
Growth	0.006 (0.04)	-0.008*** (-4.53)	-0.007*** (-4.50)
Loss	2.488*** (11.60)	0.000 (0.05)	0.003 (1.07)
DIV	0.042*** (5.62)	-0.000 (-0.53)	0.000 (0.94)
_cons	23.357*** (22.83)	-0.260*** (-21.41)	-0.294*** (-22.39)
Indep			0.007 (0.62)
Top1			0.017*** (2.64)
Balance 1			0.004 (1.34)
List Age			0.000 (0.34)
INST			-0.015*** (-4.29)

N	22155	15567	22226
adj. R ²	0.204	0.091	0.093
R ²	0.204	0.091	0.094
Year	Yes	Yes	Yes
Firm	Yes	Yes	Yes

此外,表 8 中显示,加入独立董事占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企业上市年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这 5 个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表明区块链技术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是显著存在的,再次验证了假设 1。

3.5 异质性分析

产权性质异质性。产权性质是影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有企业往往更容易筹集到资金,面临程度较小的信息不对称。而非国有企业往往信息不对称较高,金融机构对其了解也比较少,因此可能存在较大的债务违约风险。因此,我们预测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数字化转型程度异质性。数字化转型程度是影响区块链技术应用效果的重要因素。借鉴吴非等研究,将数字化转型程度按照行业年度均值划分为高低两组,探讨区块链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在不同组别中是否有显著差异^[21]。

企业是否亏损异质性。企业是否亏损也是影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发生亏损,会面临更大的债务压力,可能会选择去违约。因此预测在发生亏损的组别中区块链技术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按照企业是否亏损,将样本企业分为两组,Loss = 1 代表企业亏损,Loss = 0 则代表企业盈利。

首先是产权性质异质性。由表 9 可知,区块链技术应用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通常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和信息透明特性能够有效缓解这一问题。通过区块链技术,非国有企业可以实现信息的高效共享和透明化管理,减少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息误判,从而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债务违约风险。此外,区块链技术还可以优化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和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其次是数字化转型程度异质性。如表 10 所示,区块链技术应用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在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组别中更加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数

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完善的信息系统和数据管理能力。这类企业能够更好地整合区块链技术,实现信息的高效共享和透明化管理,从而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息误判,进而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同时,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能够通过区块链技术进一步优化融资渠道和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决策效率和透明度,增强市场信心,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债务违约风险。

表9 产权性质异质性分析

变量	国有企业(1) EDF	非国有企业(2) EDF
Blockchain	-0.010 (-0.88)	-0.005** (-1.99)
Size	0.012*** (10.49)	0.009*** (16.81)
Lev	0.150*** (16.63)	0.046*** (13.72)
ROA	-0.068* (-1.69)	-0.041*** (-3.60)
Cashflow	-0.038 (-1.45)	0.022** (2.43)
Fixed	-0.038*** (-4.64)	-0.028*** (-6.90)
Intangible	-0.079*** (-3.59)	-0.041*** (-3.49)
Growth	-0.004 (-1.10)	-0.007*** (-5.28)
Loss	0.000 (0.02)	0.003 (1.39)
DIV	-0.000 (-0.90)	0.000*** (3.32)
_cons	-0.315*** (-12.49)	-0.206*** (-18.06)
N	7633	14607
adj. R ²	0.108	0.071
R ²	0.109	0.071
Year	Yes	Yes
Firm	Yes	Yes

表10 数字化转型程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数字化转型 程度高 EDF	(2) 数字化转型 程度低 EDF
Blockchain	-0.007* (-1.86)	-0.004 (-0.50)
Size	0.011*** (14.07)	0.013*** (16.44)
Lev	0.086*** (15.35)	0.085*** (16.39)
ROA	-0.026 (-1.28)	-0.055*** (-2.84)
Cashflow	-0.034** (-2.17)	0.031** (2.14)
Fixed	-0.039*** (-6.19)	-0.037*** (-6.78)
Intangible	-0.057*** (-3.35)	-0.068*** (-4.42)
Growth	-0.008*** (-3.15)	-0.008*** (-3.43)
Loss	0.005 (1.35)	0.001 (0.21)
DIV	-0.000 (-1.53)	0.000 (0.87)
_cons	-0.260*** (-15.75)	-0.292*** (-18.21)
N	10671	11569
adj. R ²	0.089	0.098
R ²	0.090	0.098
Year	Yes	Yes
Firm	Yes	Yes

最后是企业是否亏损异质性。由表11可见,区块链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在未亏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未亏损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财务基础和抗风险能力,能更好地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财务管理、提升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信心,且它们更有动力通过区块链技术提升运营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债务违约风险。

表 11 企业是否亏损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亏损 EDF	(2) 未亏损 EDF
Blockchain	-0.007 (-0.70)	-0.007* (-1.91)
Size	0.025*** (12.97)	0.010*** (17.43)
Lev	0.091*** (8.72)	0.079*** (19.35)
ROA	0.007 (0.22)	-0.121*** (-6.94)
Cashflow	0.018 (0.52)	0.019* (1.65)
Fixed	-0.039*** (-2.92)	-0.038*** (-8.96)
Intangible	-0.069* (-1.70)	-0.060*** (-5.23)
Growth	-0.016*** (-2.72)	-0.005*** (-2.70)
Loss	0.000 (.)	0.000 (.)
DIV	0.001** (2.13)	-0.000 (-1.58)
_cons	-0.567*** (-13.71)	-0.220*** (-19.12)
N	3171	19069
adj. R ²	0.124	0.088
R ²	0.127	0.089
Year	Yes	Yes
Firm	Yes	Yes

此外,区块链技术在未亏损企业中应用的效果也更容易被市场认可,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系统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和不对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区块链技术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此外,区块链技术在不同特征的企业中表现

出异质性影响,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未发生亏损的企业中效果更为显著。

企业使用区块链技术与债务违约风险显著负相关,即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这验证了假设 1,表明区块链技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增强企业治理透明度,有效缓解了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信息不对称显著负相关,即区块链技术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验证了假设 2,表明区块链技术通过其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特性,增强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本和智能合约,确保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金融机构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与债务违约风险显著正相关,即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越高。这验证了假设 3,说明降低信息不对称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机构对企业的风险评估更加谨慎,从而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区块链技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了金融机构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债务违约风险。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降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不对称的降低,会促使金融机构更加愿意相信企业,提升信用增强的效果。产权性质异质性分析:第一,在非国有企业中,区块链技术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通常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缓解这一问题;第二,在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中,区块链技术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这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能够更好地整合区块链技术,实现信息的高效共享和透明化管理;第三,在未亏损的企业中,区块链技术对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未亏损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财务基础和抗风险能力,能够更好地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财务管理、提升信息透明度。这些结论更充分验证了假设 4。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鼓励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成本,特别是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区块链技术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提升竞争力。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开展区块链技术试点项目,推动区块链技术在企业债务管理中的应用。

第二,加强区块链技术研发与创新。加大对区

区块链技术研发的投入,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为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助于推动区块链技术在企业债务管理领域的创新应用。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区块链技术在债务管理中的应用研究,推动技术成果转化。

第三,完善区块链技术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区块链技术的监管体系,规范其在企业债务管理中的应用,防范金融风险。这将有助于保障区块链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技术应用中的问题,确保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第四,推动区块链技术与金融基础设施融合。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这将有助于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金融生态系统,为企业债务管理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金融机构可以与科技企业合作,开发基于区块链的债务管理平台,实现债务信息的实时共享和透明化管理。

第五,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通过高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培养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提供支持;鼓励企业引进精通区块链技术的专业人才,提升企业的技术应用能力和管理水平。这将有助于推动区块链技术在企业债务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 [1] 闫鑫,李健,马腾键. 区块链提升供应链金融贷前调查效能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25(11):1-12.
- [2] 孙睿,何大义,苏汇淋. 基于演化博弈的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24,32(3):125-134.
- [3] 孙国强,谢雨菲. 区块链技术、供应链网络与数据共享: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J]. 中国管理科学, 2023,31(12):149-162.
- [4] 南江霞,吴小勇,张茂军. 区块链赋能的低碳市场制造商产量竞争与碳减排技术合作[J]. 中国管理科学, 2025,33(6):360-368.
- [5] 徐瑞遥,王菊仙,王玉涛. 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影响审计师行为吗? [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22,36(6):38-

50.

- [6] 杨德明,夏小燕,金淞宇,等. 大数据、区块链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20(4):68-79.
- [7] 宋敏,徐瑞峰. 数字经济浪潮下的区块链技术: 概念炒作还是高质量创新[J]. 南开管理评论, 2024,27(6):112-123.
- [8] 刘海明,步晓宁. 民营企业债务违约是内因驱动吗? ——基于短贷长投和多元化经营视角的分析[J]. 金融研究, 2022(3):79-95.
- [9] 李萌,王近.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J]. 国际金融研究, 2020(8):77-86.
- [10] 窦超,李峥,白学锦. 上市公司“存贷双高”异象与债务违约风险[J]. 会计研究, 2023(11):133-149.
- [11] 花冯涛,孙述昇. 企业新质生产力能否抑制债务违约风险——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研究, 2025(7):111-128.
- [12] 丁志国,丁垣竹,赵宣凯. 债务违约的生成机理与风险测度——基于资本收支均衡的经济学逻辑[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39(4):127-146.
- [13] 翟淑萍,韩贤,张晓琳,等. 数字金融能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J]. 会计研究, 2022(2):117-131.
- [14] 贾秀彦,吴君凤.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 ——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研究, 2022(12):73-87,133-134.
- [15] 李勇建,陈婷. 区块链赋能供应链: 挑战、实施路径与展望[J]. 南开管理评论, 2021,24(5):192-203,212.
- [16] 龚强,班铭媛,张一林. 区块链、企业数字化与供应链金融创新[J]. 管理世界, 2021,37(2):22-34.
- [17] SUN Y Y, ZHU X Y, WU W R, et al.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corporate default risk: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ublic firms in China[J].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GIM), 2023,31(7):1-19.
- [18] 于蔚,汪淼军,金祥荣.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 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J]. 经济研究, 2012,47(9):125-139.
- [19] BHARATH S T, SHUMWAY T. Forecasting default with the Merton distance to default model[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8,21(3):1339-1369.
- [20] 李建军,韩珣.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营风险[J]. 经济研究, 2019,54(8):21-35.
- [21]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37(7):130-144.

责任编辑:费瑞波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 ——基于股价同步性的研究

蒋宁*, 吴克平, 方淑苗, 张涛, 陈颖

(巢湖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8024)

摘要:以2012—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同步性;机制检验发现,数实产业技术融合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降低信息不透明度、提升ESG表现、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信息效率和完善公司治理来降低股价同步性;拓展性分析显示,在市场竞争激烈、产权保护较弱以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地区,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关键词: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股价同步性

中图分类号: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060-10

The Impa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Industries on Capital Market Pricing Efficiency: A Study Based on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JIANG Ning*, WU Keping, FANG Shumiao, ZHANG Tao, CHEN Yi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238024, Anhui)

Abstract: Us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industries on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industries significantly reduce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industries enhances information efficiency and improves corporate governance by increasing media attention, reducing information opacity, boosting ESG performance, lowering agency costs, and consequently decreasing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extended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industries on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is more pronounced in regions with intense market competition, weak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underdeveloped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industries; capital market pricing efficiency;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枢纽,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健全投资与融资相协调的市场功能,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正逐步从“融资主导”向

“投融资并重”转型,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更加注重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长期稳定。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是否具备高效、准确的价格发现功能。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股价同步性偏高,即个股股价的变动程度与整体市场平均股价的变动程

收稿日期:2025-11-17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科研项目(2022AH051711);巢湖学院学科建设质量提升工程项目(XWY202401);安徽省社科界青年学人成长计划(QNXR2025035)。

作者简介:蒋宁(1991—),女,安徽砀山人,助教,硕士。E-mail:1158805484@qq.com

度高度相关,公司特质信息未能充分反映于股价之中,导致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低下,严重制约了其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1]。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系统探究股价同步性的成因与治理路径,对于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深化金融强国建设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这一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理解并改善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指将数字信息资源全方位渗透进实体产业中,有助于增强实体产业韧性与活力^[2],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通过将数字经济产业技术应用于生产流程优化、商业模式革新等方面以提升经营效率,并借助数据驱动、技术支撑重构传统产业的价值链,进而催生出新业态和新服务,在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推动实体经济形态向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向演进,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协同发展^[3]。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在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环境^[4]。一方面,数字化增强了企业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5];另一方面,产业融合催生的新业态(如智能制造、平台经济)可能增加企业估值的复杂性^[6],导致投资者依赖行业或市场层面的共同信息进行决策,相关结果必然影响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微观企业层面数实融合究竟能否提升信息披露与治理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抑制股价同步性?还是会因增加产业变革的复杂性与估值不确定性,加剧市场噪音,反而拉高股价同步性?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实融合与资本市场定价之间的研究非常匮乏,因此,研究从股价同步性视角切入,探究企业进行数实融合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旨在为理解数实融合的经济后果、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理论与政策参考。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已有文献多从公司治理、信息传递和投资者行为等视角研究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因素,在数字化发展领域对股价同步性的研究较为匮乏。研究将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股价同步性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并从内外部信息效率提升和治理结构优化两个维度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拓展了关于股价同步性影响因

素的研究。第二,既有文献对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但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较少涉及资本市场定价内容。本研究首次涉及企业数实融合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为企业数实融合行为在资本市场层面的经济后果作出了增量贡献。第三,基于市场竞争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视角,深入探讨了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影响股价同步性的差异化效果,为助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提供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股价同步性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在实体产业中的融合应用,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7]、降低生产经营成本^[8]、促进创新产出^[9]和全要素生产率^[10]¹¹⁸方面都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向外界释放更多特质信息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降低股价同步性。

一方面,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鸿沟”,信息不对称阻碍特质信息及时融入股价^[11],导致股价同步性较高。在企业数实融合过程中,企业和投资者在信息发布、收集和處理过程中广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信息源头、传输通道及接收端通过拓宽信息供给、疏通传导路径及提升投资者信息解读能力,有效缓解了企业与外部投资者间的信息隔阂^[12],有利于向外界释放企业层面的特质信息。另一方面,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可能会作出有损公司价值的决策,并利用较大的话语权隐藏有关决策的负面信息,导致资本市场无法识别其代理问题和负面信息,股价无法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数实融合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公司业务流程的可视化水平,便于监控管理层的自利行为^[13],使管理者能在强有力的监督下披露更多企业层面的特质信息。另外,数实融合催生的实时、大数据驱动决策模式有效削弱管理层决策操纵空间,帮助企业更加精准地识别优质投资机会和科学化资源配置,通过赋能精准投资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14],有助于释放更多反映企业基本面的特质信息,进而降低股价同步性。

基于以上论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股价同步性。

1.2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的作用机制

1.2.1 信息效率提升效应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内容,其行为本身展现出强烈的创新与变革特质,媒体对此类企业的报道意愿和关注度普遍较高,从而有效降低股价的同步性^[15]。一方面,媒体报道能够削弱私有信息渠道的价值,改善相对弱势投资群体的信息环境,促进信息公平^[16]。较高的媒体关注度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内外部的信息壁垒,促进企业特质信息向资本市场的释放与融入,从而有效抑制“同涨同跌”现象。另一方面,较多的媒体关注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治理手段,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17],缓解所有者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摩擦,改善公司所处的信息环境。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数实产业技术融合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从而降低股价同步性。

大量研究表明,企业信息透明度的缺乏是阻碍特质信息融入股价、导致股价同步性上升的关键因素^[18-19],而数实融合能够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股价同步性。一方面,数实融合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有效改善了信息传递方式并提高效率,减少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损耗,提升了企业信息环境的透明度^[20]。数字技术赋予企业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使数据信息的采集和处理趋于智能化和自动化,增强了信息的可比性。另一方面,数据的共享性和可监测性提高了信息的可视化程度和监督效果,使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和资源使用可追溯、可验证,显著压缩了其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的空间^[21],这就促使企业披露更多有效信息,提升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进一步增强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数实产业技术融合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股价同步性。

1.2.2 治理水平优化效应

数实融合通过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企业运营,以数据驱动的方式精准提升环境管理效率、量化社会责任履行和优化治理流程,从而全面改善企业 ESG 表现,已成为降低股价同步性的有力手段。首先,企业通过披露环境信息能够降低监管处罚与违规风险^[22],向市场传递企业环境资源状况和具备可持续运营能力的积极信号,促使股价更多反映其独特的绿色竞争力,从而降低同步性。其次,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和积累声誉资本^[23],更有利于向资本市场传递真实可靠的特质信息,而这些信息被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识别并解读,会及时反映到股价^[24],从而有效降低

股价同步性。最后,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不仅能有效防止高管徇私舞弊,还有助于公司的特质信息融入股价之中^[25],使投资者能更准确地评估公司特质价值并进行交易,进而降低股价同步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数实产业技术融合通过提升企业 ESG 表现,从而降低股价同步性。

企业代理成本越高,管理层隐匿的公司负面特质信息越多,导致股价无法有效反映企业真实的基本面,股价会更多随市场波动,提升了股价同步性。数实融合凭借其技术特性与组织优化效应,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一方面,数实融合有助于公司决策数据的标准化、公开化和自动化处理,有助于提高公司财务数据信息质量,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抑制了管理层的非效率投资、超额在职消费等机会主义行为^[26]。另一方面,数实融合推动组织向扁平化与网络式结构转型,通过打通信息通道并构建横向监督网络,系统性地压缩管理层的自由裁量空间^[27],同时将管理层行为透明化,从而在源头上减少代理冲突。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数实产业技术融合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从而降低股价同步性。

图 1 为数实融合影响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作用路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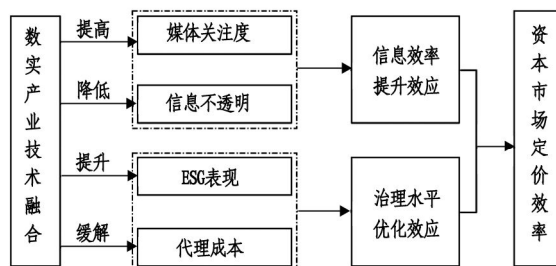


图 1 数实融合影响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作用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12—2023 年沪深 A 股的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处理:剔除数据缺失和存在异常值的公司;剔除金融类、ST 和 PT 以及资不抵债的公司;对连续变量进行双侧 1% 的缩尾处理。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数据所需匹配的专利数据(IPC 分类号、专利引用和专利类别等)源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信息取自国泰安数据库,并利用 Excel 和 Stata 17.0 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2.2 主要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参考伊志宏等^{[19]161}的方法衡量股价同步性。首先运用模型(1)估计出拟合优度 R^2 , R^2 越大,意味着股价收益率受外部市场和行业影响程度越大,

$$R_{i,w,t} = \beta_0 + \beta_1 R_{M,w,t} + \beta_2 R_{M,w-1,t} + \beta_3 R_{I,w,t} + \beta_4 R_{I,w-1,t} + \varepsilon_{i,w,t} \quad (1)$$

$$\text{SYNCH} = \ln\left(\frac{R^2}{1-R^2}\right) \quad (2)$$

其中, $R_{i,w,t}$ 为股票 i 在第 t 年第 w 周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收益率, $R_{M,w,t}$ 为市场全部公司第 t 年第 w 周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收益率, $R_{I,w,t}$ 为股票 i 在第 t 年第 w 周所在行业剔除其自身后其他公司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收益率。

2.2.2 解释变量

借鉴黄先海等^{[10]123}的做法对企业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进行测度。首先,在企业专利数据库中根据专利申请的IPC分类号识别出数字技术创新,获取产品制造及服务、技术应用和要素驱动等核心数字

$$\text{SYNCH}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TC}_{i,t} + \alpha_2 \text{Controls} + \sum \text{Year} + \sum \text{Ind} + \varepsilon_{i,t} \quad (3)$$

参照已有关于数实融合^[4,9]和股价同步性^[11,16,24]的相关文献,选取以下变量予以控制。详

股价波动受公司层面影响程度越小,股价同步性越高。由于 R^2 取值范围为 $[0,1]$,因此利用公式(2)对 R^2 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股价同步性衡量指标SYNCH,SYNCH越大,代表股价同步性越高。

技术创新的专利数据;其次,根据IPC主分类号搜索非数字技术专利的引用信息中是否包含数字技术,若该专利引用的专利分类为数字技术,则视同企业实施了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最后,将数字技术的专利引用次数加总到企业-年份层面,并进行加1取对数处理,得到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衡量指标(TC)。

2.3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数实融合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构建模型(3)来验证假设1。

细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性质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SYNCH	股价同步性	由模型(1)、模型(2)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	TC	数实融合	数字技术专利引用次数取对数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规模	$\ln(\text{总资产})$
	Lev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资产
	Roa	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Growth	收入增长率	本年营业收入增加额/上年营业收入总额
	Indep	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人数
	Balance	股权制衡度	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binq	托宾Q值	$(\text{流通股市值} + \text{非流通股股数} \times \text{每股净资产} + \text{负债}) / \text{总资产}$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股价同步性SYNCH均值为-0.481,标准差为0.899,表明不同公司股价同步性的差异较大,当前资本市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股价同涨同跌、信息效率低下的现

象,这与伊志宏等^{[19]164}的研究一致。数实融合TC的均值为0.276,标准差为0.631,说明不同企业间数实产业技术融合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均在合理范围之内。为避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对模型估计的影响,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由表2可知VIF均低于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VIF
SYNCH	-0.481	0.899	-3.307	-0.446	1.906	/
TC	0.276	0.631	0	0	3.871	1.19
Size	22.515	1.261	20.148	22.295	26.765	1.85
Lev	0.43	0.186	0.059	0.428	0.911	1.82
Roa	0.04	0.063	-0.312	0.038	0.235	1.57
Growth	0.146	0.309	-0.502	0.104	2.475	1.18
Indep	37.656	5.483	30.000	36.360	60.000	1.02
Balance	0.358	0.284	0.005	0.270	0.997	1.03
Tobinq	2.082	1.286	0.792	1.679	10.032	1.49

3.2 基准回归结果

表3为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数实融合与股价同步性的相关系数为-0.0322,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实施数实产业技术融合的企业,其股价更多反映了企业的特质信息而非与市场共同波动,从而有效降低了股价同步性,该结果支持假设1的预期。此外,为了考察不同程度的数实融合水平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差异,本研究按照行业均值将样本划分为数实融合高低两组。第(2)列结果显示,在数实融合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数实融合与股价同步性的回归系数为-0.0470,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第(3)列则表明,在数实融合水平较低的组别中,数实融合与股价同步性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以上结果表明数实融合对于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28],即企业数实融合初期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效果微乎其微,只有当企业数实融合进程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有效降低股价同步性。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SYNCH	(2) High_TC	(3) Low_TC
TC	-0.0322** (-2.57)	-0.0470* (-1.89)	-0.0900 (-0.55)
Size	0.1667*** (21.03)	0.1288*** (7.10)	0.1778*** (20.05)
Lev	-0.4399*** (-8.75)	-0.4936*** (-4.07)	-0.4484*** (-8.04)
Roa	0.4097*** (2.96)	-0.7377* (-1.91)	0.5741*** (3.85)

Growth	-0.0929*** (-3.62)	-0.1166** (-2.07)	-0.0881*** (-3.07)
Balance	-0.1089*** (-4.31)	-0.1239** (-2.26)	-0.1070*** (-3.75)
Tobinq	-0.0293*** (-4.02)	-0.0610*** (-3.30)	-0.0246*** (-3.15)
Constant	-3.6872*** (-19.28)	-2.4083*** (-5.51)	-4.0159*** (-18.78)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N	10,669	2,258	8,411
Adj R ²	0.3457	0.3249	0.3438

注:表中报告的是回归系数和T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3.3 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

更换被解释变量。参照黄俊和郭照蕊^[29]的研究重新估计拟合优度 R^2 ,其中 $MARET_t$ 为第 t 周市场平均收益率, $INDRET_{j,t}$ 为第 t 周公司所处行业 j 的平均收益率,然后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股价同步性指标 $SYNCH_2$ 。表4第(1)列为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实融合与股价同步性 $SYNCH_2$ 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假设1成立。

$$R_{i,w,t} = \alpha_0 + \alpha_1 MARET_t + \alpha_2 INDRET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更换行业样本检验。为确保数实融合进程的一致性和可比性,研究剔除了在数字技术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的产业,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为I63、I64、I65)。由表4第(2)列可知,更换行业样本后,数实融合与股价同步性的相关系

数为-0.02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替换被解释变量 SYNCH ₂	(2)更换样本 SYNCH
TC	-0.0397*** (-2.74)	-0.0270** (-2.13)
Size	0.1941*** (20.15)	0.1676*** (20.62)
Lev	-0.5194*** (-8.61)	-0.4104*** (-7.79)
Roa	0.5276*** (3.13)	0.5419*** (3.73)
Growth	-0.0951*** (-2.97)	-0.0900*** (-3.34)
Balance	-0.1324*** (-4.40)	-0.1284*** (-4.90)
Tobinq	-0.0372*** (-4.12)	-0.0299*** (-3.79)
Constant	-4.3873*** (-19.03)	-3.7154*** (-19.00)
Industry/Year	Yes	Yes
N	10669	9908
Adj R ²	0.3011	0.3482

内生性检验。借鉴赵宸宇等^[30]、黄先海等^{[10]125}的研究思路,利用同一年度、同一规模其他企业数实融合平均水平^[31]与各省份互联网普及率^[32]构建数实融合的工具变量,从而缓解实证分析中内生性问题的干扰。选取以上工具变量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同一行业内企业的数实融合程度可能受共同的技术扩散或政策环境影响,但与特定企业的股价同步性并不直接相关,仅通过影响个体企业的数实融合行为间接发挥作用;其次,不同省份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会影响各地区企业数实融合进程,但省份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主要由宏观经济政策和基建投资等外生因素决定,与个股股价同步性的误差项无直接关联,满足外生性要求。表5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弱工具变量F值=25.576>19.93,表明无弱工具变量问题;Hansen检验(p=0.4613),接受扰动项与工具变量无关的原假设,即工具变量不存在

过度识别问题。由表5第(1)列可知,两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符合相关性要求;第(2)列显示,解释变量数实融合TC的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干扰之后,基准结论仍然成立。

表5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变量	(1) 第一阶段 TC	(2) 第二阶段 SYNCH
Average_TC	0.3835*** (2.63)	
互联网普及率	1.1375*** (2.70)	
TC		-0.4630* (-1.74)
Industry/Year	Yes	Yes
N	10655	10655
Weak identification test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25.576
Hansen J statistic		0.543(0.4613)
Underidentification test (LM statistic)		11.549***

3.4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假设部分,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主要通过提升信息效率和完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信息质量和加速特质信息融入股价,进而影响股价同步性。参考江艇^[33]对因果推断研究中的中介效应分析建议,所选取的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股价同步性的因果关系较为清晰直观,因此机制检验重点关注解释变量(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各中介变量的影响。本文运用模型(5)检验中介效应:

$$\text{Meditor}_{i,t} = \gamma_0 + \gamma_1 TC_{i,t} + \sum \gamma \text{Controls} + \sum \text{Year} + \sum \text{Ind}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与基准回归一致,Meditor为中介变量,相关中介变量的定义与测度将在下文介绍。

3.4.1 信息效率提升路径

媒体关注度。参考孔东民等^[34]做法,以上市公司每年被网络媒体报道的次数加1取对数作为媒体关注度(Media)指标。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6第(1)列,结果表明数实融合对媒体关注度有显著提升作用,即企业进行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提高媒体关注度,而媒体关注度提高有助于驱动公司层面

特质信息加速融入股价,进而促使股价同步性降低。

信息透明度。参照 Hutton^[35]的做法,运用修正琼斯模型计算出的以往三年操纵性应计收入的绝对值之和来衡量信息透明度。操纵性应计项目越大, Opaque 值越高,说明企业盈余管理越激进,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6 第(2)列,结果表明数实融合与操纵性应计项目(Opaque)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进行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降低企业操纵性应计项目,信息透明度提升,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层面特质信息更好地传递给资本市场,提高股价中特质信息含量,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同步性^[36]。

3.4.2 治理结构优化机制

企业 ESG 表现。参照王波等^[37]研究,采用华证 ESG 评价体系对企业 ESG 表现进行赋分,分数越

高代表 ESG 表现越好。表 6 第(3)列显示,数实融合与企业 ESG 表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实融合能有效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而出色的 ESG 表现能够通过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减少投资者异质信念及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来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38]。

代理成本。参照叶德珠等^[39]研究,采用经营费用率来衡量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Agency)。表 6 第(4)列显示,数实融合与代理成本(Agency)在 1% 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数实融合能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降低可以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升财务信息质量和增强投资者信任,使企业基本面信息更充分地反映在股价中,从而显著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40]。

表 6 机制检验

变量	(1) Media	(2) Opaque	(3) ESG	(4) Agency
TC	0.0787*** (5.24)	-0.0031** (-2.10)	0.0853*** (6.46)	-0.0073*** (-5.03)
Size	0.5247*** (61.59)	-0.0095*** (-9.14)	0.2566*** (28.62)	-0.0091*** (-9.20)
Lev	-0.0197 (-0.37)	0.0811*** (10.40)	-0.8607*** (-13.75)	-0.1540*** (-19.17)
Roa	0.0608 (0.42)	0.0017 (0.09)	2.3293*** (12.44)	-0.2862*** (-10.83)
Growth	0.0768*** (3.16)	-0.0004 (-0.11)	-0.1511*** (-5.00)	-0.0350*** (-8.98)
Balance	0.1442*** (5.86)	0.0087** (2.54)	0.0759** (2.51)	0.0091** (2.50)
Tobinq	0.2296*** (31.63)	0.0070*** (7.38)	-0.0033 (-0.43)	0.0174*** (13.54)
Constant	-6.8400*** (-34.24)	0.3506*** (14.09)	-1.9951*** (-9.45)	0.3577*** (15.54)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N	10669	10669	10669	10669
Adj R ²	0.5156	0.0497	0.1616	0.2437

3.5 拓展性分析

前文已证实,企业数实融合通过提升信息效率和改善治理效果降低股价同步性,进而提升资本市

场定价效率,但其作用效果可能会因外部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基于此,将从市场竞争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弱以及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低三

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进一步丰富拓展文章的研究结论。

3.5.1 市场竞争强度

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披露信息的种类和数量相应增加,竞争压力有助于释放数实融合带来的信息效率提升效应,可能会使数实融合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借鉴陈志斌等^[41]的做法,采用勒纳指数的倒数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并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市场高竞争和低竞争两组。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7第(1)、第(2)列,结果显示,在市场竞争较高的组别中,数实融合与股价同步性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在竞争较弱的组别中,两者不存在显著相关性。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组间系数差异值在1%水平上显著,即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在高强度竞争压力下,企业更有可能借助数实融合传递其自身特质差异信息,从而更大程度削弱股价同涨同跌现象。

3.5.2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地区,企业的专利创新成果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可能会弱化数实融合提升特质信息价值的边际效用。因此,借鉴黄勃等^[42]对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分类的方法,采用各省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中位数进行分组,进行分样本回归。表7第(3)、第(4)列为异质性分析结果,结果表明,

数实融合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仅在产权保护较弱的样本组中显著。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组间系数差异值在1%水平上显著,即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说明在知识产权保护较为薄弱的地区,企业的创新成果易被仿冒^[43],企业进行数实融合构建自身创新壁垒的动力更强,助推企业形成特色数字化运营体系,释放更多特质信息,进而抑制股价同步性。

3.5.3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加速数字化产品的开发、迭代和市场化过程,提升融合技术的升级与扩散速度。参照钞小静等^[44]研究对各省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测度并按照中位数分为强弱两组,进行分样本回归。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7第(5)、第(6)列,结果显示,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强的组别中,数实融合对股价同步性并无负相关关系。而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弱的组别中,数实融合与股价同步性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组间系数差异值在1%水平上显著,即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弱的地区,企业进行数实融合有利于突破资源约束,通过数字化“蛙跳效应”更显著地改善信息环境,从而对股价同步性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

表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市场竞争		知识产权保护		数字基础设施	
	(1) 高	(2) 低	(3) 较强	(4) 较弱	(5) 较强	(6) 较弱
TC	-0.0319** (-2.03)	-0.0171 (-0.82)	-0.0126 (-0.68)	-0.0383** (-2.24)	-0.0311 (-1.54)	-0.0348** (-2.20)
Size	0.1530*** (13.28)	0.1637*** (15.22)	0.1741*** (15.94)	0.1566*** (13.56)	0.1635*** (13.76)	0.1692*** (15.89)
Lev	-0.4714*** (-6.42)	-0.4494*** (-6.50)	-0.4226*** (-5.95)	-0.4539*** (-6.37)	-0.4698*** (-6.32)	-0.4163*** (-6.10)
Roa	-0.5619** (-2.37)	0.9337*** (5.31)	0.4552** (2.33)	0.3782* (1.92)	0.1666 (0.83)	0.6842*** (3.57)
Growth	-0.1266*** (-3.67)	-0.0522 (-1.36)	-0.0849** (-2.24)	-0.0966*** (-2.79)	-0.0724* (-1.94)	-0.1107*** (-3.17)
Balance	-0.1598*** (-4.50)	-0.0634* (-1.78)	-0.0181 (-0.51)	-0.1951*** (-5.42)	-0.1337*** (-3.63)	-0.0814** (-2.34)
Tobinq	-0.0717*** (-6.62)	-0.0083 (-0.88)	-0.0397*** (-4.05)	-0.0181* (-1.68)	-0.0107 (-1.12)	-0.0565*** (-5.05)

续表
表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市场竞争		知识产权保护		数字基础设施	
	(1) 高	(2) 低	(3) 较强	(4) 较弱	(5) 较强	(6) 较弱
Constant	-3.2294*** (-12.02)	-3.7699*** (-13.66)	-3.8187*** (-14.16)	-3.4979*** (-12.86)	-3.8965*** (-12.22)	-3.5914*** (-14.09)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232	5,437	5,313	5,356	5,330	5,339
Adj R ²	0.3648	0.3209	0.3615	0.3152	0.3557	0.3292
Fisher's Permutation	0.138***		-0.122***		-0.068***	
Test 组间差异检验 p 值	0(0.000)		(0.000)		(0.008)	

注:组间差异检验 p 值由费舍尔组合检验得到(Bootstrap 抽样 1000 次)。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作为新经济格局下企业发展的风向标,其“不破不立”“破而后立”的鲜明创新特征必将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产生重大影响,但学术界对于二者之间相关的实证研究十分匮乏。因此,选取 2012—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实融合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同步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实融合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降低信息不透明、提升企业 ESG 表现以及降低代理成本进而降低股价同步性。拓展性分析发现,在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知识产权保护较弱以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弱的地区中,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对于微观企业而言,应充分把握数实融合这一机遇,利用数据要素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和塑造自身独特竞争优势,切实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完善公司治理,增强投资者信心,从源头上减少股价噪音。第二,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应注重精准施策与差异化引导。一方面,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弱的地区,政府应着力加大 5G、工业互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与优先布局,确保实体企业能够便捷地接入数字网络,为数字要素融入和传统技术数字化改造提供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应完善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通过完善立法与提升侵权成本,激励企业原创性创新产出,充分释放数实融合对企业发展的红利效应。第三,对于监管层和投资者而言,需协同引导市场穿透概念炒作,

回归价值投资本质。监管层应着力完善信息披露指引,抑制对“数实融合”等新兴主题的过度投机行为,引导市场聚焦于融合进程对企业财务绩效与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实质影响;投资者应构建融合多维信息的分析框架,提升对企业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甄别与判断,从而践行以基本面为核心的价值投资理念,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参考文献:

- [1] 张恒瑞,洪剑峭.空间区位竞争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J].会计研究,2022(4):22-40.
- [2] 房美言,吕康银,梁孝成.数实融合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J].兰州学刊,2025(5):84-99.
- [3] 任保平,张公娇.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5,41(3):30-45.
- [4] 郭晓旭,张娆.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提升企业股票流动性吗?[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大学学报),2025(4):66-76.
- [5] 刘志峰,肖晓颖,郑岩.数字化转型、信息不对称与 ESG 评级分歧[J].财会月刊,2025,46(10):49-55.
- [6] 黄庆华,罗琦沛.数实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当代金融研究,2025,8(1):1-12.
- [7] 张树山,尚朝阳,杨皓翔.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提升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J].商业研究,2024(6):30-39.
- [8] 江鹏,刘建江,许调蓉.数实融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了吗?[J].宏观经济研究,2024(10):72-89.
- [9] 王晓磊.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创新[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8(2):99-108.
- [10] 黄先海,高亚兴.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

- 济,2023(11):118-136.
- [11]张军,刘波,沈华玉. 股价同步性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公司治理视角[J]. 财经科学,2019(4):13-25.
- [12]张嘉伟,胡丹丹,周磊.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来自真实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2022,44(1):122-139.
- [13]罗进辉,巫奕龙. 数字化运营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J]. 管理科学,2021,34(4):3-18.
- [14]吴俊珺,杜文豪. 数实融合、资源配置效率与新质生产力发展[J]. 统计与决策,2024,40(24):5-10.
- [15]肖奇,沈华玉. 媒体关注、投资者异质信念与股价同步性[J]. 财贸研究,2021,32(10):99-110.
- [16]杨玉龙,孙淑伟,孔祥. 媒体报道能否弥合资本市场上的信息鸿沟?——基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的实证考察[J]. 管理世界,2017,33(7):99-119.
- [17]张婷婷,李延喜,曾伟强. 媒体关注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差异研究——一种治理盈余管理的新途径[J]. 管理评论,2018,30(2):25-41.
- [18]朱红军,何贤杰,陶林. 中国的证券分析师能够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吗?——基于股价同步性和股价信息含量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2007(2):110-121.
- [19]伊志宏,杨圣之,陈钦源. 分析师能降低股价同步性吗?——基于研究报告文本分析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9(1):156-173.
- [20]翟华云,李倩茹.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审计质量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37(2):69-80.
- [21]王辉,李相辰,陈旭.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融资约束[J]. 经济研究,2025,60(4):139-156.
- [22]李清,陈琳. ESG表现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25,22(11):2137-2146.
- [23]齐丽云,李腾飞,郭亚楠.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战略选择的调节作用[J]. 科研管理,2017,38(7):117-127.
- [24]李新丽,万寿义,张雪梅. 企业社会责任能降低股价同步性吗?——基于强制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准自然实验[J]. 科学决策,2018(9):1-27.
- [25]潘文富,汤继莹. 公司治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与股价同步性[J]. 华东经济管理,2023,37(6):120-128.
- [26]方巧玲,余怒涛,徐慧. 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研究:会计信息质量视角[J]. 会计研究,2024(3):34-50.
- [27]关鑫,李枫园. 数字化转型能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2(2):85-96.
- [28]贺超,丁怡帆,马云飞.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稳定——基于“数据权力”加剧股票“同跌同涨”的经验证据[J]. 金融经济研究,2023,38(4):74-91.
- [29]黄俊,郭照蕊. 新闻媒体报道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J]. 管理世界,2014,30(5):121-130.
- [30]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经济,2021,42(7):114-129.
- [31]尹志锋,曹爱家,郭家宝,等. 基于专利数据的人工智能就业效应研究——来自中关村企业的微观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23(5):137-154.
- [32]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18,17(4):1557-1580.
- [33]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34]孔东民,刘莎莎,应千伟. 公司行为中的媒体角色:激浊扬清还是推波助澜? [J]. 管理世界,2013,29(7):145-162.
- [35] HUTTON A P, MARCUS J A, TEHRANIAN H. Opaque financial reports, R2, and crash risk[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94(1):67-86.
- [36]郭恒泰,王妍.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股价同步性吗? [J]. 投资研究,2022,41(12):91-105.
- [37]王波,杨茂佳. 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软科学,2022,36(6):78-84.
- [38]僧建芬,张立杰. 企业ESG表现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J]. 现代金融研究,2024,29(11):70-80.
- [39]叶德珠,潘爽,林正鑫. 高铁开通能否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基于异地独立董事的视角[J]. 金融监管研究,2020(8):51-68.
- [40]王新光,盛宇华. 共同机构投资者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协同治理还是合谋套利? [J]. 财贸研究,2025,36(4):81-94.
- [41]陈志斌,王诗雨.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流风险[J]. 财务研究,2015(4):14-23.
- [42]黄勃,李海彤,刘俊岐,等. 数字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数字专利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23,58(3):97-115.
- [43] MANSO G. Motivating innova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5):1823-1860.
- [44]钞小静,廉园梅,罗鑾错.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 财贸研究,2021,32(10):1-13.

理雅各英译《易经》家风思想的明晰化策略研究

任运忠

(西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以典籍翻译标准和汉英高低语境中语言及文化差异为基础,提出汉语典籍英译宜采用明晰化策略,将原文深层的文化思想清晰明了地展示给西方读者。以理雅各英译《易经》家风思想为例,探讨明晰化策略在汉语典籍英译中的应用。研究发现,理雅各英译《易经》家风思想采用了显化连贯形式、增译句子成分、文外加注阐释的方法,在提升译本“可读性”的同时,确保了原文家风思想的“本真性”。典籍英译的明晰化是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理雅各;《易经》;家风思想;明晰化

中图分类号:H315.9;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070-08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Explicitation for the Thoughts on Family Tradition in *Yijing*

REN Yunz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ndards of classic translation and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high and low context,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explicitation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so as to clearly present the deep cultural ideas of the original text to western readers. Taking James Legg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houghts on family tradition in *Yijing* as an example, the application of explicit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was explore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James Legg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oughts on family tradition in *Yijing* adopted methods such as explicit coherent forms, additional sentence elements and extra-textual annotation. While improving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it ensur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riginal thoughts on family tradition. Explicita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broad.

Key words: James Legge; *Yijing*; thoughts on family tradition; explicitation

家风是中华民族家族世代相传的精神风貌,优良的家风不仅维持了家庭生活的幸福与和谐,同时也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风清气正。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风的培养和传承,以优良的家风育人兴家,并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家风文化。中华典籍承载着深厚的家风文化,其中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堪称中国家风文化的“活水源头”,中国家风思想深受

《易经》生存智慧的启迪^[1]。后世广为流传的家风家训经典多援《易经》以善其说,北宋司马光撰《家范》,开篇即引《易经》家人卦,以证其治家思想^[2]。明代思想家袁黄著《了凡四训》,引《易经》坤卦之《文言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告诫子孙修善积德^[3]。清康熙帝书《庭训格言》,引《易经》乾卦之《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警示后辈“以劳

收稿日期:2025-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XW037)。

作者简介:任运忠(1974—),男,重庆万州人,教授,硕士。E-mail:renyunzhong@163.com

为福,以逸为祸”^[4]。《易经》中的家风思想经世代文人学者推阐而发扬光大,源源不断地为子孙后代提供生活智慧。《易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同时也是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易经》中的家风思想随着《易经》的西传而译介到西方,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典籍外译不仅仅是文字转换,更重要的是文化思想的传递和交流。在西方众多的《易经》英译本中,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译本一直被中西方学者奉为“权威译本”,译者采用了明晰化(explicitation)的翻译策略,让西方读者透过清晰的译文,领悟到《易经》深层的家风思想,从而为中华典籍外译树立了典范。

1 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

理雅各原名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是近代享誉世界的汉学家。1841年理雅各出任英华书院校长,并于1843年随英华书院一同迁往中国香港,此后他在中国旅居长达30年之久。作为一个西方人,理雅各来华的初衷莫过于传播西方文化,然而他自己却不期被悠久的中华文化折服了。他发现“中国民众的道德和社会准则存在某种极其伟大的品质和力量,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崇拜卓越的学术成就,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高度尊重学问”^[5]。理雅各倾尽毕生心血系统研究并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其中包括《易经》《书经》《礼记》《春秋》《大学》《中庸》《孟子》《论语》《诗经》《左传》《孝经》等,而且还著有大量反映中国文化的学术专著及论文。理雅各每译一部中国经典,都附有长篇导读和翔实的译文注释,尽显译者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1875年理雅各因其在汉学研究中的突出成就,获得了素有世界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1876年理雅各受聘为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牛津大学这一教职的设立标志着西方汉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纪元^{[6]169-171}。理雅各一生不遗余力地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在中西方之间架起沟通彼此的文化桥梁,为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中,《易经》的英译难度最大且耗时最长,其早在1855年就完成了《易经》的初译,但直到1882年才最终完稿,作为英国汉学家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主编的汉学巨著《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十六卷正式出版。《易经》由经文和传文两部分构成,中国传统经学多采用以传附经的体例,而理雅各研究发现“《易经》的经文和传文成书相距约700年之久,

而且二者的主题也不一致”,因此理雅各在其《易经》译本中采用了经传分离的体例^{[7]xiii}。《易经》经文是对西周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记录,而《易经》的各篇传文则是对《易经》经文的哲学阐释,后者形成于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初年漫长的历史时期,理雅各采用经传分离的体例更有利于保持《易经》和《易传》各自结构的完整性和主题的一致性。理雅各在其《易经》译本序言中明确提出了“心灵对话”(mind to mind)的翻译原则,他认为直译毫无益处,翻译中国经典并不是解释作者使用的汉字,而是“要深入作者内心与作者展开心灵对话,然后再以最佳方式用其他语言表达作者的思想”^{[7]xv}。简而言之,译者应突破原文表层文字的束缚,将其深层的思想内涵在译文中清晰地表现出来。理雅各不仅完整地英译了《易经》经传,而且还通过序言、导论、注释等对《易经》进行了详尽的疏解,显化原文玄奥隐晦的文化意蕴,并尽可能为西方民众创造读懂《易经》所必备的文化语境。

2 典籍翻译的明晰化

明晰化又称作“外显化”或者“明示”,指“翻译过程中给译文添加或明示原文中隐含语言成分的过程”^[8]。“明晰化”的翻译思想在中外译论中源远流长,东汉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写道:“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9]支谦在此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其中“当令易晓”即“明白易懂”,这一思想正是“明晰化”在翻译中的应用。在西方, Vinay 和 Darbelnet 最早提出“明晰化”这一术语,“用以概述翻译中存在的一种现象——译文通常会采用比原文更加明确的形式陈述原文的信息。”^[10] Blum-Kulka 曾提出“明晰化假设”(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译者翻译原文的过程会导致译文比原文冗长,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译文提高了衔接的明晰化程度”^[11]。不同的语言系统有不同的语篇连贯形式,如汉语一般采用隐性连贯,而英语往往采用显性连贯,因此在汉译英实践中常需要将隐性连贯转换为显性连贯。语篇连贯的明晰化能够凸显原文内部隐晦的语篇关系,帮助读者理顺逻辑结构,从而减少阅读障碍。

明晰化不仅仅是连贯形式的明晰化,还应该包括意思的明晰化,即“译文中增添了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显化表达,或者说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12]。原文和译文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原文的隐含意思也许并不妨碍原文读者的阅读体验,但对译文读者而言,隐

含意思却构成了理解原文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译者应该对原文的隐含意思加以引申阐释,使其在译文中明晰化。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13]“信、达、雅”是中国传统翻译标准的金科玉律,其中“达”显然是针对译文读者而言的,即译文通俗易懂,符合译入语表达规范。翻译的目的在于将原文的意思明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译文经过明晰化处理,使原文字里行间的隐含意思跃然于纸上,以便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达”的效果。然而,隐晦的译文于读者不仅毫无益处,甚至会引起误解,难以实现翻译之目的。总之,译文明晰则“达”易,译文艰深晦涩则“达”难,甚至“不达”。

对于汉语典籍英译而言,明晰化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要求。汉语典籍英译是跨越高低语境的交流活动,汉语交流属于高语境交流(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而英语交流属于低语境交流(low-context communication)。“高语境交流指的是:大多数信息或存于物质环境中,或内化在人的身上;需要经过编码的、显性的、传输出来的信息却非常之少。低语境交流正与之相反,就是说,大量信息编入了显性的代码之中。”^[14]汉语典籍蕴含着大量隐而不宣的内容,即字面虽未明示但却寄于言外语境的信息,与典籍创作同时代的读者能够借助语境提供的背景知识,轻而易举地领会这些隐含信息。汉语典籍英译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将古汉语译成现代英语,译文的读者对象发生了变化,然而汉语典籍所依存的语境却没有随着语言形式的转变而随之迁移。由于文本时空的转换,译文脱离了原文所依附的语境,原文语境承载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在新的语境中将不复存在。“汉英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汉语典籍英译时出现信息不对等或信息空缺,这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语境进行补缺。”^[15]若非补缺原文语境并对隐含信息加以明晰化,即使当代普通中国读者也难窥汉语典籍之堂奥,更何况西方的普通民众呢?《易经》成书距今久远,其始于西周且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才渐次成型,当今西方读者所面临的时代语境与《易经》的创作语境可谓天壤之别,因此明晰化翻译策略成为英译《易经》的不二选择。

3 《易经》家风思想在理雅各译本中的明晰化表现

《易经》将深邃的家风思想深植于委婉含蓄的

言辞之中,与《易经》诞生的时代相比,现代历史和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易经》中中国古人不言自明的家风思想于现代普通读者而言,显得玄之又玄、神秘莫测。英译《易经》不仅需要跨越相隔数千年的历史语境,更要跨越中西扞格的文化语境,只有采用明晰化的策略才能为西方读者呈献一本可读且可理解的《易经》译本。对比分析理雅各和卫礼贤两位西方汉学家的《易经》英译本,着重探讨理雅各采用的明晰化翻译策略,理雅各通过显化连贯形式、增译句子成分、文外加注阐释的方法,让《易经》隐晦的家风思想在译本中清晰地呈现出来。

3.1 显化连贯形式

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语系,常采用不同的连贯手段体现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英语重形合(hypotaxis),一般采用显性连贯,“借助于形态变化和形式词,明显地标明词、词语之间、短语之间或小句之间的语法关系”。汉语重意合(parataxis),“造句更注重隐性连贯,以意统形,少用甚至不用形式手段,靠词语与句子本身意义上的连贯与逻辑顺序而实现的连接”^{[16]226}。理雅各在其《易经》英译本中明晰了原文语言层面缺省的连贯形式,将隐性连贯转换为显性连贯,以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让西方读者明晓语句间的逻辑关系,从而领悟到原文蕴含的内容。

良好的家风离不开对家庭的有效治理,治家必须制定严格的家规家范,并以此为基础家庭才能稳固。《易经》家人卦初九爻之《象传》提出了“防患未然”的固家之法。

例 1

原文:“闲有家”,志未变也。^{[17]117}

理雅各译文:“He establishes restrictive regulations in his household.”— (he does so), before any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their wills. ^{[7]312}

卫礼贤译文:“Firm seclusion within the family”: the will has not yet changed. ^{[18]571}

家人卦初九爻曰:“闲有家,悔亡。”^{[17]117}家人卦初九爻位于家人卦之始,寓意在家道初立之时,建立严厉的家规家范以防邪佞,悔恨就会消亡。“闲”即“防止”之意,防止邪佞方能维护家庭稳固。《周易注》云:“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19]家道初立务必严正,即须立家法以防患杜邪,若待家道渎乱之后再施以严治,则悔之晚矣。故家人卦初九爻之《象传》指出:“‘闲有家’,志未变也”,也就是在家道尚未渎乱之前就必须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以维持家庭稳固。原文

中“闲有家”与“志未变也”之间无任何逻辑连贯形式,在汉语高语境中连贯形式的缺失并不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但在英语低语境中,连贯形式的显化不仅符合英语表达规范,更有助于西方读者梳理语句间的逻辑关系。卫礼贤将“闲有家”译为“Firm seclusion within the family”,其中“seclusion”本义是“隔绝、隐居”,译文可引申理解为“在家庭内部建立牢固的规范和界限”。卫礼贤用冒号连接“闲有家”和“志未变也”之间的译文,英文冒号后的内容通常是对前文的解释说明,这与原文各分句间的逻辑关系大相径庭。理雅各将“闲有家”译为“He establishes restrictive regulations in his household.”,即“在家中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象传》译文中,“he does so”是对前文的重述,其中“so”是代词,表示“他这样做”,代词是英语中常见的连贯形式,用以指代前文。理雅各将“志未变也”译为“before any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their wills”,即“在他们(家人)的意志发生任何改变之前”,表示时间顺序的连词“before”(在……之前)清楚地表明“闲有家”必须在“志未变”之前。译文显化的连贯形式明晰了原文的逻辑层次,同时也显化了原文“防患未然”的固家思想。

持家需戒放纵、尚节制,方能内外和睦。《易经》节卦六三爻之爻辞提出了“节制有度”的立身持家准则。

例2

原文:不节若,则嗟若。无咎。^{[17]184}

理雅各译文: The third line, divided, shows its subject with no appearance of observing the (proper) regulations, in which case we shall see him lamenting. But there will be no one to blame (but himself).^{[7]198}

卫礼贤译文: He who knows no limitation will have cause to lament. No blame.^{[18]233}

“节”指对欲望和用度的自我约束;“嗟若”表示“嗟叹伤悔”^[20]。持家需以“节制”为基础,“不节”而放纵的行为必然会招致悔恨叹息,只有通过明确规范用度取舍才能筑牢家庭根基。“无咎”本义指“无过错”,但在原文语境中“无咎”表示“无需归咎他人”。“嗟若”的根源在于自身“不节”的行为,而非外部强加或他人导致。因此,自己必须承受因“不节”行为而引发的悔恨叹息。卫礼贤将“无咎”译为“No blame”(无过错),未明确“嗟若”与“无咎”的内在关联,易让西方读者误解“无咎”是对“不节”行为的宽容。汉语作为高语境语言,汉语读者无需借助显性连接词,即可通过原文语境领悟到“不节

致悔”与“责任在己”的内在语义关联。英语则是低语境语言,依赖显性语法手段构建语义逻辑。理雅各正是基于两种语言的语境差异,将“无咎”译为“*But there will be no one to blame (but himself)*”(除了他自己外,无人可归咎),利用转折连词“but”凸显语义重心的转移,强调“无咎”并非“无过错”,而是“责任在己”。理雅各译文通过连词“but”显化原文的语义逻辑关系,准确地再现了“节制有度”的家风思想。

汉语和英语高低语境的差异构成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巨大挑战。汉语作为高语境语言,逻辑连贯需依赖共同的文化语境进行意会;而英语作为低语境语言,需要显性的逻辑连接词来构建明晰的语义系统。为弥补这一根本差异,译者必须采用显化策略,选择正确的逻辑连接手段,使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16]230}。具体而言,译者需将汉语隐含的逻辑关系通过添加连接词予以明示,或者将模糊的指代通过明确代词加以澄清,如理雅各在翻译《易经》家人卦初九爻之《象传》时,用连词“before”表示时间上的前后承接,又用代词“so”指代前文;在翻译节卦六三爻之爻辞时,用连词“but”表示语义转折。通过形式上的显化,理雅各将汉语高语境中依赖情境推理的连贯性,转化为英语低语境读者可直接把握的语言逻辑,从而确保《易经》家风思想的准确传递和译文在西方读者中的可接受性。

3.2 增译句子成分

汉语典籍蕴含着深奥精微的思想内容,而其表达却简要不繁;《易经》作为先秦时期的汉语典籍,其意深邃无极,其言却简明精炼。《易经》简洁的言辞存在大量句子成分缺省的表达形式,理雅各采用增译的方法补充了原文表达层面缺省的句子成分,使原文深层的家风思想在译文的语言表层被明晰化。“增译是翻译技巧,也是文本转换的方式。增译作为翻译现象是可察的,对比译文与原文的语表形式可以看到语言单位量的增加。”^[21]相较于《易经》原文的简洁洗练,增译扩充了译文篇幅,使译文语义更加完整、通顺,从而减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障碍,更易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

句子成分即句子的组成部分,根据句子成分在句中的功能,汉语句子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六种形式,英语句子成分除上述六种形式外还有表语。英语强调句子结构的完整性,因而较少有句子成分省略现象;而汉语注重语言经济性原则,讲究意会,凡是不言而喻的句子成分则尽可能省略^[22]。在语言交际中,省略的成分需要通过相

关语境补充出来,而且其所承载的信息必须是交际双方共知的信息,不然必定导致语言交际失败。《易经》成书正处于古汉语形成的初始阶段,各种省略句式比比皆是,理雅各依据原文语境在译文中增译了原文省略的句子成分,补充了西方读者未知的省略信息,使原文隐含的家风思想在语言层面明晰化,从而满足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

男人和女人是构成家庭的主体,男女“持守正位”乃安家之本。家道既立,能否久安则取决于男女能否各安其位。由于女性在传统家庭分工中主管家务,《易经》家人卦之卦辞尤其强调女子坚守正位的重要性。

例3

原文:家人,利女贞。^{[17]116}

理雅各译文:For (the realisation of what is taught in) Kiâ Zân, (or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family), what is most advantageous is that the wife be firm and correct.^{[7]136-137}

卫礼贤译文:THE FAMILY.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woman furthers.^{[18]143}

“贞”即“正”,“正位”是《易经》的核心思想之一。家人卦之《象传》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17]116}中国传统家庭观念认为家中男女应各尽其职,男处理家庭外部事务是为“正位”,而女管理家庭内部事务是为“正位”,男女均“各正其位”是天地间的大道理。《周易正义》云:“家人之道,必须女主于内,男主于外,然后家道乃立。”^{[23]159}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古代社会,女子坚守正位对优良家风的形成至关重要,故曰“利女贞”,即女子坚守“正位”是有利的。原文“利女贞”是典型的无主句,凸显了女子“正位”对于安家的重要性。《易经》卦爻辞表达的“内容都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所以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24]。《易经》承载的道理并非针对特定的事物,而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普遍性,因而《易经》卦爻辞常用无主句。然而,无主句无疑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负担,读者必须联系全卦的整体语境来理解原文的意思,这对现代普通的中国读者而言已非易事,对西方读者就更强人所难了。卫礼贤采用直译的方法,将“家人”译为“THE FAMILY”,“利女贞”的译文“The perseverance of the woman furthers”采用主谓结构,译文极为简短,缺乏必要的语境补充,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读者难以从中领悟到“女性在家庭中‘守正’”的道德要求。家人卦阐述管理家庭的道理,尤其强调女子对保持家庭安定的重要

作用。联系家人卦的整体语境,理雅各在译文中增译了两个并列的介词短语“*For the realisation of what is taught in Kiâ Zân*”及“*or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family*”,并以此作为整句译文的状语,直接向读者阐明家人卦的主旨。在“利女贞”的译文中,理雅各将“利”译为名词性从句“*what is most advantageous*”,并将其增补为整句译文的主语,将“女贞”的译文“*the wife be firm and correct*”作为表语,整句译文清楚地向西方读者表明“为了实现家人卦所讲授的道理,或者实现对家庭的管理,最有利的情况是女子坚守正位”。译文表达严谨规范,而且通过增译状语和主语明晰了原文的主题,让西方读者能够直接从译文中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

家族的持续兴旺在于为家族传承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易经》乾卦之《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既为个人修身立命指明方向,更成为家族代代相传的精神内核。

例4

原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7]12}

理雅各译文:Heaven, in its motion, (gives the idea of) strength. The superior ma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nerves himself ceaseless activity.^{[7]267}

卫礼贤译文:The movement of heaven is full of power. Thus the superior man makes himself strong and untiring.^{[18]373}

原文以“天道刚健不息”的自然规律,引导家族成员勤勉事事、奋进不已,让进取精进成为家族代际传承的精神基因,从而支撑家族长久兴旺发达。“自强不息”并非只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认知上的价值准则,“以人事法天所行”^{[23]18}。天道永恒运行从不懈怠,而家族作为自然与社会的缩影,亦需以“不息”的精神持续发展。原文突出了“君子效法天道以自我砥砺”这一深刻的家风思想。卫礼贤译文“*Thus the superior man makes himself strong and untiring*”,仅用“*thus*”(于是)一词对前后文进行简单衔接,弱化了君子效法天道的主动性。“君子自强不息”强调君子是自身行为的主体,其“强”是向内求索、自我驱动的结果,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家风中强调自我修养和完善的精髓。卫礼贤的译文更偏向于君子在观察天道后不得已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让“自强不息”更像一种被动接受的行为,而非君子主动以天道为范本的自觉选择。反观理雅各译文通过增译动宾结构“*gives the idea of*”(展现出……的形象)和状语“*in accordance with this*”(以此为据)两处关键成分,相较于卫礼贤

译文更清晰地揭示了原文“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动宾结构“gives the idea of strength”点明天道运行的本质特征是“刚健”，直接呈现“天行健”的核心文化内涵。状语“in accordance with this”是对原文的阐释性补充，明确建立起“天行健”与“君子自强不息”的逻辑关联，阐明君子奋进不已是对天道规律的因循和刻意仿效，让读者领悟到君子师法天道和身体力行的主动性。

汉语高语境依赖隐性语境传递信息，行文多省略主语、宾语或逻辑前提；英语低语境特点需明确语义载体，因此增译句子成分是化解这一矛盾的重要手段，即“把原先隐藏于汉语语境中的信息，以文字的形式清楚明确地补充到英语译文中，以便使译文符合英语的句法规则”^[15]。增译需精准填补语境缺口：一是结构性增补，即补充英语句法强制要求而汉语可省略的成分，特别是针对汉语高频的主语省略，需在译文中明确逻辑主语，如理雅各英译《易经》家人卦之卦辞时对主语的增译。二是信息性增补，即增补原文字面虽未明示但深层语义隐含的信息，如理雅各英译《易经》家人卦之卦辞和乾卦之《象传》所增补的状语。理雅各增译句子成分绝非任意添加，而是译者基于对《易经》深层语义的精确把握，在英语中显化汉语中隐含的成分，以便让西方读者清晰地领悟原文蕴含的家风思想。

3.3 文外加注阐释

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翻译家释僧祐指出：“译者释也，交释两国，言谬则理乖矣。”^[25] 其将翻译称为“阐释”，无独有偶，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 1916—2011)也认为“阐释就是翻译”^[26]。翻译的过程就是用译语阐释原语的过程，阐释的目的是向读者传达原语包含的思想内容及文化信息。典籍对外翻译是跨语际的文化交流活动，译者用通俗、浅显的语言阐释蕴含在原语中的文化思想，不仅减轻了读者的阅读负担，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交流。《易经》微言精义，素有“大道之源”的美誉，然而其言简意赅的表述也常令人迷惑不解，因此理雅各采用在译文外加注阐释原文玄奥精深的义理，将原文隐含的思想内容和文化信息直接清晰地呈现给西方读者。

“积德行善”作为传统家风思想之一，其本质是将“向善”内化为家族成员的立身根基与行为自觉，以代代相传的善念与善举维系家族的道德凝聚力。《易经》坤卦之《文言传》强调了“向善而行”之于家族延续的关键作用，让善念融入家族的道德血脉，以善行为家族长久兴旺筑牢根基。

例5

原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7]12}

理雅各译文：The family that accumulates goodness is sure to have superabundant happiness, and the family that accumulates evil is sure to have superabundant misery. ^{[7]419}

理雅各译文阐释：The language makes us think of the retribution of good and evil as taking place in the family, and not in the individual; the judgment is long deferred, but it is inflicted at last, lighting, however, not on the head or heads that most deserved it. Confucianism never falters in its affirm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that each shall have its appropriate recompense; but it has little to say of the where and when and how that recompense will be given. The old classics are silent on the subject of any other retribution besides what takes place in time. About the era of Confucius the view took definite shape that, if the issues of good and evil, virtue and vice, did not take effect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 they would certainly do so in that of his posterity. This is the prevailing doctrine among the Chinese at the present day; and one of the earliest expressions, perhaps the earliest expression, of it was in the sentence under our notice that has been copied from this Appendix into almost every moral treatise that circulates in China. ^{[7]47}

卫礼贤译文：A house that heaps good upon good is sure to have an abundance of blessings. A house that heaps evil upon evil is sure to have an abundance of ills. ^{[18]393}

原文精辟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家风思想中“家族命运与道德积累相统一”的根本法则。“余庆”指“福及子孙”；“余殃”指“祸及后世”^{[27]57}。家族成员善恶言行的积累会产生长远影响，惠及或殃及后代，进而影响家族的兴衰存续。理雅各译文准确地再现了原文蕴含的家风思想，并且在译本导言中详尽地阐释了原文深层的文化内涵。理雅各在阐释中敏锐地指出，“善恶报应”的作用主体是“家族”而非“个人”。虽然报应可能会延迟，但从不会缺席。在孔子时代，儒家已经形成了善恶必有别且各有其报的坚定信念，以及子孙命运因承祖辈善恶的明确观念。

理雅各通过译文阐释，向西方读者补充了儒家文化背景与思想渊源，清晰界定了“余庆”和“余殃”的核心指向，即家族后代的祸福。理雅各的阐释进

一步凸显了“积善避恶”的家风思想,善恶之报不仅关乎个人,更会延及子孙,这一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通过译文阐释,西方读者得以理解“积善避恶”并非孤立的道德劝诫,而是一种以家风传承为纽带、维系家族延续的行为准则,体现出家风在伦理教化与社会维系中的重要作用。相较而言,尽管卫礼贤译文也传递了原文表层的字面含义,但未对译文作进一步阐释,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难以从译文中了解到中国家风思想中“善恶有报”的文化观念,更体会不到善恶之报将跨代承袭的警示意义。

在汉语典籍英译实践中,于译文外部添加阐释,是应对高低语境差异的有效方法。在汉语高语境中,汉语典籍内含的文化信息为中文读者所共享,却对低语境中的西方读者构成了认知盲区。“汉语典籍中往往包含丰富的文化因素,其中的许多因素在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并不存在,这就造成了文化因素缺省。”^[15]因此,在译文外补充阐释,正是为了弥补汉语高语境与英语低语境之间的这种文化信息差。具体而言,译者可在译文中通过前言、导论、脚注或尾注等形式,在英语中进行深层的语境重构,如理雅各在译本导言中对“积善避恶”“善恶报应延及子孙”等中国传统文化信息的阐释。文外加注阐释是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一以贯之的做法,在阐释中补充理解译本正文所需的文化背景信息,引导西方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

4 明晰化的实践边界

《易经》言辞简约而语义深奥,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本,中国读者理解《易经》常依赖语境中隐含的逻辑与文化共识;而西方读者身处低语境文化,则要求信息明确外显,依赖显性表达获取信息。明晰化是弥合高低语境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关键,通过补充隐含逻辑、阐释模糊表达,“使译文中的词句意义比原文更明白、更具体、逻辑更清楚。”^[15]然而,明晰化的边界是“文化保真”,即不破坏原文语义与文化内核,在“可读性”与“本真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文化保真”是典籍翻译的根本要求,失去文化“本真性”的典籍翻译只是语言转换,无法实现文化传播的初衷。典籍翻译是以文化传播为目的的翻译,译文必须“能够充分表现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征”^[28]。因此,明晰化必须以“文化保真”为前提,不能为追求易懂而消解典籍的文化特质。“可读性”趋向适应读者认知,“本真性”强调忠实于源文化,二者互为制约与补充。在典籍翻译实践中,译者

需对典籍中依赖文化语境的隐含信息,通过补充背景性阐释实现明晰化;对承载核心文化内涵的概念,在保留其独特文化内涵的同时辅以精准释义,既满足低语境读者对显性信息的需求,又坚守“文化保真”的底线,让典籍在跨文化传播中既被理解,又不失其本真。以理雅各和卫礼贤译家人卦上九爻之爻辞为例。

治家务必正家,然而正人须先正己,律己方能律人。家人卦上九爻之爻辞提出“以身作则”乃正家之要的家风思想。

例6

原文:“上九:有孚,威如,终吉。”^{[17]118}

理雅各译文: The topmost line, undivided, shows its subject possessed of sincerity and arrayed in majesty. In the end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 ^{[7]138}

卫礼贤译文: His work commands respect. In the end good fortune comes. ^{[18]147}

家人卦上九爻居全卦最高位,象征一位居高临下的一家之长。“孚,信也”,“威,有威可畏也。”^[29]一家之长自己诚实有信,并且在家人心目中树立起威信,家庭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吉利的。“治家者以身教,方可聚一家人之心,取一家之信;方可为一家人所敬畏。”^{[27]302}家长内怀至诚至信之心,外具庄重威严之表,为家人树立可资效仿的典范,从而使优良的家风世代相传。理雅各将“有孚”译为“possessed of sincerity”(拥有真诚),将“威如”译为“arrayed in majesty”(显示出威严),译文准确地揭示了作为一家之长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理雅各译文突出了“以身作则”的家长形象,愈加明晰了原文蕴含的道德意蕴。反观卫礼贤译文“His work commands respect”(他的工作令人肃然起敬),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用了明晰化策略,将原文“诚实有信”道德修养转化为“工作”,译文契合西方读者具象性的认识习惯,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然而,卫礼贤译文突破了明晰化策略的实践边界,原文“内诚外威”的家风思想在译文中被完全过滤了,文化“本真性”在译文中消失殆尽。

理雅各英译《易经》采用明晰化策略,不仅增加了译本的“可读性”,同时也保存了《易经》的文化“本真性”,使其成为《易经》英译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理雅各《易经》英译本“开启了《易经》在西方世界译介与传播的新时代”,西方世界能够首次全面系统地了解这部儒家“群经之首”的文化思想^[30]。中国学者林金水称理雅各《易经》英译本是“西方学者研究《易经》必读的版本”^[31],英国汉学家哈克尔

(Edward Harker)亦将其视为“任何一个严肃的《易经》研究学者所必备的藏书”^[32]。美国汉学家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评论道:“翻译这部最神秘的中国经典(《易经》)代表了理雅各作为学者-译者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19世纪整个东方主义史上划时代的事件。”^{[6]366}理雅各《易经》英译本自首次出版以来,历经百余余年仍畅销不衰,至今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翻印再版,深受西方读者青睐。这一跨世纪的传播盛况,正是得益于译者对明晰化翻译策略的精准把握与恰当运用。

5 结论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以文化为主导的软实力较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只体现在对西方少数汉学家或其他学术精英的熏陶和浸染,更在于对西方民众潜移默化的吸引和感召。因此汉语典籍英译须充分考虑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家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理雅各英译《易经》家风思想采用了明晰化策略,既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同时也在译文中实现了文化“保真”,让西方读者跨越语言和时空障碍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理雅各《易经》英译本对汉语典籍对外翻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汉语典籍翻译的明晰化为西方民众认识中国文化开辟了捷径,无疑也为中国文化“走进”西方世界打开了方便之门。

参考文献:

- [1] 尹旦萍.《周易》的生存智慧与中国家训文化[J]. 孔子研究,2002(2):54-65.
- [2] 司马光. 家范[M].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1:5.
- [3] 袁了凡. 了凡四训[M]. 北京:中华书局,2013:100.
- [4] 康熙. 庭训格言[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37-38.
- [5] LEGGE H 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M].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28.
- [6] GIRARDOT N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7] LEGGE J. The I Ching[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3.
- [8] 方梦之. 翻译学辞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549.
- [9] 支谦. 法句经序[M]//朱志瑜,张旭,英立波.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卷一.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1.
- [10] SHUTTLEWORTH M,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4:55.
- [11] BLUM-KULKA S.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M]//HOUSE J, BLUM-KULKA 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Tubinger: Narr, 1986:19.
- [12] 柯飞. 翻译中的隐和显[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37(4):303-307.
- [13] 严复. 译例言[M]//赫胥黎. 天演论及其母本《进化论与伦理学》全译. 严复,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9.
- [14] 爱德华·霍尔. 超越文化[M]. 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2.
- [15] 韩孟奇. 汉语典籍英译的语境补缺与明晰化[J]. 上海翻译,2016(4):73-76.
- [16] 朱晓东. 英汉语篇对比与翻译[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7] 李申. 周易经传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18] WILHELM R.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571.
- [19] 王弼. 周易注[M]. 楼宇烈,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2011:200.
- [20]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48.
- [21] 朱英丽. 增译研究述评:名实之辨[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9):266-270.
- [22] 袁庆德. 深层汉语语法分析[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73.
- [23] 王弼. 周易正义[M]. 韩康伯,注. 孔颖达,正义.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
- [24] 金景芳. 周易讲座[M]. 吕绍纲,整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96.
- [25] 释僧祐. 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M]//朱志瑜,张旭,英立波.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卷一.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9.
- [26]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6.
- [27] 金景芳,吕绍纲. 周易全解[M]. 修订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8] 马驭骅,马广惠. 基于交际优先与传播优先原则的文化语言翻译[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36(6):173-180.
- [29] 高亨. 周易大传今注[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49.
- [30] 任运忠.《周易》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216.
- [31] 林金水.《易经》传入西方考略[M]//文史:第二十九辑. 北京:中华书局,1988:374.
- [32] HARKER E, MOORE S, PATSCO L. I Ch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83.

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的殖民延续与文化商品化

王伟卓

(滁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探讨了谢尔曼·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印第安文化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商品化及其异化过程,作品中印第安文化在资本主义逻辑下被简化为可交换的文化符号,成为市场消费的对象。结合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框架,分析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如何剥削和压榨传统印第安文化,及其在商品化过程中文化符号的去历史化与再殖民化。研究表明,印第安文化的商品化不仅延续了殖民历史的文化暴力,也展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对少数族裔文化的重塑和消解。

关键词:文化商品化;《保留地布鲁斯》;殖民延续;文化商品化;印第安性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6)03-0078-05

Colonial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in Sherman Alexie's *Reservation Blues*

WANG Weizh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Anhui)

Abstract: It explored the commodification and alienation in this paper of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in Sherman Alexie's *Reservation Blu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 In the work,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is simplified into exchangeable cultural symbols under capitalist logic, becoming a marketable commodity. Drawing on Hall's theory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Lacan's psychoanalytic framework. This study revealed how capitalist cultural industries exploit and extract value from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It further analyzed the process of dehistoric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commodifica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not only perpetuates the cultural violence of colonial history but also illustrates the modern capitalist remaking and dissolution of minority cultures.

Key words: 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Reservation Blues*; colonial continuity; 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Indianness

在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北美地区,少数族裔文化常被纳入商业体系,成为可流通的“商品”。美国本土裔(印第安人)文化也未幸免于此,资本产业链的各环节都试图将其形象符号化和商品化。现实中,印第安文化的商业化路径通常借助旅游业的景区化运营、民俗表演的观光化包装、时装设计的符号化挪用,以及体育品牌(如堪萨斯城酋长队等)的营销机制,使其文化意象不断被重组为可供消费的商

业符号。例如,北美旅游市场上兴起的“印第安风”凸显了北美旅游业长期忽视当地原住民与土地联结的现实,这些古老而神圣的土地联系常常在文化商品化过程中被摧毁,沦为旅游消费的平台或符号资源,其深层的社会文化与精神联结被淡化或拆散。这一过程在结构上可视为对1887年《道斯法案》(*Dawes Act*)所开启的殖民性土地剥夺逻辑的资本续篇:通过土地分割与私有化摧毁了部落传统的集

收稿日期:2025-10-05

基金项目:滁州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24qd62);安徽省教育厅重点教研项目(2023jyxm0741)。

作者简介:王伟卓(1995—),男,山东菏泽人,讲师,博士。E-mail:wangweizhuo@chzu.edu.cn

体土地制度,为将原住民领土纳入市场交换机制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文学领域,印第安文化的异化现象亦有反映。本研究以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的《保留地布鲁斯》(*Reservation Blues*)为主要文本,研究聚焦印第安文化在现代商业体系中的商品化与消费化进程,考察文学叙事在其中构建的符号逻辑,旨在阐明印第安文化在资本主义符号体系中的被重构与异化方式,并结合相关理论对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审视。

1 文献述评与研究缺口

学界有关美国印第安文学的研究多聚焦于身份认同、殖民后遗症、日常生存等议题,对谢尔曼·阿莱克西作品的研究主题包括种族主义、文化混杂以及印第安青年的成长。已有研究指出阿莱克西就“大众媒介(如电影、电视)对印第安文化的歪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阿莱克西对电视媒介的立场可概括为“唯一比电视里的印第安人更可悲的事情是印第安人在无时无刻地观看电视里的印第安人”^[2]。基于对大众叙事中由类型化的印第安表征所引发的审美疲劳与伦理警惕,阿莱克西在《印第安杀手》(*Indian Killer*)中将媒介与公众的搜寻实践书写为一种以符号驱动的真实生产:“媒体和公众以各种‘印第安符号’为线索寻找杀手,但他们在乎的并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他们认为的真相。”^[3]在此,预设的族裔范式经由识别启发式取代经验性证据,“印第安性”被压缩为可流通的索引与标签,为媒体的惊悚印第安性叙事提供可复制的情节动力。

同时,殖民性暴力的历史沉积使印第安社群对创伤记忆生成了一种策略性遗忘或记忆封存倾向。章茜等指出,阿莱克西笔下的主体常以“埋葬属于印第安民族的历史”的方式暂时封存创伤,维系生存秩序^[4]。与“记忆封存”的路径并行,有学者认为作品通过重编族群边界使跨族裔共在成为可能,并据此构建“泛印第安共同体、印非共同体和印白共同体”^[5]。在另一研究思路中,有学者将《保留地布鲁斯》置于现代化与多元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讨论“生存-发展”命题,强调了该小说体现的“印第安传统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6]。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共同体想象、身体隐喻和身份危机,而对印第安文化被商业吸纳与消费化的作品关注甚少。实际上,阿莱克西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商品元素的描写,比如在《保留地布鲁斯》中,贯穿全文的主线道具吉他及其弹奏技巧正是通过售卖印第安人的灵魂得以购买的:“火堆

先生,我把我的灵魂卖给了那位绅士,好让我弹吉他弹得比任何人都要棒”^[7]⁸,仿佛正是通过商品流通使得印第安文化本土性逐渐湮灭。该小说以“灵魂-吉他-唱片”的隐喻结构,直观呈现了印第安性被编码为可交换符号的过程。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从“印第安表征”转向“表征经济”的分析,进一步考察“媒介-平台-资本”定价、分发并变现“印第安性”方式,从而揭示其被市场化治理所重写的可见性与话语结构。

2 《保留地布鲁斯》的商品化叙事

2.1 《保留地布鲁斯》概述

谢尔曼·阿莱克西的《保留地布鲁斯》讲述了一支由斯波坎保留地的年轻人组成的布鲁斯乐队——郊狼泉乐队(Coyote Springs)的兴衰故事。小说开头,著名布鲁斯黑人歌手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的鬼魂来到保留地,将魔鬼赐予他的吉他留给了部落里的年轻人托马斯火堆(Thomas Builds-the-Fire),触发了一系列超现实和寓言性的事件。乐队成员托马斯(Thomas)、朱尼尔(Junior)、维克多(Victor)等人在经纪人沃伊特(Wright)和谢里丹(Sheridan)的引导下签约骑兵唱片公司(Cavalry Records),进入主流音乐市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文化身份却成为唱片公司操控和利用的工具。乐队最终未能取得成功,而小说高潮部分《都市印第安布鲁斯》(*Urban Indian Blues*)这首曲目的录制则暴露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冲突。整个故事都贯穿着对土著与白人关系的商业化隐喻。如同小说标题所示,这是一部关于“印第安版的布鲁斯”的作品,既寓意保留地生活的悲怆,也象征土著文化被挪用再诠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在资本逻辑中进行的。

2.2 “正宗”的制造与替身的成功:文化工业的生产线

小说高潮之一是沃伊特和谢里丹商议推广郊狼泉乐队商业形象的场景。在一份传真实验室的电传中,白人经纪人向唱片公司高层描述乐队成员的形象:“这个乐队看起来正宗的印第安。他们皮肤黝黑,查斯(Chess)、切克斯(Checkers)和朱尼尔都留着长发,托马斯有一个大鼻子,维克多脸上有许多疤痕……我们可以给他们涂上战斗油彩、戴上羽毛帽,以完全凸显印第安气质。我觉得这个乐队对骑兵唱片公司来说非常有利可图。”^[7]¹⁹⁰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唱片公司的市场策略就是将乐队“商品化”:他们计划将印第安人的身体特征和文化符号作为卖点,通

过服饰和道具满足白人主流社会对“西部牛仔与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这也印证了学界的看法:主流文化长久以来倾向于将印第安人限定在固化的符号之中。从印第安人的视角看,白人唱片公司试图通过“再次印第安化”包装郊狼泉乐队的提议既可笑又伤人:资本家一方面承诺接纳这支乐队,另一方面又打算利用“刻板印第安”形象来获得利益。

对于谢尔曼·阿莱克西来说,小说中乐队成员试图通过唱片打入主流社会似乎是印第安人在21世纪为求生存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然而,阿莱克西对融入主流社会与印第安人生存之间关系的态度是矛盾的。在现实中,无论是印第安人继续迁往城市,还是在部族保留地建立赌场,阿莱克西对此都有着复杂的看法和感受。在《保留地布鲁斯》中,印第安文化纯度的丧失,以及与美国主流文化融合导致身份淡化的恐惧,一直笼罩在乐队成员心头。有学者指出,“在阿莱克西的理解中,融入社会似乎是一种出于经济需求的产物:他称赞‘斯波坎印第安人保留地上的赌场是证明斯波坎人已经拥抱资本主义的证据’”^[8]。在小说中,乐队成员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资本逻辑,他们不仅成为了资本增值的工具,也沦为了利用资本享乐的消费者。

印第安乐队必须被打造成所谓“纯正的印第安人”形象,其个人身份和艺术被简化成一种可以批量加工的文化符号,此处显现了典型的他者化与异化过程。原本在部落语境中极具意义的传统服饰和风俗,在主流看来只是牟利的道具元素。沃伊特在信中提及“给他们涂上战斗油彩、戴上羽毛帽,以完全凸显印第安气质”^{[7]190},并妄图对白人女性贝蒂(Betty)和维罗妮卡(Veronica)施加所谓“印第安性”的包装,使其充当可被替换的文化替身。这种包装并非单向强加,而是与消费侧的既有期待互为回响:乐队的白人粉丝们在追随乐队时把“印第安性”转译为可穿戴购买的文化资本——粉丝们“身上佩戴着过多的印第装饰:绿松石戒指、银质羽毛耳环、串珠项链”^{[7]41}。这表明,印第安文化在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的表征,实际上是一个由意义和市场权力共同塑造的过程。同时,也凸显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功利态度:文化与种族特征不再被视作一种内在价值或历史传承,而是沦为可以包装售卖的“商品”。这种处理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逐利的本质,也是主流社会长久以来对印第安人进行刻板型塑的结果。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曾指出,身份的策略性言说表征涉及“意义的生产、符号的编码、消费的解读等一系列社会文化运

作方式”^{[9]43}。据此,在资本主义文化语境下印第安人的身份往往被简化为可消费的符号或文化商品,呈现出高度表征化和刻板化的特征。在小说中,“正宗的印第安人”并非仅是视觉-话语层面的他者化,而是在以资本收益为核心的娱乐产业链(内容生产-排播-收视/衍生品)中被持续“品牌化”的差异资本。小说中骑兵唱片公司作为娱乐媒体的代表,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为了最大化投资回报,努力塑造低风险的族裔模板,并将“通灵者/野蛮人”等二元神话固化为可复制的叙事模块,使之转化为稳定的娱乐流量与资本竞价筹码。阿莱克西在小说中以现实主义与反讽策略,揭示原住民主体如何在“再表征-再销售”的循环中被迫以规定的形象看待自身。他们不仅被观看,而且被训练去观看并校准自我,由此将殖民话语内化为市场化的自我治理。最终,复杂的主体性被折算为可交换的族裔符码,实现从文化再现到价值增殖的转换。由此可见,资本化语境下的文化商品化不仅是对印第安人身份的再编码,也是权力结构作用下身份策略性呈现的具体实践。

通过资本逻辑进行的殖民延续“逐步渗透到本土意识中,动摇本土信念”并昭示了乐队的最终悲剧^[10]。当乐队被带到纽约时,他们的白人老板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很快便违背了先前的承诺:他宣称乐队“没有音乐天赋”,当场否决了他们的音乐创意,暗示之前一味追求刻板印第安包装而忽视了音乐本身。乐队的音乐最终未能录制出来,而约翰逊的那把吉他似乎也决定在此时背叛维克多,不再为他们的成功保驾护航^{[7]226}。乐队的失败象征着印第安文化在商业逻辑下的无力:当文化被强行纳入以利润为核心的体系时,吉他所表征的内在意义和印第安之声都被破坏或彻底掩盖。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不仅揭示了商品化挪用的残酷现实,也展现了这一过程对印第安群体造成的深度伤害。表面看来,白人文化工业对印第安音乐的剥削似乎只是逐利行为,但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进一步加剧了印第安人在文化再现中的边缘处境和身份危机。当骑兵唱片公司决定用两位经过印第安化改造的白人女子来扮演印第安歌手时,实则是在宣告:真实的印第安人及其声音并未被主流社会真正接受,主流社会更愿意消费的是去除了“麻烦”真实背景的猎奇符号。这与殖民历史一脉相承——昔日白人用军事手段征服和消灭印第安人,如今则通过文化工业来驯化和改造印第安形象。小说由此映射出一种“商品化的殖民主义”:印第安文化符号被收

编进资本主义市场,而印第安主体却被排除在真实的参与者之外,只充当被凝视和消费的客体。

2.3 幻象与毁灭:印第安音乐商品化的文化悲剧

在小说中,当音乐被商品化时,资本逻辑便对印第安主体造成了文化异化和自我裂解。郊狼泉乐队最初将传统布鲁斯与部落音乐相融合,激起了印第安社群和部分白人的共鸣。乐队原创的《部落布鲁斯》承载着印第安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舞台上曾出现“棕色和白色的手同时向上伸展,乞求更多音乐、希望与欢乐”的动人场景^{[7]80}。这种音乐创作原本体现了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与赋权:布鲁斯音乐所蕴含的苦难经验具有跨族裔的共鸣,黑人布鲁斯与印第安人的历史苦难相连接,使印第安人“有资格演奏布鲁斯,并懂得如何将其演奏得淋漓尽致”^[11]。然而,当这种源自底层共鸣的音乐进入商业体系后,却面临被异化为商品的风险。唱片公司并非真正关心音乐背后的印第安文化语境和诉求,他们只在意其商业价值和符号价值。当骑兵唱片公司介入,试图将乐队改造成迎合市场的形象时,音乐沦为噱头,乐队成员的文化表达诉求不得不让位于市场对“印第安风情”刻板偏好的满足^[12]。

这种商品化过程使乐队成员深刻体会到文化被异化的痛苦:他们不再掌握自身文化表述的主导权,而被迫扮演市场需求的“印第安人”。在拉康的理论视角下,这被视作主体在他者凝视下发生的异化:白人主流社会作为“大他者”凝视并界定着印第安音乐的意义与印第安人的身份。乐队成员若试图迎合他者的期待,便难免产生自我分裂的认同危机。小说多处暗示了乐队成员对成名之路的恐惧和质疑:例如,当乐队驱车前往西雅图参加比赛时,托马斯感觉面包车仿佛有意抗拒速度,“不肯超过四十英里”。查斯于是揶揄道,“也许这辆破车才是真正聪明的那个”^{[7]133}。托马斯隐隐担忧成名可能会杀了他们,他不时念叨:“也许我们并不配拥有它。也许我们应该心里装着更好的念头。也许如果我们不把更好的念头放在心上,坏事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7]72}这些细节表明,印第安艺人在追逐商业成功的过程中感受到某种不祥的征兆,仿佛直觉预示着名利的诱惑其实是一种出卖灵魂的危险交易。

这正验证拉康所说的“欲望陷阱”:主体追寻他者所允诺的想象性满足(如白人社会对摇滚明星的认可),结果可能失去自我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即拉康所说的“真实”(the real)。郊狼泉的成员内心隐约明白,若过度沉溺于新自由主义下主流定义的成功幻象,他们的文化根基和自我认同将面临瓦解。

印第安社群内部对乐队的矛盾反应也揭示了音乐商品化带来的族群认同紧张。小说中,当乐队小有名气后返回家乡时,反而遭到族人的抵制和敌视。一些保守的印第安长者和基督教信徒视他们的摇滚乐为“不祥之物”,有人甚至当面指责乐队在演奏“魔鬼的音乐”^{[7]179}。在这些人看来,郊狼泉乐队正在背弃印第安传统:要么堕落为魔鬼的代理,要么已经向白人文化投降。

这种内部冲突源于音乐商品化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印第安音乐人一旦登上主流商业舞台,就会被质疑为通过出卖文化来换取金钱,其身份认同被撕扯在忠于传统与融入主流的对立之间。拉康式的“主体裂解”在此表现为:郊狼泉成员的自我被割裂成无法调和的两个形象——一个是渴望保留地文化认同的“本真自我”,另一个是面向白人社会舞台的“表演自我”。当后者愈发商品化、异化,前者便愈发感到遭受背叛、支离破碎。可以说,印第安主体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制度-媒介-市场复合体的凝视与规训下被召唤为可识别的“镜像/小他者”。这使他们持续处于一种混杂而矛盾的文化处境:一方面被迫对接主流模板并模仿其可消费的表述形式,另一方面又需维系部落传统与内部规范。二者在文化商品化过程中相互纠缠并发生冲突,从而推动小说中主人公几位印第安人身份同一性的裂解。

在小说高潮部分,这种主体裂解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乐队在纽约录音室的试音以失败告终,成员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与个人内心的创伤一同爆发。主音吉他手维克多对自身才华的信心完全建立在魔幻吉他的附体之上,一旦吉他反常进行“反抗”使他无法演奏,维克多便立刻失去了支撑自我的成就感和身份认同,暴露出主体内在的空洞与脆弱。鼓手朱尼尔则在回到保留地后选择自杀,结束了饱受心理创伤的生命。可以说,当音乐商品化的幻梦破灭之后,郊狼泉乐队也随之解体:成员有的肉体消逝,有的精神崩塌,还有的带着伤痕逃离了故土。保留地音乐逐渐丧失了共同体意义,受制于景观化与市场生存逻辑,最终滑向主体裂解与创伤复燃——这与小说中作为共同体伦理象征的祖母(Big Mom)所言的“音乐本应具有治愈的力量”形成鲜明的反讽对照^{[7]208}。小说通过这一悲剧性结局印证了其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于殖民历史的受害者而言,试图通过主流商业渠道实现自我价值,往往迎来的只是主体的再度受创与裂解。这既是对资本逻辑冷酷本质的揭露,也是对印第安文化在不平等文化结构中陷入艰难处境的悲凉写照。

3 结论

通过对《保留地布鲁斯》的研究,揭示了印第安文化在当代资本主义商业体系中被商品化、异化的深层机制及其影响。小说生动刻画了主流白人资本将印第安身份符号化为猎奇的“商品”:郊狼泉乐队被唱片公司视作可牟利的“印第安”展示品。公司为了迎合市场的刻板印象,要求乐队成员涂上战斗彩绘、佩戴羽毛头饰,包装出“正宗印第安”形象;当乐队无法带来预期收益,资本便迅速将其抛弃,转面用经过商业改造的白人“伪印第安”取而代之。这一过程凸显出主流文化工业并非真正关心印第安人及其真实声音,只是需要一个安全可控且符合想象的“印第安”符号来迎合市场需求。正如小说所暗示的,殖民时代的种族灭绝如今在文化领域通过主流社会对印第安元素的挪用与商品化得以延续——曾经的武力征服被转化为对印第安符号的征用和消费。在资本导向的媒介和市场机制下,小说后半部呈现出郊狼泉乐队成员等印第安主体身份认同的结构性失序与分化:他们被迫以殖民者建构的形象来审视自身,并逐渐将这种外部凝视内化,最终导致自我认同的异化和迷失。而这一主题亦在阿莱克西其他小说(如《印第安杀手》)和其他本土裔作家的作品中有广泛体现,如厄德里克《爱药》中的“印第安历史和政治书写”^[13]。《保留地布鲁斯》中郊狼泉乐队成员追逐商业的曲折经历也恰是这一理论图景的写照:为了迎合主流期待,他们付出了丧失文化表达自主性的代价,最终不仅音乐创作被扭曲,个人也陷入身份危机与精神崩溃,其极端后果便是朱尼尔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阿莱克西通过这一悲剧性故事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印第安文化的吞噬与压榨,从而揭示了商品化语境下少数族裔文化生存的严峻困境及其付出的惨痛代价。

本研究审视《保留地布鲁斯》中的资本逻辑,拓展了人们对印第安文化身份建构与异化机制的理解深度,补充了当前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在“文化商品化”议题上的不足。通过文本解读与文化表征理论、精神分析视域相结合,解析印第安文化在殖民历史与当代商业力量的交织作用下,被形塑为一种被消费的他者形象。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阿莱克西作品批判内涵的认识,也为审视少数族裔文化在市场主导的符号体系中遭遇异化的普遍现象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保留地布鲁斯》以寓言式的艺术手法警示我们:当少数族裔文化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流通网络,其本真性和主体性便面临被掏空的风险。作

为殖民治理的当代表述,新自由主义以全球资本逻辑将少数族裔文化纳入表征经济,在“大他者”的凝视下将之转译为可交换的能指序列,并以商品形式消解其历史的厚度与主体能动性。只有收回表述主权,拆解维系消费的“正宗性”幻象,并对“符号——商品”的规训机制予以制度性和实践性抵抗,印第安民族文化才能在新自由主义洪流中免于被边缘化,维系其文化尊严与历史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刘克东. 重塑印第安新形象——美国当代印第安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述评[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 17(3): 59-64.
- [2] COX J H. Muting White Noise: Revisionary Native American Novelists[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99.
- [3] 杨宗良, 李保杰. 《印第安杀手》中的犯罪种族想象与印第安性超越[J]. 当代外国文学, 2023, 44(1): 30-37.
- [4] 章茜, 郑佳. 民族身份的堡垒——论《保留地布鲁斯》中的“记忆之场”[J]. 外国语言文学, 2021, 38(4): 437-445, 448.
- [5] 王韬媛, 刘克东. 印第安人的出路——谢尔曼·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共同体的形成[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2): 95-102.
- [6] 赵文书, 康文凯. 十字路口的印第安人——解读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的生存与发展主题[J]. 外国文学研究, 2017, 39(1): 20-30.
- [7] ALEXIE S. Reservation Blues[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5.
- [8] KEEGAN J. “Y’ all Need to Play Songs for Your People”: Preservation versus assimil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Indian encounter in Sherman Alexie’s fiction[J]. 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 1999(39): 115-134.
- [9] 程熙. 斯图亚特·霍尔: 表征的运作[J]. 世界文学研究, 2016(2): 42-46.
- [10] 邱清. 从后殖民角度论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的文化融合[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3): 87-89.
- [11] CAIN M C. Red, black and blues: Race, nation and recognition for the bluez[J]. Canadian Journal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6, 33: 1-14.
- [12] RASMUSSEN K. The paradox of Sherman Alexie’s Reservation Blues [C/OL]. Amsterdam: Rozenberg Publishers, 2010[2025-11-05]. <https://rozenbergquarterly.com/issaproceedings-2010-the-paradox-of-sherman-alexies-reservation-blues/>.
- [13] 孙胜忠, 高立新. 厄德里克《爱药》中的印第安历史和政治书写[J]. 当代外国文学, 2024, 45(4): 5-11.

副文本视角下李文俊汉译福克纳小说的隐性操控行为研究

冯传振, 申丹*

(广州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40)

摘要:基于译者行为理论与副文本理论, 聚焦李文俊汉译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 探究译者如何通过显性副文本和隐性副文本实施隐性操控行为。研究发现, 副文本是译者实施隐性操控行为的关键载体: 在显性层面, 李文俊以四百多项脚注解文化专有项, 降低阅读难度, 引导读者理解方向; 在隐性层面, 作为文化中介者, 他以归化策略拆分英语长句、置换文化符号, 含蓄化处理敏感内容, 在求原作叙事风格之真和务中文阅读习惯之实之间达成动态平衡。该操控行为源于学者与编辑的双重身份与读者导向的考量, 本质是译者主体性与社会语境互动的产物。

关键词:译者行为理论; 副文本; 李文俊; 隐性操控行为

中图分类号: H315.9;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6)03-0083-06

Paratextual Perspective on the Implicit Manipulation in Li Wenjun's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Faulkner's Fiction

FENG Chuazhen, SHEN 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40, Guangdong)

Abstract: Based on Translator Behavior Theory and Paratext Theory, it focused on Li Wenjun's Chinese translation William Faulkner's ficti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in this paper, examined how the translator employed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paratexts to enact implicit manipulative practice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paratexts served as the key vehicle for the translator's implicit manipulation: on the explicit level, Li utilized more than four hundred footnotes to explain culture-specific items, reducing reading difficulty and subtly guiding readers' comprehension; on the implicit level, acting as a cultural mediator, he adopted domestication strategy to split long English sentences, replace cultural symbols, and soften sensitive content, strik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preserv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riginal narrative style and accommodating Chinese reading habits. The motivation behind such manipulation stemmed from the translator's dual identity as scholar-editor and a reader-oriented translation approach, while its nature reflec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and the broader socio-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theory; paratext; Li Wenjun; implicit manipulation

翻译研究自文化转向以来, 其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式经历了显著拓展。学界开始重视译本外部资料的研究^[1]和译者的文化身份^[2]。译文正文不再是唯一研究对象, 译者也不再是“隐身”状态。目前,

以副文本为切入点的翻译研究, 已成为揭示译者行为复杂性的有效路径; 而译者行为理论作为“基于人本、兼顾文本的动态研究”^[3], 则为系统考察译者行为的社会性动因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二者的

收稿日期: 2025-12-1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CWY21); 广州市社科规划项目(2024GZGJ218); 广州理工学院基金科研项目(YBR2025018)。

作者简介: 冯传振(1998—), 男, 广西钦州人, 助教, 硕士; 申丹(1981—), 女, 湖南邵阳人, 教授, 硕士。E-mail: 148349568@qq.com

结合,为深入剖析翻译实践中的隐性操控行为提供了新的可能。此处所指的“操控”,不同于操纵学派强调的意识形态强制内涵的“操控/操纵”,是中性的描述性概念,强调的是译者基于翻译目的,在文本内外采取的建构、引导、调试、干预等策略性努力,旨在客观解释并揭示译者主体行为机制。

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是西方现代文学代表,书中意识流技法“晦涩难懂”^[4],造成了翻译难题。资深翻译家李文俊的汉译本,协调并再现了原作中繁复的叙事结构与独特的文化异质,“是我国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成功典范”^[5],极具研究价值。然而,现有研究对李文俊借助副文本实施的隐性操控行为,尚未进行系统性的剖析。

本研究拟融合副文本与译者行为理论,聚焦李文俊汉译《喧哗与骚动》,从副文本切入,探究译者的隐性操控行为,并分析其背后的动因与接受效果,以期为李文俊汉译福克纳小说及相关批评研究提供借鉴。

1 理论框架

为系统解析李文俊汉译福克纳小说中的隐性操控,本研究整合副文本理论与译者行为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前者为考察译者行为提供对象,后者为阐释行为动因提供依据。基于此,明确界定翻译中的隐性操控行为。

1.1 副文本理论概述

副文本概念由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提出,是指“在正文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6]。在翻译研究中,副文本是“将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7]。英国学者巴特勒进一步发展了副文本概念^[8],将其分为标题、序言、注释等显性副文本,以及译者的选择、策略、处理等隐性副文本。该理论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但目前大部分翻译副文本研究“缺乏相关理论支撑,因而常常显得泛泛而谈,没有什么说服力”^{[1]98}。因此,在相关研究中结合可靠理论框架进行深入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1.2 译者行为理论概述

译者行为理论是扬州大学周领顺教授提出的本土翻译理论,可用于系统考察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呈现与策略选择。该理论旨在“为翻译文本生成的译内环境和译外环境、译文的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译者的语言人身份和社会性角色、翻译和非译以及译者行为合理性进行

描写和解释”^[3],将译者视为文本层面中操作的语言人和社会文化中行动的社会性人。基于此视角,副文本作为译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痕迹,是“研究译者行为的绝佳材料”^{[1]94}。将副文本理论与译者行为理论相结合,前者为观察译者行为提供文本载体,后者则为分析其行为背后的动因和社会文化因素提供了理论框架,二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揭示翻译活动中隐性操控行为的有效分析路径。

1.3 翻译中的隐性操控行为

笔者将隐性操控行为界定为:译者通过显性与隐性副文本的手段,较为隐蔽地对译文的意义阐释框架、情感价值倾向、文化意识立场等方面进行调节与重构的行为,旨在实现传播推广、文化认同或经典建构等翻译目的。需要明确的是,显性副文本虽形式易见,但并不具备强制或剥夺特性,其核心功能在于提供背景信息和权威解读,潜移默化地塑造读者的理解路径,仍归属于隐性操控行为范畴。此界定侧重于译者行为的能动性调节,即在多重因素条件下平衡“求真”与“务实”,以及译文效果达成的间接性和非强制性,区别于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强制介入。

隐性操控行为通过双重路径实现:首先利用序言、注释、译名等显性副文本实施隐性认知引导,具体表现为建构阐释框架、引导读者认知、存留文化意蕴;其次通过内化于语言层面的隐性副文本,实施隐性的文本调适与意义重构,具体表现为句式归化调适、文化意象疏通、叙事标点干预文本内部的策略性调适。此双重路径为系统分析李文俊汉译《喧哗与骚动》的隐性操控行为确立了明确的分析维度。

2 副文本的隐性操控行为策略

基于前述理论,李文俊在汉译《喧哗与骚动》中实施的隐性操控行为,具体表现为显性与隐性副文本的双重策略:既作用于边缘文本材料,也渗透于译文语言深层调适。综合考察这两类副文本,能够揭示其所实施的精微而深刻的隐性操控行为。

2.1 显性副文本的操控行为策略

李文俊通过序言、注释与译名三种显性副文本,有策略地铺设了通往福克纳复杂文学世界的预设理解路径。

2.1.1 序言建构框架

原著并未附有任何序跋类文字,而是将文本的阐释权完全交由读者。与此相对,李文俊在译本中添加了长篇译序,构成了干预性而非强迫性的隐性操控。“译序”具有广阔的言说空间和指涉范围^{[9]72}。但此序绝非简单的背景介绍,而是精心构

建的权威阐释框架。序中系统梳理了作者生平、历史语境与意识流叙事技法,并将小说主旨归结为“南方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和人性的复杂性”,从而在阅读行为发生之前,已为读者预设了理解路径与阐释方向。

序言框架在文本解读上“为‘意识流’等现代派文学手法编撰了‘学习指南’”^{[9]83},还在意识形态与诗学层面“为新时期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确立了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合法性’”^{[9]83}。序言建构框架能降低意识流文本固有的阅读门槛与不确定性,引导读者沿译者设定的社会历史与人性剖析路径进入文本。然而,这种强有力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会窄化文本原本开放的阐释可能性。李文俊对此亦有警觉,他曾指出,“在读者未读原著的情况下请他们先看太多的有关评论,恐贻本末倒置之讥”^{[9]78}。这正反两方面的考量,折射出译者在求保留文本灵魂之真与务建构阐释权威之实之间的微妙平衡。

2.1.2 注释引导认知

序言是宏观框架建构,遍布全书的400多处脚注,则是李文俊实施微观层面认知引导的密集工具。注释主要具有文化认知引导与叙事认知引导功能。文化注释致力于转化陌生文化专有项,移除理解障碍;叙事注释则直接干预意识流叙事,明晰时空定位。

例1:It was on Decoration Day, in a G. A. R. uniform, in the middle of the parade.^{[10]54}

译文:那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他穿了一套G. A. R. 的制服,走在游行队伍里。(脚注:G. A. R. 为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的缩写,意为“共和国大军”,为内战后形成的退伍军人组织。)^{[11]87}

此例涉及美国历史文化专有项G. A. R.。李文俊采取了零翻译加脚注的翻译策略,保留源语G. A. R.,并辅以脚注解释其全称、内涵与相关历史背景,从而将原文中依赖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概念,转化为中文读者可直接把握的意义,在微观层面完成跨文化理解的初步引导。原著中存在大量《圣经》典故、基督教词汇及美国南方特有的习俗描写,面对这类文化负载表达,李文俊的文化注释实践能够减少读者的文化接受障碍,引导其在异质语境中建立理解路径,彰显了译者通过副文本实施文化认知调控的隐性操控。此类文化注释是译者以自身学术性提供的信息补偿,将读者可能产生的多元化和个人化解读,引导至相对统一的认知路径上,提高了译文接受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控性。

例2: The cows came jumping out of the

barn.^{[10]67}

译文:那些母牛奔跑着从牲口棚里跳出来。(脚注:回到“当前”。他们俩又走到牲口棚前,使班吉勾起了下面那一段回忆……)^{[11]95}

此例体现的是李译本中最为突出的叙事注释。全文脚注共“有260多个注解用于提示情节和时空的转换”^{[12]38}。原文中班吉的意识受外部环境牵动而跳跃,叙事在现实和回忆之间跳转,这是意识流技法的典型特征。李文俊使用脚注“回到‘当前’”,明确标识出时空转换节点,“他在译文中选用了‘直译+注解’的方法,既保留了原著中意识随意流动的形态,又为读者理解作品提供了帮助”^{[12]80}。该注释针对原文中依赖人物意识自由流动而缺乏明确时空标记的叙事特点。李文俊的叙事注释实践可帮助读者克服意识流叙事的时间理解障碍,体现出译者通过副文本实施时空认知调控的隐性操控。此类叙事注释在译文中广泛介入,是对福克纳意识流叙事美学的隐性规训,用外部清晰的线性时序逻辑梳理混沌的心理时间流,虽不可避免地稀释了阅读挑战与心理真实感,但提升了文本的连贯性和可读性。

2.1.3 译名存留意蕴

译名是显性副文本作为隐性操控行为载体的典型体现。书名作为作品的第一个副文本,是奠定整体基调、引导意义期待的关键。李文俊将*The Sound and the Fury*译为《喧哗与骚动》,并非简单字面对应,而是通过保留《麦克白》中的文学典故,传递原文的悲剧底色。“喧哗”与“骚动”二词映射出小说中家族的内部纷争与人物的内心动荡。译名的存留体现了李文俊对原著经典属性的再生产与价值导向的调控,通过互文在求语义之真与务文化之实间,实现了对原著经典地位和原著书名的内在韵味的隐性维护,从而在副文本的起点处,将作品纳入了悲剧序列,并悄然塑造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框架。

2.2 隐性副文本的操控行为策略

李文俊还通过句式、文化、意象及叙事等层面的调适,对译文文本进行了更为隐蔽但也更为深入的重塑。

2.2.1 句式归化调适

福克纳意识流文体的标志在于大量的繁杂形合句子,旨在模拟作品人物纷扰叠涌的意识活动与南方社会滞重压抑的社会氛围。面对此类表达方式,李文俊采用句式归化调适策略,将原文繁杂长句拆解并重组为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短句与动态意群。

例3:I could smell the curves of the river beyond the dusk and I saw the last light supine and tranquil

upon tide flats like pieces of broken mirror, then beyond them lights began in the pale clear air, trembling a little like butterflies hovering a long way off. [10]99

译文:隔着苍茫的暮色我能嗅出河湾的气味,我看见最后的光线懒洋洋而平静地依附在沙洲上,沙洲像是许多镜子的残片,再往远处,光线开始化开在苍白澄澈的空气中,微微颤动着,就像远处有些蝴蝶在扑动似的。[11]186

原句用 and 和 then 连接多个分句与意象,结构紧凑。李文俊将其拆解归化为逗号分隔的意群短句,动态化关键表达,并增补“就像”等比喻词,使译文顺应中文的叙事节奏。这些语言转换操作本身,并非显性的标注或说明,而是通过译者对语言形式的主动重构实现,隐匿于句法形态的转换语言之中,构成了隐性操控行为。此归化策略也体现了李文俊的翻译主张,即在忠于原作“灵魂”的前提下,“译文应当‘归化’,符合中国多数读者的阅读水平”[12]40。在此例中,隐性操控行为旨在无形悄然消解句法障碍,使意识流文本获得汉语行文的表达习惯和阅读时的呼吸节奏。此类句式归化调适超越了简单的语言转换,是对源文本的行文节奏和思维密度以及文字背后的社会氛围的隐性重塑,使福克纳绵密的叙述语言更贴近汉语读者对文气通畅的期待。

2.2.2 文化意象疏通

福克纳小说中具有浓郁的美国南方历史文化底色,原文包含有许多西方文化专有项、宗教典故、伦理禁忌及方言俚语。面对此类文化词汇,李文俊的应对策略是文化意象疏通,即通过弱化、置换等方法,化解文化隔阂,并尽量保留文本异质性。

例4:and so was able to have the creature castrated before the mother even knew it was out of the house ... [10]184

译文:而且在母亲连白痴有没有出家门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弟弟做了去势手术。[11]354

原文涉及对身体施加暴力的直白描述 castrated (阉割)。李文俊将其译为“去势手术”,将带有强烈生理与情感刺激的词汇,替换为相对中立的医学专业术语,悄然转换了表达范式,构成了隐性操控行为,旨在通过遣词弱化原文敏感内容带来的感官冲击,使译文更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尺度与读者的心理承受预期。此类弱化文化意象策略体现译者处理敏感内容的谨慎态度和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伦理和接受度的考量。

除此之外,李文俊的隐性操控也延伸至人物语言的层面。为再现原文中的种族与阶级方言特征,

李文俊常借助汉语内部的语域差异进行置换。例如对黑人方言的处理:

例5:“That’s three, thank the Lawd.” Roskus said, I told you two years ago. They aint no luck on this place. [10]24

译文:“这就是仨了,老天爷啊。”罗斯库司说,“两年前俺跟你们说过的。这个地方不吉利。”[11]33

李文俊在翻译中常借助方言塑造人物,其“译文中穿插多个地方的方言(主要是粤语、上海话及北京话)”[12]40。原文通过非标准拼写 aint、lawd 等口语化表达词语塑造黑人仆役罗斯库司的语言身份。面对此语言特征,李文俊将黑人奴隶阶级英语置换为汉语北方方言,将“I”译为方言词“俺”,将“aint no luck”转化为俗语“不吉利”。此操作将源语中基于种族与阶级的社会语言标记,无痕地置换为目标语中基于地域与口语差异的语言标记,构成了隐性操控行为,旨在让目标语读者能够凭借自身的文化认知框架,快速把握人物的社会地位与话语风格。此类置换文化意象策略体现了李文俊处理他者文化信息的逻辑,即通过语域置换或在目标语文化体系下寻求功能对等项,将陌生文化符号转化为汉语读者可即刻识别的样式,完成语言、人物和场景的再构,使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心理。

2.2.3 叙事标点干预

无标点意识流段落是福克纳作品中激进的叙事实验。此类文本摒弃标点,以词语的流动模拟意识的混沌状态,即使对母语读者也会构成阅读挑战。面对此形式实验,李文俊的应对策略是叙事标点干预,仅在意识转换的关键节点借视觉分隔符号进行介入,而整体保留无标点语流以维持原著叙述风格和表现力。

例6: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even that long for a man of courage and he do you consider that courage Yes sir don’t you and he every man is the arbiter of his own virtues whether or not you consider it courageous is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the act itself than any act otherwise you could not be in earnest. [10]174

译文:——于是我说它也没有占上风如此之久对一个有勇气的人来说——于是他说你认为那是勇气吗——于是我说是的父亲你不认为是吗——于是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道德观念的仲裁者不管你是否认为那是勇气反正它比那行动本身比任何行动都重要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是认真的——[11]234

此例属于原著中典型意识流独白,特点是缺乏标点、思绪缠绕、时空跳跃。面对此叙事实验语句,

李文俊整体上保留原文无标点的连续词语流,力求意识流实验形式之真,但在人物内心对话或思绪发生明显切换的接口,则谨慎使用破折号。该操作与“在角度转换和时空变更时,李文俊也用不同字体标注”^{[9]93}的逻辑相同。破折号并非语法标点,不打破断语流整体性,仅作为轻微的节奏提示,构成了隐性操控行为,旨在为读者在意识混沌的阅读中提供认知依托,使其既能体验原文的心理真实,也能识别意识的跳转。此类叙事标点干预极简和克制,规避了常规标点对思维流的明显切割,在不改变意识流叙述的前提下,为读者提供了认知节点,体现了译者在忠实于形式和兼顾阅读接受性之间的调和。

3 隐性操控行为的动因与接受效果

李文俊在《喧哗与骚动》译文中构建的隐性操控行为体系,不仅是多重译者身份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互动的必然产物,还与译本的接受效果密切相关。下文从译者行为理论中的“翻译外”分野切入,对译者身份、社会语境及接受效果展开剖析。

3.1 译者身份:学者编辑的双重融合

李文俊的隐性操控行为,根植于其学者与编辑双重身份的深度交融,其汉译福克纳小说是集研究、阐释与传播于一体的综合实践。时任《世界文学》编辑的李文俊既是福克纳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别具匠心的翻译家^{[9]93}。作为学者,他经历了“译、介”同步的创作阶段,“编译了重要的《福克纳评论集》,并撰写了分析福克纳文学创作艺术和思想的学术性文章,为国内‘福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9]63},译本与副文本因而获得了内在的学术权威性。而其编辑身份则塑造了其读者意识,“身兼‘译者’与‘编辑’两重身份,他常常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与对作品及作家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家和他的作品”^{[12]40}。学者身份驱使其求真于原作的复杂性,编辑身份则要求其务实于传播的有效性,二者合力通过副文本实施隐性操控行为,“充分表现出译者成熟的翻译思想和读者意识”^{[9]64}。双重身份的叠加,使李文俊的翻译实践兼具学者的“深度理解和阐释”和编辑的“读者定位与接受”,为隐性操控行为提供了底层动力。

3.2 社会语境: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期待

李文俊通过副文本实施隐性操控的行为,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密不可分。彼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迫切需要接触世界和走向世界,“西方文学作品不再被视为‘毒草’”^{[5]57},文学界渴望引进现代派以革新创作,但读者的期待视野仍难

以摆脱现实主义传统。为此,李文俊借助副文本进行必要的文化协商,回应了时代文化诉求和文学系统需求。“李文俊的评述既规避了影响传播的不利因素,又契合了当时外国文学接受的大趋势。”^{[5]58}具体而言,其详尽的译序与注释将意识流等先锋形式置于美国南方社会历史框架中阐释,有效地削弱了文本的激进性,使得作品更易被强调社会内涵的批评话语所接纳。李文俊的译介,贯彻了“译文应该符合时代的潮流,应该符合各个时代的语言”^{[12]40}的务实要求,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合法引介构建了关键桥梁,深刻影响了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创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滋养。

3.3 接受效果:经典成功与阐释限定

李文俊的隐性操控行为产生了复杂的接受效果,其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奠定了福克纳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地位。他所构筑的副文本系统,降低了阅读门槛,将福克纳的现代主义文学经典成功引入更广泛的视野。李文俊译本“逐步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和青睐,学界依据它进行学术研究”^{[5]59},标志着其译本获得了权威认可。这完整地实现了“译文既要忠实于原文,译文本身也应该是一篇好文章”^{[12]39}的理想,也推动了李文俊的翻译实践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转向。然而,副文本及其背后的隐性操控行为,或有压缩开放性解读空间之嫌。福克纳叙事风格的先锋性与意义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收束于社会历史批评的维度,原著的叙述和艺术风格被相对弱化。由此可见,译者隐性操控既可能促进经典的传播和建构,也可能会收窄文本的开放性和接受边界。经典的构建与阐释的限定呈现出一体两面的关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译者求真与务实相互权衡的必然结果。

4 结论

本研究融合副文本与译者行为理论,系统剖析李文俊汉译《喧哗与骚动》中的隐性操控行为。研究表明,副文本是译者实施隐性操控的关键载体。李文俊凭借学者与编辑的双重身份,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通过序言、注释等显性副文本建构权威阐释框架与认知引导,借助句式归化、文化疏通等隐性副文本对文本进行文化协商和深层调适。该行为本质上是在求真于原作现代主义叙事实验与务实于目标语读者接受习惯及时代文化需求之间进行的动态平衡。其翻译实践不仅成功促成了福克纳在中国的经典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以经典化构建与阐释性限定的一体两面效果,揭示了翻译作

为文化斡旋与意义重构活动的复杂性与历史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研究语料或结合读者接受实证材料,对通过副文本实施的隐性操控行为及其影响进行量化考查,以深化对译者行为机制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刘虎. 国内翻译副文本研究回顾(2008—2019):问题与对策[J]. 外国语文研究, 2020, 6(6): 91-103.
- [2] 云中泓. 中西翻译比喻中译者社会地位的历史考察[C]//东北亚语言学文学与翻译专题征稿论文集(二). 沈阳:沈阳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5: 667-677.
- [3] 周领顺. 中西译论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J]. 外语研究, 2026, 43(1): 1-7, 50.
- [4] 朱振武, 郭宇. 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1, 32(2): 73-79, 139-140.
- [5] 李方木, 丁志强. 《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本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1, 38(1): 56-59, 64.

(上接第7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2-08(1).
- [2]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 40周年增订精装版[M]. 卢允中, 张岱云, 陈复加, 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37-38.
- [3] 单丽. 新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建立研究[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 7.
- [4] 李文堂. “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重建[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7): 4-6, 204.
- [5] 王一彪. 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光明日报, 2024-05-31(11).
- [6] 臧峰宇.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8): 28-33, 205.
- [7] 孙正聿.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332(8): 22-27, 204-205.
- [8]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修订版.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61.
- [9]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修订版.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76.
- [10] 项久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源、价值根柢与实践根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6): 1-8, 155.
- [11]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25(2).

- [6] GENETTE, Ge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
- [7] KOÇAK, Müge. Problematising Translated Popular Texts on Women's Sexual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ject in Turkey from 1931 to 1959 [D]. Boğaziçi: Boğaziçi University, 2007: 63.
- [8] 叶柳倩, 曹雨薇, 赵霞. 副文本视角下《洗冤集录》翟理斯译本译者行为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3, 29(2): 311-315, 319.
- [9] 王春. 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 [10] FAULKNER, William. The Sound and the Fury [M]. New York: Vintage, 2011.
- [11] 威廉·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M]. 李文俊,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12] 王艳艳. 翻译家李文俊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责任编辑: 徐雪莲

- [12] 孔子及其弟子. 论语·雍也[M]//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论语注译. 修订版.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65-66.
- [13] 姚一娴. 共同富裕观下智慧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的经验和启示[J]. 可持续发展, 2023(2): 710-715.
- [1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新办举行《关于坚定不移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步伐的意见》发布会[EB/OL]. (2026-01-05)[2025-11-2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60105/519b5a0ca2e741859bca7ecde63c2b58/c.html>.
- [15] 人民网. 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两周年累计发送旅客超 1200 万人次[EB/OL]. (2025-10-17)[2025-11-24]. <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5/1017/c1002-40584273.html>.
- [1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6.
- [17] 习近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 求是, 2019(1): 4-8.
- [18]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1).
- [19] 凌伟强, 王虎学.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人学透视[J]. 江淮论坛, 2025(5): 15-22.
- [2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8.
- [21] 人民网. 中医药文化讲座走进马耳他中学课堂[EB/OL]. (2023-04-25)[2025-11-22].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425/c1002-32673333.html>.

责任编辑: 谢政伟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探索与实践

张金波^{1*}, 胡旭焕², 施明华¹, 李国成¹

(1. 皖西学院 金融与数学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12; 2. 湖北大学 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解析几何课程的空间曲面、向量运算等内容抽象性强, 在传统教学中难以直观呈现, 制约了教学质量与学生空间想象能力的提升。针对上述问题, 系统研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 分析了应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并从教学理念、课程融合与实践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策略。研究表明,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有效突破传统静态教学局限, 强化代数与几何的内在联系, 为高校数学课程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 解析几何课程; 可视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42; G434; O1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6)03-0089-06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Visual Teaching in Analytic Geometry Course

ZHANG Jinbo^{1*}, HU Xuhuan², SHI Minghua¹, LI Guocheng¹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Mathematics,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237012, Anhui;

2. School of Business,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Hubei)

Abstract: Analytic Geometry course's contents such as spatial surfaces and vector operations are highly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o be intuitively presented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which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s' spatial imagination ability. To address the above problems,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visual teaching of the course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were analyzed,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philosophy,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effectively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static teaching,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algebra and geometr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mathematics courses.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alytic Geometry course; visual teaching

解析几何课程是高校理工科重要的基础课程, 其核心内容如空间曲面、曲线与向量运算具有高度抽象性^[1]。传统教学依赖静态图示与公式推导, 难以帮助学生建立代数方程与几何图形之间的直观联系, 不仅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理解受阻, 也限制了对其空间想象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效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多模态生成与智能交互能力, 为破解这

一教学瓶颈提供了有效途径^[2-3]。它能够将抽象的数学对象转化为可动态调控、可交互探究的可视化内容, 进而推动教学范式从静态向动态转变。

具体而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破解和革新两个方面: 其一, 破解抽象知识的直观化难题。它可根据教学指令, 快速生成精准的二维、三维几何图形, 并支持参数实时调整^[4] 从而有

收稿日期: 2026-03-03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24aijy329, 2022jyxm1747); 皖西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wxxy2024125)。

作者简介: 张金波(1980—), 男, 安徽霍山人, 副教授; 胡旭焕(1997—), 男, 安徽合肥人, 博士研究生。E-mail: 534145433@qq.com

效弥合抽象公式与直观感知之间的鸿沟,切实提升了学生对抽象知识点的理解效率^[5]。其二,革新以知识灌输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构建沉浸式、探究式学习环境,引导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者^[6-7]。学生可自主设计参数、观察几何规律、验证数学猜想,在此过程中深化对几何概念的理解,同步培养探究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

然而,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应用边界模糊、与教学规律适配不足、伦理风险凸显等现实问题。为此,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课程可视化教学的深度融合,系统分析其应用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而从教学理念、课程融合、实践策略等多维度构建系统化应用框架,以期为推动教学范式变革、培养适应智能时代需求的创新人才提供实践参考。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随着高校教育数字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逐步深化,ChatGPT、Midjourney、GeoGebra AI 版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已逐步进入课堂^[8-9]。鉴于解析几何知识的抽象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部分高校和一线教师尝试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解析几何课程教学。

1.1 应用场景从零散演示向局部融合逐步推进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已突破单一知识点演示的零散状态,逐步向核心重难点模块融合推进。多数教师会针对空间曲面与曲线绘制、向量运算的几何意义、坐标变换等重难点模块,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和 Matlab 开展动态演示教学,让抽象知识的呈现更直观、更生动。在空间曲面教学中,教师可通过 GeoGebra AI 版输入椭圆抛物面方程 $z = \frac{x^2}{a^2} + \frac{y^2}{b^2}$,快速生成三维动态图形,学生通过调整参数的数值,实时观察图形的缩放、拉伸变化,同时可切换视角查看曲面不同维度的形态,直观理解参数对曲面形态的内在影响。在向量运算教学中,针对向量加减、数量积的几何意义这一难点,教师可借助 ChatGPT 生成动态仿真脚本,演示两个向量的平移、叠加过程,以及数量积对应的投影关系。学生可自主调整向量的方向与长度,观察运算结果的实时变化,突破空间想象障碍。

部分高校还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操作融入课程实践环节,让学生通过简单的人机交互,完成几

何图形的生成、参数调控与规律探究。同时,部分高校开始尝试将 AI 相关几何案例融入教学场景,例如在坐标变换章节引入相机成像模型演示,在向量投影章节引入 PCA 降维可视化案例,逐步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与 AI 相关教学内容的结合,推动应用场景向更贴合时代需求的方向拓展。

1.2 教学理念逐步向直观化、探究化、智能化转变

在解析几何课程教学中,以往教师多注重公式推导的严谨性与解题技巧的训练,教学理念偏向知识传授,忽视了学生的直观感知与能力培养,也未能关注 AI 时代对学生算法思维、跨学科应用能力的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引入,推动教师的教学理念发生根本性转变。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注重在教学中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动态演示与智能交互,引导学生观察几何规律、开展探究性学习,逐步形成直观演示、智能交互、自主探究、规律总结的新型教学理念。例如,在二次曲线化简教学中,教师通过 ChatGPT 和 GeoGeb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不同类型二次曲线的动态化简过程,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化简参数的选择依据,总结不同曲线的化简规律,实现从被动听讲到主动探究的转变。同时,注重在教学中渗透算法思维,引导学生思考几何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契合 AI 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1.3 应用工具与教学资源逐步丰富化、适配化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优化,针对数学教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逐步丰富,适配性也不断提升,其功能设计贴了解析几何课程的教学特点与需求,进一步强化了技术与教学的关联性。一方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通过优化算法,可快速生成解析几何课程相关的可视化图形、探究案例与教学课件。例如,教师通过 ChatGPT 输入“解析几何课程中向量积的几何意义教学案例”,即可快速获取包含动态演示思路、探究任务设计、习题配套的完整教学方案,直接适配课堂教学需求。另一方面,专业数学可视化工具逐步升级,新增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可根据解析几何课程教学需求,生成精准的几何图形、动态仿真过程与个性化探究任务,贴了解析几何课程教学的实际需求。例如,GeoGebra AI 版新增了解析几何课程专属模块,可根据教师输入的知识点自动生成动态演示图形,支持参数实时调整、轨迹追踪等功能,完美适配课堂教学中的直观演示与学生探究需求;Matlab 的 AI 插件可实现解析几何课程图形的智能生成与优化,帮助教师快速制作贴合教学重难点的可视化资源。结合 AI 教学改革需求,部分智能教学工具也逐步融入教学过

程,进一步丰富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提升了教学手段的智能化水平。同时,高校教师逐步积累了部分解析几何课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资源,并通过校内教学平台实现共享,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此外,教师开始收集整理 AI 相关的几何教学案例,丰富教学资源类型。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已取得初步进展,但目前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化、规范化、深度化的融合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潜在风险亟待解决^[10]。

2 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借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课堂教学的应用研究中取得的经验,结合解析几何课程教学的特点,以及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学改革的实践难点,笔者发现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存在技术与教学融合不深入等显性问题,还面临着伦理风险、认知偏差等隐性挑战。

2.1 应用边界模糊,导致教学异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服务于教学的辅助工具,而非替代教师的核心教学功能与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但当前在部分教学实践中,存在应用边界模糊的问题,导致教学异化。一方面,部分教师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将教学设计、可视化资源生成、习题讲解等工作完全交由人工智能主导,忽视了教学的创造性与人文关怀,丧失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部分学生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图形绘制、参数探究与习题解答,自身独立思考、自主探究的能力被削弱,形成技术依赖型学习模式,违背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核心目标,陷入技术异化的困境。在 AI 相关案例教学中,有部分教师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案例演示,缺乏对案例内涵的深度讲解,未能引导学生理解几何知识与 AI 算法的关联,导致案例教学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实现能力培养的目标。

2.2 技术与教学适配性不足,应用流于形式

教育活动具有鲜明的人文性、动态性与复杂性,解析几何课程教学更是强调抽象知识与直观感知的结合、逻辑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养,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数据和算法的机械模式运行,难以完全适应该课程教学的内在规律。当前,部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功能与解析几何课程的教学需求存在脱节,仅能实现基础的图形生成与动态演示,缺乏针对解析几何课程知识点的个性化探究、逻辑推导辅助

等核心功能,难以满足教学的深层次需求。部分教师缺乏系统化的教学设计思维,未能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学目标、学生认知规律有机结合,仅简单替代传统教学工具,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图形演示,未能充分发挥其智能交互与探究引导的优势,导致技术应用流于形式,难以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此外,部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与相关教学案例的适配性不足,无法精准呈现案例的核心逻辑。

2.3 教师的技术应用与教学融合能力不足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的深度应用,对教师提出了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教学设计能力、伦理判断能力等要求,这不仅要求教师熟练掌握课程的专业教学知识,还需要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操作技能,具备将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设计能力,以及防范技术应用伦理风险的判断能力。结合 AI 背景下教学改革的需求,教师还须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了解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领域的基本原理,能够将 AI 与解析几何课程教学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培养算法思维与跨学科应用能力。但目前多数教师存在明显的短板,部分教师仅能完成简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操作,无法设计出贴合教学需求的智能交互探究案例,更难以开发 AI 相关的综合教学案例;部分教师缺乏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理解,难以把握其应用边界与教学价值,无法实现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还有部分教师缺乏伦理判断能力,难以识别并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等风险。此外,部分教师知识结构陈旧,缺乏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储备,无法满足 AI 时代解析几何课程教学改革的需求,制约了技术应用的效果。

2.4 系统化的教学资源体系尚未建立

当前解析几何课程教学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资源,多为教师个人根据教学需求制作,存在碎片化、不系统、标准不统一、共享性差等问题,缺乏涵盖解析几何全课程、全知识点的标准化教学资源库。各高校、各教师之间的资源缺乏有效的共享机制,资源重复制作现象严重,难以形成教学合力,制约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的进一步推广与深度应用。此外,部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教学资源存在科学性偏差,若缺乏专业审核,这些资源可能对学生学习产生误导。目前还缺乏系统的 AI 相关几何教学案例资源库,案例数量不足、质量参差不齐,且缺乏标准化的教学指引,难以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同时缺乏分层设计的编程实践资源,无法适配不同层次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需求。

2.5 伦理风险凸显,监管机制缺失

借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相关学科教学中的伦理风险研究,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也面临伦理风险,且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11]。一是数据隐私泄露风险。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需要收集大量的学生个人信息、学生学习数据、教师教学数据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在存储、传输与使用过程中若缺乏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极易引发泄露、篡改或滥用风险,进而侵犯师生的隐私权与数据主权。二是算法偏见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基于历史数据训练,可能存在偏见,从而导致生成的可视化资源、探究任务等存在偏差,影响教学的公平性与科学性。三是知识产权争议。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教学资源、图形案例等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尚不明确,容易引发版权纠纷。四是学术诚信风险。学生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探究任务、作业等,易出现抄袭、敷衍等行为,不利于学术诚信体系的建设。另外,目前缺乏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与引导机制,也进一步加剧了伦理风险。

2.6 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难以适配技术应用需求

目前解析几何课程的教学评价仍以笔试为核心,聚焦于学生对公式、定理、解题技巧的掌握,缺乏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的多元化评价体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教学模式不相适配,既没有对学生人机交互探究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自主探究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专项评价,也没有对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效果、伦理风险防控能力的科学评价。同时,评价方式较为单一,多以终结性评价为主,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过程性评价,导致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效果无法得到有效检验与反馈,难以推动技术与教学的持续优化与深度融合^[12]。结合 AI 背景下教学改革的需求,当前评价体系还缺乏对学生算法思维、跨学科应用能力、编程实践能力的评价指标,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素养,同时缺乏基于 AI 的过程性评价机制,无法有效采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难以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精准监测与个性化反馈,与 AI 时代教学评价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3 创新应用策略

针对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结合该课程教学特点、人才培养要求,借鉴相关学科的应用经验,以及人工智能背景下解析几何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以

打破传统静态教学局限、实现从静态演示到动态交互的教学范式转变为目标,从教学理念、课程融合、教学实践、师资建设、资源构建、评价体系、伦理防控七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创新应用策略,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的深度、系统、规范化融合,实现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的统一。

3.1 革新教学理念,明确技术应用边界

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的深度融合,核心是打破传统静态教学局限、实现教学范式转变,突破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树立技术赋能、能力为本、伦理为先、跨学科融合的教学理念,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13]。一是明确技术定位。确立生成式人工智能是赋能教学、培养能力的核心辅助载体,而非替代教师与学生主体地位的工具,其应用的核心目标是破解教学痛点、优化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同时兼顾 AI 时代对学生算法思维、跨学科应用能力的培养需求。二是坚持学生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交互优势,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式教学场景,引导学生主动操作、自主探究,避免过度依赖技术。三是坚守学科本质。技术应用始终围绕教学核心展开,服务于知识的传授与能力的培养,避免重技术、轻知识,重形式、轻实效的本末倒置,同时注重将几何知识与 AI 算法思维有机结合,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四是强化伦理意识。将伦理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引导师生正确认识技术的作用与局限,树立正确的技术应用观,防范学术诚信风险。

3.2 强化课程整体设计,实现技术与教学的系统化融合

以解析几何课程教学大纲为核心,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结合人工智能背景下课程教学改革的需求,构建全课程、全环节、全知识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体系,实现技术与教学的系统化、深度化的融合。一是梳理课程核心知识点与重难点,明确知识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与操作环节,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内容全面纳入课程教学计划,做到知识点全覆盖、教学环节全融入;系统融入 AI 相关几何案例,更新教学内容,弥补传统教学中教学内容陈旧的短板。二是设计标准化的教学流程,针对不同知识点构建适配的教学模式,例如空间曲面教学可遵循公式推导、动态演示、参数探究以及规律总结等递进式流程。三是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循序渐进地设计 AI 技术应用内容,从简单的智能演示到复杂的自主探究,逐步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探究能力与跨学科应用能

力,实现技术应用与学生认知的同频共进。四是明确技术应用的场景边界,聚焦重复性高、抽象性强的教学环节,避免在不适配的场景中过度应用技术。

3.3 优化教学实践形式,构建探究式、互动式教学场景

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交互、动态仿真优势,创新教学实践形式,构建沉浸式、探究式、互动式的教学场景,结合 AI 背景下的教学改革要求,强化实践能力培养。一是打造智能交互课堂,优化课堂时间分配,将教师演示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总结点评作为课堂核心流程,让学生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自主修改参数、观察图形变化、验证几何结论,自主探究几何知识的规律,同时引入智能答疑系统、课堂互动工具,实时解答学生疑问,统计答题情况,帮助教师精准把握教学难点。二是设计分层探究任务,结合课程知识点与 AI 相关案例,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布置基础任务与提升任务,基础任务聚焦图形生成与参数调整,提升任务聚焦综合探究与应用拓展。三是融入跨模块综合探究,将不同知识点的可视化内容与 AI 相关案例进行整合,设计综合探究任务,培养学生的知识整合能力与综合应用能力。四是结合线上线下教学,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搭建线上探究平台,建设线上资源,让学生在课后可自主开展个性化探究、编程实践,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深度融合,同时采用翻转课堂模式,进一步强化探究式学习效果。

3.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复合型教学能力

师资队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保障。结合 AI 背景下该课程教学改革对教师的要求,围绕专业知识、技术能力、教学设计能力、伦理判断能力和 AI 知识储备,构建系统化的师资培养体系。一是开展专项培训。邀请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专家、数学教学专家、AI 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讲授常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操作技能、动态演示设计、探究案例开发、伦理风险防控等内容,同时补充 AI 相关知识,提升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二是组织教学融合教研活动。围绕相关主题开展研讨,分享优秀教学经验,提升教师将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三是搭建校际交流合作平台。组织各高校解析几何课程教师开展交流活动,促进优质教学经验、AI 相关教学案例的共享与推广。四是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发与实践,将教学成果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激发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同时组建教学团队,分工合作开发资源,减轻教师工作强度,提升资源开发效率。

3.5 构建标准化资源体系,建立高效的资源共享与审核机制

整合高校、教师、技术研发机构等多方资源,构建系统化、标准化、实用化、可审核的解析几何课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资源体系,结合 AI 背景下教学改革的需求,丰富资源类型,建立高效的资源共享机制,为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撑。一是搭建全课程教学资源库。涵盖解析几何课程所有知识点的相关教学资源,同时重点建设 AI 相关几何教学案例库,配套详细的教学指引与编程代码,做到资源全覆盖、标准化。二是建立资源审核机制。组建由数学教学专家、技术专家、AI 领域专家组成的审核团队,对生成的教学资源、AI 相关案例进行科学性、严谨性审核。三是建立资源动态更新机制。组织一线教师定期对资源库进行更新与优化,结合教学实践反馈、AI 技术发展趋势,完善资源内容。四是依托相关平台,建立跨校、跨区域的资源共享机制,实现资源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减少资源重复制作,形成教学合力,同时建设分层设计的编程实践资源库,适配不同层次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需求。

3.6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实现多元化评价

突破以笔试成绩为核心的评价模式,借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相关学科的评价经验,结合 AI 背景下解析几何课程教学改革的需求,构建契合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视化教学的多元化、过程化、综合性教学评价体系,实现对学生知识掌握、能力培养、素养提升的全面评价^[14]。一是评价内容多元化,将学生对解析几何课程知识掌握情况、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操作能力、自主探究能力等纳入评价体系,增加算法思维、跨学科应用能力、编程实践能力等评价指标,改变唯分数论的评价导向。二是评价方式过程化,结合学生课堂表现、探究任务完成情况、实践操作成果等方式,实现对学习全过程的评价,同时借助 AI 技术,自动采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实现精准监测与即时反馈。三是评价主体多元化,构建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的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四是将教师的相关教学能力纳入教师教学评价体系,推动教师持续优化教学实践。五是创新期末考试形式,采用开卷与闭卷结合、机考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增加能力考查比重,同时利用 AI 技术实现智能阅卷与防作弊监测,确保考试公平。

3.7 健全伦理风险防控机制,保障技术良性应用

借鉴生成式人工智能课堂教学伦理规制的研究成果,构建政府监管、学校实施、教师主导、学生参与的多方协同伦理风险防控机制,防范技术应用中的

各类伦理风险。结合 AI 相关教学实践的特点,重点防控数据隐私、学术诚信等风险,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的良性融合。一是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学校结合自身情况制订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管理办法,明确相关规范与行为准则,建立准入审批、日常管理与监督检查机制;同时,针对编程实践、AI 案例探究等环节,制订明确的学术诚信规范。二是强化技术层面的风险防控,选择安全可靠、算法公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采用加密技术、数据脱敏技术等方法打造安全防护体系。三是加强伦理教育,将相关知识纳入综合素质教育体系,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技术应用观,培养伦理意识与学术诚信素养。四是建立伦理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定期检测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情况,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置伦理风险。

4 结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其与解析几何课程教学的融合,契合 AI 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是高校数学教学数字化、智能化改革的必然趋势,还是破解该课程抽象教学痛点、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核心能力的有效路径。解析几何课程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数学基础,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不仅能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成效,还能帮助学生建立几何知识与 AI 算法的关联,强化算法思维与跨学科应用能力,为学生后续从事 AI 相关领域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其核心价值不在于技术本身的展示,而在于通过技术的赋能,将抽象的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可交互、可探究的教学内容,推动教学模式从单向灌输向主动探究转变,教学重心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实现解析几何课程教学的提质增效,同时兼顾伦理规范,实现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的统一。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高校、教师、教育管理部门、技术研发机构等多方协同发力。高校需强化课程整体设计,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完善评价体系与伦理防控机制;教师需革新教学理念,提升复合型教学能力,创新教学实践形式;教育管理部门需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校际间交流合作;技术研发机构需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不断提升工具的学科适配性与安全性。

未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教育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中的应用将向更深度、更智能、更个性化、更规范化的方向推进。相信通过持续的探索与创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为高校解析几何课程教学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推动高校数学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培养出更多具备空间想象能力、探究思维、创新能力、伦理素养与 AI 思维的高素质数学人才。

参考文献:

- [1] 毛浙东. 解析几何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进行“算法”的引导[J]. 数学通报, 2023, 62(3): 29-34.
- [2] 王佑镁, 利朵, 欧阳嘉煜, 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6(4): 5-15.
- [3] 欧球, 罗志卿.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科融合创新模式的实践研究[J]. 通讯世界, 2026, 33(2): 61-63.
- [4] 余辉, 夏文蕾, 程钰, 等.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课堂教学实验设计与实践[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5, 44(11): 121-125, 221.
- [5] 张一丹, 郑彩君.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历史教学的策略探究[J]. 学苑教育, 2026(6): 157-159.
- [6] 赵晓伟, 沈书生, 祝智庭. 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赋能课堂变革——基于“认知进阶—技术支持”矩阵的融智课堂实践路径[J]. 教育研究, 2025, 46(12): 40-53.
- [7] 赵文君, 李星, 唐海军.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学概念教学的案例研究——以“相似多边形”为例[J]. 福建教育, 2026(4): 119-124.
- [8] 李岩. 基于 GeoGebra 的可视化教学在高等数学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信息化, 2025(12): 47-48.
- [9] 黄及. 基于 AI 技术的初中物理可视化教学工具开发[J]. 物理教学, 2026, 48(2): 23-28.
- [10] 陈娟丽, 慕军鹏.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6, 45(2): 110-115.
- [11] 魏丹丹, 刘生锐.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边界与伦理规制[J]. 传播与版权, 2026(3): 107-110.
- [12] 王丽, 陈志锐, 李艳.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论证教学反馈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 2026(2): 123-130.
- [13] 张丽敏, 蔡一帆, 向昭辉, 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学物理可视化教学的探索[J]. 湖南中学物理, 2026, 41(2): 109-113.
- [14] 顾玉石, 王慧. 以解析几何的教学为例谈学生数学运算素养的培养[J]. 数学通报, 2025, 64(1): 17-21.

责任编辑:朱家席

乡村振兴视域下徽州民俗体育研究 ——以徽州嬉鱼灯活动的传承与发展为例

程 晟

(蚌埠学院 体育教学部,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研究个案,从乡村振兴视域对徽州民俗体育的传承及发展危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徽州嬉鱼灯活动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传承主体缺失、过度商业化、民俗体育文化失落等危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传承和发展策略:提升村民传承和发展民俗体育的意识、完善民俗体育保护传承体系和产业人才的培育、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徽州民俗“体育+”旅游品牌。

关键词:乡村振兴;徽州民俗体育;嬉鱼灯活动;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G812.7;G8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095-06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izhou Folk Sports under the Case of Fish Lantern Pl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ENG She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Taking the Huizhou Fish Lantern play as a case, it examine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rises of Huizhou folk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inheritance process of the Huizhou Fish Lantern play, there are crises such as the absence of inheritance subjects,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loss of folk sports cultur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re are crises such as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support, the lack of a systematic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and insufficien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enhancing villagers' awarenes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improv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of folk spor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dustrial talents, and relying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create a Huizhou folk "sports + " tourism brand.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Huizhou folk sports; Fish Lantern play;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近年来,民俗体育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乡风文明、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

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1]迈入加速阶段。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1号文件《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结合地方特色文化打造体育旅游项目,支持设立“乡村传统项目传承基地”^[2]。

收稿日期:2025-09-22

基金项目:蚌埠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23SK07)。

作者简介:程晟(1988—),男,安徽黄山人,讲师,硕士。E-mail:258905754@qq.com

在中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乡村地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与落实,为乡村地区的全面发展注入了崭新动力。徽州嬉鱼灯活动是徽州地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民俗体育活动,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探讨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发展路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3]。因此,本研究以徽州嬉鱼灯民俗体育活动为案例,通过分析其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探索在乡村振兴语境下嬉鱼灯活动的传承与创新策略。

1 徽州嬉鱼灯活动的历史起源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特征

徽州嬉鱼灯活动作为传承近 800 年的民俗活动,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展演活动,从其起源逻辑到实践形态,均蕴含鲜明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核,是“民俗文化”与“体育实践”的有机结合体。

1.1 从“祈福需求”到“体育活动雏形”

徽州鱼灯的起源与古徽州“山多地少、村落密集、火灾频发”的地理环境直接相关。据传承人回忆,古时村民因火灾频发,依据“鱼属水、水克火”的传统观念,用竹片、棉纸扎成鱼灯,通过集体巡游的方式祈求平安;同时,“鱼”与“余”谐音,象征富足丰收,因此,巡游活动也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起源来看,鱼灯巡游最初虽以祈福为核心,但“集体巡游”需多人协作完成,“舞动鱼灯”需运用身体力量与协调能力,已具备体育活动“身体参与”“团队协作”的雏形——不同于静态的民俗陈设,嬉鱼灯活动从诞生之初便依赖人的身体运动,这一“以身体实践为核心”的传统活动,为其后续成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基础^[4]。

1.2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特征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包括身体运动形态、专项技能、参与性与娱乐性。徽州嬉鱼灯活动具备相应的体育属性。

其一,体育运动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徽州鱼灯的制作与舞动均需专项身体技能支撑。在制作环节中,竹篾编织需精准控制手部力量与角度,确保灯架稳固且轻便;彩绘需手部具有协调能力,保证图案对称美观,这些“手工技艺”本质上是精细身体运动技能的传承。舞动环节更具体育特质:大鱼灯长 7 米、高 3 米,需 20 人协同抬举,参与者需同步控制步伐、调整力度,避免灯体倾斜或碰撞,锻炼核心力量与团队协作能力;小鱼灯虽由单人或儿童提游,但“鲤鱼摆尾”“鱼跃龙门”等动作需腰部、手臂联动,模仿鱼

类游动态,是对身体协调性、柔韧性的训练——这些动作并非随意发挥,而是经过数百年传承形成的固定范式,具备体育活动“动作标准化”“技能专业化”的特征,与武术、舞龙等传统体育项目的身体实践逻辑一致。

其二,传承中的“体育技能代际传递”。徽州鱼灯的传承不仅是文化符号的传递,更是体育技能的代际延续。鱼灯制作技艺与舞动技巧由村中掌握核心技能的“老匠人”“老舞者”传授:年轻人需先学习竹篾编织的“力道控制”,再练习鱼灯舞动的“步伐节奏”,最后磨合集体巡游的“团队配合”,整个传承过程需经过“基础技能训练”“专项技能提升”“实践应用”三个阶段,与体育项目“师徒传承”“技能进阶”的模式完全契合。例如,“鱼跃龙门”动作需舞者在巡游中突然抬高灯体、同步跳跃,既要求个人具有爆发力,又需与周围参与者保持距离,避免碰撞,这种技能需通过长期练习与实践磨合才能掌握,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性传承”的核心属性。

其三,参与性与竞技娱乐的体育特质。徽州鱼灯活动具有强烈的群众参与性与竞技娱乐性,这是其区别于静态非遗的关键体育特征。每年正月十三至十六的巡游活动,并非少数人的表演,而是全村居民的集体参与——成年人负责抬举大鱼灯、组织巡游路线,儿童提游小鱼灯、花灯,村民在巡游沿途燃放鞭炮、呐喊助威,形成“全员参与”的体育氛围。同时,活动中隐含“竞技性”:鱼灯巡游由村中大族轮流主持,灯体规模、舞动整齐度成为彰显宗族实力的象征,各族会在动作协调性、巡游气势上暗自比拼,这种“隐性竞技”与传统体育项目的“竞技精神”一脉相承。另外巡游过程中“灯光闪烁如鱼群嬉戏”的视觉效果,以及参与者在协作中获得的成就感,也让活动具备体育“娱乐性”“社交性”的属性,满足乡村居民的体育健身与精神文化需求。

1.3 发展历程中的体育价值认可

徽州嬉鱼灯活动的体育属性在发展中不断被认可,成为其入选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项目的重要依据。1964 年因特殊历史原因,嬉鱼灯活动被定性为封建宗法残余禁止展演;1979 年活动恢复后,其体育价值逐渐凸显——1988 年 3 月,汪满田村鱼灯凭借“整齐的动作编排”和“强大的团队协作能力”,在县民间艺术节演出中获奖,此时的评价标准已包含对其体育表演性的认可;2005 年 10 月,鱼灯参与黄山市国际旅游节暨歙县民俗体育文化节,获“最佳表演奖”,此次文化节直接将其归入“民俗体

育”范畴,明确肯定其体育属性;2020年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表演中,徽州鱼灯的“身体运动美感”“集体协作气势”成为展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向世界传递了徽州嬉鱼灯活动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从地方民俗活动到国家级体育文化展示,徽州嬉鱼灯活动体育属性的不断强化,印证了其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赋能民俗体育的发展逻辑理路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加速乡村振兴进程,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我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规划与政策措施。乡村振兴战略涵盖五个领域,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振兴”领域中,民俗体育具有重要地位。

2.1 民俗体育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

民俗体育活动作为特色文化IP,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带动作用。它能有效吸引游客,拉动乡村住宿、餐饮、购物等消费活动,进而带动旅游业及服务业的发展。例如汪满田村的嬉鱼灯活动,在2023年2月3日至6日的4天时间里,接待游客18000余人次,客流量比上一年增加了近40%,省外游客突破6000人次。各家民宿累计接待游客400余人次,营业额6万元左右;农户餐饮接待累计3000余人次,创收15万元。这表明民俗体育活动能够为乡村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促进乡村产业的繁荣。

以民俗体育为核心,还可以开发文创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形成“体育+农业”融合模式,从而延伸产业链,提升民俗体育活动的附加值。同时,民俗体育的传播能够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如汪满田村嬉鱼灯活动期间,农户小鱼灯线下销售600余只,销售额达24万元,线上订单1000余只,订单金额45万元以上。徽州呈坎景区通过嬉鱼灯活动,打造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产业链,进一步体现了民俗体育在产业融合和产业链延伸方面的重要作用。

民俗体育通过“场景生成”策略,与非遗宣传展演、实景演出等结合,形成沉浸式体验,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例如融入鱼灯文化的徽墨文化大剧《家业》的展演、首部鱼灯题材微短剧《有种年味嬉鱼灯》在网络平台的热播等,都为文体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还进一步提升了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

2.2 民俗体育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

民俗体育活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乡村的历史记忆和独特的民俗。它与节庆、祭祀等紧密结合,是乡村根脉的核心载体。通过民俗体育活动的传承与发展,能够重塑乡村体育文化生态,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民众团结与社会和谐。例如徽州嬉鱼灯活动,它不仅是一种民俗体育活动,更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了乡村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集体记忆。

民俗体育还能够展现村民的创造智慧,其推广能够激发村民的文化自信,使其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活态标本”。通过开展民俗体育活动,可以提升乡村文化形象,使村民感受自身文化的独特价值,强化文化身份认同。同时,民俗体育活动还能促进村民互动合作,重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乡愁共同体”意识,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例如“村超”“村BA”等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村民参与,还通过网络传播吸引了众多外界关注,提升了乡村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

在文化表达方面,民俗体育通过创新文化表达方式,如“体育+旅游”“体育+数字”模式等,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态。例如嬉鱼灯活动通过短视频、抖音等平台扩大影响力,不仅吸引了年轻群体,同时强化了“体育+文化”的双向赋能机制。《“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推动民俗体育与乡村振兴融合,通过鱼灯协会、文艺队等自发组织,形成“村民主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的文化振兴模式,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组织支持。

3 乡村振兴视域下徽州嬉鱼灯活动的传承与发展危机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徽州鱼灯发展的困境并非简单等同于其他非遗的共性问题,而是根植于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与生存场景^[5]。从传承模式到人才结构,从文化竞争力到基础设施适配性,徽州鱼灯的困境均呈现出鲜明的“徽州属性”,需结合其自身特点展开深入剖析。

3.1 传承模式的宗族依附性与现代社会的适配性相矛盾

徽州鱼灯的传承模式始终与宗族制度深度绑定,这是其区别于其他非遗的核心特征。历史上,鱼灯制作技艺以“族内传男不传女”的方式延续,传承过程不仅是技艺的传授,更是宗族凝聚力的强化——从鱼灯骨架的选材(需是族中长老指定的深

山杉木),到灯面彩绘的内容(多为家族迁徙史或祖先功绩),每一个环节都承载着宗族文化记忆。这种以宗族为核心的传承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中能依托稳定的宗族聚居形态实现有效延续,但在现代社会却面临严峻的适配难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徽州宗族聚居形态的瓦解,大量青壮年外流导致“宗族传承链条”断裂。与其他非遗可通过师徒制跨地域传承不同,徽州鱼灯的技艺传承高度依赖宗族内部的文化语境——例如,灯舞表演中的“绕堂礼”(需按照宗族祠堂的布局路线起舞),若脱离具体的宗族空间,其文化内涵便难以完整传递。当前,虽有部分鱼灯非遗传承人尝试打破宗族限制收徒,但受限于年轻一代对宗族文化认知的缺失,传承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因“宗族依附性”导致的传承模式僵化,是徽州鱼灯独有的困境,而非所有非遗的共性问题。

3.2 人才断层中的“技艺+文化”双重缺失特征

徽州鱼灯的人才需求具有“技艺+文化”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其人才断层问题比其他非遗更为复杂。一方面,鱼灯制作技艺本身具有极高的专业性:仅竹篾编织环节,就需掌握“劈篾如丝”的精细手艺,一根完整的毛竹需经过选料、烤竹、劈篾、刮篾等12道工序,且每道工序的火候、力度都需凭借经验把控;另一方面,传承人还需深入理解鱼灯背后的文化寓意,例如“水火既济”的哲学思想——鱼灯以“水”为形(象征徽州的新安江水),以“火”为魂(灯内烛火象征宗族香火),表演时需通过特定的舞步展现“水克火却共生”的辩证关系。

当前,徽州鱼灯面临的人才断层问题,导致并非单纯的技艺失传,而是“技艺+文化”的双重缺失。与其他非遗可通过标准化培训快速培养技艺型人才不同,徽州鱼灯的文化内涵难以通过短期培训传递^[6]。调查显示,休宁县现存的鱼灯传承人中,能完整阐释“水火既济”文化内涵的不足30%,而年轻传承人中,多数仅掌握基础的制作技艺,对鱼灯与徽州风水文化、宗族伦理的关联知之甚少。这种因缺少“双重属性”认知形成的人才培养难度,是徽州鱼灯传承独有的困境。例如,某职业学校尝试开设鱼灯制作课程,虽能教会学生编织灯架,但学生却无法理解为何灯架需做成“七节鱼身”(象征徽州“七姓聚居”的历史),最终制作出的鱼灯沦为单纯的工艺品,丧失了文化灵魂。

3.3 同质化竞争中的“文化辨识度”流失风险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旅游成为非遗活化的重要路径,但徽州鱼灯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同质化

竞争,造成独特的“文化辨识度”流失风险。与其他非遗可通过工艺创新实现差异化发展不同,徽州鱼灯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与徽州地域文化的深度绑定——例如,鱼灯的造型需符合“徽州三雕”的审美风格(灯面彩绘借鉴徽州木雕的“浅浮雕”技法),灯舞表演需配合徽州民歌的“徽调”节奏^[7]。然而,在过度商业化开发中,这种独特的文化辨识度正逐渐丧失。

当前,部分地区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将徽州鱼灯与其他地区的民俗灯舞简单结合,推出“夜光鱼灯”“电子鱼灯”等产品。这些改造看似创新,实则消解了徽州鱼灯的文化内核:例如,用LED灯替代传统烛火,虽解决了安全问题,却失去了“烛火摇曳映灯影”的徽州意境;将鱼灯造型改为卡通风格,虽吸引了年轻消费者,却割裂了与徽州传统美学的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周边地区模仿徽州鱼灯推出“江南鱼灯”“水乡鱼灯”等同类产品,这些产品虽在造型上与徽州鱼灯相似,却缺乏“宗族文化”“水火既济”等核心内涵,导致游客难以分辨真伪,最终稀释了徽州鱼灯的文化辨识度。这种“文化深度绑定”是徽州鱼灯区别于其他非遗的显著特征。

3.4 村落基础设施与嬉鱼灯活动的“场景适配性”不足

徽州嬉鱼灯活动对场景具有极高的要求,其村落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并非只是简单的“配套落后”,而是“场景适配性”的缺失。与其他非遗可在标准化场馆展示不同,徽州鱼灯的表演需依托特定的徽州村落空间,例如,“绕村灯”需沿着村落的水圳(徽州村落的水利系统)行进,“祠堂灯”需在宗族祠堂的“天井”中表演,这些场景不仅是活动的场地,更是鱼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

当前,徽州村落的基础设施改造未能充分考虑嬉鱼灯活动的需求,导致“场景适配性”严重不足。例如,部分村落为发展旅游拓宽了村内道路,却破坏了“绕村灯”所需的水圳路径;祠堂改造中加装了现代照明设备,却削弱了鱼灯烛火与天井光影的互动效果;游客停车场的建设占用了“灯舞广场”,导致大型嬉鱼灯活动无法举办。此外,徽州鱼灯的制作需要具有“通风防潮”功能的传统作坊,而当前村落中缺乏符合这种要求的非遗工坊,传承人只能在自家民居中制作,这既影响技艺传承,也存在安全隐患。这种因“场景适配性”导致的基础设施困境,是徽州鱼灯发展中面对的独有的问题,与其他非遗面临的基础设施不足有本质区别。

4 乡村振兴视域下徽州嬉鱼灯活动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徽州嬉鱼灯活动作为具有独特魅力的民俗文化形式,其传承与发展不仅关乎地方文化的延续,更对乡村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探索切实可行的策略。

4.1 强化村民对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主体意识

村民作为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核心主体,其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嬉鱼灯活动的传承成效。尽管《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体育在乡村建设、农业发展、农民健康及乡村文化丰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凸显了政府部门对民俗体育的重视,但受文化水平等因素限制,大众对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意识普遍较为薄弱,认识不够深入^[8]。因此,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使其正确认识嬉鱼灯活动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价值,是推动其传承与发展的首要任务。

深入领会政策精神,探索传承发展路径。当地政府和村民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深入学习《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其他相关重要文件,全面理解和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在此基础上,双方应紧密结合文件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深入挖掘嬉鱼灯活动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内在契合点,积极探索和寻找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嬉鱼灯传承方式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可以通过系统分析嬉鱼灯活动在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升村民精神面貌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和积极作用,进而制定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计划,确保嬉鱼灯活动能够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开展技能培训,激发参与兴趣。政府应当充分利用非遗工坊以及其他相关平台,积极组织开展嬉鱼灯活动的技能培训工作。通过集中教学、实操实训、集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村民在嬉鱼灯制作和表演方面的技艺水平。具体而言,政府可以定期举办嬉鱼灯活动的专项培训班,邀请具有丰富经验和深厚技艺的艺人前来授课,确保培训内容的权威性和实用性。对在培训中表现优异、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相应的技能证书和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以此激励更多村民积极参与培训,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此外,政府还应在各类村社活动中巧妙地嵌入嬉鱼灯活动的展演环节,为村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实践锻炼的平台。通过这种方式,不仅

能够让村民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提升技艺,还能增强他们对嬉鱼灯活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可以有效推动嬉鱼灯活动的普及与提升,使其成为村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办文化活动,加大宣传力度。为了弘扬和传承徽州地区的独特文化,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徽州民俗体育文化节等活动。在宣传推广方面,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新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地加大对徽州文化和民俗体育的宣传力度^[9]。通过精心策划和制作专题纪录片,深入挖掘和展现嬉鱼灯活动的历史渊源、精湛的制作工艺以及独特的表演形式,力求将这一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政府还可以积极开展线上直播活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让更多村民足不出户便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嬉鱼灯的魅力。通过这些生动直观的展示方式,村民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嬉鱼灯活动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还能进一步增强他们对这一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他们积极参与传承和发展的热情。

4.2 构建科学保护传承体系,培育产业人才

完善保护传承体系。民俗体育的传承需严格遵循整体性、原生态性与活态性理念,构建科学合理的传承机制。地方政府作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首要责任人,必须建立协调有效的职能机制,以切实保障传承工作得以全面落实。2023年《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地方民俗体育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基于此,出台了《歙县非遗鱼灯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为嬉鱼灯活动传承提供了有力的人力与物力保障。在完善保护传承体系方面,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其一,推进非遗项目晋级,要加快推进鱼灯非遗项目的晋级进程,制定具体的目标与计划,力求早日推动各村落嬉鱼灯活动晋升至更高级别的非遗等级,从而提升其知名度与影响力;其二,争取专项资金支持,积极向国家、省非遗专项资金寻求支持,同时促使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在田野调查、文献出版、展馆建设等方面为项目提供相应的支持与资金,为传承工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三,开展全面普查记录,积极开展田野调查与普查记录工作,对歙县非遗鱼灯进行全方位普查,覆盖鱼灯种类、制作工艺、传承谱系以及相关民俗活动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图片、视频等,建立文字记录与视频档案,实现数字化保存与展示,为传承和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10]。

培育产业人才。产业人才是民俗体育传承和发

展的关键因素,徽州嬉鱼灯活动在产业人才培育上可从多方面着手。其一,扩大传承人规模,通过定期开展鱼灯非遗传承人申报评选工作,积极组织省、市、县级非遗相关传承人申报评审与推荐,以此不断扩充鱼灯非遗传承人队伍。同时建立传承人激励机制,给予传承人物质资助与奖励,提升其社会地位,充分激发他们的传承积极性。其二,推行“非遗传承人学徒制”,构建老、中、青传承梯队,鼓励老艺人收徒授艺,充分发挥民间智慧。推选歙县鱼灯民间“守艺人”,从传承与创新两方面综合考量,挖掘并培育人才^[11]。引导景区、酒店、旅行社、民宿等文旅经营主体着力培育鱼灯文化传播者和从业者,拓宽人才来源渠道。其三,推进非遗进校园,把鱼灯制作纳入县内中小学“双减”课后延时服务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授课,培养学生对嬉鱼灯活动的兴趣与认知;与职业院校合作开设鱼灯社团,致力于培养具备鱼灯制作、表演、策划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与高等院校合作,开展非遗美育公益社会实践,打造院校美育实践基地,吸引艺术院校学子助力非遗传承创新。其四,注重从小培养传承人,将嬉鱼灯活动融入小学体育课堂,从儿童时期便开始培养传承人,让民俗体育文化遗产以活态形式延续下去。与此同时,对嬉鱼灯活动的形式、内容等进行挖掘整理,建立电子文档,为传承人培养提供丰富的资料支持。

4.3 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特色徽州民俗“体育+”旅游品牌

徽州民俗体育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依托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合理开发与打造,当地民众既能获得经济收入,又能促进文化传承。

整合优质旅游资源,开发专项旅游活动。全面整合徽州地区的黄山、宏村、呈坎、西递等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充分利用这些独特的旅游资源,精心策划并开展一系列以民俗体育为核心的“体育+”旅游品牌活动。例如,推出“体育+研学”特色活动,组织学生和游客深入探访嬉鱼灯活动的发源地,详细了解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增强文化认知;同时,开展“体育+赛事”活动,定期举办盛大的嬉鱼灯表演比赛,吸引游客积极参与和热情观赏,通过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提升活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

开发与包装民俗体育,增强旅游体验。对徽州地区丰富的民俗体育资源进行系统性开发与精心包装,将其有机融入旅游体验的各个环节。开发一系列参与性强的互动项目,让游客有机会参与嬉鱼灯

活动,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的真实感和沉浸式体验感^[12]。充分利用徽州地区深厚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元素,打造独具特色的品牌标识,提升品牌的辨识度和市场吸引力。例如,设计并推出以嬉鱼灯为主题的精美旅游纪念品,让游客在离开时能够将这份独特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延续旅游体验的美好回忆。

加强多方合作,共同打造旅游品牌。积极与地方政府、徽州民俗体育传承人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依托徽州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优势,共同研发和打造以嬉鱼灯活动为亮点的徽州民俗体育系列旅游品牌。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资源协调,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民俗体育传承人则提供专业的文化指导和技术支持,确保活动的原汁原味;企事业单位则负责市场的运营和品牌的推广,通过多渠道的宣传和营销,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促进徽州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推动地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13]。

总之,乡村振兴视域下徽州嬉鱼灯活动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从提升村民认知、完善保护传承体系、培育产业人才以及打造特色旅游品牌等多方面入手,结合嬉鱼灯活动的特色,制定系统性的策略,推动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

5 结论

徽州民俗体育作为乡村文化基因的活态载体,其传承和发展对激活乡土文化自信、赋能乡村振兴具有双重价值。在民俗体育的传承和发展中要处理好传承和发展的关系,保护好民俗体育的真实性和原生态。结合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总体要求,对徽州民俗体育——徽州嬉鱼灯活动进行积极保护、传承和发展,使这一民俗体育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办法》的通知[EB/OL]. (2021-04-29) [2025-04-2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4/30/content_5604170.htm.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 (2022-01-04) [2025-02-2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jyzt_2022/2022_zt04/zhengce/wenjian/202204/t20220412_615905.html.

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 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与共建路径

何修国^{1*}, 郭 玮², 李鸿渊²

(1. 中共六安市裕安区委党校, 安徽 六安 237131; 2. 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校, 上海 201617)

摘要:推进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是加强长三角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长三角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是推进长三角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动力。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价值逻辑,其中,主体、制度、利益是影响生态绿色一体化的关键因素。以六安市裕安区与上海市松江区对口合作为例,分析生态绿色一体化作为新兴的绿色发展模式,推进主体结构一体化、制度机制一体化、区域利益一体化,在处置跨区域生态环境难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建议从创新互动合作模式、强化政策制度供给、构建利益共融机制三方面一体推进。

关键词:长三角;生态;绿色发展;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101-07

Theoretical Foundati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Co-construction Path of Ecological Gree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HE Xiuguo^{1*}, GUO Wei², LI Hongyuan²

(1. The Party School of Yu'an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u'an, 237131, Anhui;

2. The Party School of Songjiang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617, Shanghai)

Abstract: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and green integration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s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rengthen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The ecological and green integration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s rural areas has its inherent theoretical logic,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value logic. Among them, the subject, system, and interest we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ecological and green integration. By the pairing cooperation between Yu'an of Lu'an city and Songjiang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a new green development model was analyzed for ecological and green integration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bject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regional interests, and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dealing with cross-region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it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from three aspects: innovating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models, strengthening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building an interest integr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Changjiang River Delta; ecology; green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2025-12-02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系统重点项目(QS2025040);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重点项目(2025SHB027)。

作者简介:何修国(1975—),男,安徽六安人,高级讲师,硕士。E-mail:2756879253@qq.com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颁布实施,生态绿色一体化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和重要内容。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在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1]生态绿色一体化是推动长三角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战略选择。如何将生态绿色理念与长三角区域发展相结合,进而推动生态、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目前,已有研究围绕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对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区域协作及生态治理等问题进行的理论分析,丰富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但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现状,推进长三角城乡生态融合共生还存在理念差异和制度壁垒,因此以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助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研究仍需结合长三角实际,不断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研究中,主体、制度、利益是关键因素,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有效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基于此,以安徽六安市裕安区与上海松江区对口合作为例,从两地农村产业协同合作的实践探索出发,深入分析两地在经济、地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特点,系统总结两地对口合作的实施情况和实际效果,从主体结构一体化、制度机制一体化、区域利益一体化三方面探索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实践路径,为推进长三角乡村振兴联动发展及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启发。

1 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生态兴则乡村兴,生态美则百姓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乡村自然资源加快增值,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2],这为推进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和有力支撑,是实现乡村生态价值转换的坚实基础。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价值逻辑。

1.1 理论逻辑

区域一体化以国界为划分标准,可分为跨国一体化和不跨国的区域一体化,跨国一体化以欧盟为

典型代表,而国内区域一体化,则多以城市群方式实现。1954年,荷兰学者 Tinbergen 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指国家或区域之间相互协作,将阻碍经济活动的因素加以弱化、消除,以创造最优国际经济结构^[3]。在一体化发展机制研究中,我国区域合作能够顺利通畅进行,需要区域合作政策进行引导和规范,中央主导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形式和客观要求。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把长三角城市群列入六大世界级城市群^[4]。目前,凭借区位和制度优势,长三角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典范,但仍然存在经济增长驱动力不足、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资源与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制约情况^[5]。

生态绿色一体化是区域各方主体通过聚集要素资源、创新发展绿色产业等方式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模式,是一条跨区域共建共享、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径。生态绿色一体化理论属于“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6],通过主体结构一体化、制度机制一体化和区域利益一体化,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其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体结构一体化。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大优势,但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亟需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生态绿色一体化意味着长三角区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区域内政府、企业、公众及社会其他主体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制度机制一体化。生态环境领域中单一的政府管制模式或市场模式抑或社区自治模式都难以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而基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相互协商、共同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能有效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包括在政策制定、产业发展、城乡规划等方面都要充分考虑生态因素,从而推进各领域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形成良性循环。三是区域利益一体化。生态环境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各组成部分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有机联系。因此,推进区域生态协同治理,是实现生态共赢利益的应然逻辑。总之,生态绿色一体化在促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及乡村振兴协调统一的进程中,旨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筹兼顾,助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1.2 制度逻辑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是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

内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布局,科学规划和大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共同的政治任务,而生态绿色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环境治理领域协同合作的重要维度和重要内容。当前,从主体结构一体化、制度机制一体化、区域利益一体化三方面探索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需要努力破除行政刚性壁垒和利益竞争困境,促进区域治理结构重组,这就要求创新互动合作模式,优化政策制度供给,构筑利益共融机制,助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是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重要保障。2020年9月,沪苏浙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分别表决通过《促进和保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2024年4月,沪苏浙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分别表决通过《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这些政策有助于以法治方式探索走出一条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的新路径。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能清晰界定生态绿色一体化中城市间的权责和利益分配。一方面,有助于构建区域生态绿色一体化责任清单制度,公正合理地划分治理权责;另一方面,制度体系通过利益调节和利益共融协调区域生态利益,以相互认同、彼此尊重、合作共赢为价值引领,有助于推进区域生态利益博弈,通过寻求利益契合点为实现利益共享创造有利契机。

1.3 价值逻辑

利益共享是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纽带和动力。区域利益一体化借助生态利益补偿机制和生态利益调节机制,在共生共融氛围中找寻行政辖区间的利益契合点实现利益共享。如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的黄山市曾由于工业化发展污染新安江水质,对下游地区的居民饮水安全和千岛湖水体构成严重威胁,导致上下游产生利益冲突,促使浙江、安徽、财政部及生态环境部等构建多方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惠共赢的新安江生态利益补偿机制,有效保护了区域生态系统,推动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由此可见,实现利益共享的核心在于通过权责的合理安排协调各方生态利益。

多元共建是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力量源泉。多元共建是区域内行动主体共同参与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实现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功能和任务的分配落实。主体结构关系遵循自愿、互

利、平等原则,在生态绿色一体化的目标引领下,发挥组织和功能比较优势开展互动合作。一方面,生态绿色一体化中的多元共建是在共同出力、共同主事等方面形成互动合作的结构形态,核心是构筑科学民主的决策协同机制、开放包容的参与执行机制、公平公正的利益补偿机制、立体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估机制;另一方面,多元共建是生态绿色一体化中利益共享的动力支撑,共同创造区域生态民生福祉,共同促进区域利益共享、协同发展。

2 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7]。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命题,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破解传统发展模式引发生态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根基。

2.1 是加强长三角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生态农业是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通过生态绿色一体化来保护和修复农村的生态环境,减少农村环境污染,提高农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农村地区是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改善直接关系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生活品质,关系到乡村全面振兴。但是在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仍存在环保意识不强、资金不足、绿色产业滞后及法治建设不健全等困境。因此,应注重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兴盛,从而助力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2.2 是推动长三角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

生态绿色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路径。生态农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加强生态农业产业协作发展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推动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有助于建立健全长三角绿色生态农业产业体系,重视农田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转变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建立新型绿色农产品产业化实验区,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推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要求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和可持续利用,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等各种资源的高效利用,满足乡村经济发展需要,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负荷。因此,要坚持以产业带动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建设,落实产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理念,推动乡村振兴各要素协同发展,从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2.3 是推进长三角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动力

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有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进长三角城乡一体化,应加强城乡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机流动和优化配置;强化在科技创新、融合互动、市场开放、政府引导等方面的协同,合力推动农业产品质量、产业效益、生产效率、经营者素质、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提升与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通过生态绿色的共同追求、资源要素共享、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生态环境共同保护等措施,能有效促进城乡之间的融合与互补,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3 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共建案例分析

“十四五”时期是六安市深度参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崛起的关键时期,是全面改善民生、建设新阶段现代化幸福六安的重要突破期。2022年底,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市与六安市对口合作实施方案(2023—2025年)》,围绕文旅、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科创、人员交流、公共服务等领域,提出一系列对口合作措施。在这一背景下,六安市裕安区与上海市松江区开展对口合作,并取得初步成效。

3.1 案例背景

六安市裕安区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是典型的革命老区、生态大区、发展新区。裕安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是中国十大历史名茶“六安瓜片”的原产地、“世界珍禽”皖西白鹅的主产区,也是六安“一谷一带一岭一库”绿色发展的核心区和主战场,盛产水稻、畜禽、水产等品质优良的大宗产品,六安瓜片、皖西白鹅、有机油茶、绿色果蔬等特色产品享誉全国,全区创建30万亩水稻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获评全国商品粮基地、全国绿色蔬菜高产高效示范县区、全国油茶产业先进县区。

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部,被誉为“上海之根”“沪上之巅”“浦江之首”“花园之城”“大学之府”,

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和上海市副食品基地之一、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区。自2019年以来,松江区的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先后获得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集体、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区、全国百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区等一批“国字号”荣誉。

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确定上海市结对合作帮扶安徽省六安市。2022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上海市对口合作六安市。2022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的《上海市与六安市对口合作实施方案(2023—2025年)》强调“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2022年12月,中共六安市委、六安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对口合作六安市工作行动计划》,提出建立县区对口合作对接机制,明确了具体的合作方式与对接举措。

3.2 共建基础

农业产品品牌化。裕安区不断提高茶叶、蔬菜、小龙虾、生猪等特色农产品的产量,着力挖掘网销渠道,提高农产品销售收入。皖西白鹅国家级扩繁基地通过省级验收,上海点耕农业与城南镇关王庙村共建草莓育苗基地持续推进,加快建设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并培育多个“二品”农产品。与之相应的是,松江区聚焦浦南绿色发展实践区,高质量建设“绿色田园”。一是推进绿色发展,深入开展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绿色农业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一,绿色食品认证率达47.72%,连续3年位列上海市第一。二是推进品牌发展,依托粮食家庭农场模式持续打响“松江大米”品牌。扩大“松早香1号”“松香粳1018”种植面积至8.2万亩。三是推进特色农业发展,黄浦江大闸蟹连续7年获“王宝和”杯最佳口感奖。

农业产业链化。2024年,裕安区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数达66家,其中有29家羽毛羽绒规模以上企业,积极推进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投入财政资金5421.97万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6亿元,新入驻生产经营主体23家。加快绿色食品加工园建设,新增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6家。松江区则重点从两方面发力。一是突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招引培育农业强链补链项目。沿叶新公路农业走廊和佘天昆公路农业走廊布局稻米加工点6个,浦远、森鲜、春强净菜加工基

地投入使用。二是稳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松江区共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4家,国家级合作社示范社4家。

乡村资金强保障。2024年,裕安区财政持续加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支出6452万元,占比达22.12%;各级财政衔接推进补助资金35690万元,投入25705.97万元用于农业特色产业项目发展,占比达72.03%。落实特色产业到村项目17774万元,到户产业奖补项目1269.22万元,小额贷款贴息及风险金1817.75万元,农田水利3045万元,休闲农业乡村旅游项目1800万元。积极协调银企对接,对经营主体开展茶叶鲜叶贷、育秧贷和插秧机专项贷,共发放贷款1995.82万元。松江区则保障和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推进“三力保障”。一是财力保障,坚持“三农”投入不减导向。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农业农村投入64.1亿元,同比增长9.82%。二是物力保障,落实乡村振兴用地。2024年共安排用地指标27公顷用于乡村振兴,占总量22%。其中,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占5.5%。三是人力保障,加强创新创业人才支撑。制定出台松江区农村创新创业人才选拔工作政策,选拔培育支农爱农、扎根乡村等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农业科技带头人9名。

3.3 共建特色

健全机制,实行高位推动。一是坚持专班推进。组建对口合作工作的“一办八专班”,每个专班由一名区委常委或副区长牵头负责,先后召开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及专题会等20次会议进行研究部署,有力有序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二是坚持系统谋划。认真做好“上海功课”、解构“松江需求”,每年年初印发重点任务计划,每月盘点、定期调度,推动议定事项清单闭环落实,累计谋划梳理88项重点措施,目前已完成75项。三是坚持高层互动。裕安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先后赴松江区沟通对口合作事宜21次,19家区直单位赴松江区实地对接66次,围绕产业协同、供需对接、干部交流等领域达成一批合作事项。

搭建平台,促进产业合作。一是推动产业项目承接。在产业链互补互促上开展靶向招引,近两年累计引进沪苏浙加工制造业项目56个、总投资超230亿元。与松江区经委合作,推动裕安区60家规模以上企业嵌入上海产业链、供应链,2025年上半年实现订单额3.99亿元。通过松江区合作交流办协调,2025年4月,巴比食品、春强农业、渔浪水产等农业龙头企业到裕安区实地考察,积极寻求战略

合作。二是推动园区合作共建。与松江泗泾镇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产业园区共建协议,积极推动高新区与松江经开区战略合作落实落地。两地农业部门联合共建“皋申智慧农业示范产业园”,目前已开展100余亩黑晶玉米、车厘子试验种植,2025年获评为“上海市生物育种示范基地”。三是推动基金资本互利。与松江国投合作设立总规模为5亿元的“吉六零松裕基金”,并正式进入运营期。

发挥优势,打造供应基地。一方面,充分发挥裕安区农产品特色鲜明的优势,积极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一是严格标准、稳定供应,大力开展农产品品牌认证提升行动。全区创建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6个,“徽六”六安瓜片、绿珍薯业、谷雨香茶叶等10家农业企业产品被纳入松江区“百县百品”集采名录。二是加强宣传推介,拓展农产品入沪销售渠道,组织品牌企业参加上海市系列展销活动,2025年1月至9月,裕安区农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额达12.25亿元,同比增长9.7%。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红绿资源富集的优势,积极打造红色旅游和绿色康养基地。一是加强红色传承。利用2023年度对口合作资金700万元,实施红色资源传承保护项目,社会效益明显。利用2024年对口合作资金500万元,对六霍起义纪念馆和部分革命旧址进行改造提升。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每年承办上海中小学生研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二是强化文旅互动。推动两地旅游企业共同开发旅游线路5条,开展“上海六安周末旅”活动,在上海地铁2号线车厢投放裕安文旅宣传片,利用公众号、抖音号等新媒体互推两地文旅资源。

加强交流,激发内生动力。裕安区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尤其与松江区对口合作视为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核心目标不仅是招项目、争资金,更重要的是借松江之“智”与“制”,全面激发裕安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人才培养上,引入上海交大教育集团师资,与六安天河职业学校合作,共同投资35亿元建设天河科技学院,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培养技能型人才2000余名。在科技创新上,推动中钢联、高迪环保、中科日升等16家企业与上海市高校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六安高新区加入G60科创走廊产业园区联盟,与上海启迪漕河泾孵化中心结对,2024年以来组织上海博士团队科技成果路演活动10场次,备案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9个,吸纳上海高校院所技术合同549万元。

4 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的困境分析

当前,裕安区与松江区开展对口合作,特别是在探索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调研显示,两地在对口合作中距离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需要予以关注。

4.1 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存在差异

在资源禀赋上,两地具有不同的地形特色,因此导致两地经济发展差异明显。裕安区属于典型的内陆地区,拥有丰富的山水资源和多样的地形,气候条件适合多样化的农作物种植,如茶叶、中药材等特色农业;而松江区位于长三角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气候条件适宜,便于农业大规模发展。在政策上,两地在乡村产业中都注重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具体政策支持方面有所不同。裕安区注重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实施土地流转政策,推动农旅融合,促进美丽乡村旅游发展;松江区得益于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更为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市场机制,重点发展产业园区、科技创新驱动的现代农业、数字化农业等。两地在自然资源和产业政策上的不同,促进了两地差异化发展和功能互补,但阻碍了要素流动,不利于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

4.2 合作交流机制亟需常态化

两地虽已签署合作协议,逐步探索具体的对口合作路径,但缺乏专职专人负责交流工作,使得双方在信息共享、项目对接、经验交流等方面不够及时和深入,导致定期会议缺失、联动机制不健全、信息交流不完善等。此外,两地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相互认可的政策框架,导致跨区域合作项目阻力较大,合作项目的审批、实施等环节效率不高。因此,行政壁垒仍是阻碍两地交流合作的重要因素,虽已建立合作框架,但需进一步细化、落实,才能形成合作共赢的良好格局。

4.3 技术和人才合作有待深入

两地合作意愿强烈,但由于两地在户籍制度、薪酬待遇、生活配套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高端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在流动上存在一定障碍。此外,松江区的农业教育和培训资源丰富,但缺乏专门针对裕安区的培训课程和实践机会,存在技术适用性难题。常态化合作机制和交流平台的缺乏,也让技术合作与人才交流难以系统化、持续化推进。两地缺乏固定的联络点和协调机制来促进技术转移、人才互访和经验分享。技术和人才是推进两地合作提质增效、促进两地生态绿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两

地都重视人才培养,但由于资金与资源投入不均、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阻碍了两地农业技术和人才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合作。

5 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的共建路径

新时代推进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应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为导向,着力破解区域协调发展难题,巩固和完善现有一体化发展机制,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裕安区与松江区的对口合作实践表明,生态绿色一体化作为新兴的绿色发展模式,推进主体结构一体化、制度机制一体化、区域利益一体化,在处置跨区域生态环境难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要从创新互动合作模式、强化政策制度供给、构建利益共融机制三方面一体推进。

5.1 理论维度:创新互动合作模式

生态绿色一体化是综合性、系统化的发展理念,强调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找到平衡点,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创新两地互动合作模式,促进主体结构一体化,为两地及长三角发展拓展更广阔的合作空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两地发展实际,通过区域合作探索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共建路径和合作模式。裕安区兼具高山、丘岗、平原等多种地形以及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孕育了百余种名特优农副产品,松江区则拥有大市场、大流通、大平台优势。在明确区位特色基础上发挥各自优势,补齐短板,探索形成松江研发+裕安制造、松江市场+裕安产品、松江总部+裕安基地、松江企业+裕安资源的“四+”合作路径,助力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健全跨区域合作机制。一是探索建立长三角乡村振兴合作机构或委员会,负责制定乡村振兴政策和规划,制定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实施方案,形成合力推动乡村振兴。二是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根据两地独特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具有特色的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三是积极鼓励社会各类企业参与乡村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加强人才交流和培训,深化区域人力资源合作,补齐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短板。一是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和交流机制,吸引和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管理、有爱心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实地考察、两地互访等方式,提高人才综合素质和

能力水平。二是鼓励人才在长三角自由流动和交流合作,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如发挥松江区制造业、养老服务等优势产业吸纳就业的作用,推进两地人力资源联动,开展人才协同培养和就业安置,为企业解决用工荒提供更多通道,探索形成两地人才培养与就业的联动机制。

5.2 制度维度:强化政策制度供给

坚持政府推动与企业推动相结合,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相协调,从自发性、松散性、低层次逐渐走向自觉性、紧密性、高层次,为此,要建立健全长三角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协调机构的作用,确保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一是制定和完善对口合作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推动两地搭建产销平台、引进农业龙头项目、签订农业合作协议等,共同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地,为乡村振兴一体化合作提供有力保障。推动松江区将裕安区重点农产品纳入政府集采平台,推动六安瓜片、固镇虾稻米、胜缘食品预制菜等名优品牌农产品参加松江“百县百品”现场直播带货活动,同时进驻农产品展销窗口。二是推动两地共同编制饲料加工、特色瓜果、苗木、产学研基地等项目投资计划。签订《对口合作产业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共建集产学研销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三是强化资金保障。充分发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作用,提高产业项目的资金占比,确保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创新金融支持和资金投入方式,加大对乡村振兴的资金投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创新试点,推出符合乡村振兴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同时,探索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激发社会各界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5.3 价值维度:构建利益共融机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推进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要借助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东风”,不断推进长三角农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在价值层面上,需要长三角各方发挥共建共享精神,探索构建利益共融机制,倡导城乡一体、共同发展,推动城乡资源、市场、公共服务等要素共享,促进长三角乡村振兴全面提升和全方位发展。

一是坚持以产业链构建作为重要路径。为实现错位发展和互动联系,推动裕安区和松江区在产业链构建上不断完善“补链”和“延伸”。按照优势互

补、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推动两地借助有利气候资源,结合合作共建的农业科研技术、人才、科技成果和创新平台等优势,推进农机装备研发、种业科学技术、数字信息服务等合作,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农机装备工程化协同攻关。二是持续深化对口合作优势,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进两地协同发展、合作共赢。三是探索建立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补齐农业生产效率短板。如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为契机,以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为抓手,整合科技优势力量,协同开展农业科技集成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四是探索乡村经济、生态、美学三大价值的有效实现形式和路径,努力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裕安模式”与“松江样本”。进一步强化乡村振兴一体化合作。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协作与配合,实现共赢发展。如鼓励松江区企业走进裕安区,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投资力度,依托当地农户打造农家乐,建设乡村旅游振兴标杆项目,带动消费和就业,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403.
- [3] TINBERGEN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M]. Amsterdam: Elsevier, 1954: 26.
- [4] GOTTMANN J. 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 Economic Geography, 1957, 33(3): 189-200.
- [5] 顾骅珊.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需提高协同度[J]. 环境经济, 2020(9): 32-35.
- [6] 张志胜. 多元共治: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201-210.
- [7]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N]. 人民日报, 2025-01-23(1). 责任编辑: 谢政伟

可口可乐文化符号在中国市场本土化转译的接受度实证研究

储江晗

(蚌埠工商学院 国际商务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在全球本土化背景下,跨国企业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其平衡“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能力,如何通过文化符号的有效转译实现本土认同,成为其市场成功的关键。聚焦中国大学生群体,通过文献研究梳理文化符号转译相关理论和可口可乐的本土化策略,并结合技术接受模型 TAM,运用 SPSS 26.0 和 AMO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实证研究其品牌文化符号在中国市场本土化转译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并得出具体结论。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文化环境、品牌执行及文化适配性对接受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符号设计因素影响不显著。基于此研究结果,建议可口可乐优化传播渠道、强化体验与设计融合,以进一步提升本土化转译的接受效果,并为其他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实施本土化策略提供参考,也为文化符号转译理论提供实证支持。

关键词:文化符号转译;接受度;影响因素;可口可乐

中图分类号:F713.55;F2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3-0108-07

Acceptance of Coca-Cola's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Localization Translation of China Market

CHU Jiangh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engb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localization, the succes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creasingly hinges upon their ability to balance “globalisation” and “localization”. How they achieve local identification through the effectiv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has become pivotal to their market success. Focusing on the cohort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t examined relevant theories on cultural symbol translation and Coca-Cola's localization strategies in this paper. Integrat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it employed SPSS 26.0 and AMOS software for data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explor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cceptance of the brand's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localized transl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market, drawing specific conclusions.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brand execution,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exer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acceptance, whereas symbol design factors show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is basis, it was recommended that Coca-Cola optimise it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experience and design. This approach w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ocalized translation,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undertaking localization practices in China, and offer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ori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Key words: cultural symbol translation; accept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Coca-Col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外资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带动、技术和

管理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因此,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的总体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2025-10-23

作者简介:储江晗(2001—),女,安徽蚌埠人,助教,硕士。E-mail:1035342754@qq.com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品牌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其平衡“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能力。于是,“全球本土化”策略随之诞生,成为跨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策略。其中,文化符号作为传递品牌价值、建立情感连接的关键载体,其在本土文化环境下的有效转译,对于跨国企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口可乐作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品牌之一,其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堪称全球本土化的经典案例。自1978年重返中国市场以来,可口可乐不仅保持了其“快乐”“分享”的全球核心品牌理念,更通过深入的本土化实践,将自身品牌文化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可口可乐从产品、包装、营销等多方面出发,对本土化转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这一转译过程使可口可乐在中国碳酸饮料市场长期保持35%以上的占有率,成为中国消费者认知度最高的国际品牌之一^[2]。因此,探究可口可乐公司的品牌文化符号在中国的本土化转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文献综述

1.1 研究概念和理论

基于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王连森^[3]提出,“符号”涵盖语言和非语言系统。文化符号作为承载特定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元素,包括语言、图像、节日等,对特定文化群体具有识别性并能引发情感共鸣。韩亚栋^[4]在研究中指出,“转译”源自语言学,旨在将文化理念与价值观转换为易于受众接受的形式。在本研究中,文化符号的本土化转译可以理解为全球文化符号与地方文化元素的融合过程。它不仅涉及语言转换或符号替换,更强调文化意义的本土创造性转化,使理念、视觉与情感诉求能够被中国受众理解与接纳。而可口可乐正是通过将其全球文化符号在中国进行本土化转译^[5],逐渐融入中国的文化环境,实现了全球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1.2 可口可乐文化符号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转译

在中国市场,可口可乐采用了多种本土化转译的策略对其全球文化符号进行转译,使其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环境。梳理近年关于此领域的文献发现,关于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采用的营销本土化策略的研究较多。王书特^[6]指出,可口可乐根据市场调研得知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料的需求,随即对产品线进行了调整,推出了无糖可乐以及酷儿、美汁源等非碳酸饮料。许惠文^[7]研究认为,可口可乐不仅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品的需求,并且在推出新品时注重场景营销,传递符号的实用价值,提升消

费者的购物体验感。程菲^[8]研究发现,可口可乐在春节档广告中将红罐可乐与福字、对联、灯笼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图案融合。陈科存^[9]认为,可口可乐在产品包装上也进行了创新,采用中国十二生肖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包装设计,这类包装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和喜爱。

可口可乐通过产品、包装、促销及广告等方面的本土化策略,有效契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加速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现有研究多从定性角度分析其文化符号的本土化转译,尚未深入探讨具体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缺乏定量层面的探究。因此,本研究将基于TAM模型与文化符号转译理论,构建接受度模型并展开实证研究,旨在探究中国大学生群体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本土化转译接受度的影响因素,进而为可口可乐在华的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本研究也希望为其他在华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本土化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与借鉴。

2 研究基础与研究模型

2.1 技术接受度模型

技术接受度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见图1)是解释和预测用户对新信息技术接受行为的经典模型^[10]。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该模型的核心因素,使用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使用意向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使用意向决定实际行动,使用态度和感知有用性共同决定使用意向,感知易用性则由外部变量决定。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课程思政^[11]、农业研究^[12]、数字农业产业链^[13]等领域,技术较为成熟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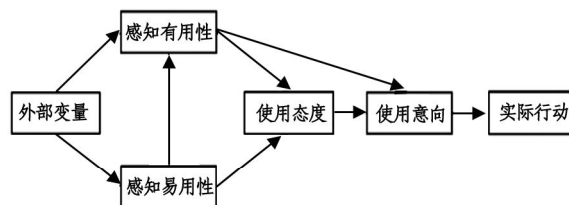


图1 技术接受度 TAM 模型

2.2 研究假设

本研究以 Davis 提出的 TAM 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并以大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拟探讨以下问题:大学生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在中国本土化转译的接受度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各因素与接受度的影响关系和程度如何?为精准解释文化符号转译的接受度,本研究在 TAM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符号设计

因素、文化适配性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和品牌执行因素4个外部变量,提出了假设模型(见图2),该模型可用于探究大学生群体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本土化转译的接受度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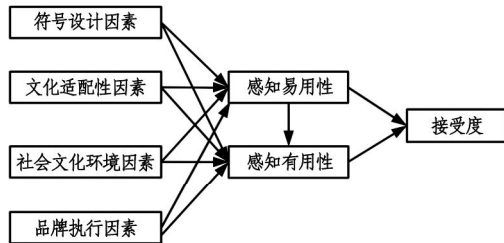


图2 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本土化转译的接受度假设模型

该模型指出影响技术接受度的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指用户认为使用该系统能提升其工作绩效的程度;另一个是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指用户认为使用系统的容易程度^[14]。感知有用性由感知易用性和4个外部变量共同决定,并且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影响被调查者的接受度,最终影响其实际行动。综合以上模型,本研究将接受度作为模型的最最终变量,围绕“大学生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本土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提出11个假设,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假设表

假设编码	假设内容
H1	符号设计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易用性存在正向影响力
H2	文化适配性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易用性存在正向影响力
H3	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易用性存在正向影响力
H4	品牌执行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易用性存在正向影响力
H5	符号设计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力
H6	文化适配性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力
H7	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力
H8	品牌执行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力
H9	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存在正向影响力
H10	感知易用性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接受度存在正向影响力
H11	感知有用性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接受度存在正向影响力

3 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

3.1 问卷设计

本研究共有7个结构变量,每个结构变量包含3个测量变量,合计21个测量题项,如表2所示。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信息,主要包括性别、年级、专业和消费频率4个题项;第二部分

在技术接受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研究需要,围绕符号设计因素、文化适配性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品牌执行因素、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接受度7个维度设计21个测量题项。调查问卷合计25个题项,问卷测度项采用李克特的7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表2 调查问卷及编码表

结构变量	序号	编码	测量内容
感知易用性	1	PEOU1	我能理解可口可乐在中国推出的本土化包装/活动传达的信息
	2	PEOU2	我觉得可口可乐的本土化元素容易让我产生联想
	3	PEOU3	我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就能接受其本土化设计
感知有用性	4	PU1	我觉得可口可乐的本土化设计让我感到更亲切、更有共鸣
	5	PU2	我认为这些本土化策略增强了可口可乐品牌在中国的吸引力
	6	PU3	本土化设计让我更愿意在社交场合选择可口可乐产品

续表
表2 调查问卷及编码表

结构变量	序号	编码	测量内容
接受度	7	UI1	我愿意购买具有中国本土化设计的可口可乐产品
	8	UI2	我会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或分享可口可乐的本土化营销内容
	9	UI3	我会向朋友推荐本土化设计的可口可乐产品
符号设计	10	DES1	我认为可口可乐的本土化设计与中国当下流行文化结合得很紧密
	11	DES2	我觉得其本土化设计在保留全球品牌特色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元素
	12	DES3	我喜欢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本土化尝试
文化适配性	13	CUL1	我认为可口可乐的本土化策略很好地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
	14	CUL2	我觉得可口可乐的本土化尝试是尊重中国文化的
	15	CUL3	我认为可口可乐的本土化设计与其全球品牌形象并不冲突
社会文化环境	16	SOC1	我周围的朋友对可口可乐的本土化设计大多持正面态度
	17	SOC2	社交媒体上的意见对可口可乐本土化的评价会影响我的看法
	18	SOC3	我对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努力持积极看法
品牌执行	19	BRA1	我在线上线下多个渠道都能接触到可口可乐的本土化营销信息
	20	BRA2	我认为可口可乐的本土化策略是长期持续的,而非短期促销
	21	BRA3	我认为可口可乐的本土化策略是成功的

3.2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通过问卷网站问卷星进行问卷设计,面向笔者任教院校的大学生群体,通过网络链接、微信二维码等渠道发放问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共回收问卷220份,剔除作答时间短、IP地址重复或极端数据,获得有效问卷203份,问卷总体有效率为92.27%。基本描述信息包括受访者性别、年级及专业。从样本分布来看,性别上,男生107人、女生96人,分别占调查对象的52.71%和47.29%;年级上,大一40人、大二69人、大三69人和大四25人,分别占比19.70%、33.99%、33.99%和12.32%;专业上,文史艺类73人、理工类89人、经管类35人、其他专业6人。可口可乐消费频次,每周多次33人、每周1-2次92人、偶尔喝58人和几乎不喝20人,分别占比16.26%、45.32%、28.57%和9.85%。下面采用SPSS 26.0统计分析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数据分析。

3.3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是对量表的一致性、可靠性进行分析,在检验问卷信度时,通常采用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判断信度高低的度量标准^[15]。其中 $\alpha > 0.6$ 是量表信度最小的可接受值,高于0.6时值越大表明信度越高,一般 $\alpha > 0.8$ 时说明量表信度非常好^[16]。由表3可知,调查问卷各变量和总体的Cronbach's α 系

数介于0.854至0.899之间,均高于0.6的标准,表明问卷数据具有足够的信度,且内部一致性较好。

效度用于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指测量工具能准确测出所要测量事物的程度^[15]。首先,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检验问卷效度,即采用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这两个最常用的指标,来检验样本数据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SPSS 26.0分析结果显示,问卷各变量和总体的KMO值均大于0.7, 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均小于0.05,甚至小于0.001,说明问卷数据具有很好的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本研究采用聚合效度进行分析,即检验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大于0.6)^[17]、平均方差萃取量(AVE > 0.5)、组合信度(CR > 0.7)^[18]。其中采用AMOS检验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运用公式(1)和(2)计算得出AVE和CR。由表4可知,本研究的7个潜在变量对应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7,AVE值均大于0.6,CR值均大于0.8,表明所有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AVE = \frac{\sum_{i=1}^p \lambda_i^2}{p} \quad (1)$$

$$CR = \frac{(\sum_{i=1}^p \lambda_i)^2}{(\sum_{i=1}^p \lambda_i)^2 + \sum_{i=1}^p (1 - \lambda_i^2)} \quad (2)$$

表3 问卷及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表

变量代码	变量名称	项合计	Cronbach's α 系数
PEOU	感知易用性	3	0.865
PU	感知有用性	3	0.854
UI	接受度	3	0.880
CUL	文化适配性	3	0.866
DES	符号设计	3	0.899
SOC	社会文化环境	3	0.897
BRA	品牌执行	3	0.862
总体	总体	21	0.863

表4 验证性因子分析

潜在变量	观察变量	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	平均方差萃取量 AVE	组合信度 CR
感知有用性	PU1	0.792	0.659	0.853
	PU2	0.828		
	PU3	0.814		
感知易用性	PEOU1	0.875	0.680	0.864
	PEOU2	0.803		
	PEOU3	0.794		
文化适配性	CUL1	0.844	0.682	0.865
	CUL2	0.859		
	CUL3	0.772		
品牌执行	BRA1	0.772	0.674	0.861
	BRA2	0.826		
	BRA3	0.863		
符号设计	DES1	0.843	0.748	0.899
	DES2	0.892		
	DES3	0.858		
接受度	UI1	0.832	0.710	0.880
	UI2	0.870		
	UI3	0.825		
社会文化环境	SOC1	0.855	0.740	0.895
	SOC2	0.861		
	SOC3	0.864		

最后,采用区分效度测量研究中各变量是否具有独特性且能被有效区分。如表5所示,对角线加粗数值为各变量 AVE 的平方根,非对角线数值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从表中分析得出,所有变量的 AVE 平方根均明显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例如,“感知有用性”的 AVE 平方根为 0.659,远高于其与“感知易用性(0.147)”“文化适配性(0.233)”等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因此,本研究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5 区分效度分析

变量名称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文化适配性	品牌执行	符号设计	社会文化环境	接受度
感知有用性	0.659						
感知易用性	0.147	0.680					
文化适配性	0.233	0.104	0.682				
品牌执行	0.314	0.286	0.169	0.674			
符号设计	0.211	0.284	0.264	0.236	0.748		
社会文化环境	0.211	0.219	0.162	0.321	0.308	0.740	
接受度	0.301	0.159	0.173	0.081	0.195	0.100	0.710

4 研究结果

本研究通过 AMOS 软件的分析结果,得到结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 Estimate,并通过 SPSS 26.0 软件求出显著性概率 P 和表示自变量可解释因变量的变异值 R^2 ,从而求出影响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本土化转译接受度的各类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研究结

果如表 6 所示,社会文化环境和品牌执行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易用性有显著影响,即假设 H3 和 H4 成立;文化适配性和品牌执行因素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即假设 H6 和 H8 成立;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对接受度也具有显著影响,即假设 H10 和 H11 成立;其余的假设均不成立。

表 6 结构模型验证结果

假设编码	路径关系	Estimate	S. E.	C. R.	P	验证结果	R^2
H1	PEOU < - - - DES	0.051	0.076	0.676	0.499	不成立	
H2	PEOU < - - - CUL	0.076	0.078	0.980	0.327	不成立	0.105
H3	PEOU < - - - SOC	0.168	0.074	2.260	0.024*	成立	
H4	PEOU < - - - BRA	0.267	0.082	3.254	0.001*	成立	
H5	PU < - - - DES	0.125	0.066	1.884	0.060	不成立	0.140
H6	PU < - - - CUL	0.169	0.069	2.456	0.014*	成立	
H7	PU < - - - SOC	0.076	0.066	1.166	0.244	不成立	
H8	PU < - - - BRA	0.210	0.075	2.820	0.005*	成立	
H9	PU < - - - PEOU	0.063	0.073	0.862	0.389	不成立	
H10	UI < - - - PEOU	0.151	0.072	2.085	0.037*	成立	0.111
H11	UI < - - - PU	0.277	0.086	3.226	0.001*	成立	

注: * 表示 $P < 0.05$ 。

5 结论与建议

经过模型验证,假设 H3、H4、H6、H8、H10 和 H11 成立,假设 H1、H2、H5、H7、H9 不成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文化环境、品牌执行、文化适配性 5 个潜在变量均值较高,说明大学生对可口可乐文化符号在中国的本土化转译接受度较高,可口可乐实施的本土化转译措施可行且有效。

根据假设检验结果,可口可乐在中国进行的本

土化转译策略效果较为显著。从检验结果分析看,其本土化转译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优化,进而更有效地提升其文化符号在中国的接受度,达到销售额提升的目的。

一是优化传播渠道,增强符号接触的便利性。根据假设检验结果,品牌执行因素对感知有用性有显著影响,对感知易用性无显著影响,说明可口可乐在品牌执行方面应降低认知门槛,多选择中国消费者喜爱的社交平台进行内容推广,采用符合其语言习惯和互动形式的传播方式,增强符号接触的便利

性与趣味性,从而提高人们的购买意愿。

二是在营销活动中加强体验与设计一体化。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均对接受度有显著影响,说明可口可乐需要在营销活动中同步优化易用性与有用性。例如,在推出城市限定包装时,应配套设计瓶身的AR码,用户通过扫码即可参与数字化互动,让产品设计与有趣体验融为一体,最大限度提升用户的体验感。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的讲话(全文)[EB/OL]. (2025-03-28)[2025-08-15].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3/content_7016262.htm.
- [2] 朱琳. 可口可乐中国市场营销营收超预期[N]. 经济日报, 2025-02-17(4).
- [3] 王连森. 基于符号学的“整体品牌”概念[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5): 72-76.
- [4] 韩亚栋.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J]. 新西部, 2019(S1): 130.
- [5] ROBERTSON R.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J]. Global Modernities, 1995(1): 25-44.
- [6] 王书特. 可口可乐公司发展策略与商业模式分析[J]. 中国市场, 2022(32): 88-90, 198.
- [7] 许惠文. 可口可乐之变: 用场景营销驱动营销升级[J]. 销售与市场, 2025(4): 8-17.
- [8] 程菲. 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消费群体对品牌认同的影响机制[J]. 全国流通经济, 2024(10): 16-19.
- [9] 陈科存. 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企业本土化路径分析[J]. 商业观察, 2024, 10(18): 97-100.
- [10] DAVIS F D.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 MIS Quarterly, 1989, 13(3): 319-340.
- [11] 胡晓平, 张传明. “学习强国”融入课程思政教学的接受度实证研究[J]. 黑河学院学报, 2024, 15(1): 92-94.
- [12] 潘国林, 胡含秀, 汤关清, 等. 粉煤灰配施下人造土壤性质特征及苜蓿生长影响因素研究[J]. 蚌埠学院学报, 2025, 14(2): 10-18.
- [13] 郑谦, 薛满峰, 胡娜. 小农户衔接数字农业产业链的影响因素及模式异质性分析[J]. 蚌埠学院学报, 2025, 14(1): 36-43.
- [14] VENKATESH V, DAVIS F D.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J]. Management Science, 2000, 42(2): 186-204.
- [15] 李振龙, 邢冠仰, 李佳, 等. 基于扩展TAM的车路协同系统驾驶人接受度研究[J]. 中国公路学报, 2021, 34(7): 188-200.
- [16] 张文彤, 董伟. 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17] JOE F H, CHRISTIAN M R, MARKO S. PLS-SEM; indeed a silver bullet[J].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 19(2): 139-152.
- [18] 刘喆. 基于TPB和TAM模型的教师信息化教学行为[J]. 现代教育技术, 2017, 27(3): 78-84.

责任编辑: 张晓娜

(上接第100页)

- [3] 普文芳, 魏美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及传承人意义[J]. 学术探索, 2014(4): 119-122.
- [4] 王燕妮. 中国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研究[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5(2): 115-120.
- [5] 邢娜, 王庆庆, 张丽, 等. 乡村振兴视域下徽州民俗体育的现代传承困境与发展对策研究[J]. 宿州学院学报, 2023, 38(5): 35-40.
- [6] 牛芳, 卢玉, 陈小蓉.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徽州民俗体育的传承——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例[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4, 38(3): 58-61, 72.
- [7] 王国凡. 徽州民俗体育文化[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58-66.
- [8] 李谋涛, 彭成根, 胡小勇.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徽州民俗体育的发展研究[J]. 黄山学院学报, 2019, 21(5): 90-93.
- [9] 卢玉. 文化产业视野下徽州民俗体育的旅游开发[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38(2): 186-191.
- [10] 周悦, 程秀珺, 石建飞. 鱼越徽梦——徽州非遗鱼灯元素和现代设计的融合[J]. 新楚文化, 2025(11): 29-31.
- [11] 崔涛. 民俗体育助推乡村振兴价值审视与实施路径[J]. 体育文化导刊, 2021(12): 58-65.
- [12] 赵响, 孔令南. 乡村振兴视阈下川西民族地域民俗体育发展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径[J]. 四川戏剧, 2021(12): 122-125.
- [13] 徐加豪, 陈家起, 高奎亭, 等. 数字游戏赋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转向[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5, 41(2): 53-63. 责任编辑: 寇国庆

“尊道贵德”：老庄的生命价值观

闫伟^{1*}, 余武丞²

(1. 铜陵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61; 2.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先秦老庄道家将生命价值的源头归于“道”与“德”,从人的类存在与个体性存在的角度确立起“生命至上”的价值本位意识。老庄“生命至上”的价值观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主张“不以物易己”,在与外物的比较中追求生命本身的终极意义;二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性作为“善”的实质内容,在宇宙视域内突出生命个体的独立价值。庄子抹杀个体间死亡的区别、批判为仁义而死的行径,体现出道家死亡价值观具有虚无主义的思想特质。

关键词:老庄;生命价值观;“道”;“德”;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6)03-0115-07

Respecting the Dao(“道”) and Valuing De(“德”): Laozi and Zhuangzi's View about Value of the Life

YAN Wei^{1*}, YU Wuche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244061, Anhui; 2. Hube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Wuhan, 430062, Hubei)

Abstract: Taoist school represented by Laozi and Zhuangzi attributed the source of the value of life to Dao(道) and De(德), and established the value-based consciousness of “Life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human's collective existence and individual existence. The Taoist value of Life First was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e was the advocacy of “Not Sacrificing Oneself for External Things”, and the pursuit of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life itself in comparison with external things. The other was taking the value of life existence as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Shan(善), and highlighting the independent value of individual liv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niverse. Zhuangzi's obliter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death among individuals and his criticism of the act of dying for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t can be seen that Taoism has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ihilism in its values of death.

Key words: Laozi and Zhuangzi; the values of life; Dao(道); De(德); Nihilism

先秦时期,与孔孟儒家具有崇高的死亡价值观不同,老庄道家注重生命个体的本然价值,死亡几乎没有价值可言。老庄生命价值理念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他们确立生命的价值不像儒家那样立足于“人”的群体性与社会性,而是从“人”的个体性角度出发谈论人的死亡;另一方面,老庄价值哲学的终极根源在于“道”与“德”,这就决定了他们基于“尊道贵德”的自然观念将生命的价值意义指向了生命本身。老庄在价值取向上具有超越世俗的一面,在

批判世俗“以物易己”的价值理念的同时,也坚持了“生命至上”的价值本位意识。另外,由于老庄注重生命个体的本然价值,相对忽略了生命的社会价值及其社会属性,故在死亡价值观念上具有虚无主义^①的特质。

1 生命本然价值观的确立依据

老庄的生命价值观致力于生命的本然性,这与儒家生死价值观重在生命的社会伦理性是不同的。

收稿日期: 2025-10-1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铜陵学院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24tlxyrc43);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2024AH053411)。

作者简介: 闫伟(1989—),男,山东新泰人,讲师,博士。E-mail: 13562814130@163.com

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学者重视生命的社会性,所以在阐发生命价值理念时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证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儒家具有崇高的死亡价值观念,可以为仁义礼等道德规范的取得而付出生命,是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合礼而死”。而老庄则与此迥异,他们确立生命的价值性是从更大范围内进行考量的,绝不仅限于人的社会属性。余英时说:“道家的哲学以生的观念为核心而建立,不仅将生想象为弥漫整个宇宙的‘气’,而且也将它想象为个体的生命过程。”^[1]余英时认为老庄生命价值观的立论角度是“宇宙”,是着眼于“气”之于宇宙万物的物质本体性而言的,是在“气化生死”的基础上窥视生命的生死过程的结果^②。所谓“个体的生命过程”主要强调了老庄在看待生命价值时侧重于“人”的个体属性。一般而言,“人”的存在属性可以分为“类存在”“群体存在”与“个体存在”,儒家以社会伦理道德价值作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是立足于“人”的群体性存在;而老庄则以生命本身作为终极价值追求,乃是立足于“人”的类存在与个体性存在,也就是余英时所谓道家将生命“想象”为“宇宙”与“个体”两个层面。在老庄哲学中,若从“宇宙”与“个体”的层面探究生命的本质与价值来源,最终可归结至“道”与“德”两个哲学范畴上。

一者,老庄所谓“道”是包含天地万物在内的宇宙本根性的存在,它既是生命的生成根据,也是生命价值的来源依据。老子谓“道”为“天下母”“天地根”,庄子言“道”为“本根”“本原”,他们皆将“道”视为天地之物的“母亲”,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的终极源头。在老庄那里,生命依“道”而生,也因“道”而具有了自身的价值。蒙培元论及老子的“道”时提出“道”是“一种潜能或潜在性存在,是一个价值本体”^{[2]116}。陈鼓应也说:“道家将‘道’视为‘天下母’——一切价值的源头。”^[3]生命具有价值意义的前提是生命本身的存在,没有生命,何谈生命的价值。因此,不管是人的社会价值,还是人的自然价值,都是以生命存在为根据的。老庄将“道”置于一切生命的终极本原,所以“道”当然是生命的终极价值来源,这与其生命本原论是相一致的。

二者,老庄以“道”确立生命价值,基于“道”的超验性将生命价值指向了生命自身,“道”通过“德”作用于人的过程中也凸显了生命的本然性价值。作为生命终极根源的“道”是超验性的,是不能用感官进行认知与把握的,依于“道”而产生的生命价值也是不能被人所规范的,它只能归向于生命自身。另

外,生命的价值由“道”而生,“道”通过“德”具体内化于“物”的过程中由“性”内含于生命之中。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4]141},庄子言“物得以生谓之德”^{[5]382}，“德”在生命体中是“道”的延续,是万物得之于“道”的结果。与从“道”的超验性看待生命的价值一样,从“德”的层面看待生命的价值也是无法被人的感官所触及的,因为“德”与“道”同样无形无状。故而,生命的价值存在于生命之内,生命的价值意义也只能是生命的自身,即生命的自然性、本然性的价值。

三者,老庄之“道”是具有等同于或超越于宇宙范畴的存在,从“宇宙”的角度俯视人的生命价值,得到的也是生命的本然性价值,这是庄子所谓“道通为一”的必然结果。依据价值关系的实质,有学者以庄子为例论证了道家生命价值观的这一特点:“主体(人)与生命体自身、生命自身产生的根源(‘道’)、生命体自身所处的场域(宇宙与物)之间的意义关系中,主体(人)保全生命自身而合于德、通于道、与道为一时,生命的价值最终归向于生命自身。”^[6]“道通为一”出自《庄子·齐物论》,是以“道”的视角看待“物”,义在“无穷物之异状,以道言之,皆通为一”^{[7]42}。“物”在老庄哲学中,意义较为广泛,人与非人、他人与社会、自然与宇宙皆可包含其中。以“道通为一”为思想基础分析生命的价值表明老庄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尺不仅仅是自己、他人及社会,更有非人的自然乃至整个天地宇宙,因为“一”是指人与他者的联系,而不是人与他者的区别。儒家以道德的有无区分人与物,而老庄则“在人与自然物的联系中来确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确立人的生命价值”^{[8]203},所以老庄追求的自然是生命本身的固有价值,即生命的本然性价值。

四者,从“道”的层面审视老庄的生命价值观,即以“宇宙”观看生命的目的与意义,并立足于“人”的类存在而言的,但老庄又尤为注重生命的个体性,这是就“人”的个体性存在而言的,其在老庄哲学中的体现,即“德”之于生命的价值作用:

一方面,“德”与“道”一样,成为老庄生命价值观得以确立的依据。生命由“道”而生,也以“道”为价值终极依据,而“德”亦与生命价值关系密切。老子庄子论“德”多与“人”相关联,“德”与“形”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多侧重于“德”之于生命的价值意义。由于“德”成就“物”的内在性质,万物“尊道贵德”的原则已经蕴含了生命“贵”于木石等非生命事物的思想,这是生命价值得以确立的重要方面。相较老子,庄子在以“德”为根据彰显生命价值的方面较

为突出与明显。“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5]366}“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5]713}在庄子看来，生命的可贵固然来源于“道”，但能够“通于天地者”乃是“道”内化于人生命之中的“德”。庄子将“道”“德”“性”并列，提出三者之间的相通关系，而重点在于生命与“德”的价值关系，所谓“生者，德之光也”意在说明生命因“德”而极富价值，生命是“道”通过“德”施化宇宙万物的过程中最有价值意义的“杰作”。质言之，生命因有“德”而有价值，“有德则润身，故云‘生者，德之光’”^{[9]304}便是此义。另外，庄子在《德充符》中塑造了多位身形残缺但德性丰盈的“兀者”，如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等，他们最大的人格特征是“才全德不形”，实质上就是庄子所谓“全德”之人。“兀者”虽然形残但“全德”，是庄子给予肯定的人物形象。“德在内则成身，施于外则和物”^{[10]212}，“德”之于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成身”，还在于“和物”。故庄子在《天地》中言：“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5]393}显然，在庄子的生命理念中，“道”是生命的产生者与价值终极依据，而“‘德’是生命的内在特质与价值存在方式”^{[11]184}。

另一方面，基于“德”之于万物的内在性，老庄凸显了生命的个体性以及生命价值的本然性。老庄将“道”作为生命的本根，而“德”成为生命之内在属性，故对于生命来说，“道”是抽象的、普遍且一般意义上的生成本原，而“德”则是内在的、特殊且具体意义上的“成和之修也”^{[5]197}。由此，如果说“道”成就的是类存在的“人”之生命，那么“德”成就的就是主体性或个体性的生命存在，“‘道’必须落实到人生问题，实现主体性的‘德’”^{[2]117}。再者，“德”成就个体生命之“性”。庄子说：“性者，生之质也。”^{[5]713}钟泰云：“庄子言性，有纳性于生之中，即合生与性而言之者……要之生之谓性，性与生义本相通。”^{[7]545}其实不仅庄子，老子亦是如此，个体生命的价值通过“性”（由“德”所成就）欲以实现的绝不是人伦道德之性，即生命的社会价值，而是生命自然之性，生命本然之性，也就是生命的本然价值。林希逸注解庄子“性者，生之质也”时说：“性，在我者也；质，本然也。”^{[12]368}林氏所谓“我”是主体之“我”、个体之“我”；所谓“本然”指“德”，成就的乃是生命的本然性价值，即生命的自身价值。

2 “生命至上”的价值本位意识

老庄生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对人之生命本然

价值的肯定，这主要体现在老子庄子在价值取向上具有超越世俗的一面，即对世俗常人所苦苦追求的身外之物持有排斥、鄙夷的态度，在生存方式上持有“全生保身”“自由逍遥”的基本原则。质言之，立足于“人”的类存在与个体性存在，老庄的生命哲学致力于生命本然性价值的终极意义，因而具有“生命至上”的价值本位意识。

老庄“生命至上”的价值本位意识与其人生价值判断有关，即与生存方式的选择相关。有学者指出：“价值判断是辨别事物什么是有价值的和最有价值的，也是辨别什么样的人生有意义和最有意义。”^{[13]101}在生命价值的范围内，“价值判断”中的“价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用”，对谁有用呢？当然是指生命体自身，即生命个体。先秦时期，与儒家的价值取向多侧重于个人伦理道德层面的完善建设不同，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生命为本位，追求生命自身的价值，其生命价值的终极选择当是庄子所谓“全生”“保身”与“尽年”。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4]125}面对“名”“货”“得”等身外之物，老子认为这些事物与“身”即人的生命体相比，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相比老子，庄子对名利富贵，甚至是儒家倡导的仁义道德等价值取向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身外的事物与生命本身相比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最有价值意义的。在《骈拇》中，庄子针对“今俗所为与其所乐”（《至乐》）即世人苦苦寻求名利等外在事物的行径展开了批评：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5]293}

在庄子看来，名利等事物是世俗之人欲以获取的价值之物，人们趋之若鹜，甚至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是一种“伤性以身”的行为。“以物易性”的表现是沉溺于“物”，改变了自己的自然之性，甚至不惜丧命。庄子认为人不管是为何而死，都是以牺牲生命来换取身外之物，这是对生命的践踏与轻视。“殉”，义为“以死赴之”，也就是以丧失自己生命的方式博取他物。钟泰释曰：“以身从之，至死而不恤。”^{[7]192}杨国荣也说：“‘殉’意味着牺牲个体的生命。”^{[14]203}对于庄子而言，名、利、家、天下等皆为“身”外之物，其价值根本无法与个体生命相提并论，世人为此殒命实属可悲，他在《让王》篇中疾呼：“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

岂不悲哉。”^{[5]851}从庄子“身”重于“物”的观念看，他显然是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林疑独注解此文时就认为名利而死者“皆未知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而所逐者惟外之尘垢粃糠耳”^{[10]364}。由此，庄子与老子一样，并不以这些身外之物作为自己的价值归宿，而是以生命自身作为自己的终极价值取向。

庄子言“不以物易其性。”所谓“性”乃是指人的天生之性、人的自然之性、人的本然之性，实际上就是代指人的生命体。郭象注“以物易性”云：“失其自然之素。”^{[5]177}褚伯秀也说：“以物易性，逐伪丧真。”^{[10]365}“真”者，自然之性也，与郭氏所谓“自然之素”同义。《庚桑楚》中，庄子指出“性者，生之质也”^{[5]713}，故“性”本质上是生命之性。对此，徐复观认为“生之质，即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不离乎形，但亦非仅仅是形”^{[15]339}。在庄子的生命体系中，生命体的构成不仅仅只有“形”，亦有“心”“神”“性”（“德”）等等，这些因素共同组成人的“生命”。庄子认为名利等物是“残生伤性”之属，对此提出批评，说明他所看重的实则是生命本身。

另外，庄子“生命至上”的价值本位意识还可以从他对“善”的认定中看出。

《至乐》篇有云：“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5]542}“善”在传统哲学中是一个具体的价值概念，与“恶”相对存在，庄子所谓“善”亦是如此。庄子以“善”与“不善”规定“烈士”，乃是出于生命本然价值的考量；说“烈士”为“善”是基于其“足以活人”，也就是保证了他人生命的存在；说“烈士”为“不善”是基于其“不足以活身”，也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为此，庄子特意以伍子胥为例对“烈士”进行最终的价值评价，“子胥争之，以残其形；不争，名亦不成……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諛諛然如将不得已”^{[5]542}。成玄英说：“諛諛，趣死貌也……贪求至死，未能止息之也。”^{[5]543}在庄子看来，“烈士”虽然在“足以活人”的层面上可谓“善”，但“烈士”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们欲以获得好名。因此，“烈士”所求者依然是“俗之所乐”，这与庄子“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相悖，故“烈士”在庄子那里终究属于“不善”者。其实，不仅是“烈士”所求之“名”，庄子将世俗“所尊者”“所乐者”都判定为与“其为形也亦愚哉”（《至乐》），即对生命体有害的事物。故而，庄子之于“善”的评定标准无疑是立足于生命存在的价值原则，“作为‘善’的实质内容，生命的意义进一步在价值原则的层面得到了确认”^{[14]204}。基于此，联系庄

子“不以物易其性”的观念可知，庄子对丧生于名利的俗人（也就是代指一种错误的人生价值取向）展开批评，认为他们不应为了满足一些欲望而付出生命。在批判世俗的、错误的、有伤生命本性的价值取向之后，庄子于《养生主》篇首以“逐知”为例揭示了他心中认为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5]108}

对这段文字，钟泰解释说：“此一篇大旨，亦一书大旨也。‘随’犹逐也。逐知即逐物也。”^{[7]65}钟氏以“逐物”释解“随知”，可谓得庄子学说之精妙。“已而为知”，只是庄子对俗人疲命追逐身外之物的象征性说明，庄子从文字表义上警戒世人不可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而其本意则是以批评“逐物”的方式确立起以生命价值为终极价值追求的人生价值理念。在此，庄子用一个“殆”字道出了“逐物”对生命的危害。“殆”，诸家多释义为“危”，所“危”者当指生命之“身”也，褚伯秀称其为“切身之害”^{[10]114}，憨山谓其为“劳心悴形”^{[16]59}，王先谦则言其为“以物为事，无益于性命”^{[17]41}。出于对生命的珍视，庄子才说“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并以此提出了养生原则与养生目的，即“缘督以为经”与“保身”“全生”“尽年”。换句话说，庄子正是从肯定生命价值的立场出发，才一再突出养生对于个体的价值意义。

关于庄子的生命价值理念，从史书典籍中也可寻得踪迹：一是《秋水》篇中，庄子以神龟“宁生而曳尾涂中”也不愿“死为留骨而贵”的比喻拒绝楚王的聘请；二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庄子以“郊祭之牺牛”不如“游戏污渎之中自快”的“孤豚”言明自己“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价值观。这两个关于庄子不仕的“故事”所表达的寓意是一致的，即“庄子认为生命本身的价值才是至上的，绝不能因为权势尊位而丧失自己”^[18]。为此，庄子尤为注重生命的价值，在意“全生避害”，在生命与“物”的选择中果断选择前者，主张“不以物易己”^{[5]750}，“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5]495}。实际上，不只是庄子，整个先秦道家哲学都有“贵己”与重视生命价值的思想传统。如冯友兰认为杨朱“贵己”、《老子》“贵以身为天下”、《庄子》“不以物累形”皆可证明“‘为我’是贯穿于道家各派的一个重要思想”^[19]。杨朱有“贵己”与“为我”的观念，“己”与“我”在道家那里均是指生命个体，而在生命哲学的

视域内,“贵己”之“己”与“为我”之“我”都可代指自己的生命本身,故老子和庄子对生命本然性价值的重视是其生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特质。

实际上,对生命价值意义的理解,道家与现代存在主义者的观念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海德格尔提出“本真的向死而在”,向死而在即向着终结者的存在,是此在的生存方式。所谓“终结者”就是死亡,死亡被海德格尔名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与不可能的可能性”。此在之“此”意味着个体的独立与自身,只有死亡才是体现“此”最为贴切的。“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而在这种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20]263}“只有当此在是由它自己来使它自身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此在才能够本真地作为它自己的而存在。”^{[20]302}只有死亡才可以让沉沦(非本真)中的此在超拔出来,成为真实的自己,为自己本真地存在着。海氏哲学中的“本真的存在者”无疑是指透过死亡突出生命本身的价值意义,这里指向的当然是生命的本然性。

老子、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观重心在于“以死观生”,即通过死来彰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对于常人来说,死是一种悲哀,是一切的消失,但对于哲人来说,“正是因为死的存在才可以让人理解生的意义,才可以使人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可能”^[21]。由此,道家与存在主义者看重的都是生命的本然价值,即海德格尔将生命个体称之为“此在”的真正意义所在。

3 虚无主义的死亡价值观

老子庄子依凭“道”与“德”从“宇宙”与“个体”两个层面确立起以生命本然价值为人生终极价值的观念,这与儒家以道德价值为本位的生死观截然不同。在儒家生命哲学中死亡的价值是崇高的,而在老庄生命价值观念中死亡的价值几乎为零,其死亡价值观念带有虚无主义的特征。究其根本,这是因为老庄生命价值指向的是生命本身,强调的是生命的本然价值;儒家注重生命的社会性与伦理道德价值,并不是从生命个体角度看待生命的价值,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层面看待生命的价值,在死亡价值观上儒家亦如此。

虽然老庄生命价值理念中死亡的价值为零,没有儒家“死得其所”式的崇高价值,但这种抹杀死亡价值的生命理念也可看作是道家独特的死亡价值观。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如《至乐》篇中,梦中的庄子与髑髅就死后的“南面王乐”

与活着时的“人间之劳”的对话,有学者认为“死亡是对人生负累的解除,死亡因此具有了生命的价值,庄子是从生命本身的意义肯定死亡的价值”^{[8]170}。《至乐》篇中,庄子确实描绘了“生苦死乐”的生死情景对比,诉说现实中的人生会遭遇种种苦难,而死后没有负累与重压,犹如君王一般。但是由此认为“死”具有生命所赋予的价值,“死”是对现实人生痛苦的解除,庄子从“生命本身的意义”层面肯定“死”之于“生”的价值,并认为死亡价值等同于生命价值的观点是不合理的。死亡价值是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但这并不等于说死亡价值就是生命价值。庄子《齐物论》《至乐》等篇章中确有“生苦死乐”的思想观念,但这不过是庄子将现实生活的困苦在精神层面转化为安乐、自由的结果而已,并不能称其为死亡的价值,充其量是庄子通过打破死亡的未知性化解常人“悦生恶死”情结的一种手段而已。由于死亡的个体性使得死亡成为一个未知的谜,故人们可以想象死后世界比现实世界美好,但也有可能死后的世界比生前的世界更加痛苦、可怕,庄子只是选择描绘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因此,庄子的“生苦死乐”观念不是对死亡价值的阐发,而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超越方式。诚如刘明所说:“如果它是死亡价值,道家就会为此去付出生命,但老庄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为了追求死后的快乐去死。”^[22]死亡价值的成立是以生命的付出为代价,假如《至乐》中的死后安乐是一种死亡价值,庄子必定会为了得到这种快乐而叫人去死,但事实上庄子不仅不鼓励人去死,而且在教人如何养生以求“全生”“保身”与“尽年”。因而,以庄子虚构出的“南面王乐”作为死亡价值是不合理的,这与“死亡价值”的概念并不相符,而它也不是从“生命本身意义”上赋予死亡以价值,因为死后的安乐、逍遥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庄子自己的、脱离实际的虚构。此外,就算庄子梦中的“南面王乐”从精神层面缓解了常人因死亡未知性而产生的恐惧,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此种价值并非“死”的价值,而是庄子通过对死后世界的描绘展示给读者的。所以老庄生命理念中的死亡其实是没有价值可言的,或者说其死亡价值等于零,这是它与儒家生死价值观的最大差异。

老子对死亡的论述较少,故他的死亡价值观较为模糊,不甚明显。庄子则不然,他善谈生死,尤其是善于“以死观生”,所以探究先秦道家的死亡价值观念主要是基于庄子的死亡价值观来进行的。庄子的死亡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抹杀生命个体间死亡的区别,强调“生

异死同”,从而否定死亡的价值与意义。如《骈拇》所载,庄子认为“小人”为利而死、“士”为名而死、“大夫”为家殉身、“圣人”命丧天下,这些人虽然“事业”“名号”存在差异,但“伤性”“殉身”却是一样的。如伯夷与盗跖二人,伯夷为“名”而饿死于首阳山下,盗跖因“利”而死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5]294}。由此,在庄子的生命价值理念中,那些为名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固然他们以死而追求的事物不同,但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没有根本的差异,俱是“残生伤性”的行为。庄子以伯夷、盗跖为例进行论证:世人赞扬伯夷因忠节而饿死在首阳山,鄙视盗跖因贪财而死于东陵,称伯夷一类人为“君子”,称盗跖一类人为“小人”,“君子”“小人”只是后人对这两类人的评价称呼,但就个体生命的价值而言,哪里有“君子”“小人”的不同,他们都是一些为身外之物而不惜丧命的俗人,其实是非常可悲、可叹的。可见,“庄子不承认死的意义有不同,也就是抹杀死亡价值的高低大小之别”^[23]。否定“死的意义”,抹杀“死亡价值的高下之别”,也就相当于是对死亡价值的否定,因为在庄子看来,人无论是“为何而死”都是不值得的,都是“伤性”的行为,只有生命才是最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庄子的死亡价值观还体现在对儒家式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为道德价值而死的“自杀”现象的批评与嘲讽之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极力强调道德价值高于生命自身的价值,而庄子却在《盗跖》篇中借盗跖之口斥责孔子说:“世之所谓贤士,无异于骀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而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5]875},“世之所谓忠臣者,然卒为天下笑,皆不足贵也”^{[5]877},“子之道狂狂伋伋,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5]877}。《盗跖》列举了“贤士”“忠臣”,譬如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高、比干、伍子胥等人,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贤人、志士。伯夷与叔齐为了尽忠饿死于首阳山致使死后无葬,鲍焦为了廉洁自律守哭泣于大树之下而枯亡,申徒狄刚正直谏但最终投河自尽,介子推割肉侍重耳却终被大火烧死于绵山,尾生高因信守承诺而淹死于水中,比干忠心为国却被纣王剖腹挖心,伍子胥为吴国尽心却以沉江离世。这些所谓“贤士”“忠臣”都具有忠君、诚信、耿直等道德品格,为了至高的道德情操,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死捍卫心中的理想信念。可是,在庄子看来,儒家所赞扬的这些人俱是丧己于“名”的悲剧人物,他们好似被屠宰的狗、沉河的猪、操瓢的乞丐一样,只是为了

“名”就轻易丧命,是不懂得珍惜生命的愚者,根本不值得尊重与敬仰,相反应当受到嘲笑与讥讽。庄子所谓“本养寿命”“可以全真”是与上述轻死之徒的价值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是一种生命至上、以生命自身胜于一切的生命价值理念。钟泰谓:“‘全真’,即全其情。归根不过‘说其志意,养其寿命’八字。”^{[7]698}庄子言“养寿命”为“本”,“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12]457}可见,庄子是出于生命本然价值的本位意识对“贤人”作出评价的,他说这些为道德而死的高尚者,都是“诈巧虚伪”的人,说他们“为天下笑”“不足贵”,关于他们的事迹以及推崇、赞扬他们的言论也都是“奚足论哉”。

庄子批判“贤士”为“名”而死的行为,实质上也隐含着对儒家所注重的道德观念的批判,这是因为“好名”的前提是“贤士”具备儒家所谓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如忠信、仁义等。同时,庄子在《人间世》中又以“名”为例从处世方式层面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批判:

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5]126}

在这里,庄子依旧以“名”为例展开说教。庄子所谓“存诸己”是指自己的“全生”,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体,只有自己先得以存活,人才会去“存诸人”,这与杨朱的“一毛不拔”有些义理方面的相通之处,都是强调生命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在庄子看来,关龙逢与比干丧命于君王之手,只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他们都是“好名者”,为了名声而不惜冒死进谏“暴人”,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必死于暴人之前矣”。按照庄子的处世观念,人首先要保全自己的生命安全,要存身,然后才可以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活动。由此,庄子将生命看得比名利重得多,生命的本然价值是他的人生价值归宿,任何事物都不能与生命相提并论。需要注意的是,庄子对“好名者”的批判实质上也是对儒家所注重的伦理道德的批判,因为这些“好名者”都是为了实现仁义之“名”、忠孝之“名”、诚信之“名”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庄子说:“德荡乎名,名也者,相轧也。”^{[5]126}成玄英疏云:“夫德之所以流荡丧真,为矜名故也。”^{[5]127}“丧真”之“德”在庄子那里是指儒家为求得“好名”而形成的脱离“自然”“虚静”之真质的仁义道德。依庄子所言,儒家所大力倡导的忠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不过是“士人”为了取得好的名声而进行的伪作,而这些人

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实属愚昧。

以上是庄子对那些为“名”而死之人的批判,其本质是间接地、迂回地批判儒家的伦理意识与道德规范。在儒家强调的各种具体的道德观念之中,仁义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论述最多的君子之德,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指向的就是为仁义而死的人生理念。基于此,反对道德价值高于生命本然价值的庄子对儒家的仁义不可能不进行大力地批判。有学者提出:“庄子反对的不是仁义本身,而是反对儒家倡导的带有功利目的的仁义和统治阶级对仁义的无耻盗用。”^[24]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这是从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角度审视庄子对儒家仁义的否定。不过,立足于庄子的生命哲学来看,他之所以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与其“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关系更大。庄子说:“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5]282}仁义之“用”是“非道德之正”在于仁义对生命的损害。郭象注曰:“未能与物无方而各正性命。”^{[5]284}至于仁义如何危害生命,庄子指出“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残生损性也”^{[5]293}。由于老子和庄子皆以生命自身作为终极价值归宿,他们对于儒家为仁义而死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这是“殉仁义”的“君子”之为,是一种“残生损性”的“大惑”之举。在《盗跖》一篇中,庄子更是借用儒家的“圣人”之行揭窳仁义等道德意识不足以与生命相较的思想观念。所谓“不以美害生”“不以事害己”^{[5]888}都体现了庄子“生命至上”的价值本位意识,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死亡价值的否定。此种生死观念没有儒家生死观的群体性对人生社会价值的巨大塑造作用,但却体现了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

4 结论

总之,先秦儒家与道家的生命理念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不管是孔子、孟子、荀子,还是老子、庄子,他们都极为看重生命,肯定维护生命的价值。不过,两家在生命价值观上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儒家强调事功,追求生命的社会价值;老庄强调自然,追求生命的自我价值^{[1]212}。儒家高扬仁义等道德价值,甚至将其置于高于生命本身的地位,体现了儒家关注“人”之社会性与伦理性的思想倾向。与此不同,老子和庄子从在“人”之上的自然、宇宙视角看待生命的价值,将生命的本然当作人生的终极价值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忽略“人”的社会属性,复归到了“人”的自然属性。从儒道生命价值观的差异本身来看,两者存在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家对

“道”的不同理解:儒家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5]之“道”是社会伦理之“道”;而道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66}之“道”是自然之“道”。由于儒道两家理解与追求的“道”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倡导伦理道德价值,甚至以仁义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价值;而老庄以自然为价值本位,以生命自身为终极价值归宿,实质上认为死亡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与儒家崇高的死亡价值观具有塑造民族精神的巨大作用不同,老庄对死亡价值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抑制个体生命的社会性文化创造。不过,道家生命观的现代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老庄生命观对现代人的健康生命价值理念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人生价值是由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共同构成的,这就决定了传统的儒道生命哲学在现代人的生命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互补作用:儒家强调生命的社会价值,对当代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责任担当意识的培育无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老庄道家追求生命的个体价值,对现代人的豁达人生观与爱惜生命的实践智慧同样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注释:

- ① 死亡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是指对死亡价值的否定,认为生命本身的价值是生命的终极性价值,本文中“虚无主义”皆为此义,与西方哲学中的虚无主义在“否定价值意义”的层面上存在相通之处,但与叔本华、尼采等意志主义哲人强调世界本质的虚无有较大差异。
- ② “气化生死”的观念是老、庄共同持有的生死观念,老子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由“气”而生,归“气”而死,而庄子则直言“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东汉生死观[M]. 何俊,编. 侯旭东,等,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
- [2] 蒙培元.“道”的境界——老子哲学的深层意蕴[J]. 中国社会科学,1996(1):115-124
- [3] 陈鼓应. 道——精神家园[J]. 中国道教,2011(5):34-36.
- [4] 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M]. 楼宇烈,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2011:141.
- [5]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6] 经纶. 庄子生命哲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8.

□□□□余□□□□冬(终)又余以高同生九祀□□□□东土至于淮之□□子子孙永保。”^{[1]234}

由于该墓曾遭盗扰,而鼓座是少数带有铭文的器物之一,因此成为推断墓主人身份的关键材料。自从考古报告公布以来,学界对此高度关注,诸多学者对铭文进行了释读与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虽然目前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仍存在争议,但鼓座铭文作为核心证据,持续推动着相关讨论的深入与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最终解开墓主身份之谜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学界在九里墩墓葬研究方面已取得不少进展,但仍存在较大分歧。从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特征来看,舒城九里墩墓既不符合典型的钟离国墓葬的特征,也与蔡、吴等国墓葬存在明显差异,其国别与族属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1 九里墩墓葬文化属性的认识与辨析

综合来看,目前学界对九里墩墓主身份与墓葬所属文化属性的主要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主要结合墓葬地理位置、等级及部分文化特征,认为墓主可能是群舒的某位君主。发掘者认为,九里墩鼓座上圈铭文“佳正月初吉庚午余□□于之玄孙□□公□”中的“余”字即舒,墓主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君主^[1]。李学勤先生赞同这一看法,但提出墓主也有可能是受封于该地的楚国贵族^[2]。陈秉新先生经考证后认为,鼓座铭文“余以高同生九祀□□”当释作“余以高同生,九祀𠄎𠄎”,“𠄎”即“舒”。因九里墩墓位于舒城县城东四公里,恰处春秋时期舒鸠国地域范围内,故推断该鼓座为舒鸠氏遗物,墓主人应为舒鸠君主^[3]。

第二种观点以殷滌非先生为代表,他认为鼓座铭文中的“余舟此于”即《仆儿钟》之“余迭斯于”,其中“余”应释读为“徐”,因此该鼓座当为徐国之器^[4]。但该分析仅针对鼓座本身,并未对墓主国别与身份作出明确判断。

第三种观点以朱凤瀚先生为代表,他指出该墓“似已非是群舒之墓,而很可能是楚国占领该地后封于此地之贵族(封君)之墓”,但同时认为“墓主人也可能是已附属于楚的群舒贵族”^[5]。郑小炉先生从鼓座出土地点、时代及器物特征等方面综合来看,认为此墓当以楚墓为是^[6]。张志鹏先生亦主张其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墓葬:“九里墩墓的墓主作为楚国贵族,生前应该是率军依次灭掉蔡、钟离、杞三国的统帅,战争结束后受封在位于淮河中游的今舒

城一带成为封君。蔡侯朔戟为兵器,钟离公鱼(𠄎)铜鼓座乃战地所用建鼓之重要部件,均为军事用品,应该是楚灭蔡、钟离两国而缴获的战利品。”^[7]这种观点既重视考察了墓葬的地域因素,又重视对文化内涵的分析,富有启发意义。

第四种观点倾向于将九里墩墓与蚌埠双墩一号墓相联系,认为“由2006至2008年发掘的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对照九里墩春秋墓出土的青铜鼓座铭文,证明出土蔡侯朔戟的该墓亦应是钟离国墓葬”^[8]。赞同这一看法的学者有阚绪杭^[9]、孙合肥^[10]等。王鑫进一步提出,该墓可能为钟离国国君墓,墓主与鼓座铭文中的作器者“钟离公𠄎”应为同一人。其墓葬不在钟离国故地的原因可能因为吴国已于公元前518年占领钟离故地,钟离被楚迁往九里墩墓所在的今安徽舒城一带^[11]。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大多依据鼓座铭文的释读,对钟离国历史疆域及其变迁考量不够充分。

第五种观点以徐少华先生为代表,他指出九里墩墓发掘报告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位君主,可备一说,但“亦不能排除为吴国高级贵族的可能性”^[12]。这一观点的得出主要依据墓葬形制、规模、部分随葬器物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但缺乏足够论据。

第六种观点以杨德标先生为代表,他认为舒城九里墩墓在器物、铭文字体与纹饰特点上接近于寿县蔡侯墓,且墓葬中出土有一件蔡侯朔戟,应属蔡侯墓,墓主人为蔡成侯朔^[13]。李筱进一步提出,九里墩墓主应为偃姓贵族,但其祖先可能是从蔡国迁至舒国,而墓中所出鼓座应为墓主所获得的钟离国器物^[14]。这类观点主要依据九里墩墓与寿县蔡侯墓在文化特征上的相似性,未充分考虑楚文化对这两座墓葬的影响。

以上诸说虽具参考价值,但分歧仍然显著,尚需深入探讨。从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特征来看,舒城九里墩墓既不符合典型的钟离国墓葬的特征,也与蔡、吴等国墓葬存在明显差异,其国别与族属问题仍有待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受时代所限,第一、二种观点对鼓座铭文存在误释。铭文厘清以后,第一句已确定为“唯正月初吉庚午,余敖厥于之玄孙童麗公𠄎”。“童麗”亦作“童丽”,二字为何意虽在当时尚存争议,但“余”既不是“舒”也不是“徐”则为大部分学者公认。2006年,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中出土有九件编钟,正面正部铭文均相同:“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童丽君柏作其行钟童丽之金。”^[15]2007年安徽省凤

阳县卞庄一号墓亦出土有五件铸钟,钟体正面铸有铭文:“惟正月初吉丁亥,余口(厥)于之孙童麗君柏之季子康,择其吉金,自作(和)钟之。”^[16]⁶⁴凤阳县东板桥镇有钟离国城遗址,此地曾出土过一枚汉代的“钟离丞印”,确证了几件器物铭文中的“童麗”即为钟离,九里墩鼓座基本可以确定是钟离国遗物。故许多学者认为九里墩墓应为钟离国之墓,此说遂成为学界主流观点。但我们认为,结合传统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将九里墩墓推定为钟离国君主墓葬仍缺乏充分的实证支持。

首先,墓中仅出土一件带有“钟离”铭文的器具,并不能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为钟离国国君。正如不能仅凭墓中同时出土的蔡侯朔戟而认定墓主为蔡侯一样,单一器物铭文难以作为判定墓主身份的决定性证据。

其次,若仅以鼓座铭文、墓葬等级、墓向与随葬品以及摆放位置,认为九里墩墓与已发现的典型的钟离国墓葬具有相似性而断定其族属,则可能忽视该墓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和跨地域传播的可能性。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虽然与蚌埠双墩一号墓、凤阳卞庄一号墓存在部分相似处,但实际有明显差异。其一,在墓葬形制方面,蚌埠双墩一号墓与凤阳卞庄一号墓皆为圆形竖穴土坑墓,而舒城九里墩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且舒城九里墩墓也不存在填土构成的放射线现象和土偶垒砌的内壁遗迹。其二,在葬俗方面,双墩一号墓与卞庄一号墓中皆有殉人,说明钟离国存在殉葬习俗,这一习俗多见于淮河中下游的淮夷和东夷诸国,但未见于舒城九里墩墓。其三,在随葬器物特征上,九里墩墓出土的甬钟、簠、敦、兵器和车马器,在器型、纹饰等方面均与寿县蔡侯墓高度相似,与典型的钟离国墓葬存在明显不同,且九里墩墓葬中未发现具有钟离国特色的土偶。若九里墩墓为钟离国典型墓葬,其文化差异不应如此之大。尽管九里墩墓与寿县蔡侯墓的文化相似性高于已发现的钟离国墓葬,但我们仍不能仅凭此就认定其为蔡侯墓。需要注意的是,寿县蔡侯墓本身出土的诸多器物,在造型与纹饰方面与河南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相同,显示出浓厚的楚文化风格。胡平平先生指出,“九里墩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使用白膏泥,具有楚墓特征。2件铜簠、1件铜敦、几件鼎足都为楚文化风格。”^[17]由此可见,九里墩墓在墓葬形制和文化特征上更接近于楚文化系统。

再次,从地理层面和时间维度上来分析,钟离国故城在今安徽省凤阳县板桥镇,为小型诸侯国,领土从未涵盖今舒城地区,现已发现的钟离国墓葬均分

布在蚌埠—凤阳一带。《左传》记载钟离国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灭于吴,此后未有复国于异地的记载,而同墓葬中出土的蔡侯朔戟已确认为蔡成侯之物,蔡成侯于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72年在位,这表明九里墩墓主的下葬时间不应早于公元前490年,此时楚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张至群舒地区,距钟离国灭亡也已过去了近30年,在时间上也难以衔接。

2 九里墩鼓座的文化属性分析

舒城九里墩鼓座呈龙虎盘踞造型,采用浮雕技法铸成,外壁设四个衔环铺首,器身饰蟠螭纹和蟠虺纹,被学界命名为“龙虎纹四环铜鼓座”,亦称“四环形器”。其主要用于固定行军作战时所用的建鼓。相似器物在其他地区亦有发现,如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建鼓底座;1996年山西太原金胜村674号墓出土的夔龙纹鼓座;2002年河南叶县旧县4号春秋墓发现的建鼓座;2003—2005年在无锡鸿山越国墓出土的悬鼓座;以及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的蟠螭纹鼓座、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镂空蟠龙纹鼓座和山西青铜博物馆所藏的蟠蛇纹鼓座等。

从造型上看,各鼓座风格迥异:曾侯乙建鼓底座由八对大龙和数十条盘绕的小龙构成,呈镂空蟠龙造型,并镶嵌绿松石,极为繁复华丽;河南叶县建鼓座上有三十余条蟠龙相互穿插缠绕,结构密集;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镂空蟠龙纹鼓座上亦有大小不一的十几条圆雕蟠龙相互缠绕,外沿有三条小龙口衔圆环,较大的几条龙双眼是圆形的中空,可能原本有镶嵌物,这三件鼓座在造型上有较高的相似度。山西太原金胜村夔龙纹鼓座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的蟠螭纹鼓座则无立体浮雕,造型相对简朴;山西青铜博物馆所藏的蟠蛇纹建鼓座以三条盘绕的蛇形为主体,非龙形;无锡鸿山越国墓出土的悬鼓座为瓷器,下部有四个衔环铺首,上部为六条双头蛇,在材质上不同于其他鼓座。相比之下,九里墩鼓座所铸之龙数量较少,体型短小,卷尾带钩刺,形态近似夔龙,与其他几例存在明显差异。

此外,九里墩鼓座上还饰有两个对称排列的虎头,虎嘴大张,双目圆睁,形成龙虎共存的独特造型。尽管鼓座略有残损,但从现存断面形态推断,龙与虎的躯体原本应是相互衔接缠绕,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造型在至今发现的鼓座中仅此一例。

古人对虎的崇拜心理广泛存在,这一点从湖北石家河^[18]、安徽凌家滩^[19]、四川三星堆^[20]等遗址出土的虎形器物中可见一斑。不过,这种崇拜现象

在历史上似乎呈现出一定的地域集中性,以华中、华南地区尤为显著。这一分布特征或与古代中国虎类的自然分布范围有关:上古时期,政治经济中心多位于豫、陕、晋等中原地区,而南方则开发较晚,地广人稀,森林茂密,为华南虎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华南虎主要分布于中国中南部,其他虎种如东北虎、新疆虎、印支虎等很少活跃于中原核心区,这可能是导致中原地区虎崇拜遗存少于南方的原因之一。

商代卜辞曾记载南方一个名为“虎方”的方国。卜辞中有“虎入百”(《合集》9273反/2);“乙亥卜,贞令虎追方”(《合集》20463反/2)。郭沫若先生认为,虎方位于江淮流域,疑即徐方^[21]。《左传·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注》:“夷虎,蛮夷叛楚者。”^[22]丁山先生认为虎方即此处记载的“夷虎”,并指出:“是虎方者,宗周所谓淮夷,春秋所谓群舒矣。”^[23]《安徽通史·先秦卷》引《水经·肥水注》云:“肥水北迳芍坡东;又北,迳死虎塘东;又北,右合阎涧水,水积为阳湖,阳湖水自塘西北迳死虎亭南,夹横塘西注。”此死虎塘在今安徽寿县东南四十余里处。“死虎”即“夷虎”,因上古夷、尸、屍、死为一字。此地当淮水之南,属群舒,虎与舒古音相通,所以虎方疑即后来的舒方^[24]。尽管许多学者的看法具体有所不同,但均认为虎方位于江淮地区,与钟离国相距不远,应同属淮夷族群,在文化上可能相互影响。郭静云先生指出,虎方以“虎”为名,正反映了该族群对虎的崇拜^[25]。安徽阜南县于1957年曾出土过一件殷商时期的龙虎尊,龙与虎共雕刻于一器,三条龙位于器肩,作蜿蜒形状,龙的头、角均突出成为三个铺首,三个虎头位于器的腹部,张面露齿,作食人状,刻镂古朴生动,细致精美^[26]。九里墩鼓座上所铸的虎头形象,亦是这种淮夷文化特征的具体展现。

从纹饰风格来看,九里墩鼓座的兽身部分遍饰蟠螭纹,器身则饰有蟠虺纹,这类装饰手法与楚国青铜器较为接近。楚国青铜器普遍采用细密繁复的蟠虺纹作为底纹,并常在器表铸有立体的动物形象。九里墩鼓座在装饰风格上与楚式青铜器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楚文化的影响。但其整体仍保留有自身文化的独立特征,反映出淮夷地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延续了本地传统的艺术表达方式。

在器物性质与功能方面,现今已发现的鼓座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曾侯乙建鼓底座与河南叶县建鼓座为代表,造型精美复杂,可能属于礼乐器具,主要用于宴飨、仪典等场合的演奏;另一类包括太原

金胜村夔龙纹鼓座及山西青铜博物馆所藏的蟠蛇纹鼓座,造型相对简单,更可能用于战争中的战鼓陈设。九里墩鼓座在性质功能上应属后者。

从九里墩鼓座铭文来看,最初由于锈蚀严重,铭文释读困难,后来殷涤非、曹锦炎、何琳仪、王少清等专家学者先后对该铭文进行了释读,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其中张志鹏先生对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考校订,将铭文隶定如下:

唯正月初吉庚午,余敖厥于之玄孙童鹿公
 𠄎,择其吉金,玄纁纯吕,自作□鼓。命从若鼓,
 远淑闻于王东吴谷,逆(迎)[于]徐人、陈
 [人],去蔡于寺,以神其臭……以支野于陈
 □□山之下,余持可参□□,其□鼓苾苾,乃于
 之零,永祀是扃,侁公获飞龙曰夜白……余以共
 疏示□嫡庶子,余以会同姓九礼,以飮大夫、朋
 友,余以□□□于东土,至于淮之上。世万子孙
 永保。^[27]

由铭文内容可知,九里墩鼓座应为钟离公自作之器。部分学者认为其自称为“公”属于对周代礼制的僭越。然而,纵观已出土的青铜器材料,此类现象并不罕见——无论周天子所封实际爵位是侯、伯还是子,众多诸侯国君在其自作器中皆自称为“公”。例如,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六四号墓的楚公逆钟,上有铭文“隹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夫壬四方□”^[28]。“楚公逆”即西周晚期楚国国君熊罾。此外,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戈胡部也刻有“钟离公柏获徐人”^[29]¹⁴²的铭文。但楚和钟离在周代皆为子爵,此处的“公”显然是国君为了抬高自身地位的自称。而九里墩鼓座铭文中出现的“钟离公”的称谓,恰可证明该器为钟离国国君所有。

结合蚌埠双墩与凤阳卞庄一号墓出土的相关材料可知,春秋晚期先后有钟离公柏、柏之季子康与钟离公𠄎三位钟离国贵族的存在。再据九里墩鼓座铭文所载,钟离公𠄎为敖厥于之玄孙,可进一步推测钟离国的部分世系为:敖厥于→(子)柏→(孙)康→(曾孙)□→(玄孙)𠄎……^[30]。该铭文中的钟离公𠄎应为敖厥于玄孙、柏之曾孙、康之孙,但可能与康并非直系亲属。

据现有研究,钟离公柏约死于公元前560年前后,活动时间当在春秋中晚期,季子康为钟离公柏的少子,其去世可能晚于钟离公柏二三十年^[31]。考古报告将卞庄一号墓的年代下限定在鲁昭公四年^[16]²⁰⁸,即公元前538年,说明康去世之时钟离公𠄎可能已经继位。钟离公𠄎在鼓座铭文中自述:“余

以共疏流口嫡庶子,余以会同姓九礼,以飶大夫、朋友”,何琳仪先生认为“合同姓九礼”与《周礼·秋官·掌交》“九亲之礼”性质相同,系指合会同姓中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的九种仪礼^[32]。这里的“九礼”可能是钟离公馭为了联合同姓宗族而举行的一套礼仪,但亦不能排除“九”为虚指,用以突出礼仪的隆重。“飶”即“食”,“以飶大夫、朋友”是指赐食给他们,即设宴款待。这里的大夫、朋友应是指同姓和异姓的下属与盟友。这些记载都表明在鼓座铸造之时,钟离公馭的家族结构及其所控制的官僚贵族体系仍然完备。铭文中提到的钟离公馭亲自率军征战并在胜利后举行献捷庆功之宴,这表明钟离国尽管处于楚、吴等大国势力竞逐的夹缝之中,但在春秋晚期仍保持一定的政治独立性和军事自主权。其国君不仅能调动军队实际参与区域军事行动,还有能力通过宴飨等礼仪活动展示国力与威信。由此可见,钟离国在当时或许仍是淮河流域一个具有实际统治能力和文化自信的诸侯国。

此外,九里墩鼓座在形制与纹饰方面,与湖北曾侯乙建鼓底座、河南叶县建鼓座等同类器物存在显著差异,体现出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结合鼓座铭文,这或许可视为其铸造之时钟离国尚未灭亡的一个佐证。因此,鼓座最初的所在地更有可能位于今凤阳一带的钟离国核心区域内,而非群舒地区。同时,鼓座与墓中其他随葬器物之间,可能存在时代或文化来源上的差异。

3 鼓座流落于群舒之地原因探析

弄清鼓座出现在群舒地区的原因,是解开九里墩墓国别与文化属性的关键。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鼓座流传至该地区可能存在三种途径:

其一,作为通婚媵器随嫁而来。但结合该鼓座的使用性质及铭文内容来看,这一可能性较小。

其二,作为战争中的战利品被带回。若属此情况,则该鼓座应是墓主人在军事行动中缴获的战利品之一,与其他战利品一同随葬。

其三,由流亡贵族携带至此。公元前518年吴国灭亡钟离后,可能有部分钟离贵族流亡至群舒地区寻求庇护。这些贵族死后葬于当地,而鼓座作为象征国家权力的重要礼器,自然会被作为故国遗物随葬。

从现有证据来看,后两种假设更具说服力。这主要是由于鼓座作为国家重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流散更可能与重大的政治军事变动相关。

但进一步结合历史背景分析,该鼓座作为战利

品而随葬的可能性也较低。一方面,钟离国于公元前518年为吴所灭,若鼓座确系战利品,按战争惯例,理应归吴国所有。而九里墩墓地处楚国势力范围内的群舒地区,墓葬形制及出土的随葬品所呈现的吴文化特征均不明显,基本可排除该墓为吴国墓葬的可能性。至于张志鹏先生所言的墓主人生前应该是楚国率军灭掉钟离国的统帅一说,与现存文献记载不符,难以成立。

另一方面,九里墩墓葬中也未出土兽首鼎、曲柄盃等带有群舒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表明墓主人并非群舒贵族。至于杨德标先生提出的“墓主为蔡成侯朔”之说,主要是依据墓葬中出土的蔡侯朔戟。但九里墩墓葬所在地与蔡国实际地理位置存在矛盾,因此该说法亦难成立。

除鼓座外,九里墩墓葬中仍可见部分钟离国文化因素。例如,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盃虽已残损,但仍可辨认出其头部呈兽首状,双耳竖起,长颈张口;这一形制与凤阳卞庄一号墓出土的提梁盃特征相似。此外,九里墩墓中所出的青铜镈钟等器物,在造型上也接近于蚌埠双墩一号墓、凤阳卞庄一号墓及凤阳大东关一号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物。

然而,九里墩墓的主体文化特征及其地理位置,均表明它并非典型的钟离国墓葬。该墓整体呈现明显的楚文化风格,同时又包含少量其他文化因素,据此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依附于楚国、身份为钟离国后裔的贵族。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贵族的构成较为复杂,有许多他国贵族常居于楚,并获得了较高的爵位和官职。史书记载楚有贵族养由基,为养国后裔,曾随楚共王伐晋;吴王阖庐夺位成功后掩余、烛庸两位吴国公子也逃至楚寻求庇护,被楚昭王赐以封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逃亡贵族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了楚文化,一段时间以后,其原本的文化特征已不再明显。九里墩墓主很可能就是某一位在国灭后逃亡至楚的钟离贵族。《通志》云:“钟离,今濠州也。子孙以邑为氏,或言钟,或言钟离。楚有钟仪、钟建、钟子期。”^[33]其中钟建曾任楚昭王时期乐尹,表明确有钟离贵族曾在楚国担任要职。九里墩墓出土的蔡侯朔戟与青铜鼓座的铸造时间至少间隔约30年,结合前文对钟离公馭的生平年龄判断,墓主应非钟离公馭本人,可能是其后代子孙。由于国灭已久,加之墓主人长期在楚国任职,因此九里墩墓葬呈现显著的楚文化风格,同时遗留有部分钟离国文化因素。墓中刻有钟离公馭事迹的鼓座,便是少数能够追溯墓主人祖源信息的关键器物。

关于九里墩墓出土的蔡国铜戟。因此戟援胡上

有错金铭文共六字,铭文为“蔡□□之用戟”,李治益先生将铭文释读为“蔡侯朔之用戟”^[34]。这一说法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这类刻有所有者铭文的兵器多为自用,如安徽省南陵县和庐江县出土的吴王光剑上分别有“攻敌王光自乍(作)用剑以战戍人”^[35]和“攻吴王光自作用剑,余以至克肇多攻”^[36]的字样,钟离君柏墓中还曾出土有“余子白司此之元戈”^{[29]142}字样的徐君铜戈。前文已述,蔡侯朔即蔡成侯,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72年在位,此时间段也是铜戟年代的上下限。蔡成侯即位时蔡国的政治环境较为特殊:前任国君蔡昭侯因亲吴被弑杀,楚申公寿余、叶公诸梁遂将蔡国民众迁至负函(今河南信阳),完全掌控了蔡国政局。在此背景下,蔡成侯不得不采取亲楚的外交策略。而这一时期的楚国为了恢复曾经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持续对江淮诸国发动战争。蔡国新都州来(今安徽省淮南市境内)地处楚国东进的前沿,其军队或被楚用作东征力量。蔡侯朔戟出现于具有强烈楚文化特征的九里墩墓葬中,可能并非战利品,而是作为友好象征的器物赠送。春秋战国时期,兵器作为贵重物品馈赠并不罕见,如《史记》所载吴公子季札赠剑予徐君;20世纪末在安徽省六安市城西窑厂5号楚墓中曾出土的一件蔡侯产戈(蔡成侯之子蔡声侯之器),制作精美且带错金铭文,考古报告推测可能属于睦邻间往来的贵重物品^[37]。今山西省境内也曾出土过吴王光剑等吴国铜器。研究人员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当时晋吴两国通过盟会、聘使、媵女等方式,采取赠送、贿赂等手段使双方铜器相互流传是有可能的^[38]。因此,九里墩墓中所见的蔡侯朔戟,或与上述器物类似,可能是蔡成侯与九里墩墓主之间友好交往的见证,反映了该时期复杂的政治互动与个人关系。

4 结论

综上所述,九里墩墓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征。由此推测,墓主人作为亡国后依附楚的钟离国贵族,其墓葬既保留了象征宗族渊源的钟离公斲铭文鼓座,又通过蔡侯朔戟等器物展现了与周边诸侯国的交往交流,更在葬制、礼器组合等方面深度接受了楚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融合现象生动反映了春秋晚期江淮地区小国贵族在政治变局中的生存策略——他们通过器物铭刻维系故国记忆,又以文化认同换取新的政治身份。值得注意的是,九里墩墓出土的敦、簠等典型楚器与钟离遗物共存的现象,恰是楚国经略淮夷地区过程中“因俗而治”政治智慧的物化体现,也为研究钟离国灭亡后贵族阶

层的文化调适提供了珍贵个案。

参考文献:

- [1] 杨鸿霞. 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J]. 考古学报, 1982(2): 229-242, 277-282.
- [2] 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141.
- [3] 陈秉新. 舒城鼓座铭文初探[J]. 江汉考古, 1984(2): 73-78, 83.
- [4] 殷涤非. 九里墩墓的青铜鼓座[G]. 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五辑), 1982(5): 28-33.
- [5]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801-1802.
- [6] 郑小炉. 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J]. 文物春秋, 2003(5): 6-14, 50.
- [7] 张志鹏.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非钟离公鱼墓考[J]. 东南文化, 2016(6): 70-75.
- [8] 曹锦炎. 蔡侯兵器三题[C]//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2011),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235-241.
- [9] 阚绪航. 钟离国墓葬出土青铜器和铭文研究[M]//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上海博物馆. 两周封国论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524-534.
- [10] 孙合肥. 试论钟离[J]. 江汉考古, 2014(2): 68-71, 126.
- [11] 王鑫.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出土钟离公鼓座新研[J]. 江汉考古, 2024(2): 93-100.
- [12] 徐少华.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J]. 东南文化, 2010(1): 45-48.
- [13] 杨德标. 舒城九里墩墓主考[G]//楚文化研究会.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一集,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143-145.
- [14] 李筱. 试论安徽九里墩龙虎纹鼓座的年代与国别[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6(6): 62-67.
- [15] 阚绪航, 周群, 钱仁发, 等. 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0(3): 4-18, 97, 99.
- [1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凤阳县文物管理所. 凤阳大东关与卞庄[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17] 胡平平. 钟离诸墓研究三题[J]. 东南文化, 2023(1): 121-130.
- [18] 荆州博物馆. 石家河文化玉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78-95.
- [1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凌家滩玉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59-60.
- [2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祭祀坑[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35-36.
- [21]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17.
- [22] 左丘明. 左传[M]. 杜预,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996.
- [23] 丁山. 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8:150.
- [24]陆勤毅,李修松.安徽通史:先秦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195.
- [25]郭静云.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2):5-14.
- [26]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J].文物,1959(1):2.
- [27]张志鹏.舒城九里墩墓年代与国别考[J].东南文化,2012(2):68-70.
- [2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J].文物,1994,454(8):4-21.
- [2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钟离君柏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 [30]张志鹏.“钟离氏”族姓考[M]//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钟离君柏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497.
- [31]徐少华.童丽公诸器与古钟离国历史和文化[M]//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钟离君柏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494.
- [32]何琳仪.九里墩鼓座铭文新释[J].出土文献研究,1998(1):67-73.
- [33]郑樵.通志[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457.
- [34]李治益.蔡侯戟铭文补正[J].文物,2000(8):89-90.
- [35]刘平生.安徽南陵县发现吴王光剑[J].文物,1982(5):59.
- [36]马道阔.安徽庐江发现吴王光剑[J].文物,1986(2):64.
- [37]冯志余,万永林.安徽六安市城西窑厂5号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9,518(7):31-38.
- [38]戴遵德.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J].文物,1972(4):69-72.
- 责任编辑:寇国庆

(上接第121页)

- [7]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8]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9]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M].李波,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0]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M].方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
- [11]杨爱琼.先秦儒道生死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2]林希逸.庄子虞斋口义校注[M].周启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3]陈战国,强昱.超越生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 [14]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 [16]慈山.庄子内篇注[M].梅愚,点校.武汉:崇文书局,2015.
- [17]王先谦.庄子集解[M].沈啸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8]兰耀辉.《庄子》的生命哲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227.
-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8.
- [2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21]闫伟.生死的超越:从庄子到海德格尔[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2):39-45.
- [22]刘明.周秦时代生死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86.
- [23]郭大东.东方死亡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113.
- [24]张松辉.庄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
- [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2:168.
- 责任编辑:寇国庆

蚌埠學院學報

(综合类双月刊)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陈国龙

副 主 任:张亚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艳春	韦文联	吕 部	吕效华	朱兰保	朱家席
邬旭东	刘 娟	许 晖	孙兰萍	孙西超	李大胜
李文瑛	李如林	李宗群	吴长法	何 蕾	张 斌
张永芳	张亚新	张茂林	陈 荣	陈发来	陈国龙
陈恩红	周仁战	郑晓奋	胡 飞	赵生学	赵东勇
袁 飞	郭有强	黄迎辉	崔执树	葛金龙	魏天路

主 编:张亚新

副 主 编:郭有强 邬旭东 朱家席

目 次

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与实践·思政理论研究

- 根脉与魂脉的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路径 罗鸿(1)
“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观涵育家国情怀的当代价值 张书浩,路丙辉(8)

文学理论与新闻传播

- 论两汉文人的地域意识 宫伟伟(15)
轻重对立和身心二分的兼美体验
——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情动 张可鑫(22)
论王蒙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及其审美价值 陈梓涵(27)

艺术创作与设计

- AIGC 视域下 IP 构建驱动的红色旅游文创设计路径 杨蕊,许存福(34)

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建设与管理

- 皖南示范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 卢学英,邓洪波(41)
区块链技术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 陈小君(49)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
——基于股价同步性的研究 蒋宁,吴克平,方淑苗,等(60)

外国语言研究

- 理雅各英译《易经》家风思想的明晰化策略研究 任运忠(70)
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的殖民延续与文化商品化 王伟卓(78)
副文本视角下李文俊汉译福克纳小说的隐性操控行为研究 冯传振,申丹(83)

高等教育与教学

-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解析几何课程可视化教学探索与实践
..... 张金波,胡旭焕,施明华,等(89)
- 乡村振兴视域下徽州民俗体育研究
——以徽州嬉鱼灯活动的传承与发展为例 程晟(95)

综合研究

- 长三角乡村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与共建路径
..... 何修国,郭玮,李鸿渊(101)
- 可口可乐文化符号在中国市场本土化转译的接受度实证研究 储江晗(108)

淮河文化研究

- “尊道贵德”:老庄的生命价值观 闫伟,余武丞(115)
- 九里墩墓葬文化属性再思考 王世伟,雒有仓(122)

Journal of Bengbu University

Vol. 15, No. 3, Sum. No. 87, 2026

Main Contents

- Integration of Roots and Soul: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Developmental Pathway of the Cultural DNA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UO Hong(1)
-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as the Found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Family Ethics Concept in Family-nation Sentiment ZHANG Shuhao, LU Binghui(8)
- Regional Awareness of Literati in the Han Dynasties GONG Weiwei(15)
-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Light-heavy Opposition and Mind-body Dualism: The Affect in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ZHANG Kexin(22)
- The Urban Space and its Aesthetic Value in Wang Meng’s Novels CHEN Zihan(27)
- The Path of Red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Driven by IP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GC YANG Rui, XU Cunfu(34)
- Assessment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Southern Anhui Demonstration Area LU Xueying, DENG Hongbo(41)
- Impac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on Corporate Debt Default Risks CHEN Xiaojun(49)
- The Impa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Real Industries on Capital Market Pricing Efficiency: A Study Based on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 JIANG Ning, WU Keping, FANG Shumiao, et al. (60)
-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Explication for the Thoughts on Family Tradition in *Yijing* REN Yunzhong(70)
- Colonial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Commodification in Sherman Alexie’s *Reservation Blues*
..... WANG Weizhuo(78)
- Paratextual Perspective on the Implicit Manipulation in Li Wenjun’s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Faulkner’s Fiction FENG Chuanzhen, SHEN Dan(83)
-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Visual Teaching in Analytic Geometry Course ZHANG Jinbo, HU Xuhuan, SHI Minghua, et al. (89)
-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izhou Folk Sports under the Case of Fish Lantern Pl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ENG Sheng(95)
- Theoretical Foundati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Co-construction Path of Ecological Gree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Delta
..... HE Xiuguo, GUO Wei, LI Hongyuan(101)
- Acceptance of Coca-Cola’s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Localization Translation of China Market
..... CHU Jianghan(108)
- Respecting the Dao(“道”) and Valuing De(“德”): Laozi and Zhuangzi’s View about Value of the Life YAN Wei, YU Wucheng(115)
- Re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the Jiulidun Tomb WANG Shiwei, LUO Youcang(122)